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 著

巨木丛书 04

全彩插图本

现代日本学第一书 影响持续半个世纪

透视与超越日本的首选读本

250幅浮世绘及现代摄影

菊与刀

从民族性格与文化的角度
揭示战后日本快速崛起的真正原因



南星越 / 译

南海出版公司

C713.32
2

全彩插图本

现代日本学第一书　影响持续半个世纪

透视与超越日本的首选读本

250幅浮世绘及现代摄影

从民族性格与文化的角度　揭示战后日本快速崛起的真正原因

菊与刀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 著

南星越 /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7 · 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与刀／（美）本尼迪克特著；南星越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7.10

ISBN 978-7-5442-3877-9

Ⅰ.菊… Ⅱ.①本… ②南… Ⅲ.文化－研究－日本

Ⅳ.G131.32 C95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3294 号



巨木丛书

项目创意／设计制作／紫圖圖書 ZITO

菊与刀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

南星越／译

责任编辑／万夏

出版发行／南海出版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世艺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23 印张

字数／150 千

书号／ISBN 978-7-5442-3877-9

定价／58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大藤芳
明治十年 月 日岁叔御届
一大区八小区南金六町十 四番地
画工 月岡米治郎
一大区六小区通一丁目十九番地
岁叔人 大倉孫兵衛



武士与荣誉

浮世绘 日本 约1877年

惊涛骇浪间，战船已被大海吞没，剩下的两支队伍在水中殊死搏斗，为荣誉战斗到底。这是一个视荣誉如生命的民族，却在半个多世纪前用军国主义将自己的荣誉毁于一旦。但是在短短几十年内，他们却在经济战场上赢回了荣誉。关于原因，本尼迪克特已在书中阐明。透过一花可以看世界，透过一刀亦可以看民族，菊花与刀象征的日本人二元化性格将在本书得到全面的展现。



武士道

武士铠甲 中世纪



年轻的明治天皇

摄影 19世纪

情义的束缚

荒木经惟 摄影 现代



第二代大谷鬼次之奴·江户兵卫

东洲斋写乐 1794年

目 录

《菊与刀》中的浮世绘与启示录 8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12

好斗又温和；黩武又爱美；桀骜又谦逊；顽固又善变；勇敢又怯懦；保守又开明……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38

他们认为，日本才是能够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唯一的国家……

第三章 各得其所 各安其分 68

等级制，日本人看做是正当的而且可行的社会结构，他们的各项活动皆以此为准则。

第四章 明治维新 110

斯宾塞在给伊藤博文的信中写道，日本传统习俗中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国民福利的基础……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136

“恩”的用法虽多，其中有一个意思是共同的，那就是承受的负担、债务或者重负。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154

“恩”是永久长存的债务，“报恩”则是紧如张弦的偿还。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却是善行。

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

176

“情义”分为两类：一类为对社会的情义；另一类为对名誉的情义。

第八章　洗刷污名

192

一个正派的人会同时感受到恩情和侮辱，并对两者都要认真回报。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224

日本人把生活变得很难处理，他们像艺术品一样培养肉体的享乐，又牺牲享乐去献身于义务。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244

“忠”、“孝”、“情义”、“仁”、“人情”等德行规定构成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276

自我修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一类为“圆熟”。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302

幼年和老年是自由的领地，婚姻却是戴上“枷锁”的开始。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346

日本人迈出社会变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的“错误”和失败。



对镜自照

二代歌麿　浮世绘



赦喻的五条训诫

雕塑　日本



宁死不降的武士

雕塑　日本



赶路的轿夫

歌川广重　浮世绘

《菊与刀》中的浮世绘与启示录

一本经典的畅销书

经典和脑神经的碰撞造就了《菊与刀》的畅销。

碰到日本题材的作品，多数的中国读者的神经都会不自觉地紧绷。这个小小的邻居，一手造就了我们记忆中最近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另一手造就了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昔日南京城头的太阳旗和现在儿童手中的索尼游戏机共同刺激着我们的神经，令我们紧张，而紧张的精神状况下任何反应都是不过分的。只是不过分不代表有益。

负面的刺激往往造成负面的反应，比如：气愤，仇恨，攻击，谩骂。所以，读此书之前，中国读者首先要做的，莫过于控制情绪。

不得不承认，在控制情绪方面，有一个美国人做得很好，她就是鲁思·本尼迪克特。美国也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曾受到日本战争伤害的国家，而本尼迪克特也正是在二战期间受命于美国战时情报局，从她的老本行出发，利用文化人类学家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她将这一番冷静研究的成果整理成一份报告，供美国政府参考在战后如何对日制定政策。我们无从考证这份报告在美国对日作战的军事政治决策上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但其在战后美国对日政策及日本局势发展上的惊人预见性却是有目共睹的，而其在日本民族性研究方面产生的影响更是怎么说也不为过。这份报告，便是《菊与刀》的基础。

二战之后，作者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投降以后的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为书名出版，引起轰动。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已重印36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

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第一书，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文化人类学的经典巨著，也成为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人文社会学科的必读书，更另人啧啧称奇的是，这本100%的学术著作，在当代中国仍然畅销。

它在中国的畅销，归因于我们受日本刺激而时时紧绷的神经。那根神经在给我们制造紧张情绪的同时，也引起我们对日本的深深好奇。当好奇心压过波动的情绪之后，人们便开始为自己的好奇心寻找答案。这个时候，经典的《菊与刀》浮出水面。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其生命力。《菊与刀》出自专业研究人员之手，目的在于关乎国家关系的政策制定，其写作态度必然极其慎重，研究方法必然极其严谨，结论成果必然极其严肃。在当时文化人类学所拥有的技术水平下，这部《菊与刀》，从一个西方的冷静视角，尽最大可能精确描绘了一幅日本百态图，尽最大可能分析总结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慎重的态度，严谨的方法，精确而富有逻辑的结论成果，这一切造就了《菊与刀》的生命力，强大的生命力将《菊与刀》成就为经典。

一本精彩的学术书

丰富的资料与文化人类学技术工具造就的学术书。

谈到这本学术畅销书的内容，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她所收集到的各种资料。它的精彩之处不仅仅在于对事实游记般的叙述，更在于基于文化人类学技术工具基础上的整理和分析。作者试图通过她所掌握的资料，从日本人的种种行为当中整理出他们的行为模式，再从心理学、人类学等观点出发，对这些行为模式进行解释。其最终目的，在于求得对日本人民族性的清晰而准确的把握。

总结一个人类群体的特性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透彻难免显得复杂化，全面又容易被指责肤浅。还好《菊与刀》的作者做得相当成

功，洋洋洒洒十五万字，皆如中的之矢，透彻分析八个字：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作者非常隆重地将它展开于第三章，进行实质性分析，在读者进行阅读时在心中树立起“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意识。这样一来，下面她叙述的各种奇怪的情况，也就都显得不那么突兀了。

不得不佩服这位美国学者收集整理资料的能力。战争造成研究者根本没有条件前往那个岛国进行实地考察，以便取得一手的资料，因此整本书的写作都基于作者对于已有资料的查阅、分析、甚至拼凑。即便如此，作者还是在书中列举出了大量的事例，如《四十七士》故事中的诸位家臣（第八章），入赘女家的“婿养子”（第三章），因为丈夫的钱被母亲偷走而抱着孩子自尽的妻子（第六章）……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形象和他们背后的传说故事一面挑起读者阅读的好奇心，一面为其提炼观点提供论据和材料。

“从日本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以来的75年间，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令人极为迷惑的‘但是，又……’之类的词句，远非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这是作者在本书第一章写出的形象而深刻的句子，接着作者解释了本书的题目《菊与刀》的含义：温和又好斗、爱美又黩武、尚礼又倨傲、善变又顽固、驯服又专断、忠贞又反叛、勇敢又怯懦……由此揭示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进而分析了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书十三个章节，以“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作为潜在中心，层层铺开，事理并重，准确犀利。

一本附图的参考书

了解文化上渊源联系的邻居的附图参考书。

《菊与刀》成书于1946年，半个世纪前的准确预言令人称奇，学术价值为无数读者追捧不已。半个世纪后，我们推出了附图的版

本，200 多幅插图，包括日本著名绘画大师葛饰北斋的浮世绘，美女画师喜多川歌麿的艺伎图，热爱中国文化的武士绘翘楚歌川国芳的杰作以及当代的摄影大师荒木经惟的惊世之作等，这些图片恰当地分布在各个章节中，让一本严谨的学术书以生动、具体而富有亲和力的形式走向更多的读者，尤其是那些曾经因为排斥“学术书”的晦涩和生僻而错过众多经典的读者。

对于读过此书的人，这些插图可以作为原文的解释和补充，尤其是在提及历史、文化、民俗时，都可以通过图片看到具体的实例，可以是某一场战争的浮世绘、某一场艺伎的欢宴、某一次民间的祭祀、某一处景观的摄影等；对于第一次读本书的读者，那么毫无疑问，这是截至目前最富有吸引力的版本。避开学术书令人懊恼的高深，单看插图，就可以对日本的历史、文化、民俗、宗教有了一个大概了解，做到阅读之前心中有数，并以舒畅的心情开始攻读这本厚重的学术书。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插图绝非信手拈来，它们不仅在内容上与原文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也具有同样的分量，尤其是二战期间珍贵的黑白图片，它们是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的日本。至于色彩鲜明、内容丰富的浮世绘和摄影，那些都是大师的心血之作，如果仅是浏览而过，那将是一种遗憾。

回归到本书的参考价值，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日本的当年的奇迹和当前的困境，文化层面的考量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中国和日本互为邻居，文化上渊源联系，从一个西方人眼中看日本，能够较好地跳出民族立场上的干扰，较为客观地了解我们的这位邻居。书中对与日本人行为方式的分析，推而广之应用到对日本当今政治、经济现象的分析，或更进一步，应用到对日本工商业的成功和教训的分析，都可以对了解对手、看清现实、改善自我产生巨大的正面意义。

凱風快晴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本尼迪克特为本书命名为《菊与刀》，目的在于用这二者来象征日本人颇具矛盾的民族性：生性好斗又异常温和；既推崇武力又追求美感；既桀骜自尊又谦逊有礼；既冥顽不化又柔弱善变；既性情温顺又不轻易任人摆布；既忠诚不阿又极易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乐于接受新生事物。

在与美国发生激烈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让人琢磨不透的。这个强大对手的行动方式和思维习惯与我们截然不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敌人。正如1905年的沙俄一样，我们面临的对手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但进行了充分武装和严格训练的民族。日本人并不承认那些西方国家所公认的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太平洋上的战争因此变得复杂起来。战争所面临的不仅是一系列岛屿登陆作战与困难卓绝的后勤工作问题，因此了解“敌性”便成为我们的重要工作。为了能够与之对抗，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行动。

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至今已经75年了。在此期间，外界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然而，又……”之类的词句，此类词句之多和令人迷惑的程度远非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一个严谨的观察家在论及日本之外的其他民族时，是不太可能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说，然而他们又很蛮横、倨傲；也不太可能既说这个民族异常顽固，又说，然而他们又极易适应激烈的变革；也不太可能既说这个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绝不轻易接受上级的操纵；也不太可能既说他们忠诚、宽厚，又说，然而他们很叛逆，满怀怨恨；也不太可能既说他们生性勇敢，又描述他们怎样怯懦；也不太可能既说他们做出的行动完全基于考虑别人的评价，即自己的面子，又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他不太可能既写一本书描述这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如何给予演员和艺术家以崇高荣誉，如何沉浸于对菊花的栽培中，又另



二元化的日本民族性格

《富士山下的情侣》
奥村正信 漆绘作品
18 世纪 20 年代

浮世绘是日本的风俗画，版画。它独具民族特色，主要描绘日常生活、风景和演剧。在这幅画的背景里，可以看到日本的象征——高耸入云的富士山。山下是一对身着传统服装的情侣，马上的男子佩带的是象征着武士道精神的武士刀，牵马的日本女子动作柔美而细腻。整幅画传达出一种祥和，而武士刀却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了日本民族的倔傲与黩武。这就是酷爱养菊与佩刀的日本民族，有着对抗的二元化性格的民族。



武士道　　武士铠甲　中世纪

这件中世纪的铠甲被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如同源远流长的武士道。武士道的古典名称为“叶隐”(hagakure)，如树木的叶荫，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这种精神是果断地、毫不留恋地、毫不犹豫地死。武士崇尚的是精神上的优越，是在心理上能先战胜自己，再战胜别人。他们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他们不会避开堪称无谓的自我牺牲。因此即使这个民族面临外族侵犯，身受重挫，却从未承认失败。

外写一本书来补充说明该民族对刀剑与武士荣誉的无比推崇。

但是，关于日本的论著中却纵横交织着上述所有的矛盾，并且这些矛盾都是真实存在的。菊与刀两者共同构成了一幅绘画。日本人的性情与行为方式是极其矛盾的，他们既生性好斗又异常温和；既推崇武力又追求美感；既桀骜自尊又谦逊有礼；既冥顽不化又柔弱善变；既性情温顺又不轻易任人摆布；既忠诚不阿又极易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日本人十分介意外界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但当他们的劣迹不被察觉时，又往往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训练严格，但又具有很强的反抗性。

既然了解日本已成为美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就不能对上述许多同样令人苦恼的矛盾置之不理了。严峻的问题接连不断地浮出水面：日本人下一步将如何行动？我们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就使他们投降，是否需要直接对皇宫进行轰

炸？从日军俘虏身上能够获得些什么？我们对日本军队及其本土宣传哪些内容才能在拯救更多美国人生命时削弱日本人那种负隅顽抗的顽强意志？其实日本人自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如果实现了和平，出于维持秩序的需要，我们需要对日本永远实行军事管制吗？我们是否要准备与那些疯狂抵抗到底的顽固分子在日本的荒凉要塞中决战？一场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是否可能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在日本国内爆发？如果这样的革命真的爆发，谁又将成为领导者呢？或者，灭亡才是日本民族的命运？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1944年夏初，美国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展开。同年6月，我接受了委托，开始从事研究日本的工作。为了深入了解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术我都可以拿来使用。许多美国人认为，对日战争还要持续至少三年，或许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然而在日本，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次战争是一场百年之争。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在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的局部胜利，但这些地区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公报根本就不承认海军的失败，他们的国民受到了蒙蔽，依然认为自己的国家还是胜利者。

然而，这种形势在进入六月以后开始发生变化了。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两年半来，最高司令部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就变得没有必要，对德战争的胜利也已经指日可待。太平洋战场上，盟军已经在塞班岛登陆。这预示着日军终将彻底失败。这次战役之后，我们的士兵就越来越频繁地与日军短兵相接。此外，通过与日军在新几内亚，在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Tarawa)、比亚克（Biak）等地区的战斗，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何等的可怕。

截至1944年6月，有关我们的敌人即日本的许多疑问急需我们作出解答。对这些疑问我们必须作出准确的回答，并能够提出真知



战争中的细节　　摄影　20世纪中期

1944年3月，一个东京的小女孩正在准备防空演习。日本是个重视细节的民族，仔细观察这张照片可以看到，日本在战时对孩子的保护训练是非常仔细的：她的长袖上衣和裤子以及头上戴的风帽都十分厚实，这是为了不受随时可能落下的火苗和瓦块的伤害；她的腰间别的是包扎伤口的毛巾，背心上还缝了一块布条，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学校。

灼见。这既是基于军事上、外交上和最高决策的要求，也是为了在前线向日军散布宣传小册子的需要。我们通过日本发动的所有战争必须了解的除了有日本政府的动机和目的、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经济、军事上的统计资料之外，还必须弄清楚日本人民对他们的政府存在哪些期望？我们不仅要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感情习惯，还要弄清楚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以及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我们必须暂时抛弃美国人采取行动的前提，尽可能避免用相同情况下我们自己的行动方式来盲目地推测日本人的行动。

我所接受的任务是艰巨的。我国正与日本处于交战中，在战争中很容易把一切都归咎于敌国。因此要想了解敌人的人生观就变得非常困难，然而这项艰巨的任务又是我们所必须完成的。任务的关键是弄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同等情况下我们将如何行动。我必须避免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负值”即不利条件来看待，而是努力看做是解释他们的“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加以利用；同时我必须用看待文化问题的视角来观察日本人对战争本身的进行方式，而不是将此看做军事问题。如同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体现了日本特色。他们对待战争所表现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什么特征？他们的领导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鼓舞士气、消除国民的惶恐？他们是如何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所有这些所显示的他们自以为

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对战争中的这些细节认真研究，以此来观察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暴露自己的。

然而，我们两国正在交战的事实却对我非常不利，这意味着我不可能采取实地调查的方法——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不可能到日本去，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不可能亲眼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并区分出关键性和非关键性的行为。我也无法观察他们作出决定时的复杂过程以及他们培育下一代的方式。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写的《须惠村》非常有价值，它是人类学家采用实地观察的方式写出的唯一的一部论述日本村落的专著，但这本书里却还没有提到我们在 1944 年遇到的有关日本的诸多问题。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巨大困难，但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却相信，还是有些研究方法和必要条件可以利用。至少我还可以利用文化人类学家最注重的方法，即与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很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亲身经历的很多具体事件，从中找到他们进行判断的方法，他们的叙述可以填补我知识上的许多空白。在我看来，一个人类学家要想完全了解任何一种文化，这种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对日本进行研究的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通过查阅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及统计资料来开展工作，他们从日本的文字或口头宣传的词句中寻求其发展的脉络。然而我确信，他们所寻求的答案，很多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价值中，因此，通过研究生活在这种文化的人，我们将会获得更加让人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是说我不查阅相关书籍，也不意味着我就不请教那些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有关日本的丰硕文献资料以及曾在日本居住过的许多西方优秀的观察家，对我帮助非常大，这是研究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们所无法享受到的。那些民族没有文字因而就无法用文笔来展现自我。西方人关于他们的论述也大多是凤毛麟角，浮光掠影。谁也不知道他们曾经

的历史。从事实地调查的人类学家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驱学者帮助的条件下，探究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的最高崇拜者等。我在研究日本时却有很多学者的遗产可以继承。嗜古好奇的文献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日本人的一些生活细节。不但欧美学者详细记载了他们的生动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许多不寻常的传记。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民族有强烈描写自我的冲动。他们不但描述自己的生活琐事，还宣扬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日本人的坦率程度实在令人惊异。当然，他们并不会全盘托出、暴露无遗。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那样做。尽管日本人描述自己会省略许多重要事件，因为他们对这些太熟悉了，就如同呼吸空气一样，已经习而不察了。就像美国人写美国时也一样。但是相对而言，日本仍然是

泛灵多神信仰　　摄影　日本　现代

神道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日本人一般在出生30至100天内，就会被父母带领参拜神社，在3、5、7岁的11月15日所谓三五七节和升学和结婚的日子也要到神社祈求神佑。"神社"代表着日本人的实用主义理性，"泛灵多神信仰"使他们形成了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习惯，并无视这些文化之间的冲突。他们很愿意将这些"有用"和"有效"的文化融合重组为一个新的实体，并为己所用。



一个喜欢自我暴露的民族。

阅读这些文献时，我采用了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的那种读书方法，即特别注意那些无法了解的事情。关于议会演讲辞中那一大堆罗列的观念，我必须知道些什么？他们为什么大肆攻击一些无足轻重的行为，却对一些骇人听闻的暴行视而不见，这种态度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发问，这幅绘画的弊病到底何在？要理解这些现象，还有什么是我必须知道的？



有争议的美　约翰·劳诺斯 摄影 现代

艺伎于17世纪在日本初露端倪，到现在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这些美丽的女子通过长期的学习，精于歌舞、礼仪、语言、装饰、诗书、琴瑟，甚至细微到如何鞠躬与斟酒。她们是日本古老文化的传承者。传统意义上的艺伎，在过去并不被人看做下流，相反，许多家庭还以女儿能走入艺坛为荣。然而，她们粉妆出入于风月场，她们的美，她们的神秘，她们的过去将来，引来了世人不同的目光，有惊艳，也有怀疑。

我观看了许多由日本编写、拍摄的电影，包括一些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看完之后再和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一起详细讨论，他们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的眼光和我是完全不同的。当我被一些情节搞得迷惑不解时，他们却并不是这样的。不仅如此，他们对剧情、动机的理解与我也不相同，他们是从整体结构上来理解电影的。像阅读小说一样，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长大的他们迥然不同。在这些日本人之中，有的会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进行辩解，有的则痛斥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一种人使我受教更多，但不论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他们所描绘的日本生活规范的景象却是一致的。

倘若仅仅是直接从其所研究的文化对象即人民那里搜集资料来寻找答案，人类



生如樱花之绚烂　　山本建三 摄影 现代

日本过去曾有“花推樱花，人推武士”的说法，所以日本的国花樱花，是一种社会神话，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承载物。樱花开放的时间较短，一般为一周，而日本人赏花的最佳时机却是樱花开始凋谢时，因为那一刻，他们将感受到一种悲怆、苦难与残缺合一的完美。这就是他们为至高理想抛却生死，为抗争命运忍受孤独，为追求生命的亮点即使宛若樱花般稍纵即逝的民族性格。

学家所做的事情也就和那些在日本居留过的一切西方优秀的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情没有差别了。如果一个人类学家的贡献仅限于此，那就不能期望他在以往外国居留者关于日本卓越著述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了。然而，由于文化人类学家受过某些具有特殊能力的锻炼，他们花费一些精力，试图对一个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增添新的贡献，这样还是值得的。

文化人类学家（这里前后的出现的“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指的都是作者自己。——译者注）了解多种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日本的很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甚至与马来诸岛、新几内亚、波里尼西亚等一些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极为相似。当然，根据风俗习惯的相似做出古代发生过移民或相互接触的推测，是很有意思的。但对我而言，了解文化相似性的价值是在于凭借这些类似或差异可以获得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启示，而不在于这类可能发生的历史关联。因



为，我理解这些风俗习惯在简单的文化中发生作用的机理。亚洲大陆的暹逻（今泰国）、缅甸和中国等民族也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我对它们或多或少有些了解，因而可以把日本与这些民族进行比较。在有关原始民族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已反复证明这种文化比较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部落具有和周围其他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但风俗习惯却90%与邻近部落相同，不过他们可以作些修改来适应10%的差异。在这一修改过程中，某些基本习俗会被排斥，即使这一习俗对整体的比率是非常之小，也可能致使该民族向独特的未来发展。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对这种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是最有裨益的。

人类学家还必须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为解决这一特殊问题他们的研究技术也必须加以磨练。凭借经验他们知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遭遇某些情况并必须对其含义作出判断时，其方式是迥异的。在一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人类学家会遇到超出人类想象力的以血缘责任或财务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他们必须对这类部落习俗进行调查，不仅要弄清楚亲属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而且还要调查这种习俗在部落行为中的影响，以及如何让每一代人从小就受其制约，身体力行、世代相传，和他们的祖先做的一样。

在对日本进行研究时，也可利用人类学家对这种差异、制约及其后果的关注。如今，没有人感觉不到美国与日本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差异。关于日本甚至出现过这种说法：只要是我们做的，他们就一定反其道而行之。一个研究者如果相信这种说法，简单地认为彼此之间的差异如此离奇以至于根本不可能了解另一个民族，毫无疑问这种想法是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自身的经验充分证明，即使存在离奇的差



文化的差异　《四十七死士之夜袭》 歌川国芳 浮世绘 约1830年

对于日本民族，世人有太多的不理解，但是也有太多的震撼。这是日本广为流传的“四十七死士”的故事，这47名武士为了给受辱的主君复仇，不畏幕府权威，夜袭宿敌；然而在这扣人心弦的一幕之后，却是成功复仇的武士们在主君墓前集体自杀的结局。这就是武士道中那种为“情义”不惜牺牲甚至以牺牲为荣誉的精神。

异也不会阻碍研究者对它的理解。跟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人类学家能够更好地把差异作为一种“正值”即有用的资源而不是“负值”来利用。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越是表现得离奇，他们就越会注意这种差异。文化人类学家对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中任何东西都不会视为理所当然，这就使得他们面向研究对象的每件事物时不会只注意少数遴选的事例。在关于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缺乏比较文化学训练的人总是将很多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往往忽视很多行为的整体领域。对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习惯以及人们对于熟悉事物的公认说法，他们都不进行研究。然而，投射在一个民族银幕上的大量内容却是这类习惯或公认说法，它们影响着该民族的未来，作

用远远大于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由于人类学家所研究的部落中的日常琐事与其本国相应的事物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就必须发展研究这些日常琐事的技术。当他们想理解某一部落中被看做是最恶毒的但另一部落中却被看做是最胆怯的行为时，或是试图了解在特定情形下，人们将如何行动、怎样感受时，他们就必须进行大量观察并注重细节。虽然他们曾在对文明民族进行研究时常常不大注意这些。人类学家要充分相信，这些才是解释问题的关键，而且他们还要知道如何进行挖掘。

这种方法在研究日本时值得加以运用。因为只有高度注意一个民族生活中人们的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对这一论证前提赋予的重大意义：不论在任何原始部落或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来源于日常生活。不论一个人的行为或意见奇怪到什么程度，他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其经验存在联系的。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感到迷惑不解，就越觉得在他们的

文化的融合　　歌川芳几　国芳画像　1861 年

歌川国芳三十几岁时，以超凡的毅力与信心推出《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宏大系列，一举成名。正如这位日本的绘画巨匠把中国的传奇故事引入日本绘画，日本的图书馆里也充满了中国古代的典籍文献，而且几乎都被译为日文，因此许多日本大学生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大学生对日本历史的认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的是，日本人对别国的文化的海纳、传播，以及把它们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东寺——京都的象征

摄影 日本 现代

公元5世纪初，日本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势力扩大到朝鲜半岛南部。公元6世纪，日本开始正式接受儒教，佛教也是在这个时候传入日本，从此在这个岛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这是日本第一高塔——东寺，也称教王护国寺，位于京都车站西南，是京都的象征。寺院里有座五层高塔，高56.4米，1644年重建，为日本国宝。

生活中一定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在发生作用。越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细节之处，我的研究成果就越大。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同样坚信这样的前提：即使是最孤立的细小行为之间也存在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构成总体模式的方式。人类社会总是在设计自身的生活。如果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和评价方式被赞同，那么这个社会中的人就将其视为全世界的基本理论，不论困难有多大，他们都将这些结论整合为一体。既然人们接受了这些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他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行思考和行动时就不可能采取相反的价值体系，否则就一定会带来混乱和不便。他们会努力追求更加的和谐一致。他们给自己准备了各种共同的理由和动机。一定程度的和谐一致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整个体系必将瓦解。

因此，经济活动、家庭生活、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紧密地啮合起来。当其中一个部门相对其他部门发生急剧的变化时，出于实现和谐一致的需要，其他部门就会受到巨大压力。在追逐权力统治的无文字部落中，对权力的崇尚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以及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中，同样也体现在宗教活动中。在存在古代文字著作的文明民族中，教会必然保留过以往历史的文献。没有文字的部落不包括在内。随着人们对经济、政治权力公开认可的日益加强，教会逐渐放弃了与其抵触领域的权力。他们虽然保留了词句，却更改了其内容。宗教教义与

政治、经济活动并不是完全隔离开来的，他们不是处于有完全堤防隔开的水域中，而总是越过这些假设的堤坝，互相融合，以至掺杂在一起不可分，这是绝对真理。研究者把调查的领域越是扩散到经济、性生活、宗教以及后代培育等各个领域，他就越能弄清楚其所研究的社会中发生的事情，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建立假说、搜集相关资料。他就能学会把任何民族所形成的要求都理解为他们从其社会经验中得来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的表现，不论这些要求是用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用道德的术语来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写的这本书探讨的是日本人关于生活方式的各种假设前提，并不是一本专门谈论其宗教、政治经济活动或家庭生活的书。它只是论述这些前提假定的自我表露，并关心其当时的活动。它是一本探究日本民族之渊源的作品。

民族的宽容　　葛饰北斋 1814 年或 1819 年

北斋的画风简单纯净，这是他引用中国的“庄生梦蝶”的题材的创作的绘画。透过这位观蝶哲人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庄生”的世界，而透过蝴蝶的眼睛，我们看到的则是蝴蝶的世界。正是由于身处的立场不同，看到的世界，拥有的观点也会不同，这样的情况普遍地存在于不同的民族之间，而唯有一种“宽容”的精神，才能使各个民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俗通水滸傳豪傑百八人之壹個
浪子燕青
北京の産まれて面雪
花を彫物も
泰安州
天齋
一勇齋
國芳画
聖帝誕生日
聖帝廟宴
相撲の大関
佳肩と云者
吉

浮世绘中的浪子燕青　　歌川国芳　出自《一百零八将》　约1827年至1830年

浪子燕青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三十六天罡星最后一位天机星，这位中国式的江湖人物，在日本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的笔下，根据大师对中国文化理解和他的日式绘画的经验，被融入了异土的风情。

20世纪里，我们所面临的一大障碍就是对一些问题仍然持有模糊不清，甚至是片面的看法，不仅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这个观念上是这样的，而且在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成为俄罗斯民族等观念上也是如此。国家之间由于这方面知识的匮乏产生了误解。我们有时候所担心的无法调节的分歧，其实仅仅是细小的毫厘之差所引起的。然而，一个民族基于其整体经验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不同于我们的设想的行动方针时，我们却在奢侈地谈论共同目标。我们压根就不找机会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是什么。一旦我们去了解，也许就会发现，某一行动方针仅仅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而已，并非一定就是坏的。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各民族对于他们自己思想和行动的说法。对任何一个民族的作家来说，努力地描述自己民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对生活进行观察时，每一个民族都使用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镜片。人们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透过镜片观察事物的。任何民族都将此看做是理所当然，对该民族而言，他们所接受的焦距和焦点仿佛是上帝安排的东西。如同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会搞清楚镜片度数一样，我们也不能奢望各民族会对自己看世界的方法进行分析。当我们想知道镜片的度数时，眼科医生就被训练出来了，他就会验明度数。毋庸置疑，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就是做当代世界各个民族的眼科医生。

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具有宽容态度和某种硬心肠。某些善意人士时常指责强硬心肠。这些“世界大同”的宣传家坚信并向世界各地的人灌输这样一种信念：所谓“东方”和“西方”，黑种人和



重檐与远山　　葛饰北斋 浮世绘 约1834年

日本桥是江户最古老的景观之一，早在1603年就已建成，横跨在隅田川上。桥上行人熙熙攘攘，桥下渔市生意兴旺。隅田川两岸的房屋多是存储货物的仓库，刷着灰泥或者以石板包砌。顺着重檐望去，是秀丽的富士山和云雾缭绕的城堡。就在这一眼望去的瞬间，日本的民间风情已被画师尽收画底，呈现于观众了。

白种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差异都是表面的，事实上，只要是人，他们的想法就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然而，我却不理解，相信了“四海之内皆兄弟”，难道就不能再承认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吗？这些软心肠的先生们似乎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张模子刻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国际亲善主义就无法建立了。不过作为对其他民族尊重的条件来强求人们接受这种单一性，就好比是强求自己的妻儿要同自己长的一模一样，这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具有强硬心肠的人承认并尊重民族差异的存在。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包容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法国可以是地道的法兰西，日本也可以是地道的日本民族，这并不威胁世界和平。对不相信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达摩克利斯剑，Damocles Sword，源于希腊的神话传说，相传达摩克利斯是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一世的宠臣。传迪奥尼修斯请他去赴宴，让他坐在黄金的宝座上，并用金银器皿



给他盛上各种美食佳肴，但却在宝座上空用马鬃悬了一把闪光的利剑。达摩克利斯抬头看见这把利剑时，惊恐万分。因为这把千钧一发的利剑随时都可能掉落下来置他于死地。后来，“达摩克利斯剑”就意味着“迫在眉睫的危险”。——译者注）的任何研究者来说，妄图用外部压力来抑制这类人生态度的生长的想法是荒谬的。他也不必担心一旦采取了某种立场就会让世界僵死不变。鼓励文化上的差

异，并不意味使世界静止。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及维多利亚时代，并未因此丧失其英国性。这正是因为英国人一直是英国人，能够适应不同时代，承认不同的标准和民族气质而存在。

要系统地研究民族差异，需要既有某种强硬心肠还要有某种宽容态度。只有在人们自己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时，才可能具备非比寻常的宽容态度。只有这样，宗教的比较研究才会发展。他们也许是耶稣教徒，也许是阿拉伯学者，或者他们



并不信教，但他们绝不是偏执狂。对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倘若人们小心谨慎地保卫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只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世界上仅有的解决方法，那么对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能发展。这种人决不会理解对其他生活方式的了解会增加他们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置自身于愉悦和丰实的体验之外。他们保守自持到如此地步，以至于除了要求其他民族采纳他们的特殊方式外别无其他选择。如果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就强求其他一切民族接受我们喜欢的信条。这就好比我们无法用十二进制来替代十进制进行计算，好比我们无法像东非的土著人一样采取金鸡独立的方式休息，其他民族也无法接受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因此，这是一本论述日本预期和公认习惯的书。它将研究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他们能期望被恭维，什么情况下又不能；他们什么时候会觉得羞愧，什么时候会觉得尴尬等。本书所论述的问题，最理想的根据莫过于普通的平民百姓，包括形形色色的人。这并不是说每人都曾置身于书中提及的每一种特殊情况，而只意味着那种



重礼的民族

《吉原仲之町夜樱》歌川广重 浮世绘
约 1834 — 1835 年

这是一个平凡的夜晚，月儿已至中天，吉原街道上的人们正匆匆地赶路。就算是夜深至此，人们仍不忘相遇时的问候礼节，彼此停步寒暄。尤其是徐步慢行的女子，她们的优雅与温柔更是让人惊叹这个民族对礼仪的崇尚。

情况下这些人都认可一致的行动。这样进行研究旨在描绘出思想和行为深处的态度。或许并未达到上述目的，但这是本书的理想所在。研究者很快会发现，在这项研究中，继续增加更多的调查材料，也不会使研究结果更有准确性了。比如说，在探讨某人在何时对谁行礼这个问题时，我们就没有必要对所有日本人进行统计调查。对于这种公认的习惯性行为，找任何一个日本人证明都可以，只要有几个确证就行了，没有必要调查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之后获得一致的结论。

想要弄清日本生活方式所基于的那些观点，研究者的工作就远非统计证实那么简单。人们迫切地需要他报告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怎样形成日本人观察现存事物的镜片的。他必须解释日本人的观点是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观点的。他还必须努力采取适当方式使那些使用完全不同的焦距来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将这些问题听明白。这种分析工作中的最有权威的判断者并不一定就是被称为“田中先生”的普通日本人。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更何况以他的眼光来看，美国人写的那些解释简直就没有必要。美国人研究社会，很少注意文明民族的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前提。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把这些前提看做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最擅长统计的研究方法，他们都把所有精力放在对意见和行为“分布”的研究上。他们分发大量调查资料、调查答卷，采集交谈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定等众多数据，对此进行统计分析，以求从中找到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发现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尤其是在舆论调查领域的研究方法在美国已经日臻完善到完美程度，可以在全国范围使用用科学方法选出的有效的抽样。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知道某一政治候选人或某项政策有多少支持者和反对者，还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

六月祇园祭　　北尾重政 出自《拟生十二月》 18世纪70年代中期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行为性格与他们古老的民族节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要观察一个民族的性格，则需从它的民族节日入手。画中是六月的祇园祭。祇园祭同东京的神田祭、大阪的天神祭是日本的三大祭礼，蕴涵着这个民族对神灵的笃信与对安康的向往。这一天由男孩们抬着神龛绕街游行，传说这样就可以驱赶城中流行的疫病。


十二月
物まね
あそび
六月
ぎおんまつり
天王
まつり



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来对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制并且由国民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些调查结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调查了解民众的意见。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存在一个极其明显却无人谈及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都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并将它视为理所当然。舆论调查的结果只不过是让我们对已知的事物多增加一些了解罢了。在了解另一个国家时，要想发挥投票方式的作用，就必须先系统地深入研究这个国家民众的习惯和观点。我们可以通过谨慎的抽样调查了解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有多少。可是，如果不先了解他们对国家的态度，那么抽样调查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只有在了解了他们抱有的国家观后，我们才能弄清楚各派别到底在街头或国会中争论些什么。一个民族持有的政府观，跟显示各政党势力的数字相比，要具有更普遍、持久的重要意义。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一致认为政府几乎是一



七夕欢舞　　浮世绘 歌川国贞 19世纪30年代

七夕本是源自中国的节日。到了每年阴历七月初七，就是隔在银河两端的牵牛星、织女星一年一度相会的日子，人们载歌载舞，大举欢庆，歌颂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这一风俗传入日本之后，渐渐融入日本文化，成为与他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种无法摆脱的灾难，它限制了个体自由。在美国人看来，政府官员的地位也许只有在战争年代才会比民间事业的任职者更高。这种国家观与日本人的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甚至跟欧洲许多国家也有很大区别。我们对日本人首先必须了解的正是类似国家观的这种基本观点。他们这些观点在风俗习惯、对成功者的评价以及有关他们民族历史的神话、民族节日的辞令中得到表现。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些间接表现进行研究，但必须是系统地进行研究。

对选举我们要研究赞成票、反对票的比例，同样，对某一民族在生活中所形成的基本观点以及所赞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要进行仔细、详尽的研究。日本的基本观念非常值得我们研究。我确实发现，只要我们弄清楚日本人具有的与西方人不同的人生价值观，掌握他们使用的概念和符号，那么以往我们看日本人行为时眼中的很多矛盾就不复存在了。我开始意识到，为什么日本人会把某些急剧变化的行为看做是其整体体系的组成部分了。我能试图道出其中的原委了。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我发现，在我最初看来他们使用的那些奇特语句和范畴，现在有了重大含义，而且充满日积月累的感情。它们区别于西方人所熟悉的道德观、罪恶观，他们拥有一套独特的体系，一套既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儒教的，而是包含了本国优缺点的日本式的体系。

名所江戸百景

浅草川首尾の松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等级制，战争的起因说，战时的日本急于向世界输出这一观念。他们认为，必须为建立世界的等级秩序而战，而且，这一等级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才是能够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唯一的国家……

任何文化传统中都包含了关于战争的信条。西欧各国尽管各有特色，但也在很多方面具有一些共性，比如号召全民参与的战争动员方式，局部失利时坚定信心的方式，战死和投降者的稳定比例，以及对待战俘的某些行动规则等，这些在西欧国家的战争中都是可预见的，因为即使包括战争在内，这些国家也同属于一个文化大体系。

日本与西方在战争惯例上的所有差异，都可以成为了解其人生观以及对人的全部责任看法的资料。我们进行研究的目的是要对日本的文化及行为进行系统的分析，至于那些与我们的信条不符合的东西在军事上是否重要，我们没有必要在意。但这其中的每一个行为却可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提出了许多与日本人性格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作出解答。

日本为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那些前提条件与美国的恰恰相反。其衡量国际形势的观点与我们存在差异。美国认为战争是由于轴心国的侵略所引起的。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国以征服的行为非法地打破了国际和平。不论是“满洲国”、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轴心国所占领的地方都证明他们推行的是以强凌弱的罪恶方针。他们的行为践踏了“让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信条，或者至少是侵犯了对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准则。日本对战争起因的看法则另有不同。在他们看来，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全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消除。日本必须为建立世界的等



大东亚理想　　摄影珍珠港 1941 年

“大东亚共荣圈”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1940 年 9 月，日本政府在一次讨论与德、意进行同盟谈判的高级会议上，把日本的势力范围规定为：“以日、满（指伪满州国。——编注）、支（支那，指中国）为中心，包括委任统治之德属诸岛，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就是指日本、中国、东南亚地区、西南太平洋诸岛以及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而后其又补充规定道：“但在谈判中，我方提出之南洋地区暂指缅甸以东、新几内亚以北。”图为 1941 年日本偷袭美国驻扎在太平洋珍珠港的舰队，隆隆的爆炸声和黑色烟雾向世界诉说着日本军队的野心。

级秩序而战。当然，这一等级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才是能够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唯一的国家，日本也才是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的国家。日本实现了国内的和平统一，平定了内乱，建筑了公路，发展了电力、钢铁等产业。根据日本官方数字，其青少年接受公共教育的比例达到了99.5%。所以，它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邻邦——中国。“大东亚”各国属于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把美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中驱逐出去，然后是英国、俄国，使之“各得其所”。诸国都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各自的位置，这样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这种被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在日本文化中包含的意义。这是日本民族自己创造出来的、最符合其口味的幻想。在日本看来，最大的不幸就在于那些被占领的国家，并不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理想。尽管如此，即使战败后，日本仍然认为不应该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这一理想。此外，在日本战俘中，即使是最不好战的士兵，一般也不会指责日本对亚洲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所怀有的目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保持其某些固有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和依赖。这一点与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是完全不相容的。但我们却必须弄清楚这一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又有什么益处。

日本对胜利的希望所寄托的依据也不同于美国的通常看法。他们宣扬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的言论。他们说：美国是个大国，军备的确优越，但这不算什么！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日本民众从国内的一家大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害怕数字就不会发动战争了。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在这次战争中创造的。”

在日本取得胜利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策划者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较量，并不是军备之间的较量。”当日本在战争中失利的时候，他们



日本的战争起因说　　摄影　日本　20世纪40年代

这是战时的一家武器工厂，妇女们也加入了这场战争，她们正在检验机关枪的子弹。对于这场站战争的起因，日本有不同的看法。在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建立世界的等级秩序而战，而且这一等级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才是能够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唯一的国家。

还是反复强调："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会失败。"在塞班、硫黄岛溃败时，这一信条毫无疑问成了很方便的遁词，然而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遁词。在日军炫耀胜利的几个月期间，它一直发挥着进军号角的功能，并且早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这一信条就已经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口号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名为《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就说道：日本的"真心使命"是"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与许多备战的国家一样，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存在担忧。整个30年代，日本国民总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一路飙升。偷袭珍珠港的那年，近一半的国民总收入


雪のあけぼの
小林幸八郎

武士的佩刀　　绘画 日本

军舰和大炮，象征了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犹如武士的佩刀象征了日本的道德品质。在明治天皇颁布“废刀令”以前，武士刀除被用做护身的武器外，同时还被日本人视为象征民族传统精神的一项灵器。现在，虽然它已不再具备实用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它在日本民族美的意识演变过程中，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就一把好刀需要经过不断的冶炼：高温加热反复折叠、锤平，尤其为使刃口更为尖锐，还需两种以上的钢材，并将之锤炼如剃刀般锋利，如同成就一种精神，需要不断修炼。

都被用于了陆海军的军备上。而只有百分之十七的政府总支出额用于民用的行政性支出。对物质军备的关心程度日本与西方诸国并无区别。然而，就像武士的佩刀只是日本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军舰和大炮，也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

美国向来追求强大，而日本却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像美国一样日本也开展增产运动，但其增产运动却基于一个独特的前提。他们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不灭的。物质虽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却是次要的、短暂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鼓吹：“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不存在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原封不动地被应用在战争中。日本的战术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传统的口号，并不是专门为这次战争而特意提出的口号。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就印着粗体字的“必读必胜”四个字。他们的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撞击我军军舰，这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无数素材。日本人把这类飞行员称为是“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原是指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时，一次飓风使其船队覆灭，从而拯救了日本，所以称为“神风”。

就是在日本民间，当权者们也推行精神胜于物质这一信条。比如，当民众在工厂里劳作了12小时之后又被通宵达旦的轰炸折磨得筋疲力尽时，他们就宣称：“身体越累，精神和意志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当老百姓在冬天的防空洞里冻得瑟瑟



伤兵的富士山之行　　摄影　日本　20世纪中期

富士山是东京附近的一座被大雪覆盖的死火山，日本人相信，爬上这座山就能净化自己的身体。这些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的老兵，正斗志昂扬地向山顶走去。对他们而言，此行是对天皇和日本的永世长存的祝愿。

发抖时，大日本体育会就通过广播指挥大家做御寒体操，并宣称这一体操不仅可以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还可以代替当时极其匮乏的为维持百姓正常体力所必需的粮食。他们说："也许会有人说，现在食品这么缺少还做什么体操啊。这是错误的。食物越是匮乏，我们越是要采取其他方法来增强体力。"这也就意味着要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美国人关于体力的认识，总是通过了解昨天的睡眠是否有8或5小时；饮食正常与否；有没有感到寒冷等状况，然后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日本人却认为这是物质主义，他们根本不关心体力贮存的问题。

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更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宣扬战争中精神可以超越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一家广播电台就曾报道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军的飞机分三四架小编队飞回机场。在第一批回来的人中有一个大尉。从自己乘坐的飞机走下来后，他站在地上，通过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他一架一架数着部下返回的飞机，脸上略带苍白，但神色却十分镇定。当他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时，他写完报告就向司令部走去。他到了司令部，向司令官汇报了情况。一汇报完，他就立刻倒下了。当时在场的军官们赶紧跑上前，但他早已经停止呼吸了。检查后，大家发现他躯体已经冰凉了，胸口带着致命弹伤。一个刚断气的人的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然而大尉的身体像冰块一样凉透了。他肯定是早就死了，支撑他做完这次汇报的是他的精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正是已逝的大尉所怀有的强烈责任感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显然，美国人肯定会认为这只是一段捏造的荒诞奇谈。但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是不会觉得这种广播可笑的。他们确信，日本的听众肯定不会把这看做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他们首先明确的一点是这个广播用事实证明，这位大尉的英雄故事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奇迹就不能存在呢？灵魂都是可以修炼的。这位



镇定的精神　腊像　日本

四位武士似乎在商议着什么，气氛有些凝重，但无法从他们的表情上窥透他们的内心。长期以来，他们已经练就镇定的精神，可以说是“胸有激雷，却面如平湖”。

大尉明显是自我修炼到一定程度了。日本人都懂得：既然“镇定的精神能够千年永存”，那为什么就不能在一位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的中心信念的大尉身上多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对此深信不疑：特殊的修炼可以让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这位大尉已经学会，并收到了成效。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系列极端行为嗤之以鼻，将他们的信条看做是贫穷民族的遁词，抑或是被骗者的愚昧妄想。但我们越是真的这样看待日本人，就越难在战时或平时应对他们。他们是用一系列的禁忌、排斥和一定的训练方法使这些信条渗透到日本人心中，并使之根深蒂固的。这些信条绝对不仅是单纯的怪癖。了解了这些，美国人才能理解日本人在战败时承认“仅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幻想”这些话的真正含义。而且更

为重要的是，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才有可能衡量他们这番自白的含义：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工厂中，经过与美国人的精神的较量，日本人的精神力量还是不够的。如同他们在战败后所说的那样：在战争中，他们“完全是凭主观意志的”。

不仅是关于等级制度和精神高于一切的说法，战争期间日本人对各种事情的说法都为比较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素材。他们奢谈安全、士气等只不过是精神准备上的问题。在遇到种种困境时，诸如城市的空袭、塞班岛的溃败、菲律宾的失守等，日本政府对老百姓所作的解释也总是千篇一律的：“这些情况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一切早在预料之中。”收音机仍在夸张地宣传着，明显是指望日本人可以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处在一个全面预计的世界之中。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让老百姓镇静下来。“基什加岛（Kiska）被美军占领了，日本本土已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但是对此我们早有估计，并已经作了相应的准备。”“敌人势必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在作计划时早就考虑到这些了。”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的日本俘虏也坚信，轰炸是不可能摧

竹枪破敌 摄影 日本 20世纪中期

一位精神矍铄的退役将军正在向穿教师制服和水户爱国妇女协会的成员现场演示，如何用竹枪来击退劲敌。美国人认为用“竹枪”守阵地只是幻想，然而这位退役将军手中的竹枪却让全军为之一震。



毁本土日本人的士气的，“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早就对此作了准备”。在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日本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中广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上空来了。但是，这是在我们飞机制造者的预料之中的，对此我们已做好了万无一失的准备，丝毫没有什么可值得忧虑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万事俱备，万无一失。只有基于这一信念，日本人才能够继续坚持他们那种必不可少的观念：这一切都是我们主动期求来的，绝不是被动来临的、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我们不应认为是消极地受到了攻击，而应该认为是我们主动地把敌人吸引到身边来的。“敌人，想来就来吧。”他们决不说：要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相反他们会说：我们所期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欢迎它到来。海军大臣的国会演说词中引用了18世纪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有两种机遇，一种是偶然碰到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极其艰难的状况时，我们必须自己去创造机遇。”此外，当美军突然攻进马尼拉市中心时，他们的报道说，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得意洋洋地说：敌军现已落入我方怀中了……”“敌军仁牙因湾（Lingayen Bay）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市就迅速沦陷，这正是山下将军的神机妙算，事态的发展正处在将军的部署中。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中。”换言之，他们越是失败，事态的发



精神准备

将军的号角仿佛有着神奇的魔力，听到的战士都能服从他的安排，奋力杀敌。号角声像一种号令，它给予了战士们精神准备，如同战时的日本政府告诉百姓：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左图为海螺制成的号角，它在战争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展就越是顺利。

跟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不过走的是另一极端。美国全力以赴进行战争是为了应战。这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我们遭受到了攻击，所以才要教训一下敌人。在谈及珍珠港以及巴丹半岛的溃败时，只要是顾及稳定国内民众情绪的发言人，就决不会说："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计划中充分考虑到的。"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这样说："这些是敌人肆意强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美国人会调节自己的全部生活，以经常应付各种挑战，我们会时刻准备应战。而日本人则宁愿选择万事预先都安排好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没有比未曾料到更有威胁性。

日本人在战争中频繁宣传的另一个主题也揭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经常说：全世界是如何关注他们的。因此，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民族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他们部下传达命令说，目前他们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中，必须表现出日本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诫令，在遭到鱼雷攻击，被迫弃舰时，必须以最出色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被全世界耻笑，美国人会将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公映"。这关系到全世界对他们的评价。日本人一贯很重视这一点，这在他们的文化中有着深刻的渊源。

在有关日本人的态度问题中，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他们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他的臣民究竟有多大的控制力呢？几位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七百余年间，天皇一直是并无实权的傀儡首领。民众所尽忠的是那些直接统领他们的君主，诸如"大名"，以及位于其上的军事大元帅，即将军。几乎没有人关心对天皇忠诚与否。天皇只是被幽禁在孤立的宫殿中，其活动和仪式都被各种规章制度严格限制着，而这些规章制度就是将军制定的。如果一个地位很高的封建诸侯对天皇表示出敬意，这甚至会被视为是背叛。日本的平民百姓几乎无视天皇的存在。某

些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只能通过日本的历史来理解日本，天皇在老百姓的记忆中只是模模糊糊、默默无闻的，为什么却能够被拥戴起来，成为日本这样一个保守的民族重新积聚力量的真正核心呢？这些学者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拥有永世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太夸张了，他们的坚持只能证明其论据的不堪一击。因此，美国二战时制定政策就没有根据要礼待天皇，反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猛烈地攻击日本近来编造的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制度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对天皇的神圣性发起挑战并使之摧毁，那么就会使日本的整个结构坍塌。



裕仁天皇正式登基　摄影　京都　1928年

1928年，裕仁天皇在京都的古皇居正式登基。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也不管天皇的手中是否还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在日本人民心中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很多优秀的美国研究者对此持有相反的意见，他们熟悉日本的情况，也读过来自前线的报道或日本方面的文献。有过日本生活经历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比在言辞上侮辱、攻击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更能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

坚信，日本人是不会把对天皇的攻击看做是对军国主义的攻击的。一战后，他们亲眼见证了，民主的呼声很高，军国主义的名声却非常臭，以至于军人外出到东京市区时都要谨慎地换上便装。但即使是那样的年代，对天皇的崇敬依然是狂热的。那些曾在日本居留过的人士声称，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并非“希特勒万岁’的口号可比，后者与法西斯的一切罪恶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是显示纳粹兴衰的一张晴雨表。

日军俘虏的证词证实了上述观点。同西方的军人有所不同，日军俘虏没有接受过在被俘后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训练，所以，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很明显地不统一。这种训练的缺乏当然源自于日本的不投降主义。在当时，这种状况虽然只限于部分军团和地方军队，却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俘虏的证词值得我们重视，是因为它们是日本军队意见的横断面。这些战俘并不是因为士气低落而投降的，也没有因投降而失去了典型代表性。除极少数外，他们几乎每一个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因无力抵抗才被俘的。

那些负隅顽抗的日军俘虏，将极端军国主义归于对天皇的效忠。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遵循圣旨”行事，是为了让“陛下放心”而战，是在“为天皇而献身”。他们认为“天皇指引国民进行战争，服从就是我的职责”。但是，这次战争和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反对者，也同样将他们的和平主义归因于天皇。就所有人看来，天皇乃是一切。反对战争的人称天皇为“热爱和平的陛下”，他们坚持认为天皇“始终是一位反对战争的自由主义者”，“是受了东条的欺骗”，“在满洲事变时，天皇就表示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情或未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厌恶战争，也不同意国民卷入到战争之中。天皇对他的士兵受到的虐待并不了解。”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恰恰相反。不管他们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为如何的不满，这些德国战俘仍然认为，必须由最高的

战争赔偿者——希特勒来承担战争本身以及准备战争的责任。然而，日本战俘却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对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政策的认同不能混为一谈。

他们觉得，天皇和日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称其为日本。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民众宗教生活的中心，是日本民族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此而遭受谴责。普通民众认为天皇不应对战争负有责任。应由内阁和军部的领导者来对战败负责，而天皇则没有责任。即使战败，所有的日本国民仍会继续崇敬天皇。

美国人一贯认为凡是人就不可避免地会受怀疑和批判，在我们看来，那些一致认为天皇可以超越一切批判的论



以死亡洗清耻辱　　摄影　澳大利亚　20世纪中期

一位日本战俘在澳大利亚的战俘营中自尽，以死亡来洗清战败的耻辱。在武士道的训条里，投降是怯懦的表现，因此战俘们坚信，光荣的牺牲才是他们的使命。



古老的头盔　　文物 出自日本

古老的武士头盔几乎破损，仿佛轻轻一触它就会彻底破碎。尽管如此，它还是散发出一种坚毅、执著的力量。古老的天皇制度，在时代变迁中逐渐变得不再适用，但是它具有的那种凝聚力和感召力却从未消失。

调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然而，直至战败，这些却毫无疑问地仍然是日本坚持着的舆论。那些最有审讯战俘经验的人都认为在每份审讯笔供上都注明“拒绝诽谤天皇”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包括与盟军合作过、曾在日军中宣传我们思想的人在内，没有一个战俘愿意诽谤天皇。从各地汇集的诸多审讯口供中，只有三份委婉地提到对天皇的反对，只有一份明确提到：“保留天皇将是日本的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一位意志薄弱者，他仅是一个傀儡而已”。而最后一份仅仅是作了一个猜测，认为天皇可能会让位于皇太子。他还猜测，如果废除了君主制，那么日本的青年妇女或许可能拥有羡慕已久的像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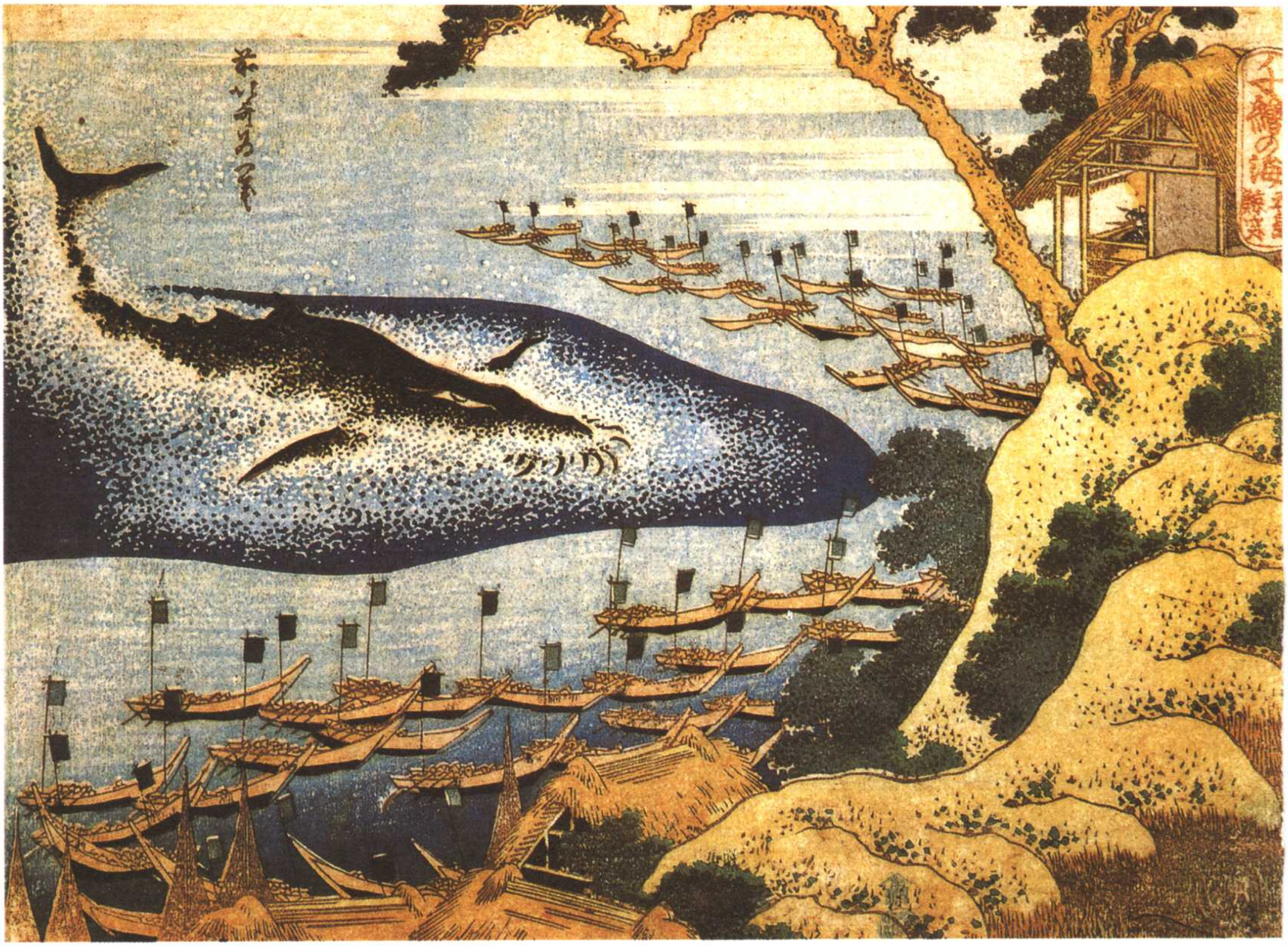
所以，日本军部统领就利用全体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尊崇，他们把“天皇御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天长节时，他们率领部下向东方遥拜三下，高呼“万岁”。军队受到日夜轰炸时，他们早晚和部下一起共诵天皇亲自在军人敕谕中向部队颁赐的“圣旨”，奉诵声回荡在森林中。军国主义势力极大程度地利用人们对天皇的效忠，他们号召所属官兵都要“奉诏必谨”、“免除圣虑”，要他们以尊崇之心报陛下之仁慈，要献身于天皇。然而，对天皇意志的这种服从却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的那样，他们只要天皇一声令下，就是只有一支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命令停止战斗，他们也会服从。如果天皇陛下下诏停战，第二天日本人就会放下武器。纵然就是最强硬好战的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能够让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让他们愿意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的，只有天皇陛下的圣旨。

日本人对天皇是无条件的忠诚，但对天皇以外的其他人和集体都加以批判，这两种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日本的报纸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人批判政府和军部领导。战俘们对前线的指挥官极为不满，尤其是对那些不能与部下同甘苦共命运的人破口大骂。他们对那些自己坐飞机逃跑，却撇下士兵让他们顽抗到底的指挥官更是恨之入骨。战俘们常常对一些军官备加赞扬，对另一些军官则严厉谴责。他们对日本的事物完全具有辨别善恶的能力。纵然是日本国内的报纸杂志也在批判“政府”，他们指出政府很不令人满意，要求更强有力的领导和更大的协作。他们还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如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重要的座谈记录，这次座谈的参与者包括了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以及日本的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的领导人物等。座谈中，一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有很多，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实现言论自由。最近几年，日本民众不敢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看

醒目的宣传公告　　摄影　日本　1943年

在珍珠港事件后，东京的宣传机器高速运转起来，日本人民被铺天盖地的新闻和报道吞没，它们全都在宣扬日本的士兵多么勇敢，这场为了抵抗侵略者、保卫天皇的圣战有多么正义。这是一家剧院的巨型广告牌，上面的标语是：我们不会停止进攻。





拒绝救援　　葛饰北斋 出自《千绘海》

日本人对勇敢的定义完全不包括救援的行动，连在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也被斥为胆怯，他们崇尚的是死亡本身就是精神上的胜利，如《捕鲸图》描绘的，难敌数十艘渔船包围之势的鲸鱼，仍蓄势待发，做困兽之斗。

法，他们因为说的话而受到惩罚。国民满腹狐疑，只是在表面应付，他们变得异常胆小。照这种情形，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位发言者对此进一步强调说：“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和自己选区的居民座谈到深夜，我想征求他们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但他们却唯唯诺诺，不肯讲实话。言论自由完全被限制了。这确实妨碍了人们斗志的激发。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限制了国民，使他们变得胆小如鼠，甚至跟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这使得本应发挥出战力的国民，到现在战斗力仍然未发挥出来。”

即使处在战争中，日本人也在指责政府、大本营以及他们的直接上司。他们

并不是绝对地承认等级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他们唯独不批判天皇。天皇的至高无上性是在近代才得以确立的，但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尊重？日本人的性格中什么怪癖成就了天皇的这种神圣不可侵犯性呢？只要天皇下达命令，日本人就会“挥舞竹枪”，奋战到死。同样，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也会乖乖地承认战败，接受被占领的事实。日本战俘的这些话可靠吗？会不会是故意迷惑我们的欺人之谈？还是确实就是这样的？

有关日本人作战行动的这些重要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前线作战，也关系到对日政策。还有一些态度，则更与日本军队有着关系。其中之一是对日军战斗力消耗的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的广播电台对此表现出极大的惊讶，其态度与美国人截然相反。广播内容如下：

官方对约翰·爱斯·麦肯因司令官受勋的解释不是他击退了日军，我们不清楚他们否定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尼米兹的公报已宣称他击退了日军。麦肯因受勋的官方理由是，他成功地解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基地。这个小报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的真实性，而不是虚构出来的。我们并不是质疑麦肯因将军确实救了两艘军舰。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了解这一奇怪的事实：“在美国，拯救两艘军舰就可以受勋了。

一切救援行动以及给陷在困境中的人的一切帮助，都会让美国人深为感动。勇敢的行动如果能解救受难者，就是更加英雄主义的行为了。日本人对勇敢的诠释则不包括这类救援。他们甚至把我们在B 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的行为斥为“胆怯”。他们的报纸、广播频繁谈论这一话题，他们认为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最高尚的，而谨小慎微是没有价值的。他们的这一态度在对待伤病员及疟疾患者时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在他们看来，那些负伤和生病的士兵已没有利用价值了。他们的医疗服务极其匮



日本对战俘的处置　《落入敌手的猫》绘画 日本

这是日本民间的绘画，取材于古老的寓言，这幅说的是猫成为鼠的囚徒后面临的是怎样的折磨。这种折磨恰好折射了二战中日军对战俘的处置。有这样的统计数据：20世纪40年代，在菲律宾群岛甲万那端，一万名战俘中，大部分都染上了多种疾病，包括痢疾、脚气、疟疾、坏血病和糙肤病。这些的病病因多为饥饿，或者由饥饿导致恶化，1/4的战俘在被关押后的头八个月死去。

乏，以至于难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来就匮乏的医疗设施由于补给上的困难就更难以维持。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向日军士兵灌输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上的胜利。我们那样对病人进行照顾，好比在轰炸机上配备安全设备一样，反倒是给英雄主义造成了干扰。首先，相对美国人而言，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就不会那样频繁拜访内外科医生。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都经常谈论说，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超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这些在日本却是不常

见的。总之，在战争中，日军既没有设置一个受过专门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并救助伤员的救护班，也没有配备系统的医疗设施，诸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对医疗品补给的关注之少就更让人感慨了。如果遇到某些紧急状况，他们干脆杀死伤病患者。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战场，日军常常被迫从设有医院的营地

撤退，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在有条件时预先转移伤兵患者的习惯。只是在敌人马上围攻到面前或是部队真正执行所谓的“有计划的撤退”时，他们才想到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却是伤兵被临走的值班军医全部用枪杀死，或者是用手榴弹自杀。

既然对伤兵的这种态度是日本人对待本国同胞的基本原则，那么在处理美军战俘时，它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按照我们的标准，日本人在对待战俘和他们的同胞问题，都犯了虐待罪。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Harald W.G1attly）曾说，他作为战俘被囚禁在台湾三年与跟囚禁在日军相比，美军战俘所受到的医疗护理要多得多。盟军战俘营中设有军医可以对俘虏进行护理，而日军却一个军医都没有设。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军仅仅设了一个医务人员来医护自己，还只是一个下士，后来才升了中士。这位上校在日军中一年只能有一两次机会看军医。（1945年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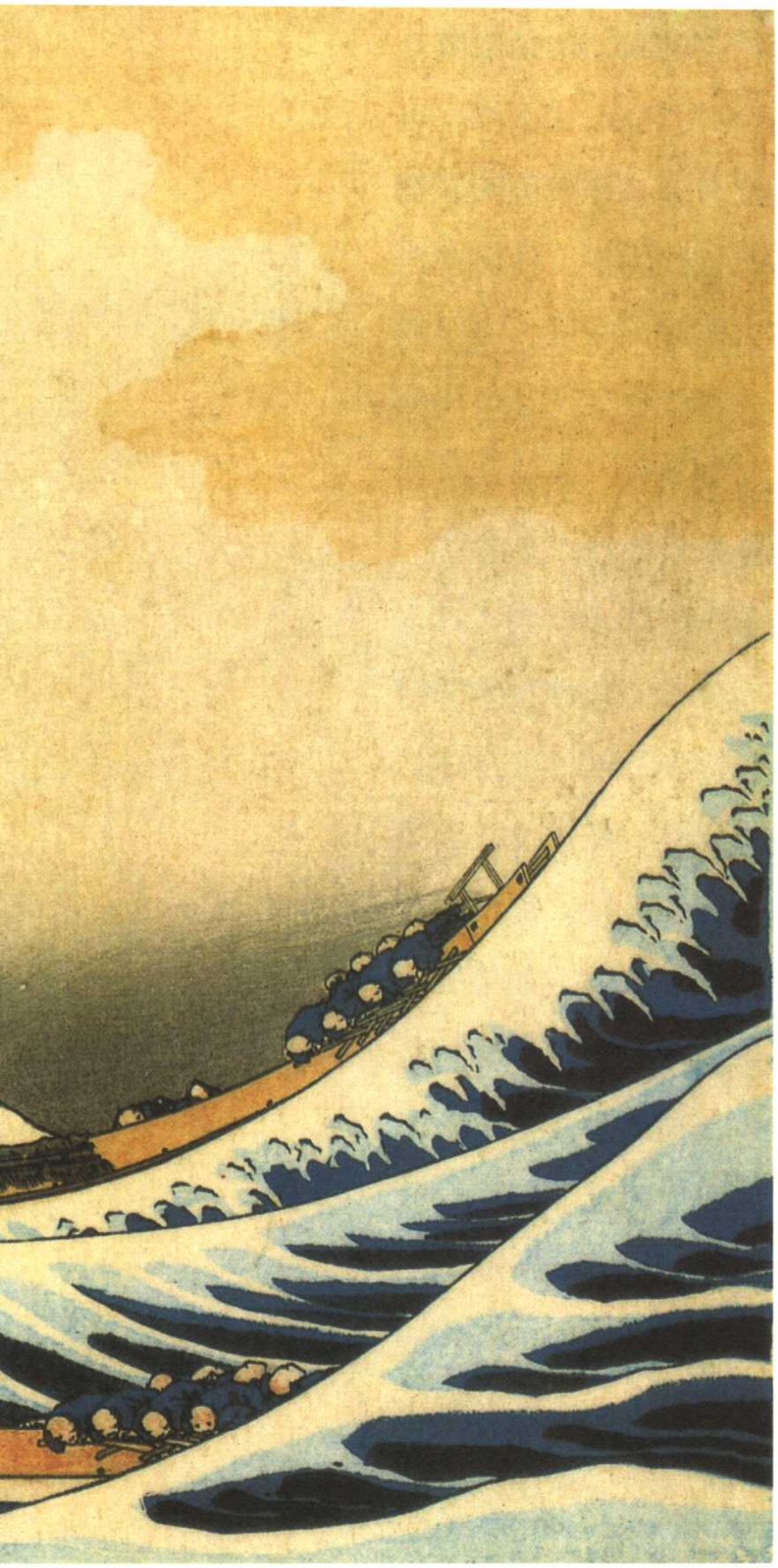
宁死不降的武士　　雕塑　日本

手握长戟的武士双目紧闭，仿佛在静静等待死亡的来临，他似乎已下定决心以死谢天皇。日本的兵员在这种宁死不降的精神的感召下，在绝境中总是以自杀式的进攻结束自己的生命，以保持荣誉，而从未想过要投降。





关于这种兵员消耗理论，日本人表现得最极端的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仍然寡不敌众、毫无希望时，便会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把自己看做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把这种情况告知他们本国，让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在西方国家，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平民，他们都不会因此而蒙辱。但是，对此日本人的看法则不同。荣誉就是拼战至死。面



日本的不投降主义

葛饰北斋　出自《富岳三十六景》

约 1830—1831 年

内忧外患如巨浪当头，但日本人却坚持将战争进行下去。他们的不投降主义在这个危急时刻成为了整个军队甚至全民族的精神支柱。他们的看法是，荣誉就是拼战至死，要么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要么赤手空拳冲入敌阵，发起集体自杀式的进攻，总之绝对不应该投降。

临绝境，日本士兵要么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要么赤手空拳冲入敌阵，发起集体自杀式的进攻，总之绝对不应该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被俘获，他就会觉得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的名誉丧失了，相对从前的生活，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当然，日本军队虽然有上述的军令，但在前线却不用对此专门教育他们的士兵。日军如此忠实地实践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虏与战死的士兵的比例达到 142：17 166，也就是 1：120。并且，在这 142 名战俘中，大多数都是在负伤或昏迷情况下被俘的。一个人自己或两三个人结伴投降的就更占少数了。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如果阵亡者达到了全军兵力的 1/4 或 1/3，该部队一般是不会不停止抵抗的。投降与阵亡士兵的比率大约为 4：1。而在霍兰迪亚（Hollandia）战役中，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投降与阵亡的比率达到 1：5，与北缅的 1：120 相比这已经是莫大的进步了。

因此，在日本人看来，那些被他们俘获的美国人，单是投降这件事就够可耻的了。纵然他们没有受伤，没有染上疟疾、赤痢等，也已经成为废物从而被排除在完好的人的范畴之外了。许多美国人都曾提到，在俘虏营里，美国人发笑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他们曾谈到这件事是如何刺激到日军看守的。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当了战俘本身就已经是奇耻大辱，美国人却居然不这样觉得，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日本军官要求俘虏营的看守们也必须遵守一些美国战俘所必须服从的命令。对日军来说，急行军或是乘坐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运输船转移，已是平常的了。有些美国战俘还谈到，日本哨兵曾反复地严令他们对自己的违章行为进行掩盖，最严重的罪行就是公开违抗。在战俘营中，俘虏们白天外出修路或进工厂劳作时，是禁止从外面带食物回来的，但这个规定往往只是一纸空文。因为水果、蔬菜被包起来就可以带进来。不过，一旦被发现，那就是严重的犯罪了，这就意味着美国战俘蔑视日本哨兵的权威。如果战俘公然挑战权威，即使只是一句顶嘴的话，也要被严厉惩罚。哪怕是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严禁顶嘴。在军队中，顶嘴是肯定要被严惩的。俘虏营中确实有很多暴行和虐待。我们对作为文化习惯导致的行为和暴虐行为进行区分，这并不是宽恕暴虐行为。

战争刚开始时，日军士兵坚持认为敌方会虐待并杀死所有战俘，因而他们更把投降当做是耻辱。有一个关于美军在瓜岛上用坦克碾死战俘的谣言在日本各地流传甚广。有些日军士兵想投降，但我军对此十分怀疑，为谨慎起见而将其全部杀死，这种怀疑常常是有根据的。当一个日本士兵除了死亡外别无其他选择时，往往以与敌人同归于尽为傲，甚至在被俘后也常常这样做。如同一个日军战俘所说："既然已经决定要用自己来祭奠胜利，那么不壮烈牺牲才是极其可耻的。"这种可能性使我军更加审慎，从而更使日军投降的人数减少。

投降是奇耻大辱，这一观念深深地烙在了日本人的灵魂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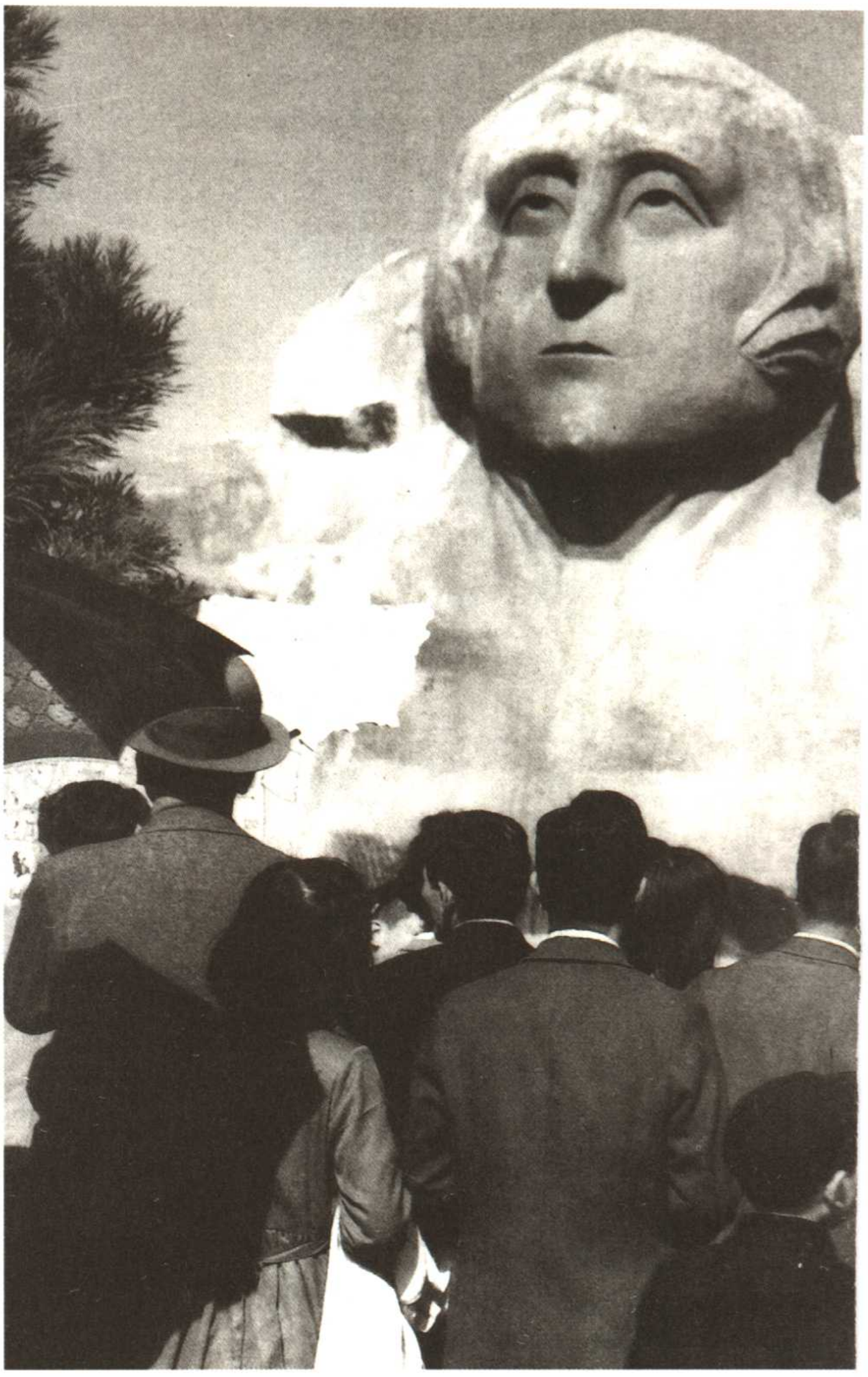
切腹的武士

绘画　日本

这幅画生动地描绘了一名武士把刀刺入自己腹中的情形。面对剧痛和死亡，他没有露出丝毫畏惧。

他们将此视为天经地义，我们的战争惯例与此却迥然不同。同样，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看来也不可理解。有些美军战俘要求将自己的姓名告知美国政府以便让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日本人极为震惊，他们十分蔑视这种做法。一般的日本士兵都没有料到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他们原以为美军会像日军一样顽强抵抗到死。他们实在理解不了，为什么美国人就一点都不以被俘为耻呢。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存在的最戏剧性区别，莫过于日本士兵被俘后居然能与盟军合作。日军头脑中完全缺乏适应新环境的准则。一旦他们名誉丧失，他



美国总统的困惑　　摄影 大阪 1950年

这是1950年的大阪展览会，经过日本艺术家的塑造，拉什莫山四位伟大的美国总统雕像的复制品有着困惑的眼神，仿佛在表达美国人对于日本人效忠天皇、无畏死亡、否认失败的不解。

们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生命。直到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日本战俘要求回国。不论战争结局将怎样，有些人都要求被处决。他们说："如果你们的惯例不允许这样做，那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好了。"结果他们比模范战俘还要好。一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军国主义分子甚至为我们指明了弹药库的位置，他们为我们仔细说明日军的兵力配置情况，制作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乘坐同一架轰炸机为他们指点军事目标。貌似他们的生命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内容与旧的完全不同，但他们却表现得同样忠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俘都这样。他们中的少数人顽固不化。并且不管怎样，以上行为的发生，必须以先提供一些有利条件为前提。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日本战俘，不敢轻易接受他们表面上的合作，这使得有些战俘营根本就不打算利用日军战俘可能提供的服务。但在接受日军战俘协助的战俘营中，都是消除了原先的猜疑而逐渐代之以对他们的信赖。



美国人并没有预料到日本战俘会有如此大的转变，这不符合我们的信条。然而日本人的行为就好比是这样：一旦他们选择了一条路就会全力以赴，如果失败了，就顺理成章地选择另一条路。战后，对他们这种行为方式我们能否加以利用？或者这只是个别士兵成为俘虏后的特殊行为？就像日本人在战争中的其他行为表现出的特殊性迫使我们要进行思考一样，是什么制约了他们的整体生活方式、各种制度的作用方式和他们的思维及行动习惯，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本书的核心，抑是日本人观念的核心。等级制，日本人看做是正当的而且可行的社会结构，并以此作为解决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他们的各项活动，如政治、军事、祭祀、婚姻和教育等皆以此为准则。

我们要理解日本人，首先要搞清楚“各得其所”所包含的意义。日本人对秩序、等级制度的信仰，与我们对自由平等的信仰完全不同。把等级制看做是正当的，将其视为一种可行的社会结构，对我们而言这是十分困难的。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赖是基于对个人与他人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持的整体观念，我们要想了解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就必须对他们的民族习俗做一番描述，包括家庭、国家、宗教信仰及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像看待国内的问题一样，日本人在看待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时也都带着等级制的观念。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将自己描绘为位于国际等级制金字塔顶端的角色，虽然现在这种角色已被西方各国取代，但他们对现状的承认，仍然是建立在等级制观念之上的。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表明他们非常重视这一观念。在1940年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前言中，日本人提到：“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以及意大利政府确信，使世界各国‘各得其所’才是维护持久和平的前提……”此条约签订时，天皇所发布的诏书也提到这一点。诏书中说：

弘扬大义于八方，缔造神舆为一宇，实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也，亦朕夙夜之眷念。今世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珍念者，惟在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袭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悦。唯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前途尚迢……

偷袭珍珠港当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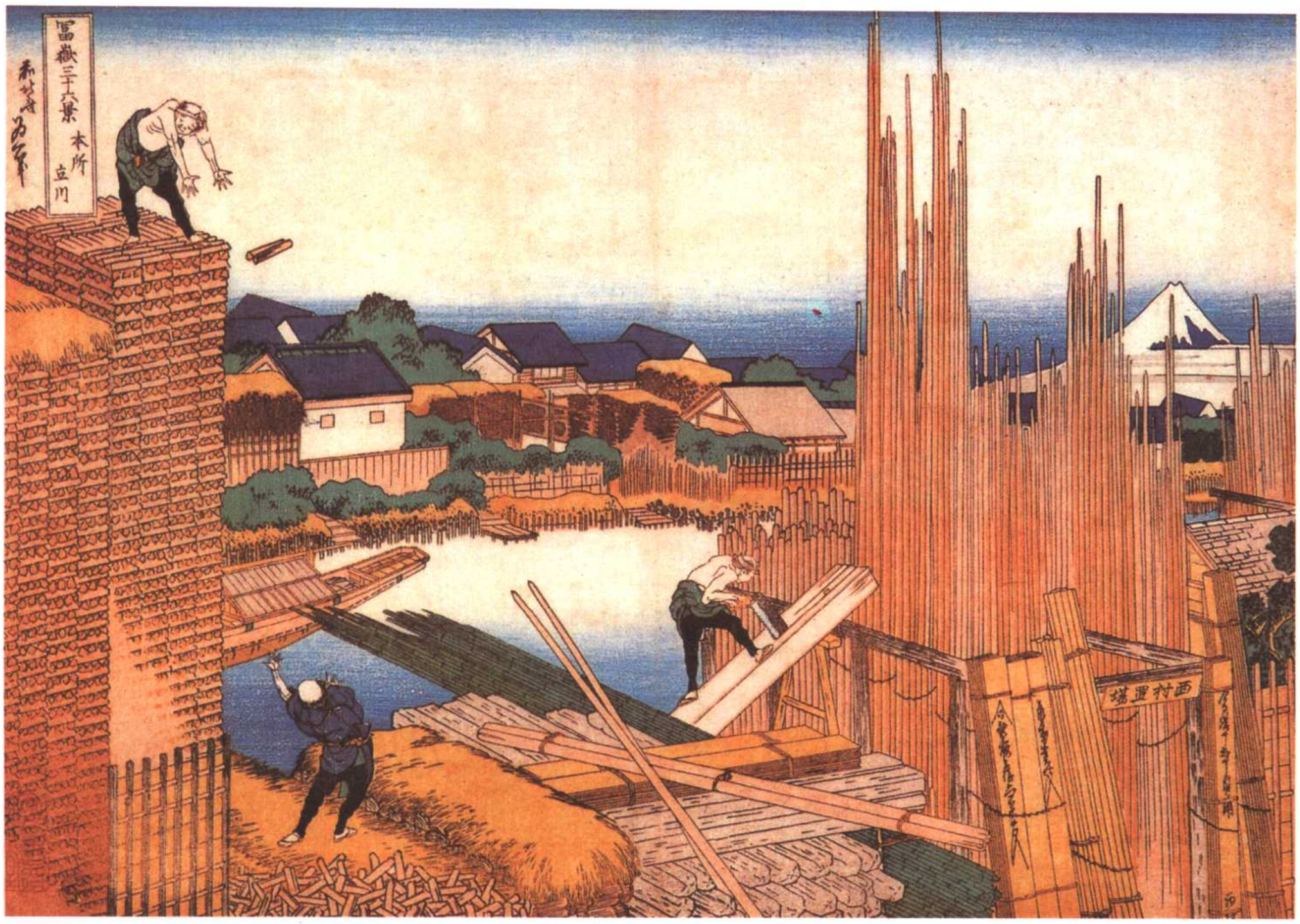
忙于耕种的农民　　歌川广重 绘画

这幅画描绘的是幕府时期的农民，他们一直处于被压迫和剥削的地位，然而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分守己，认为这是为了效忠天皇该做的。

递交的声明也非常明确地提到这点：

……使万邦各得其所乃帝国坚定不移之国策……与上述使万邦各得其所之帝国根本国策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这一声明是针对数日前的赫尔备忘录而发的。备忘录中，赫尔强调了美国所尊重的最基本的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对于美国而言就如同等级制对日本一样重要。赫尔提出了四项原则：各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加强国际合作；平等的原则。这些都是美国人对平等和不可侵犯的权利信奉的要点，我们认为这四项基本原则不仅要在国际关系中贯彻，日常生活中也必须同样遵循。在美国人看来，平等是获得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基础，也是最崇高、最道德的



辛苦的工人阶层　　葛饰北斋 浮世绘 约1835年

这是江户的小木材场，画面右侧的人正将一块大木板锯成两半，而左侧两人合作着将一堆碎木垒好。工人、农民和商人在等级制度中同为身份卑微的庶民阶层，与高高在上的武士阶层截然不同，他们享有较少的自由和权利，只能安分地服从统治。

基础。对我们而言，拥有平等意味着拥有不受专制压迫、不受干涉、不受强制的自由；意味着拥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和每个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这是当今世界实现的基本人权的基础。我们即使在自己破坏平等原则时，也要支持其正义性，我们怀着极大的义愤向等级制度宣战。

这是自建国以来美国人始终坚持的看法。杰佛逊将这一原则写进了独立宣言。此外，被写入宪法的《权利法案》也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一个新建立的国家的公开文件中写的正式语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体现了这个国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区别于欧洲的生活方式。有一份关于平等问题的重要国际报道文献，是法国年轻人阿列克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访问美国后所写的。阿列克斯·托克维尔是一位聪明而又目光敏锐的观

察家，能够发现美国这个陌生世界的诸多优点。他说美洲大陆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年轻的托克维尔生长在法国的贵族社会中，这个在当时社会活跃着并有影响力的人一定记得，这个贵族社会先后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更猛烈的《拿破仑法典》的震撼和冲击。托克维尔高度评价了美国的社会生活秩序，并对此表现出宽容的态度，虽然他是以法国贵族的视角来观察的。他的书向旧世界报道了即将到来的新事物。他相信，美国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这种发展也会在欧洲发生，尽管会有差异。

江户时代的渡河卒　　葛饰北斋　出自《富岳三十六景》　约1835年

静冈县大井川是江户时期旅人赶路的最大难关，德川幕府出于军事防御的理由，禁止在河上架桥。因此想渡河的旅客，必须依靠“渡河卒”，利用担架或是骑在“渡河卒”的脖子上过河。当大井川的水深不及胯下时，渡河费是48文；若是超出胯下，不及腋下，渡河费是94文；若是水深高于腋下时，便不能渡河，旅客就得在大井川河岸上的旅馆内坐等河水退掉。渡河卒隶属于日本社会最低层，这个阶层的人民有时不得不以生命作为博取糊口钱的代价。



因此，他对这个新世界进行了详细报道。他认为只有在这个新世界中人们才真正认同彼此之间的平等。人们的社会交往建立在一个和谐的基础之上。人们互相以平等身份进行交流。美国人从不拘泥于等级礼节等细枝末节，他们既不会要求别人有这些礼节，也不会对别人施以这些礼节，他们喜欢说自己没有接受任何人的恩惠。旧贵族或罗马式的家族在那里也不存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等级制度在那里消失了。他说美国人信仰的就是平等，除此之外几乎别无其他信仰，他们甚至有时会无意间忽视自由，但平等却是维系生命之所在。

一个多世纪以前我们祖先的生活通过外国人的眼睛被描绘出来，美国人读完以后备受鼓舞。尽管目前我们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基本的轮廓还是没有变化的。读完这部作品，我们得出结论，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已是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了。在这个国家，像杰佛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40，美国联邦党领袖之一。历任华盛顿的秘书和参谋、财政部长、军队检查长等职。1804年与总统艾伦·伯尔决斗，重伤致死。——译者注）那样的偏爱贵族式社会秩序的人过去有，现在依然有。但即使是这些人也承认，在美国，我们的生活方式绝不是贵族式的。

上述这些最高伦理是美国太平洋政策的基础。珍珠港事件前夕，我们对日本所作的关于这些伦理的宣传道出了我们最信奉的原则。我们确信，每沿着我们所指的方向前进一步，都将改善这个尚不完美的世界。而日本人在宣布其信奉“各得其所”的信念时，也是基于从其社会经验中萌生的那些生活准则。数个世纪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民族有机的生活准则，既是最容易预见到的，也是最广泛被接受的。对他们而言，承认等级制行为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而这并不等同于简单的西方式权威主义。在日本无论是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按照与我们迥然不同的标准行事。目前，

日本人承认美国权威处于等级制金字塔的顶端，我们就更有必要清楚地了解他们的习惯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描绘出他们在目前状况下会采取的行动。

日本尽管近年来被逐步西方化，但它仍然是个贵族式社会。人们在每一次寒暄，每一次交往时的举止，都必须表达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每当一个日本人对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坐”时，都必须根据双方的亲疏程度或对方的辈分，选择使用不同的词汇。“你”这个词就有好几个，场合不同，所选用的“你”也不同。动词也存在几个不同的词根。换句话说，如同太平洋上一些其他

施礼的一个重要环节——鞠躬　　摄影　现代

照片中的女子正在向离去的客人告别，她们的鞠躬非常标准，表明了她们对客人的尊重和挽留。鞠躬在表示问候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用于很多其他场合，例如表示感谢、道歉或谦恭之意。鞠躬礼的使用非常普遍，鞠躬的深度和时间的长度都视具体情况而定。很多情况下，只需要浅浅的一躬。腰部弯曲 20 度，双手自然下垂，保持 1—2 秒即可。对长者或地位较高的人，以及要表示特别尊敬的人，可以鞠深躬。腰部弯曲 45 度，保持 2—3 秒即被视为深躬。



民族一样，日本人也使用“敬语”，而且是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他们所有这些动作都有详细的规矩和惯例。施礼前不仅要了解鞠躬的对象，还必须知道鞠躬的程度。一个鞠躬，对某一个接受者来讲可能是非常恰当的，但用于另一位关系略微不同的人身上时，可能会被视为是一种无礼。从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到简单地动动肩、点点头，都是日本很多鞠躬的方式中的一种。一个日本人必须从孩提时代就学习在每个场合该行的礼数。

日本人在行使礼仪上不仅要考虑等级差别，还要考虑性别、年龄、家庭关系以及过去的交情等等。甚至同样的两个人之间，在不同情况下也要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一个普通百姓可以不必对其好朋友行鞠躬礼，可是一旦对方穿上军装，那穿便服的人就必须向他的朋友鞠躬了。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需要平衡多种因素，在特定情况下，某些因素可以互相抵消，某些则会加强。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人不太拘泥于相互之间的礼节。在美国，日常家庭生活中，人们就不太拘泥礼节。他们一回到自己家，就会扔掉一切形式上的繁文缛节。然而，在日本，家刚好是学习并细致观察礼仪的地方。当婴儿还在母亲背上的时候，头就被母亲摁下，被教导懂礼数。蹒跚学步的儿童第一件要学的礼数就是尊敬父兄。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孩子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都要给哥哥和弟弟鞠躬。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它包含着一定意义，表示行鞠躬礼的人本来计划自己应付某些事情的责任，但现在则承认受礼方有权干预；受礼方也承认会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些责任。等级制以性别、辈分和长嗣继承等为基础，它在家庭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

最高跪拜礼

跪地是最高跪拜礼，如这位武士，他正向他的主君下跪，双手扶地，两腿跪地，动作谨慎而庄重。





向武士鞠躬 《最后的武士》 剧照 现代

武士们风尘仆仆地从远方回来，村中的百姓向他们深深地鞠躬。在百姓心中，为效忠天皇和保卫家园作出牺牲的武士，是他们十分崇敬的人。

众所周知，在日本和中国，孝道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准则。早在六七世纪之间，伴随着中国的佛、儒伦理以及世俗文化，关于孝道的阐述就已经传入日本。不过，为适应日本家庭的不同结构，孝道的性质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甚至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仍然必须忠于其大宗族。一个大宗族可能由成千上万个成员组成，宗族对全体成员拥有裁决权，并受到这些成员的支持。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存在差异，但在大部分地区，一个村庄的居民大抵同属一个宗族。拥有四亿五千多万人口的中国，只有100多个姓氏。同一姓氏的人，多少都承认彼此间的宗族关联。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可能全部同出一祖。住在他乡的城里的家庭也可能与他们是同宗。譬如在广东人口稠密的地区，全部宗族成员要联合起来，他们共同经营和维持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在祭祖的节日里，共同向祖宗牌位行礼，这些

牌位可能多达千个，但却是同一远祖所繁衍的。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院，并设立基金以资助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学习。宗族要联系散在各地的成员，了解他们的状况，认真增订族谱，记载有权分享祖宗恩惠者的姓名，每10年左右刊印一次。宗族有世代相传的家规，与当局意见相左时，可以拒绝把本族犯人交押当局。在封建社会，大宗族是一种半自治性质的共同体，仅在名义上接受国家管理，官员是由不断更迭的政府所指定的，他们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所辖地区的人视他们为外人。

在中国，姓氏是宗族制度的根本，没有姓氏或类似替代物，宗族就无法生存发展下去。在某些宗族中，族谱就是与姓氏相当的东西之一。在日本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直到19世纪中叶，只有贵族和武士家族才可以使用姓氏，只有上层阶级才有族谱。而且日本族谱记录的方式，如同“美国革命妇女会”（美国革命妇女会，Daughters of American Revolution，1890年设立于华盛顿，会员仅限于参加过独立战争人的后裔——译者注）一样，是从现在活着的人往上追溯，而不是由

祭祀活动 摄影 日本 现代

这是热闹的祭祀场面，那些没有姓氏和族谱的日本“庶民”以参与祭祀为由，聚集在一起。





祭祀先人　　摄影　日本　现代

日本各个阶层的人们每天都在这种佛坛前祭祀，他们在类似墓碑的牌位前供奉上食物，怀念已故的父母、祖父母和其他一些近亲。

始祖开始从古至今地列举后裔。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录方法。日本是封建国家，人们是向封建领主而不是宗族共同体尽忠。被效忠的领主相当于当地的主君，这不同于中国那些任期短暂的官员，后者始终是这一地区的外人，两者地位身份悬殊。在日本，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一个人隶属的藩是其联系的纽带。

在神社或圣地参拜始祖或氏族之神是使民族制度化的另一种方式。那些没有姓氏和族谱的日本“庶民”也能参与这一类活动。在“庶民”参与祭祀的神社里，村民们无须证明他们同属一宗就可以聚集在一起。他们因为居住在某位祭神的封地上而被称做是该神社的“氏子”（日文称“氏子”）。如同世界各地的村民一样，这些祭拜的村民们，世代定居于此，彼此间不可避免的存在血缘关系，但他们之间并不是同出一祖的亲密氏族关系。

朝拜祖先的活动区别于神社的祭祀。在家中的房间设立“佛坛”，只摆放六七

个最近去世的亲属灵牌进行祭祀。日本各个阶层的人们每天都在这种佛坛前祭祀，他们在类似墓碑的牌位前供奉上食物，怀念已故的父母、祖父母和其他一些近亲。即使曾祖父母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无法辨认，也不会再重新刻写，他们会迅速淡忘三代以前的墓地。日本的家族联系淡薄程度几近于西方，其中与法国的家族关系或许是最相似的。

在日本，“孝道”只局限于有直接接触的家庭内部。这个集团内部，最多包括父亲、祖父，伯父、伯祖父及其后裔，每个成员都要确定与自己的辈分、性别、年龄相适应的地位。即使容量很大的豪门望族，其家族也会划分为几个独立的支系，次子以下的男孩必须另立门户，这被称做“分文”。直接接触的集体内部是比较狭小的，存在非常缜密的规矩。成员们“各安其分”。长者在正式隐退（隐居）之前，成员对他必须严格服从。即使在今天，一个有几个成年儿子的父亲，在他自己的父亲尚未隐退以前，也必须事无巨细地请示年迈的祖父，获得允许后才可以行动。即使是三四十岁的人，父母也还是要一手包办孩子的婚姻。父亲是一家的男性之长，用餐时他要第一个举筷，沐浴时也是他先入浴。全家人都要向他毕恭毕敬地行礼，他则只需点头受礼即可。日本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谜语，翻译成美国的解谜形式（Conundrum form）就是：“儿子向父母提意见为什么就如同和尚要求蓄发一样？”（佛教僧侣必须剃度）答案是：“不管怎么想，绝对不可能做到。”

“各安其分”不仅是指辈分之间的差别，而且意味着年龄不同，行事也要有所差别。日本人认为秩序极端混乱时，常使用“非兄非弟”一语来表达，意思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既非鱼又非鸟（neither fish nor fowl）。在日本人眼中，长兄应该理所当然地保持其长兄的特质。长子是继承者。曾经去过日本旅游的人们谈论“日本的长子自幼就学会一套不凡的气派”。长子拥有与近似父权的权利。此后，弟弟很快就会依赖长子。今天，尤其是在日本的农村和乡镇，按规



摄影　日本　现代

关于孝道的谜语

日本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谜语："儿子向父母提意见，为什么就如同和尚要求蓄发一样？"答案是："不管怎么想，绝对不可能做到。"

矩，长子要留在家中，次子和三子则可以到外面的广阔天地中，接受更多的教育，获得更多收入。这样看来，古老的等级制度仍然是十分坚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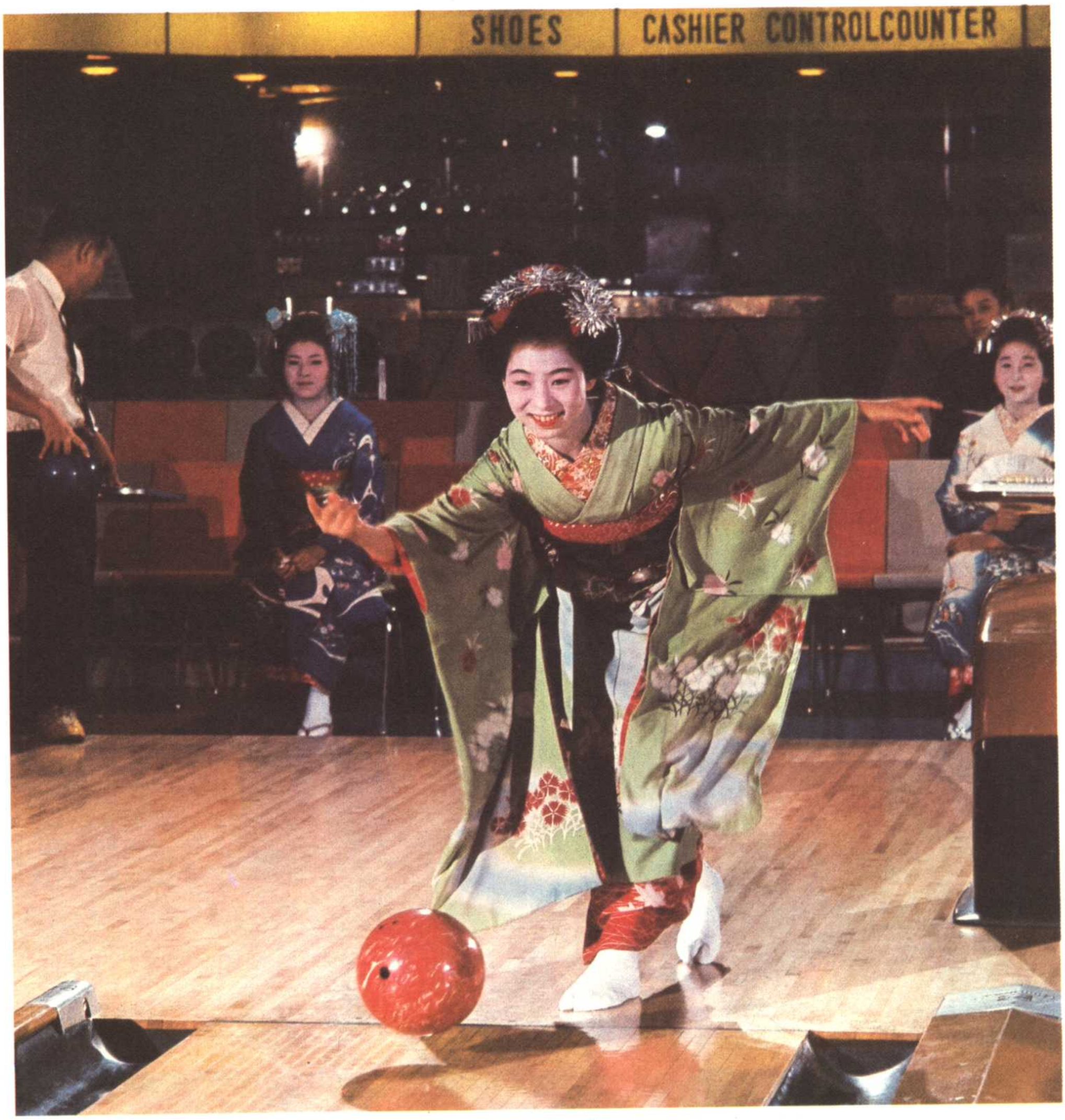
在今天的政坛上，对于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传统的兄长特权也展现得淋漓尽致。1942年春天，陆军省一个中佐发言人就东亚共荣圈问题作了如下的发言："日本是他们的兄长，他们是日本的弟弟。要让占领地区的居民们对这一事实家喻户晓。过多体恤会让他们心理上形成一种滥用日本好意的倾向，这会给日本的统治造成不好的影响。"换句话说，是要由哥哥来决定什么事是对弟弟有益的，而且在强行执行时，哥哥不能"过分体恤"弟弟。

一个人不论年龄大小，其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取决于性别。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比丈夫低，走路时要跟在丈夫身后。妻子即使穿上西服，和丈夫并肩同行，进门时也要在丈夫前面开门，一旦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后面。日本家庭中，礼物、

关怀和教育费全归兄弟享受，女孩子只能眼睁睁看着。即使在为数不多的专为青年女性开设的高等学校，课程重点也都是放在教导礼仪和举止规范上，在智力训练方面与男性学校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有一位女校的校长在对该校上流家庭出身的学生谈话时，提到应该学一点欧洲语言，她的理由是希望她们将来可以将丈夫们用的书掸去灰尘后，能认识书名以正确将其插入书架。

性别决定地位　　摄影　现代

日本的女子的位置总是在丈夫的身后，她们享有的权利也次于男性。她们的世界的主体由礼仪和家政为主，即使进行智力训练，目的也在于成为男性的点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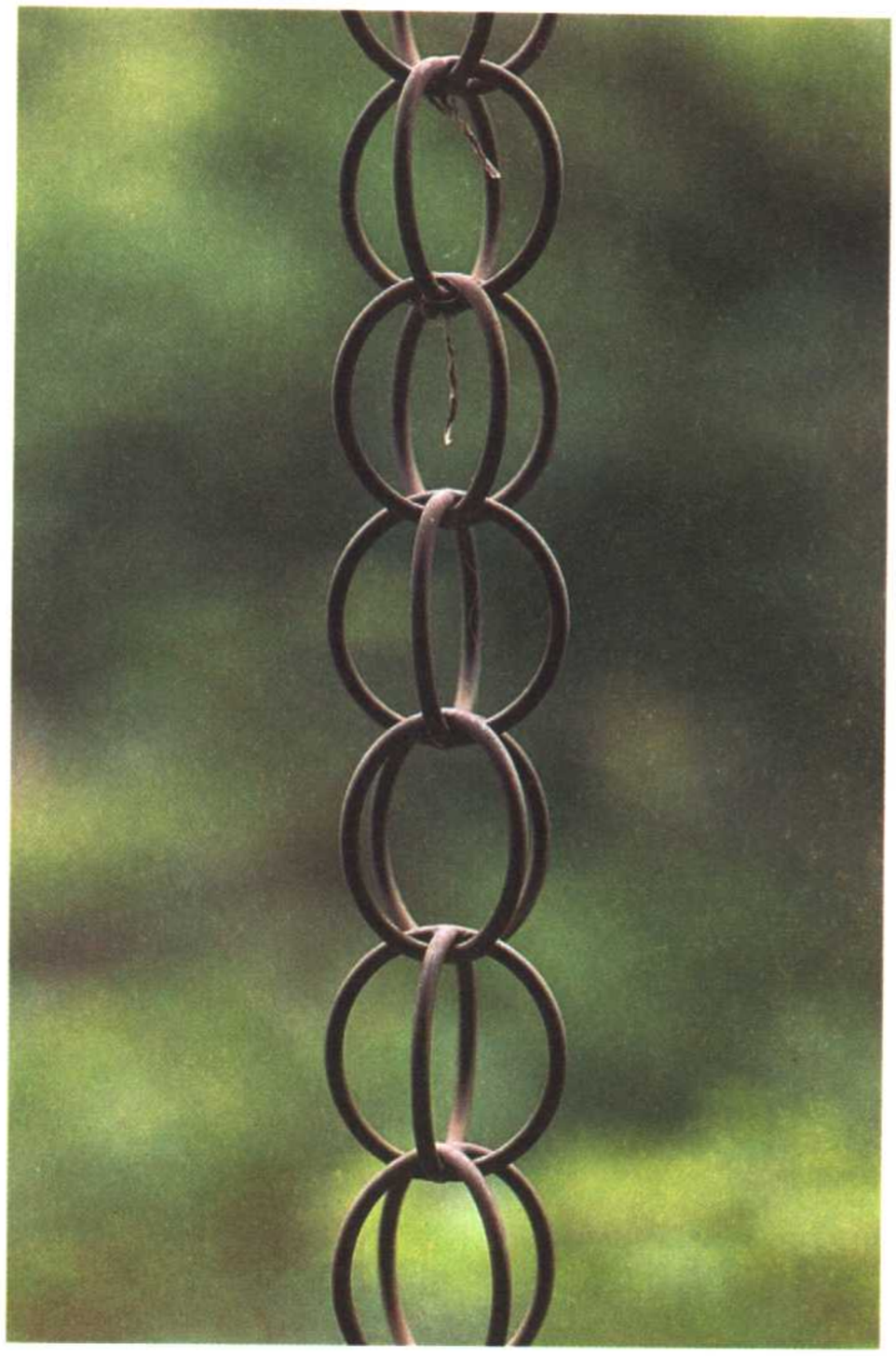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与亚洲大部分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妇女还是拥有很大的自由的，这不仅仅是日本西化后的现象。因为她们从来没有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裹脚，她们可以自由进出店堂，自由在大街上行走而无须将自己藏在深闺，这些都曾使印度妇女羡慕不已。在日本，全家的财政大权掌握在妻子手中，她们负责全家的采购。家里发生财政危机时，她必须选择一些东西送进当铺抵押。妻子负责指使佣人，在儿子婚姻问题方面也有相当的发言权。一旦做了婆婆，更要一手操持家务，其行事宛若以前从未当过唯命是从的媳妇。

在日本，取决于辈分和性别的特权非常大。不过，这一特权的行使者在角色上，更像是责任的受托者，而不是独断专行者。父亲或兄长要对所有家庭成员负

采草药的女子　　葛饰北斋 出自《嬷嬷讲述的诗百首》 约1835年至1836年

夕阳西下，一群采草药的妇女匆匆下山，远处传来两只雄鹿的叫声，引得两名妇女停下了脚步。日本的女子并非是深闺简出，她们管理家庭的财政大权，负责全家的采购等。这些采草药的女子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补贴家用，十分令人钦佩。





家族意志的制约力

摄影　日本　现代

日本的家族都有家族会议，每遇问题必然要召集成员共同讨论。家族意志赋予每个成员一种强制的制约力，如同独立的铁环被某种力量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责，包括活着的、死去的以及即将出生的。他必须要作出重大决定并保证其实行。不过他所拥有的权力并不是无条件的。他要本着对全家的荣誉负责的原则行事。他有责任要求儿子及兄弟们牢记该家族的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并保证这些家产不被辜负。即使是一个农民，也会祈求祖先保佑他崇高的责任。一个人的阶级地位越高，负有的家族责任就越大。家族的要求在个人要求之上。

不论是什么门第的人家，在遭遇重要事件时，户主都要召开家族会议进行讨论。譬如说，家族成员可能会千里迢迢赶来参加订婚的会议。作决定的程序并不因人不同而有所差异。妻子或弟弟的意见也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倘若家长闭目塞听，独断专行，就会让自己陷入到非常困难的境地。当然，被会议决定命运的人可能会很难服从作出的决定。然而，那些长辈自己从小就对家庭会议的决定坚决服从，他们会严格地要求晚辈也这样做。这种要求背后的制约力，不同于普鲁士在法律上和习惯上给予父亲的对妻儿的专横权力，虽然强制性相同，但效果却不一样。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学习对专制权力的尊重，也不轻易地养成屈服于专制权力的习惯。无论那种要求多么苛刻，家族意志的服从是基于全体成员的关心，是以这种最高价值来要求成员服从的，是出自一种共同忠诚的名义。

每个日本人都是最先在家庭中学习等级制的，之后再将所学运用到经济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他们知道，不管一个人在这个集团中是否具有实质的支配力，只要这个人“适得其所”，他们就要对其表示敬意。即使丈夫受到妻子支配，或者

哥哥受到弟弟支配，在正式关系上，妻子或弟弟照样得尊重丈夫或哥哥。背后的操纵和支配并不会破坏特权之间的外观界限。实际的支配也不改变表面关系。等级制依然是不可侵犯的。有时候，这些会给不在意正式身份而在意把握实权的人带来某种策略上的方便。因为，这样会较少地招致别人的攻击。家庭生活经验告诉日本人，要想让一种决定得到最有力的支持就是让所有成员都确信此决定能维护该家族的荣誉。高居家长地位的专制者随意施加的命令并不是最有支持力的。日本的家长更像是物质和精神财产的管理者，全体家族成员都很看重这些财产，他们的个人意志都从属于财产的要求。日本人反对使用武力威胁，但并不因此减弱对家族要求的服从，也不会因此对特定身份的人减少敬意。即使年长者不是蛮横的专制者，等级制在家族中也可以维持。

美国人在人际关系上有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标准。通过上面对日本家族等级制的粗浅介绍，我们尚且理解不了日本家族中那种公认的强有力的感情纽带。日本家族中有一种相当牢固的连带性，这种连带性的获得是本书研究的课题之一。我们要想了解他们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领域中的等级制的要求，首先就必须

“八百万神”说　　摄影　日本　现代

日本神社信仰是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的，拜的是神灵化的万物，从高山、大树、奇石、瀑布、海洋、田地、太阳、火、雷、各种动物到祖先的神灵，都可以成为祭祀崇拜的对象。











↑神灵化的犬

↖神社前的水池

神社现在都不设香火，人们到神社去，一般是先在神社前的水池边用一个长柄木勺净手。

← 寺庙中的枯山水园林

← 刻在窗户上的神鸟

了解他们是怎么在家庭中透彻地学习这种习惯的。

日本人在阶级关系上的等级制像在家庭中一样地强烈。综观日本历史，它一直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一个民族，登基制存活了几个世纪，既有重大的优势，也有严重的缺陷。自从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等级制一直是他们生活中的准则。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当时，日本已经开始向无等级的中国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并加以修正以适应其自身的等级制文化。中国的高度文明一直让日本使节赞叹不已。公元7—8世纪时，日本天皇和宫廷已经着手进行要用中国的高度文明来充实日本。他们对这项事业投入了无与伦比的巨大精力。此前，日本没有文字，直到七世纪，日本采用了中国的会意文字来表达它自己那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语言。之前，日本有一种宗教，四万个神祇镇守山岳、村庄，赐福给人们。历经无数变迁，这种宗教延续至今，变成了现代的神道。7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大规模地引进佛教，作为“保护国家的至善”宗教（George Sansom, 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第131页。所引奈良时代编年史中语。日文是：圣武天皇在陆奥国，黄金出，乃下诏曰“闻佛言，护国者必胜”云云。——译者注）。在此以前的日本，官方和私人都没有巨大的永久性建筑。可是后来，天皇仿照中国的京城修建了新的奈良城。日本各地还仿照中国式样，修建了很多壮丽的佛教寺院和僧院。天皇采用了使节们从中国学来的官阶和律令，一个自主的民族就这样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了外国文明，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从一开始，日本就未能仿效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组织。在中国，官位是授给经过科举考试合格的行政官员的。日本采纳了，却授给了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从中国仿效来的官位制就成了日本等级制的构成部分。日本不断被分裂成很多半独立的藩国，领主们经常互相嫉妒对方的势力，许多社会习俗的产生也都与领主、家臣、侍从的特权联系起来。无论日本如何坚持不懈地汲取中国的文化，但始终没有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取代等级制在日本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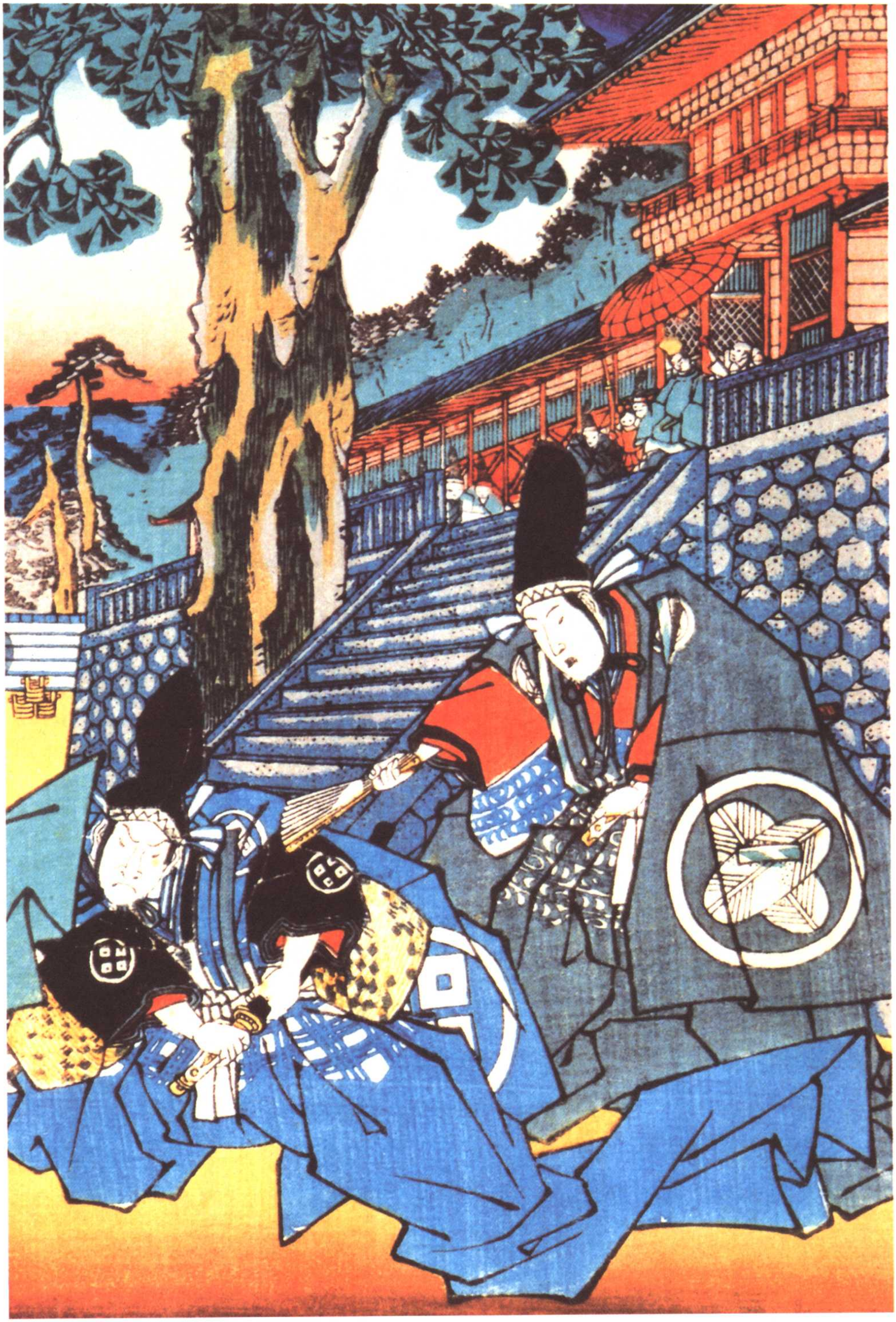


奈良　　**奈良公园　日本**

奈良位于日本本州岛中西部，这里自远古以来就有人类居住，已经有1280年的历史。从公元710—784年的74年间，这一地区曾名“平城京”，是7代天皇的首都。那里有许多历史旧迹和古代文物，有平城宫遗址、皇陵和寺院，古代建筑多仿中国唐都长安，奈良公园内东大寺是中国唐高僧鉴真到日本后最初驻锡处。

位。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以及以庞大宗族将各种身份、职业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式宗族制度，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那种世俗皇帝的观念也未能被日本接受。皇族中人在日语中被称做“云上人”，只有他们才能拥有皇位继承权。改朝换代在中国是时常发生的，但在日本却从未发生过。天皇本人就是神圣，不可侵犯。天皇和他的大臣们把中国文化引到日本，但他们却领会不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

所以，虽然日本吸收了中国各种文化，但这些新的文明仅仅是为此后几百年间世袭领主与家臣之间争夺统治权的冲突开辟了道路。8世纪末叶，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权，将天皇赶到后台。此后，藤原氏的统治又遭到了封建领主们的反对，整个日本陷入内战状态。闻名遐迩的源赖朝力挫群雄，击败各方对手，以“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事头衔自封，掌握了全国的实际统治权。“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



将军”，按照日本惯例，只要源赖朝的子孙能够控制其他封建领主，这个称号就由他们家族世袭。天皇已徒具虚名，将军必须接受他象征性的封赐，他的重要性仅限于此。天皇已经完全丧失行政权力。幕府操纵实权，以武力来对抗不归顺的各地领国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各自的武装家臣，即“武士”。这些武士完全听命于大名。在动乱的年代中，封建领主们时刻准备着挑战对方大名或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地位。

公元16世纪，内乱在日本像流行病一样蔓延。经过几十年的混战，到1603年，伟大的武将德川家康打败所有对手，成为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此后的大约260年里，将军一职就由德川家族世袭，直至1868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日本进入近代时期，德川政权的统治这才宣告结束。德川政权的统治是一个漫长的时代，从很多方面讲都是日本最值得重视的历史时期之一。直到最终崩溃，德川政权都在日本国内维持了一种武装和平，它有效地维护了德川氏政治目的的中央集权制。

德川家康曾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他始终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内战中，一些强藩的藩主曾反对他，直到最后失利才归顺他。这就是所谓“外样”（即旁系大名）。这些大名获准继续保持对自己领地和家臣的领导权。在日本的封建领主



德川家康像　　插图画　日本

台座上端坐着的是德川家康。画的正上方是家康的署名与花押，这时的德川家康曾贵为天下第一人，表现出威严庄重的姿态。

被驱逐的武士

幕府时期，封建领主都竞相在各自的府邸招募武士，武士们也纷纷投靠不同的领主。这位武士正受到他的领主的责骂，他强忍愤怒按剑未出，如果他触怒了领主，将面临失去依靠的命运。



小牧长久手合战　　屏风画　日本

德川家康曾与北条氏政同盟，结合织田信长次子织田信雄反抗丰臣秀吉。1584年双方展开小牧长久手合战，可最后却因为谁也消灭不了对方主力，而以谈和收场。之后德川家康向丰臣秀吉称臣，丰臣秀吉则正式展开其统一天下的霸业。

中，这些大名在其领地上也确实继续享有最高的自治权。然而，他们却不被批准享有德川家臣的荣誉，也不能担任幕府的任何重要职务。重要职务全部由“谱代”（嫡系大名），即内战中拥护德川的大名掌控着。德川家康维持这一困难的政局的策略是，防止藩主（即大名）力量的积蓄，制止任何可能对将军统治产生威胁的联合。为了维护国内和平局面——德川氏的统治，德川氏非但没有废除封建制，反而大力加强这一体制，使日本的封建体制更加巩固。

日本的封建社会存在各种复杂的阶层，每个人的身份都由世袭决定。德川氏巩固了这种登记制度，并详尽规定了各阶层成员的日常行为。每一位户长都必须将有关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贴在门口。他的服装、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要符合世袭身份的规定。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依次是士（武士）、农、工、商，下面还有贱民。其中，以贱民的数量最多，他们被称做是“秽多”，即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秽多由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及摄制者等职业者组成。贱民在日本是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更确切地说，他们根本算不上是人。通过他们居住地方的道路不被计入里程，仿佛这块土地及其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人的生活极其贫困，虽然被准许从事相关职业，但却不被正式社会组织所接纳。

商人的地位仅位于贱民之上。不管美国人多么的惊讶，这在封建社会中也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商人阶级一直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一旦他们受到尊敬而致使商业繁荣，封建制度就可能灭亡。公元17世纪，德川氏颁布了锁国法令，其

严峻程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从未有过的，这些法令从根本上铲除了商人的基础。日本曾经在中国与朝鲜的整个沿海地区进行海外贸易，这必然使商人阶层随之得到发展。德川氏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船只的人，都要被处以极刑，企图以此来阻遏商人基层的发展。被准许建造或驾驶的小船，既不能远航到大陆，也不能运输商品。国内交易受到严格限制，各藩藩界都设立关卡，严禁商品流通。还有一些法律规定了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奢侈取缔令》中就限定了商人的衣着、雨伞以及在婚丧嫁娶时的费用限额。商人不允许与武士居住在同一区域内。如果他们受到特权阶层——武士之刀的凌辱，法律不会保证他们的权益。德川氏

民不聊生的战国时代　浮雕　日本

12世纪末日本进入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军事封建国家，即“幕府”时期。13世纪后期，幕府的武士统治开始面临困难，廉仓幕府逐渐走上灭亡的道路。1467年，“应仁之乱”爆发，日本进入长达100年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群雄四起，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乱世争雄，最终于1600年德川家康发动关原合战，建立德川政权。直到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战国时代才结束。



妄图把商人永远置于卑贱的地位。但在货币经济中，他所推行的这些毫无疑问要以失败告终。当时，在日本运行的已经是货币经济，但德川氏却试图逆转这个趋势而前行。

德川时代，维持封建社会安定的两个阶层是武士和农民，德川幕府将他们分别冻结了起来。德川家康一统天下之前，伟大的将军丰臣秀吉已经通过著名的“缴刀令”，实现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农民的武器被收缴，只有武士才享有佩刀的特权。武士再也不能兼做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被允许从事生产，他们变成寄生阶级，每年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年贡米作为他们的俸禄。每个武士家臣按份额从大名那里领取谷米。他们不必担忧生活来源，完全依赖于各自领主。日本历史早期，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使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结下了牢固的纽带，在和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就转变为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他们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武士要依靠俸禄生活，各自的俸禄额早在德川初年就按照家格的高低决定了。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武士的俸禄并不丰厚，整个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所得差不多，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如果一个武士家族有几个继承人分享这点俸禄，那就更让人头疼了。这就使得武士会限制自己的家族规模，对他们而言，最令人窘迫的就是威望来源于财富和外观，因此，他们信奉：俭朴才是最高美德。

在武士和农、工、商其他三个阶级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后三个阶级是“庶民”，武士则不是。武士的佩刀不只是装饰，而是代表了其特权阶级。他们有权对庶民使用佩刀。这种传统早在德川时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德川家康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对武

特权阶级

德川家统治日本的时期称做江户时代，那时天皇、贵族、寺院神社及幕藩体制下的农民都由德川家控制。但在德川家康一统天下之前，丰臣秀吉已经通过了著名的“缴刀令”，实现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把农民的武器收缴，让武士享有佩刀的特权。





士无礼，对上级不逊的庶民，可格杀勿论”（《家康遗训百条》内云：“士乃四民之长，农工商辈对士不得无礼。无礼，即心中无士也。对心中无士者，士不妨击之。”宽保三年《彻定书百条》中也规定：虽对步卒无礼，不得已而杀之，经审按后属实者亦无妨，德川家康根本没想过要在庶民与武士阶级之间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他的政策依据严格的等级而制定。庶民和武士都归大名统率，并直接与他联系。这两个阶级各处于不同的阶梯之上，又各自有一套从上到下的法令、规则、统治和相互义务来约束。两个阶梯间的人的距离是不可逾越的。有时迫于形势，需要在这两个阶梯之间再架起桥梁，但这并不是这一体系本身所固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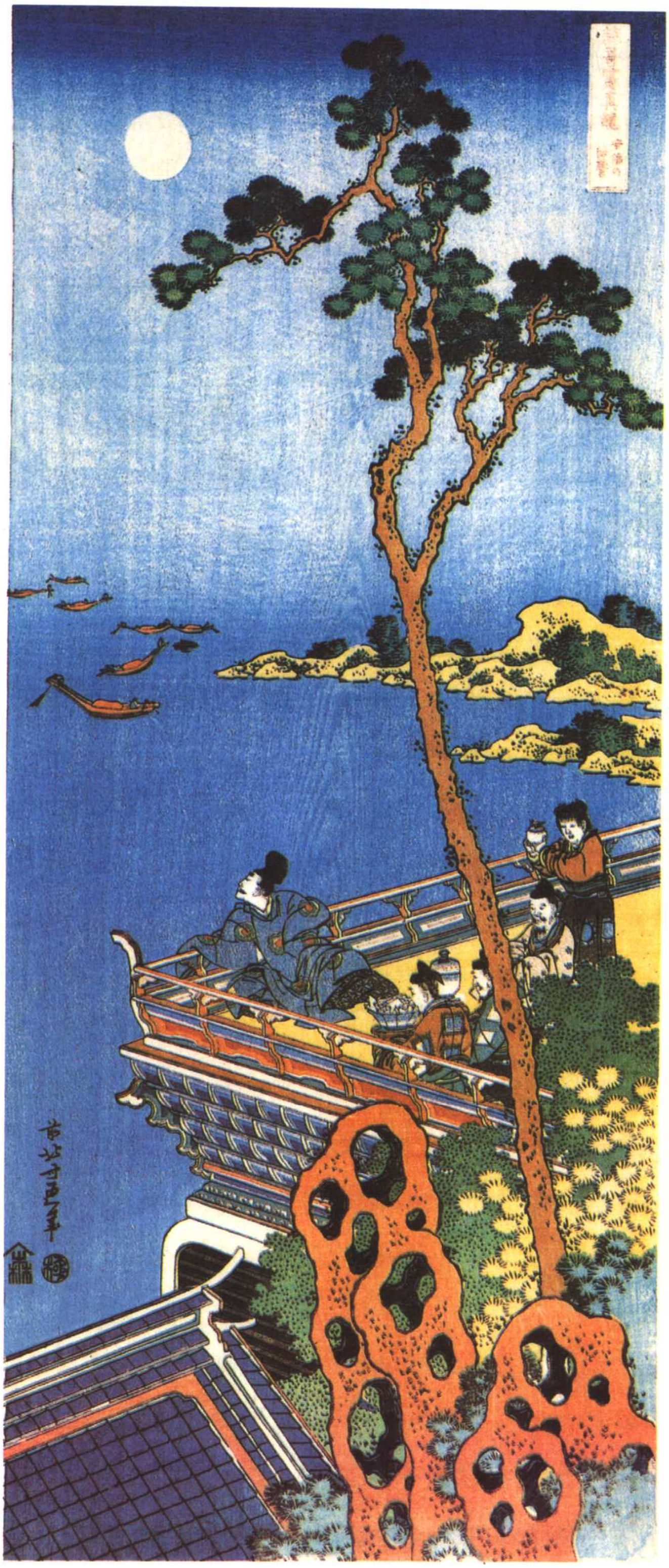
赶路的轿夫

歌川广重 出自《东海道五十三次》 约1831年至1834年

炎热的夏天，酷暑难忍，但轿夫们还必须得抬着他们的主人匆匆地赶路，他们汗流浃背，而轿上的人却悠闲地看风景。在幕府时代，只有武士与贵族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而渐渐地，富裕起来的商人也加入了这一阶层。

德川时代，武士已经不仅可以舞刀弄剑，而且还逐渐开始管理藩主财产，并从事古典能乐、茶道等各种风雅艺术。他们负责处理全部文书，以巧妙的手段实施藩主的谋略。两百年间的和平是很漫长的，这使得武士们很少有机会舞刀弄剑。日本的商人突破严格的等级规定而发展了追求舒适高雅的城市生活方式，同样，武士虽然要时刻准备着拔刀赴战，但他们也发展了各种风雅艺术。至于农民，虽然法律并未明确保障他们可以免受武士欺凌及强加的沉重年贡和种种限制，但仍然存在某些规定来保障他们的利益。法律保护农民对天地的所有权。在日本，拥有土地就意味着拥有威望。德川统治时期，政府禁止土地永久转让。欧洲封建社会也有类似法律，为的是保障封建领主的权益。而在日本却有所不同，这条法律保障的是每个耕作者的利益。农民非常珍惜他所拥有的这种永久权利，甚至在今天他们的后裔仍然不辞辛苦的在稻田耕作。然而无论如何，农民仍然是养活着整个上层寄生阶级的阿特拉斯（Atlas，希腊神话中肩扛天宇的提坦神。——译者注）。

囊括了将军的政府、大名的机构、武士的俸禄等的上层寄生阶级大约有200万人。农民要缴纳实物税，即需要把一定比例的收成上缴给大名。在同是水稻农业国的暹罗，传统赋税是10%，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却高达40%，并且实际交纳的比这个还要高。有些藩中的赋税甚至高达80%。农民经常被强迫从事徭役和无偿



和平年代的武士

葛饰北斋 出自《诗歌写真镜》
约 1833 年

武士自小接受各种训练，包括吟咏作画等有助个人修养的科目。在长久的太平生活中，武士不再舞刀弄剑，开始成为贵族公卿财产的管理者和各种风雅艺术的专家。

服务，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被大量消耗。像武士一样，农民对家庭规模进行限制。整个德川时代，日本人口总数几乎没有变化。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亚洲国家，这样停滞的人口数字足以说明当时的统治状况。不论是指望年贡生活的武士，还是生产者阶级，这个政权都对他们实行了严格的斯巴达式的限制，尽管如此，每个下属与上级之间仍存在相对的可依赖性。人们对自己的义务、特权及地位都了如指



沉重的负担 《大野新田》 葛饰北斋 浮世绘 约1835年

自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的农民一直是世界上受剥削程度最高的人群。各种起义和上访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这并没有动摇此种局面背后的幕府政权，所以农民们只能还是背负着承重的负担，一如从前地过日子。

掌。一旦这些受到侵害，即使是最贫困的人也会提出抗议。

农村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下反抗过封建领主及幕府当局的统治。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六十年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发生过不下千次。起因并不是由于传统“四公六民”的重赋，而是抗议赋税的累增。当他们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时，就集结起来涌向藩主。他们有秩序地进行请愿和裁判，把写好的匡正苛政的请愿书递呈给藩主的内臣。如果发生内臣扣押请愿书或者藩主不予理会的状况，他们就选派代表把状子呈递给江川的幕府将军。一些著名的起义中，就有农民在江户城的大道上拦截幕府高官的轿子，直接把状子呈递上去以保证不被扣压的情节。尽管这样要冒的风险很大，但幕府当局收到状子后就会立即展开审查，判决也大约有



一半可能有利于农民。

不过幕府当局对农民请求的判决并不符合日本对法律和秩序的要求。农民的抱怨可能是正当的，国家对他们的尊重也是应该的。然而，农民起义领袖却是严峻的等级制法令所不被允许的。即使在判决有利于农民的状况下，不容忽视的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却已经违背了必须忠贞这一基本法律。所以不管目的如何正确，他们都可能被处以极刑。农民们自己甚至都承认这是一种无法逃脱的命运。人们把被处以极刑的人看做是英雄。他们聚集在刑场，目睹起义领袖被投入油锅、砍头或被钉上木架，他们决不因此暴动。在他们看来，事后可以建立祠堂把起义领袖作为殉难烈士来祭奠，但对于极刑，他们认为这是法令，是秩序，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令的核心，这是他们所必须接受的。

德川幕府历代将军都致力于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他们力图让每一阶级都依靠封建领主。每一个藩中，居于等级制最高地位的都是大名，他们可以对属下行使特权。将军在行政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控制大名。他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出现大名结盟或实施侵犯计划的事件的发生。各藩藩界均设哨所关卡，过往行人经过严格检查，杜绝“出女入炮”，即以防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进来。为防止任何政治联



荷兰人的小岛　　地图　17 世纪

元和九年，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长崎作为对外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也禁止日本远渡海外。荷兰人是唯一被允许与日本进行贸易的欧洲人。他们的停留地在长崎港附近的一座人工岛上，并用围墙围了起来。他们只能与日本人有少量的接触。由于闭关自守，幕藩体制迎来了安定时期，但随着产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体系崩溃，使幕藩体制开始动摇。

盟的发生，大名之间未经将军允许是不能联姻的。藩与藩之间彼此不能架桥，通商也受到严格限制。此外，将军还派出许多探子秘密了解各地大名的财政收支状况，一旦发现某藩主金库充盈，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耗资巨大的土木建筑工程，以将他的财政限制在一定水平以内。各种规定中最有名的一项就是，大名每年都必须在江户居住半年，而且在返回自己领地时，必须把自己的妻子作为将军的人质留下。就是这样，幕府费尽心机地确保自己的权势，巩固其在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将军只是奉天皇之名来掌握政权，所以他并不是等级制拱桥中的拱心石。天皇并无实权，他和其宫廷世袭贵族（公卿）都被迫隐居在京都。天皇的财政来源甚至连最小的大名都比不上，宫廷的一切仪式也受到幕府的严格限制。尽管如此，即使是最有权势的德川将军，也完全没有废除天皇和实际统治者并行的



没有实权的天皇

《后醍醐天皇》插画 日本 中世纪

幕府时期，天皇并无实权，他和其宫廷世袭贵族都被迫隐居在京都。他的财政来源甚至连最小的大名都比不上，宫廷的一切仪式也受到幕府的严格限制。

这种双重统治。对日本而言，双重统治并不新奇，自 12 世纪以来，天皇就被剥夺了实权，大元帅（将军）就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统治。有一个阶段，职权分化极为严重，已成为傀儡的天皇将实权托付给一位世袭的首领，而后者又将其权力交付世袭政治顾问（执权者）来行使。这种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时常发生。德川幕府即将崩溃的末年；培里将军也没料想到将军的背后还有天皇存在。1958 年，美国的第一任驻日使节哈里斯（Townsend Harris）和日本就第一个通商条约进行谈判时，才发现日本还有一位天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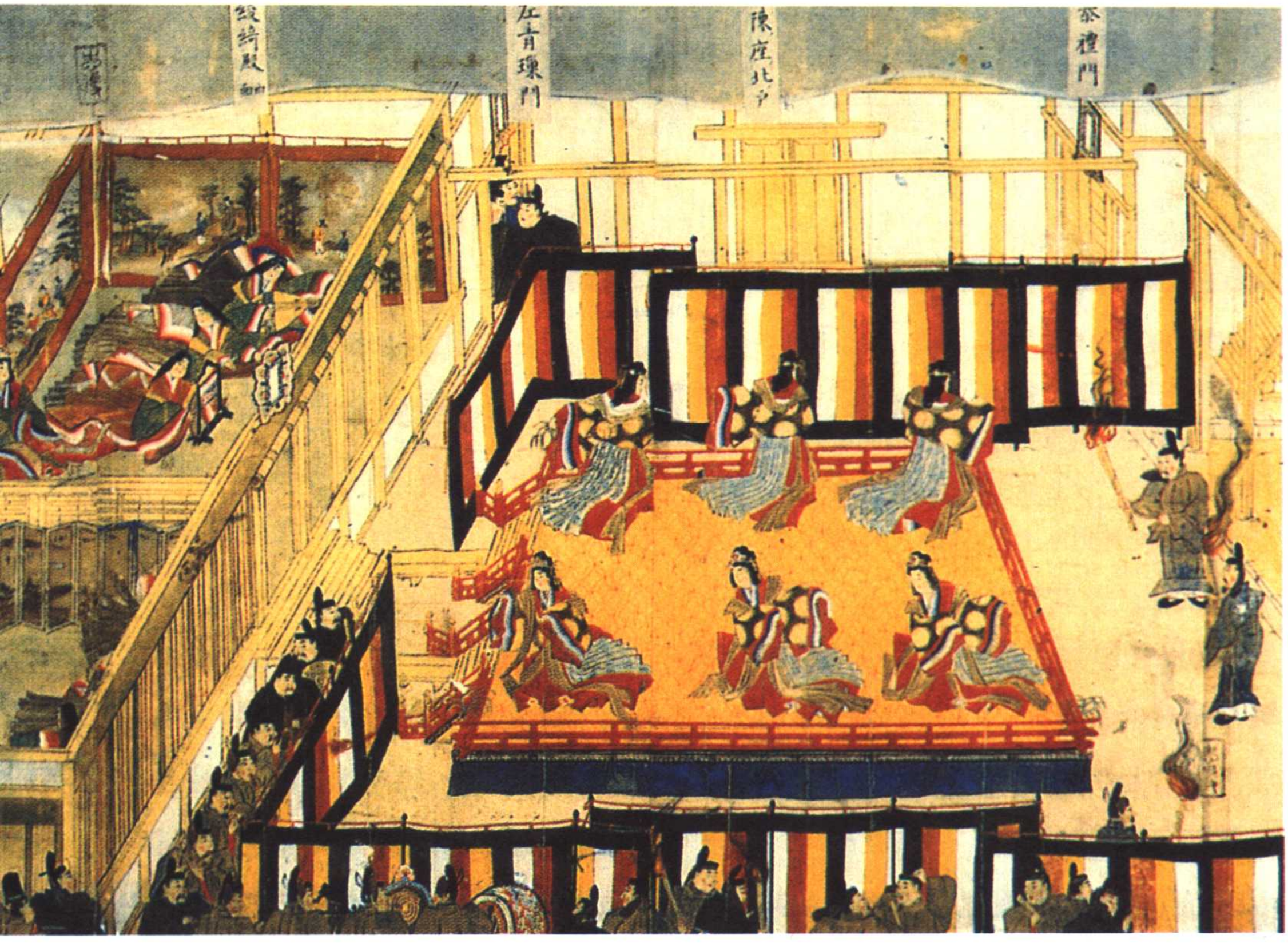
事实上，日本人对于天皇的理解在太平洋诸岛上能随处被发现。天皇是神圣的首领，对政治的参与可有可无。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天皇自己直接行使权力；而另一些岛屿上，他则把权力委托给别人执行。尽管这样，他的身份仍然是神圣的。在新西兰各部落中，首领神圣到不可冒犯的程度。首领不能亲自进食而必须由专人奉食，奉食的汤匙不可碰到他神圣的牙齿。首领外出须由人抬送，经他神圣的双脚触过的土地都自动成为圣地从而转归其拥有。他的头部尤其神圣，任何人不可触摸。他的话可以传达到部落诸神的耳朵里。在诸如萨摩亚岛、汤加岛等太平洋岛上，神圣首领完全脱离了世俗生活。一切政务由世俗首领掌管。十八世纪末，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在去过东太平洋的汤加岛后说那里的政权和日本尤为相似，那里神圣首领是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汤加岛的神圣首领执掌宗教仪式而不参与政权，果园中采下的第一颗果实被他接受并举行仪式后，人们才能品尝。神圣首领去世时，讣告中要使用“天堂空虚了”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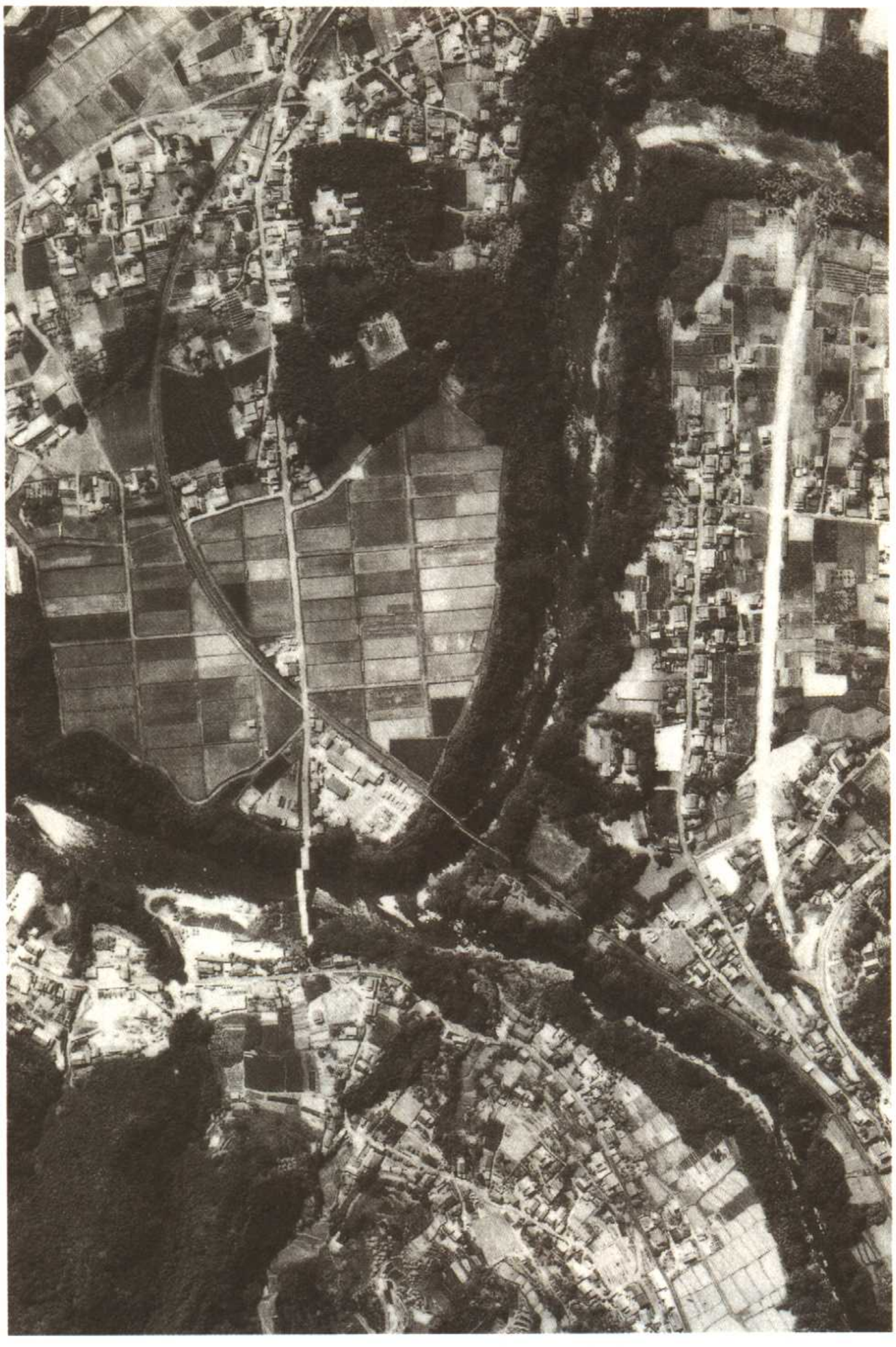
类词句，经过庄严的仪式而被葬入巨大的王墓。然而他却丝毫不参与政治。

虽然毫无政治实力，虽然是所谓“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按照日本人的概念，天皇在等级制中仍占据着一个恰当地位。对他们而言，是否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并非衡量天皇身份的尺度。长达几个世纪的年代中，虽然由征夷大将军统治，但日本人却始终如一地重视天皇和他在京都的宫廷。只是以西方人的视角看来，天皇的存在是不必要的。日本人已经习惯了随处的严格等级地位角色，他们对此的看法与西方人不同。

日本宫廷舞蹈　　绘画 日本

这是一次宫廷庆典，舞者在靠近天皇房间（右侧）的台子上，和着两群伴奏者的音乐翩翩起舞。左下角是一些弹琵琶、吹笛子、打击着鼓磬的男人们，还有一群被隔断在屏帷后面一间独立房间中在演奏琵琶、弦琴和编钟等乐器的女人们（上左），而两个舞女在一旁休息。虽然金碧辉煌的宫廷中的天皇没有实权，但他们在百姓心中却有着神圣的地位。





如地图一样精密的民族　　摄影　长筱　现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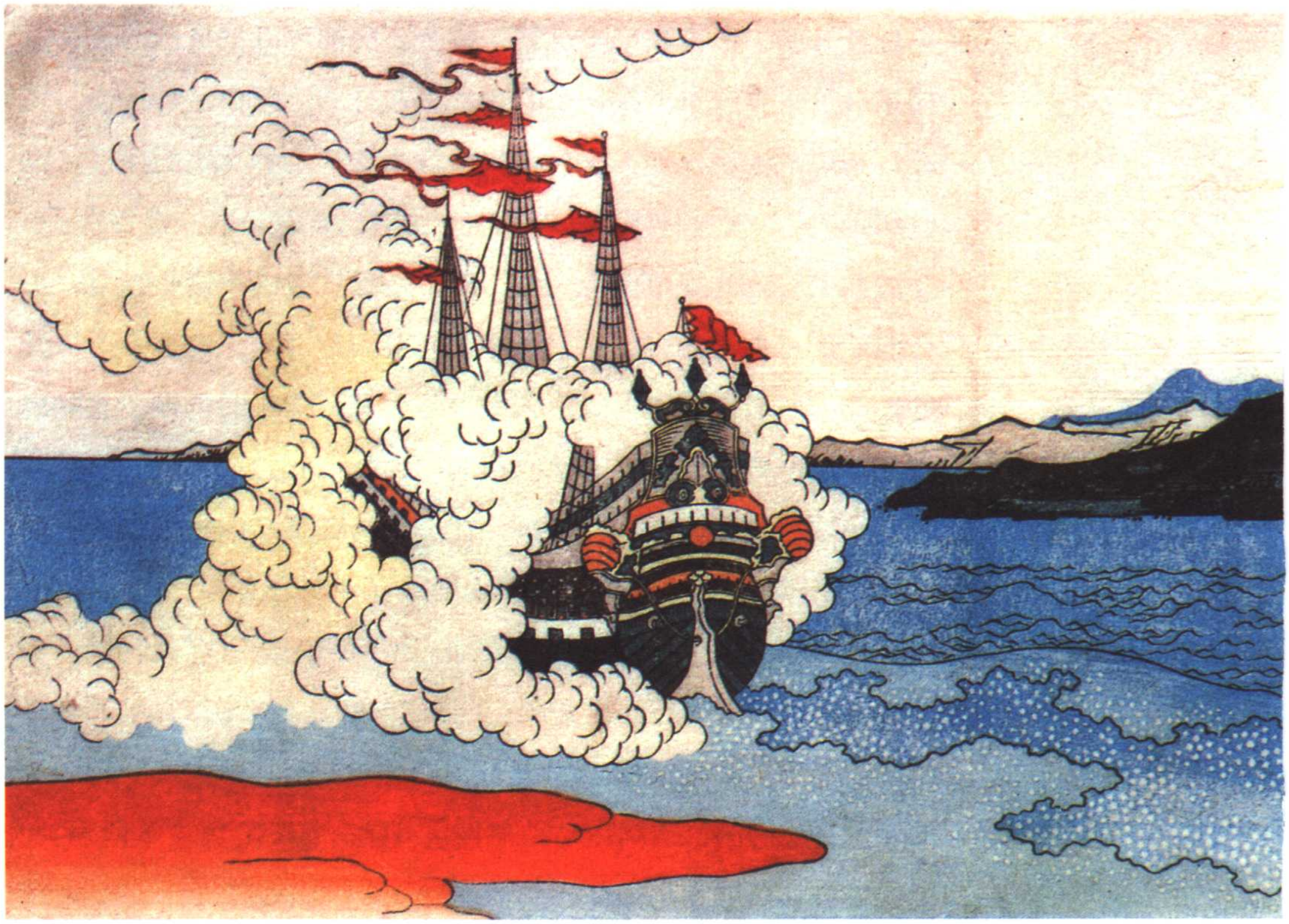
相对于其他独立民族，日本人更受这样一种世界的制约，在这个世界里，行为的每一个细节都被严格规范，细密得宛如一幅精密地图，社会地位是被规定了的。图为空中拍摄的日本在战场——长筱地图。

上自天皇，下至贱民，日本封建时期存在着极为明确的等级制，这也给近代日本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从法律上宣告封建制度结束至今也只不过是75年，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惯是不会就此在一个人的一生之间消失得没有踪影。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尽管近代日本的国家目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政治家们却仍在审慎地计划以求大量保存这一制度。相对于其他独立民族，日本人更受这样一种世界的制约，在这个世界里，行为的每一个细节都被严格规范，细密得宛如一幅精密地图，社会地位是被规定了的。两百多年间，是铁腕维持了这个世界里的法令和秩序。这段时间里，日本人学会了将这种繁密的等级制视同为安全稳定。只要他们存在于既知领域内并履行已知的义务，那么这种世界就是可信任的。盗贼被有效控制，大名间的内战停止。如同农民受到剥削可以起义一样，如果臣民可以证明别人对他们的权利构成侵犯，那么一样可以提出诉讼。尽管这样做存在风险，但也是被大家公认的。历代德川将军中有

一位最开明，他设置了控诉箱，每个公民都可以把自己的抗议投到箱中。只有将军持有箱子的钥匙。在日本，只要一种行为与现存行为规范抵触，那么这种侵犯性行为就有足够真实的保证可以被纠正。人们对这种规范十分信任，相信只要遵守就一定安全。一个人如果与这些规范保持一致，而不是反抗或修改这些规范，那么他就是有勇气和完美的。在这个规范的范围内，它是一个可知的世界，因而在日本人眼中，它也是一个可信赖的世界。它的规则并不像摩西十诫中的道德原则那样抽象，而是非常详细地规定：人们在这种场合应该如何行事，在那种场合下又该怎样；武士该如何，平民又该怎样；兄长应该如何，弟弟又该如何；诸如此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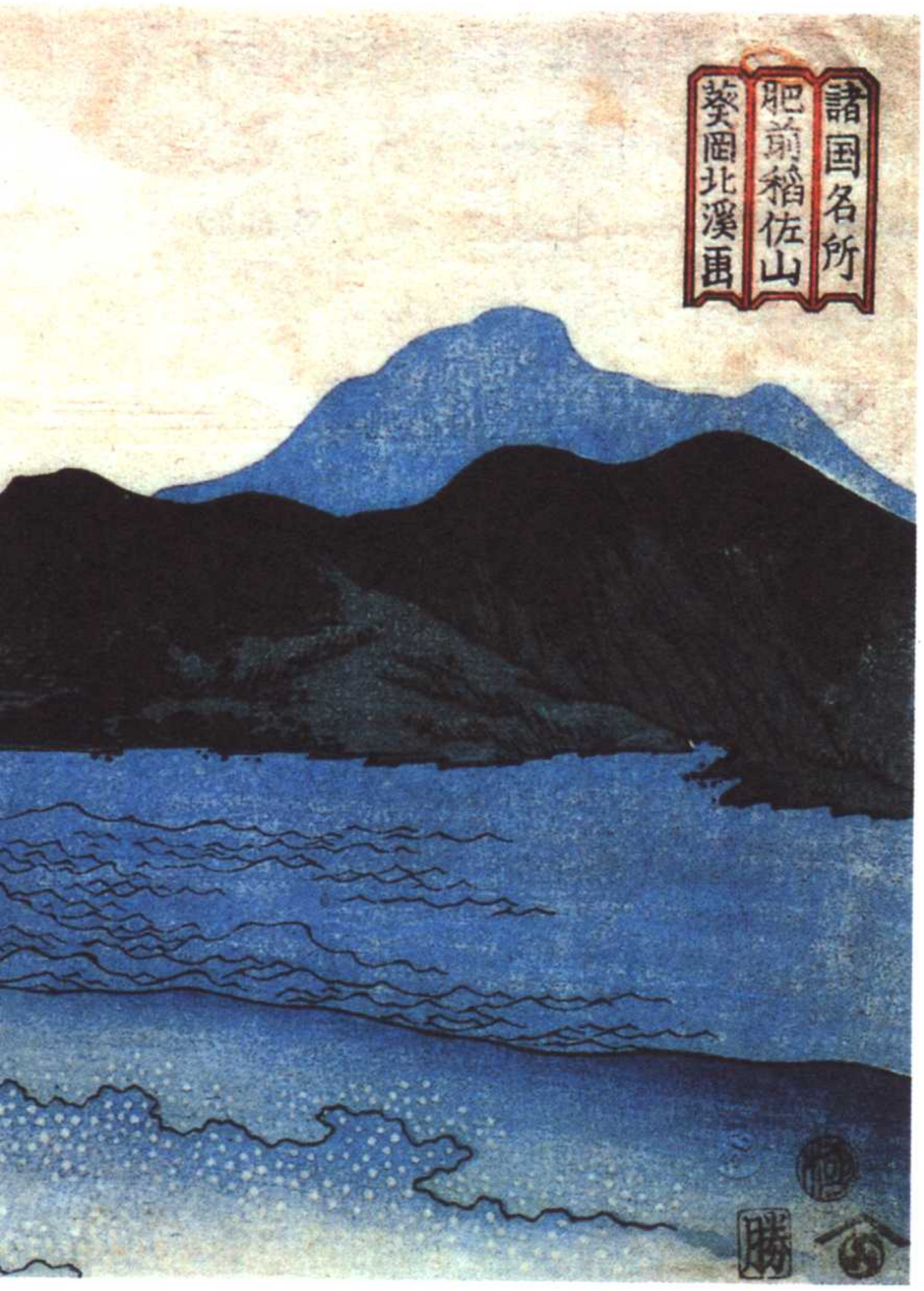
与其他一些生活在强力等级制统治下的民族不同，这种制度下的日本人并没有变得温良恭顺。关键的问题是要承认，日本的各个阶层都受到了某种保障。即使是贱民阶层也得到了垄断其特种职业的保证，他们的自治团体是被当局认可的。每个阶层被严格限制，但这是有秩序的，是安全的。

日本的等级限制还具有某种灵活性，这是印度等国所没有的。日本习惯用一些明确的手段来对制度进行调节，以保证常规不受到公然破坏。一个人可以采用多种途径改变自己的等级身份。货币经济时代，高利贷主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这时，富人就采用种种传统的方法以跻身于上层阶层。他们通过典押和地租而变成“地主”。当然，农民的土地是禁止转让的。然而，由于极高的地租，把农民继续限制在土地上对地主是有利的。高利贷主们居住在这块土地上收取地租。在日本，这种土地“所有”权就意味着势和利。一旦子女与武士阶层通婚，他们自己也就摇身变成了绅士。过继和收养是另一个变通等级制的传统方法。它提供了一个“购买”武士身份的方法。尽管德川氏一再加以限制，但商人还是富了起来。随后，他们就想方设法的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当养子。在日本，人们很少收养子，而是大多招女婿。入赘的女婿被称为“婿养子”，继



承岳父的一切。但代价也是巨大的。他的姓氏会从生父家的户籍中抹去，转入妻子家的户籍，他要跟着妻子家姓并同岳母一起生活。代价虽高，但获益也不浅。富有的商人的后代有了武士的身份，穷困拮据的武士则与富者结成了亲戚。等级制却依然如故并未遭到破坏。经过这样的变通，给富贾提供了上层等级的身份。

所以，等级制并不是规定只是同一等级内部才可以通婚。有好几种公认的途径可以实现不同等级间的通婚。其结果往往是富裕的商人逐渐渗入到下层武士阶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使得日本与西欧的差异更加明显。在欧洲各国，中产阶级逐渐发展起来，力量日益强大，这种压力最终使得封建制度瓦解崩溃。中产阶级随之统治了现代工业时代。日本却没有产生如此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放高利贷者以公开认可的方法，“购买”了上层阶级的身份。这样商人就和下级武士结成了联盟。同样是封建制度处于苟延残喘的时期，日本竟然容许比欧洲大陆更大的阶级流动性存在，这实在是让人惊奇，而这种情况最让人信服的证据就是，日



外国舰队的到来

《肥前稻佐山》 葵冈北溪 出自《诸国名所》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

封建社会的后期，连年征税，民不聊生。幕府统治下的各种弊端已经暴露无遗。以致黄金时代的锁国政策又被提上议程。可日本作为脱离亚洲大陆的一个岛国，对西方探索的船队而言，恰是一个绝佳的休整地和补给站。不管怎样的闭关锁国，西方列强的觊觎之心还是难以回避。而且千疮百孔的幕府统治在满载洋枪和火炮的舰队面前只能是束手就擒。

本的贵族和市民间几乎不存在任何阶级斗争的痕迹。

很容易就说日本这两个阶级互惠互利。在法国也可能同样是如此。西欧也有过两三个类似的例子，但欧洲阶级的固定性却十分顽强。在法国，阶级冲突可以导致贵族财产被剥夺。而在日本，他们却彼此结合起来。推翻腐朽幕府统治的联盟是由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级武士组成的。近代日本仍然保留着贵族制度，如果没有被允许的阶级流动手段，是很难出现这种情况的。

日本人对这套繁密行为规范的喜好和依赖是有必要的理由的。这种规范保证了遵循者的安全并允许抗议非法侵犯，可以调节以适应自己的利益。它要求相互履行义务。19 世纪后半叶，德川幕府崩溃时，任何集团都不主张废除这些规范。“法国大革命”甚至是“1848 年式的革命”（指“二月革命”。——译者注）也没有在日本发生。然而，形势已经是无可挽回了。从一般平民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欠下了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非生产阶级的人数众多，财政支

出额相当巨大已无法维持，大名财政亏空，已无力支付其武士侍从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纽带的网络也只能供人嘲弄。他们对农民增课非常重的年贡，企图以此来避免沦亡。寅收卯粮，连年的预征使农民已贫困到一定地步。幕府濒临破产，已难以维持。1853年，当培里司令官率舰队来到日本时，国内危机已达到白热化。强行闯入日本后，于1858年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当时的日本已处于无力抗拒的状态。

当时的日本，主流的口号是“一新”，即“恢弘往昔”，“王政复古”。这和革命是对立的，甚至是非进步的。“接夷”的口号与“尊王”联在一起并同样广为流行。重新回到锁国政策黄金时代的政治纲领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只有极少数的领导人明白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他们全力奋斗却遭暗杀。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讨厌革命的国家会顺应西方模式改弦易辙，更不用说五十年后竟然能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日本发挥了与完全不同于西欧各国的固有长处，



越中索桥

葛饰北斋 出自《诸国名桥奇览》 约1834年

弥漫的云雾淹没了高大的柳杉林，只露出半米多高的树梢，索桥在两个行人体重及所负重物的压迫下，被拉伸成一条角度极陡的折线，仿佛时刻都会断裂。江户幕府后期，天灾不断，幕府统治腐败，民不聊生，幕藩体制也如同不堪重负的索桥，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实现了高层人士和一般舆论都从没有要求过的目标。如果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能从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来，他们是绝不会相信的。因为当时地平线上几乎连巴掌大的乌云都没有预示20年后会有一股风暴横扫日本列岛。但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日本那落后并被等级制束缚的民众急速转向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了下来。



風俗美人二十相

遊歩の姿

明治年間
妻君之
風俗





明治廿年六月廿日印刷
同　年六月廿一日出版
印刷兼發行者
日本橋區馬喰町二丁目廿番地
鯉島龜吉

彫工　和田刀

第四章

明治维新

19世纪后半叶，日本内忧外患，政体不得不改。但日本人固守千年的等级制度是否要改？斯宾塞在给伊藤博文的信中写道，日本传统习俗中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国民福利的基础，对此应当加以培育和维护……这封信给与了改革者莫大的信心。

宣告日本进入了近代时期的战争口号是“尊王攘夷”，这一口号的含义是“王政复古，驱逐蛮夷”，旨在使日本免遭外国侮辱，回到由天皇和将军“双重统治”之前的10世纪黄金时代。京都的天皇朝廷是当时最反动的势力。在天皇支持者看来，天皇派的胜利就是要侮辱并驱逐外国人，重新恢复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意味着要剥夺“改革派”在国内外事务上的发言权。势力强大的外样大名变成倒幕派的先锋，他们提出“王政复古”的口号，要求更换当权者，推翻德川幕府，确立自己在日本的统治地位。农民们希望能占有更多自己收获的粮食，但他们反感“改革”。武士阶层则希望在维持俸禄的同时能有机会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商人们则在财政上支持“王政复古”派的军队，希望推行重商主义，他们从未对封建制度表示不满。

1868年，倒幕派赢得胜利，宣布“王政复古”，标志着“双重统治”时代的结束。当时，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胜利者即将推行的是一种极为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但新政府成立之后却采取了相反的政策。不到一年的时间，取消了大名在各藩地的征税权。政府收回了“版籍”，原先“四公六民”中的“四公”要交给大名（德川幕府时代封地——“知行地”万石以上的高级武士，亦即各蕃蕃主，或称“诸侯”。——译者注），现在则要交给政府。但这种收回不是无偿的，政府要给每个大名发放相当其正常收入一半左右的俸禄额，并且还减免了他们在供养武士和公共建设上的支出。同大名一样，



年轻的明治天皇　摄影　19世纪

1868年，维新强国的“倒幕派”成功发动政变，15岁的明治天皇及其幕僚从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手中接过统治大权，并颁布“王政复古”诏书，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明治天皇勇于接受西方风俗，从1872年起他就带头剪掉发髻，穿起西装，这张照片是他25岁时身着欧洲式军装所照的。

武士也从政府那里领取俸禄。在这之后的五年间，政府从法律上废除了等级间的不平等，取消了用来表明不同等级、地位的服饰等外观标志，下令可以“散发”（1871年公布的“散发脱刀令”允许人们自由剪发，废除佩刀，以破除旧习，提倡“文明开化”。——译者注）。政府相继解放了贱民，废除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撤除了各藩之间的关卡，取消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到1876年，把大名和武士的俸禄拆成偿还期为5－15年的俸禄公债，一次性的发给他们，由个人在德川时代所领取的固定俸禄额决定其份额的多少。有了这笔钱，他们就有可能创办非封建性质的新式企业。早在德川时代，商业金融巨头与封建土地贵族之间就有了某些明显的结合，这项政策最终使得这种特殊的结合得以确立。

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实施的这些重大改革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当时，这些改革措施甚至不如1871年到1873年的“征韩”战争更能得到一般百姓的拥护。但明治政府并没有动摇进行改革的方针，他们否决了侵朝计划。政府的施政方针与绝大多数为其建立而奋战过的人的愿望形成强烈对立。到了1877年，对立派的伟大领导者西乡隆盛终于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他的军队代表了尊王派要求



岩仓使团首脑　　摄影　19世纪

1871年12月23日，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内阁顾问兼参议木户孝允、参议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和参议兼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的“欧美使节团”出发考察欧美。图为五人的合影。

维持封建制度的全部意愿，但明治政府在“王政复古”实现的一年后就违背了这些意愿。政府招募平民，组成一支义勇军，打败了西乡隆盛的正规部队。这次叛乱充分证明了当时明治政府在国内激起的不满是多么地强烈。

农民也怀有同样强烈的不满。在1868年到1878年明治政府的最初10年里，至少爆发了190次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逐渐采取措施，减轻压在农民身上沉重的税赋。所以农民们觉得新政府忽视了他们，这也是有理由的。农民们还反对一些试图改变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措施，比如建立学校、征兵制、丈量土地、散发令、给贱民以平等待遇、官方对佛教的极端限制、改用阳历等。

支持政府进行这些异常激烈不得民心的改革的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日本封建时代那些特殊习惯孕育了的下级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这些武士是大名的心

腹家臣，他们既有高明的政治手腕，还经营管理着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而另一些商人则购买武士身份，使生产技术知识在武士阶层中得以普及。武士和商人的结盟使一些自信而干练的人充分发挥才能，谋划并组织实施了明治政府的改革。这些人为什么能如此精明能干并且将聪明才智付诸实践？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刚刚从封建形态中走出来，其国力就像如今的泰国一样衰弱，但却能诞生一批能够把握时代潮流的领导人，他们成就了最具政治手段的大事业，这是在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出现过的。这批领导者的优缺点都根植于日本人的传统民族本性，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揭示这种民族特性的历史和现状。现在，我们暂且先来了解一下这些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们是如何成就这一事业的。



大久保利通　　肖像　19世纪

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家。出身于萨摩藩下级武士家庭，17岁步入政界，任萨摩藩属下记录所书役，属藩政改革派。因他对推翻幕府有特殊的贡献，被后人誉为“维新三杰”之一。



西乡隆盛　　小林永濯　绘画

早年曾为改革幕藩政治四处奔走的西乡隆盛，以其过人的才智和恒心，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为“维新三杰”。1873年，西乡的“征韩”计划未能得到政府的回应，继而辞职回乡，之后他的政见愈来愈背离明治维新所代表的精神。



西南战争熊本城之役　　近藤樵仙　油画

在百姓的协助下，政府军正拖着火炮向西乡隆盛的大本营——熊本城堡进发。由于两军的装备相差悬殊，政府军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他们是把自己的任务看做是一项事业来成就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这当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把日本变成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他们并不是偶像破坏者，对封建阶级，他们既没有彻底否定批判，也没有剥夺其财产，而是以高官厚禄来引诱，使他们转变立场，永远支持新政府。他们终于改善了农民的境遇。尽管在10年之后他们才满足了农民的愿望，但当时农民的境遇主要是由于明治初期国库的匮乏造成的，而并不是他们从阶级立场上想要拒绝农民的要求。

不过那些掌握政府实权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拒绝一切关于废除等级制度的思想。“王政复古”废除了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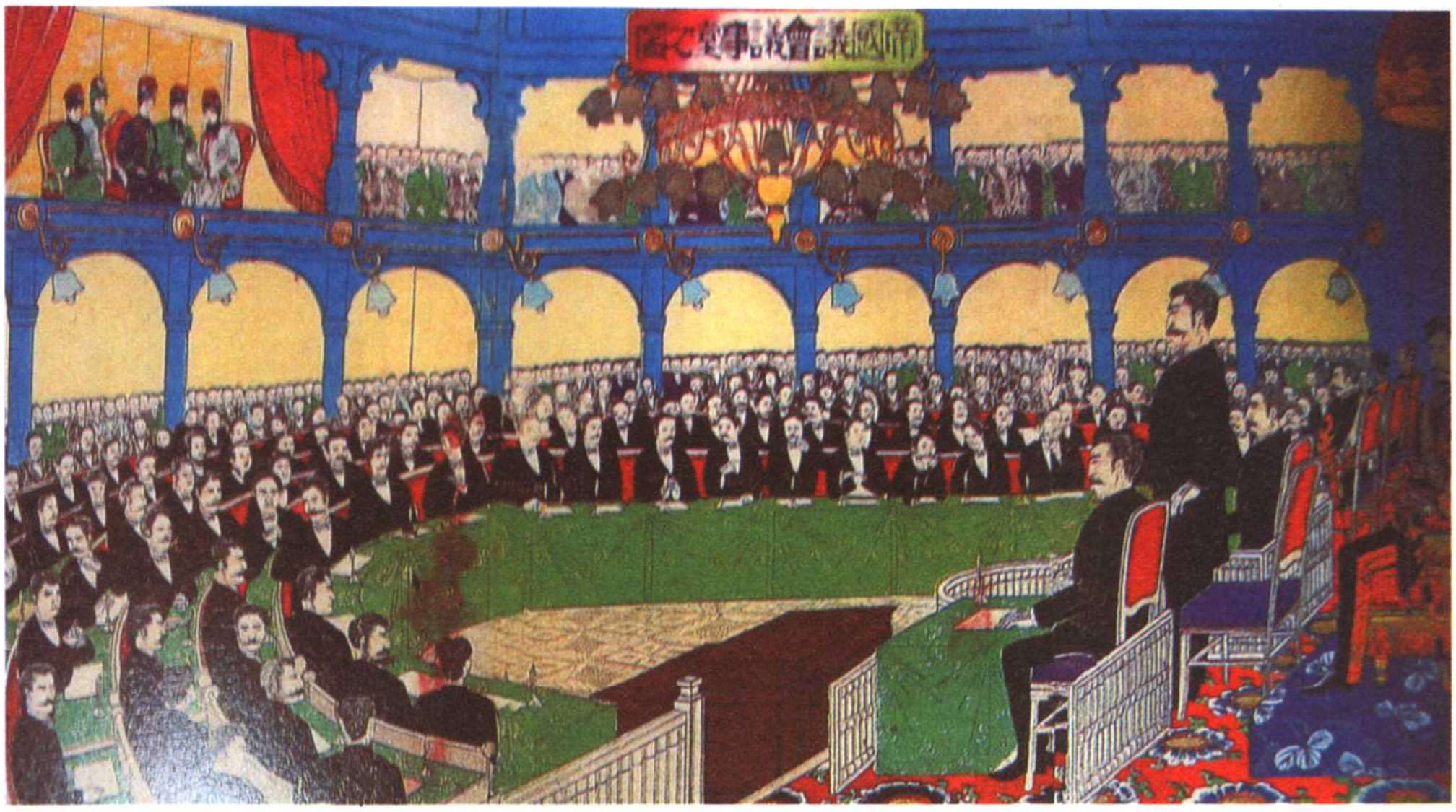


伊藤博文　　肖像　19世纪

1890年，日本召开行宪后的第一届国会，伊藤博文任贵族院议长。1892年第二次组阁，对内压制自由民权主义的政党活动，对外扩军备战，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朝鲜、中国的战争。

使天皇处于社会阶段金字塔的顶端，简化了等级制度。此后的政治家又取消了藩，消除了效忠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但这些改革只是赋予了等级制度一个新的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它。为了让国民接受他们卓越的政治纲领，被称为“阁下”的那些领导者强化中央集权统治。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老百姓恩威并施，交替使用大棒和胡萝卜。在公共舆论反对改用阳历、设立公共学校，对废除秽多等贱民的不平等待遇的措施表示不赞成时，他们却丝毫不动摇自己的立场。

上层阶级施予民众的恩泽之一，就是1889年天皇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它肯定了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设立了议会。这部宪法是“阁下”们在研究批判西方各国宪法的基础上精心起草的。但是宪法的拟定者却“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来避免人民的干涉和舆论的侵扰”（金子坚太郎子爵语）。负责起草宪法的机构（制



帝国议会议事堂之图

随着民主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日本的议会的地位升高，明治维新时期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模式逐步得到改变。

度取调局）隶属于官内省，因而其地位是神圣不可冒犯的。

明治的政治家们非常明确自己的目标。1880年，宪法起草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户孝允侯爵前往英国（伊藤博文赴欧是在1882年。五年前即1877年，木户孝允已死，因此，木户不可能承担此任。这里当系金子坚太郎子爵之误。金子奉伊藤之命，随员中桥德五郎、木内重四郎、水上浩躬、太田奉三郎等，于1889年携英文本日本宪法前往欧洲，征求各方意见，并会见了斯宾塞。——译者注），就日本目前遇到的问题，听取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意见。和日本使节进行了漫长的交谈后，斯宾塞写了意见寄给伊藤。谈到等级制度时，斯宾塞写道，日本传统习俗中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国民福利的基础，对此应当加以培育和维护。他说日本有一大优点就是对长辈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在“长辈”的领导下，日本将稳步前进，并将可以克服许多个人主义国家无法避免的种种困难。这封信验证了他们的信念，对此明治的大政治家们非常满意。他们力图在现代世界中保留其“各得其所”的优点，不想破坏等级制这一传统。

明治政治家们在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领域中也都明确规定了国家和人民

之间“各得其所”的义务。其整体安排与美国、英国迥然不同，以至我们常常忽略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其上层阶级拥有强有力的指挥权，无须听从公众舆论的指挥。掌握政府的是等级制的上层人物，但却不包括由选举产生的人。对政府的掌握者的选举，人民没有任何发言权。1940年，组成政府最高层的都是一些可以随时拜谒天皇的重臣、天皇身边的顾问以及天皇亲任的官员即阁僚、府县知事、法官、各局长官和其他高宫。在等级制度中这样的高位不是由选举选出的。对甄选、任命内阁成员及大藏省或运输省局长这样的事来说，人民就更没有任何发言权了。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国民的意见，他们拥有某些特权可以对政府高官提出质询或批评，但在任命、决策或预算等方面则无任何实权，也缺乏法律的创议制。众议院要受限于不经过选举产生的贵族院，贵族院议员半数由贵族组成，另四分之一由天皇遴选。贵族院拥有与众议院几乎对等的法律批准权，这样就又增加了一

地方测量之图　　葛饰北斋 浮世绘 184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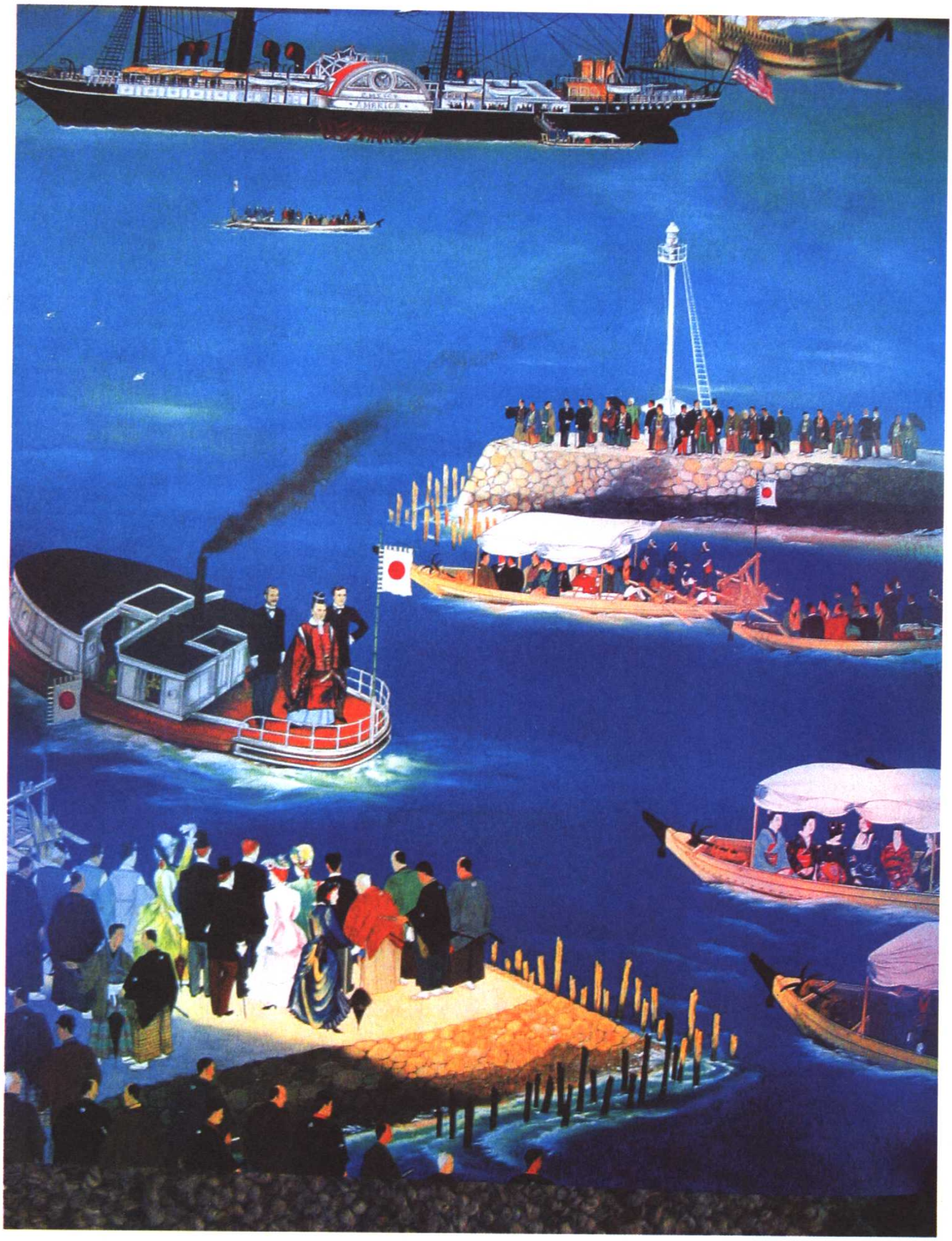
早在19世纪50年代，日本人已学会利用西方传来的大方仪及小方仪来精密地测量土地。对于比国内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总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学习和利用，这使它得以不断缩小与西方工业强国之间的差距。



种等级性的控制。

确保日本政府的高级职位都由“阁下”们掌握，这决不意味着日本在“各安其分”的体制下没有自治。所有的亚洲国家，无论实行哪种政治体制，上层权力总是不断向下延伸的，在中层与下层的地方自治权对接。但各国间也存在差异，诸如民主范围达到的程度，负有的责任，以及地方领导能否对整个地方共同体负责，会不会被地方势力所垄断而损害中央利益。如同中国一样，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最小的责任单位约5－10户，被称为“邻组”（德川时代称“五人组”）。这一“邻组”的组长，负责领导组织组内事务，保证其成员行为端正。遇到可疑行为必须报告，发现在逃犯则要交付政府。一开始，这种管理方式被明治政治家们废除了，但后来又被恢复起来，改名为“邻组”。在市镇中，有时政府也积极发展“邻组”，但现在这一模式在农村已经不发挥什么作用了。比“邻组”更重要的单位是“部落”。政治家们几乎没有废除部落，但也没有把它作为政府体系的一个行政组成部分。它是国家权力尚未涉及的领域。部落由15户左右的居民户组成，每年更换一次部落长，直到今天仍具有其重要的组织功能。部落长的职责是管理部落财产；保证给予向遇丧或遭受火灾的部落家庭援助；合理安排耕作、盖房、修路等公共事项的日程；担负告知义务；发生火警时振铃；休息日敲钟击梆。同其他亚洲国家不同，日本的部落长并不负责共同体内国家赋税的征收。所以，他们的负担并不重，所处的地位也不会引起矛盾，他们只是在民主责任范围行使职责。

近代日本正式承认市、叮、村等地方行政机构。由公选的“长者”们推举一位领导者，代表本地区和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府县公署交涉各项事务。在农村，这个领导者通常是一位拥有土地的农民家庭中的年长者。当选的村长，在经济上要遭受或多或少的损失，但却拥有不小的权力。他与长者们共同对村里的财政、公共卫生、学校进行管理，登记财产并了解每个居民的情况。村公所是个非常繁



走向世界　　山口蓬春　绘画

明治四年的11月，日本政府派出以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为首的使节团出访世界，一方面以主动和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对各国国情做一番考察。随同使节团一同出发的，还有6名女留学生。使节团归国后呈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书，它成为日本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基础。

忙的地方，负责管理国家拨来的小学教育补助费，征集由本村负担的远比国家补助费要多很多的教育经费，并监督这些费用的开支；还要对村落共有财产进行管理和负责租赁相关事项；组织土壤改良和植树造林工作；对一切财产买卖进行登记；只有经过村公所正式登记的财产买卖才能被法律所承认。本村每户居民的住址、婚姻、子女的出生、过继和收养、前科以及其他资料都必须在村公所登记。村公所保管每户家庭的上述材料。居民的原籍资料村公所可以从任何地方提取，将其登记入户籍册。当一个人在遇到申请就业、接受审判或其他需要身份证明的情况时，他必须写信给原籍的市、叮、村公所索要本人材料的副本，或者亲自回去取来交给有关单位。因此，人们是绝不敢轻易给自己或家庭的资料上留下不好的记录的。



市、盯、村所负的责任很大，这是一种共同体的责任。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出现了全国性政党。虽然任何国家也都会出现“执政党”与“在野党”的交替。但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却丝毫不受政党交替的影响，仍然在“长者”们的领导下为共同体服务。尽管这样，地方行政机构在对法官、警官和教员的任命三个方面不能行使自治权，这些人员都是由国家直接任命和启用的。由于日本的民事诉讼几乎一直是通过调解或仲裁来解决的，所以法院在地方行政中几乎不发挥什么作用。相比较而言，警官的作用则重要一些。每逢临时集会，他们必须到场。不过，他们并不常有这种任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对居民身份和财产进行相关记录。为了保持警官局外人的身份，避免地区性联系的发生，政府要经常调动警官的工作地点。对学校的教员也是这样。国家对学校的规定非常严格。和法国一样，日本的每所学校在同一天都使用同样的教科书，上同样的课；每天早晨的同一时间，在同样的广播伴奏下，做同样的早操。市、叮、村共同体对学校、警察和法院没有自治权。

上述的日本政府机构，所有特征都与美国政府机构大相径庭。在美国政府机



西洋音乐会

明治政府一改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的政策，提倡向西方求知。西方文明大量涌入日本，改变了人们许多传统的观念，东京音乐学校1889级的学生毕业时就举行了一场完全西化的音乐会。

构中，由普选产生的人掌握着最高的行政、立法权；由地方指挥下的警察和法院来执行对地方的管理。但是，日本的政府机构在形式上与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却几乎是一样的。例如，和日本一样，荷兰的一切法律都是由女王的内阁起草的，国会实际并未掌握立法权。法律规定町、市长也由女王来任免，因此女王的权力非常广泛，直达地方事务，超过1940年以前的日本。虽然实际上女王总是认可地方的提名，但女王的任命也是必经的程序。在荷兰，警察和法院也是直接对君主负责。不同的是，荷兰的任何宗派团体都可以自由开办学校，而日本的学校制度则基本上是照搬法国的。在荷兰，开凿运河、围海造田以及开发地方事业，这些都是地方自治体而不是由普选产生的市长或官员们的职责。

日本政府机构与西欧各国间的真正差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其职能上。日本


古今名婦鏡
小深
小深は神田今川橋津の國屋惣兵衛の娘也一度某侯の妾と成又藝妓と成后大和へ見物せんと便船に乗込が難風の為に海上に漂ひ幸ひ数日を経て亜米利加属國布哇國へ漂着し亜米利加人の助けを得て同國へ渡り開化ふ志一諸学ふ勉励し遂ふ女教師となれり小深の新服せーの安政六年三月之と云ふ
松亭吟

穿洋装的日本女子

这位日本女子显然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穿的是西式的礼服，并像西方上流社会的淑女一样，还拿了一把遮阳伞。

人依靠的是由以往的经验熔铸、并以道德体系和礼仪来体现的古老恭顺习惯。只要那些“阁下”们在其位谋其政，他们的特权就会受到尊重，国家就可以指望。这并不是因为“阁下”们的政策得到拥护，而是因为在日本，越过特权界限就是错误的。政府的最高层一点也不需要重视民众舆论。政府只是要求国民支持。当国家越过自己的权限范围干涉地方事务时，其裁决也会受到尊重。但在美国人眼中，发挥各种内政机能的国家政府几乎是种不可避免的祸害。日本人则不然，他们觉得国家是近乎完美的存在。

不仅如此，政府非常注重承认国民意志的“适得其所”。在合法的公众舆论领域，即使是为了国民利益的举措，日本政府也会尽力征求人民的同意，这种说法并不夸张。例如，在改革旧式农耕法时，负责农业发展的官员很少使用权力来强行推广，这正像美国爱达华州的同行们一样。在鼓励建立由国家担保的农民信用合作社、农民供销合作社时，政府官员总是和在地方有威望的人多次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地方政府自行解决辖区内的事务。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对权力进行适当的分配并划分相应的行使范围。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日本人更加尊重“上级”，这也为他们自己争取到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不过“上级”也必须苛尽自己的职责。日本人信奉的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明治政治家在宗教领域中制定了比政治领域更为奇特的制度。国家只管辖一种宗教，将其奉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对其他的信仰奉行自由政策。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所谓的国家神道。就像美国人对国旗的敬仰一样，这种宗教因被视为民族象征而受到特殊的尊敬。日本人认为国家神道不是宗教。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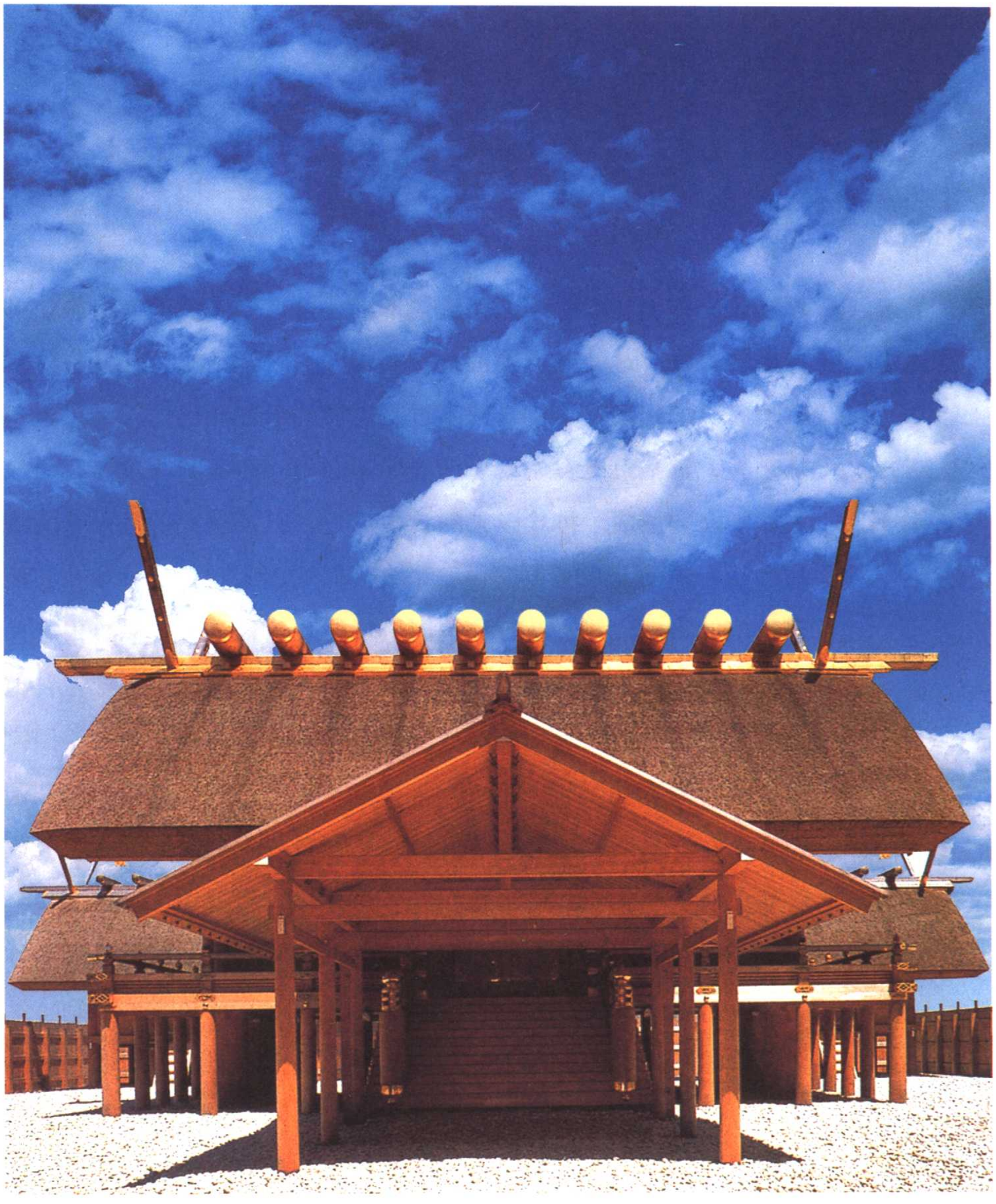

手力雄ノ命
天ノ鈿女命

天照大神出现了　　绘画 日本

日本的神道教是儒教、佛教、基督教和当地原始宗教的大杂烩。神道教认为在一切自然现象中都有神，太阳女神天照大神是神道教中最崇高的神明。据说她是创造日本的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的女儿，而日本皇族则是她的后裔。图为受到风神惊吓而躲藏起来的天照大神，他对外面黑暗之中的喧闹感到惊讶，于是从石窟里出来了。自此，陷入黑暗的大地再次有了光明。

日本政府并不要求全体国民都信仰国家神道而违反西方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这就好像美国政府要求人们对星条旗敬礼一样，日本政府要求国民信奉神道只不过是忠诚的象征而已。因为神道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里传授而不必担心西方的非难。在学校里，国家神道成了神代以来的日本历史，以及对“万世一系的统治者”——天皇的崇拜。国家来支持管理国家神道。日本在其他宗教信仰方面，几乎奉行和美国一样的政策，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信仰。不仅对于佛教、基督教甚至是其他教派的神道或祭祀神道也是一样。这两种不同领域在行政上和财政上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由内务省神祇局来管理，其神官、祭招、神社等费用均从国库开支；一般祭祀神道以及佛教、基督教各派则受文部省宗教局管理，经费靠教徒自愿捐赠。

在宗教信仰上，日本政府坚持上述立场。国家神道不能被称为是庞大的“国教会”，却至少可以称为是庞大的机关。小到特别祭典时司祭神宫才进行清扫的地方小神社，大到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各地分布着11万多座神社。神官系统的全国性等级与政府系统并列，从最底层的神官到各郡、市和府、县的神官，再到最高层被尊为“阁下”的神祇官。这些神官，更多的是在代替民众举行仪式而不是领导他们进行祭拜。国家神道与我们平常到教堂去做礼拜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因为它的非宗教性，在法律上没有权利宣讲教义，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所了解的类似礼拜之类的仪式。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有频繁的祭拜日。町、村代表要站在神官面前，参拜神社。神官举着一根系着麻绳和纸条的“币帛”，



伊势神宫　日本传统建筑 木结构 本州岛三重市 公元2世纪

伊势神宫是日本最古老、最神圣的神道教神社，位于三重市的海滨密林里。伊势神宫匀称简洁，轻巧严谨，蕴涵着一种自然的神力和天道的哲理，代表了日本建筑的精华。神宫分内外两宫：内宫称“皇大神宫”，祭祀天照大神；外宫晚于内宫约500年建造，称“丰受大神”，它专门负责保护天照大神的食物。两宫的样式大致相同，公元7世纪，天武天皇确立了每20年重建神宫的制度，神宫得以完好保存至今。神宫纵深布局，层次丰富。4圈同心圆的栅栏将神宫与外界严密隔断，只有主持仪式者和皇族成员才可以进入。

在他们头上来回挥动，替他们祛邪。之后，神官再打开神龛内门，细着嗓子叫喊，召唤众神降临来享用供品。这时，神官祈祷，参拜者们按身份排列，毕恭毕敬地供上小树枝。这些树枝上垂着几根细长的纸条，从古至今被奉为神圣的象征。然后，神官再度尖声喊叫，将众神送回，关闭神龛内门。遇到国家神道的大祭拜，天皇亲自为国民致祭，政府各部门要放假。不过，和地方神社的祭祀日以及佛教的祭祀日不一样，这种祭祀日并不是群众的祭祀节日。后者属于不在国家神道范畴的“自由”领域。

在自由领域，日本人按照自由的意志进行教派和祭祀活动。佛教异常活跃，至今仍被视为绝大多数国民信仰。各种宗派，甚至是神道，都有各自教义和开山祖师。除国家神道外，还存在不少教派。其中有些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推行国家主义之前就已经成为纯国家主义的堡垒了。其他一些是一种精神疗法，通常被喻为基督教科学。有人信奉儒家教义，有人则专门进行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的活动。老百姓的祭祀节日多数不在国家神道的范畴内。在这种节日里，神社里都是蜂拥而至的百姓，每个人都漱口祛邪，拽绳、打铃、击掌，以此召唤神灵降临。然后，他们恭恭敬敬地行礼；再次拽绳、打铃、击掌，将神灵送回。礼毕后，在离开神社殿前，他们就开始这一天的主要



远途拜庙

深山藏古寺，日本人却不觉途远，远足拜庙是他们的喜好之一。无论是气势恢弘的建筑物还是由当地志愿者维护的街边小祭坛，无论是神社还是寺庙，也无论是神道教还是佛教，它们都无所不至地渗入到了日本人的生活当中。

活动。在神社院子里的小摊贩上购买珍品玩物，观看相扑、祓术以及有小丑插科打诨逗笑的神乐舞。一位曾留居过日本的英国人说，每逢日本祭祀节日，他的脑海里都忍不住浮现威廉·布雷克的一节诗：

如果教堂给我们几杯啤酒，

和那温暖我们灵魂的欢乐之火，

我们将会终日唱诗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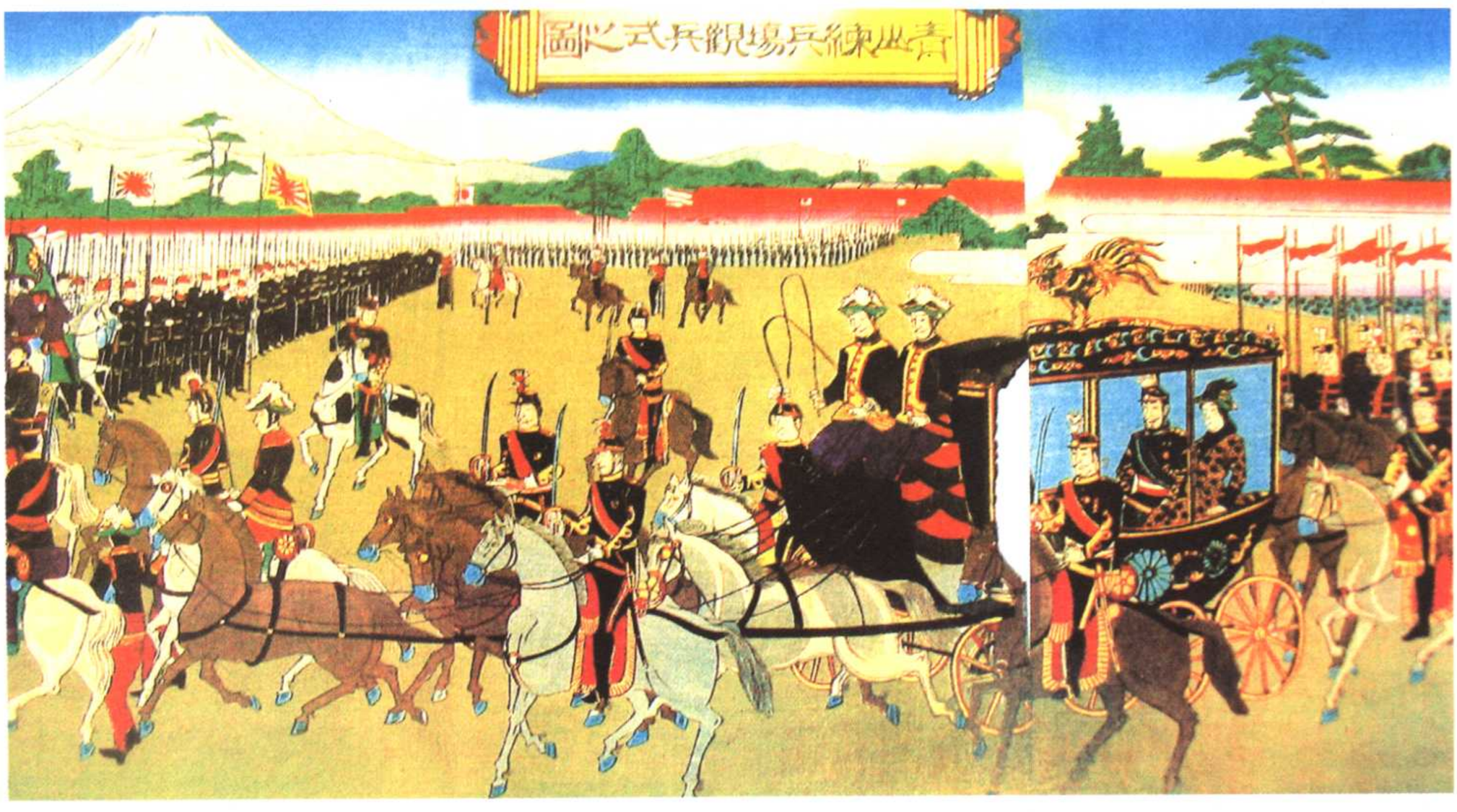
绝不会想离经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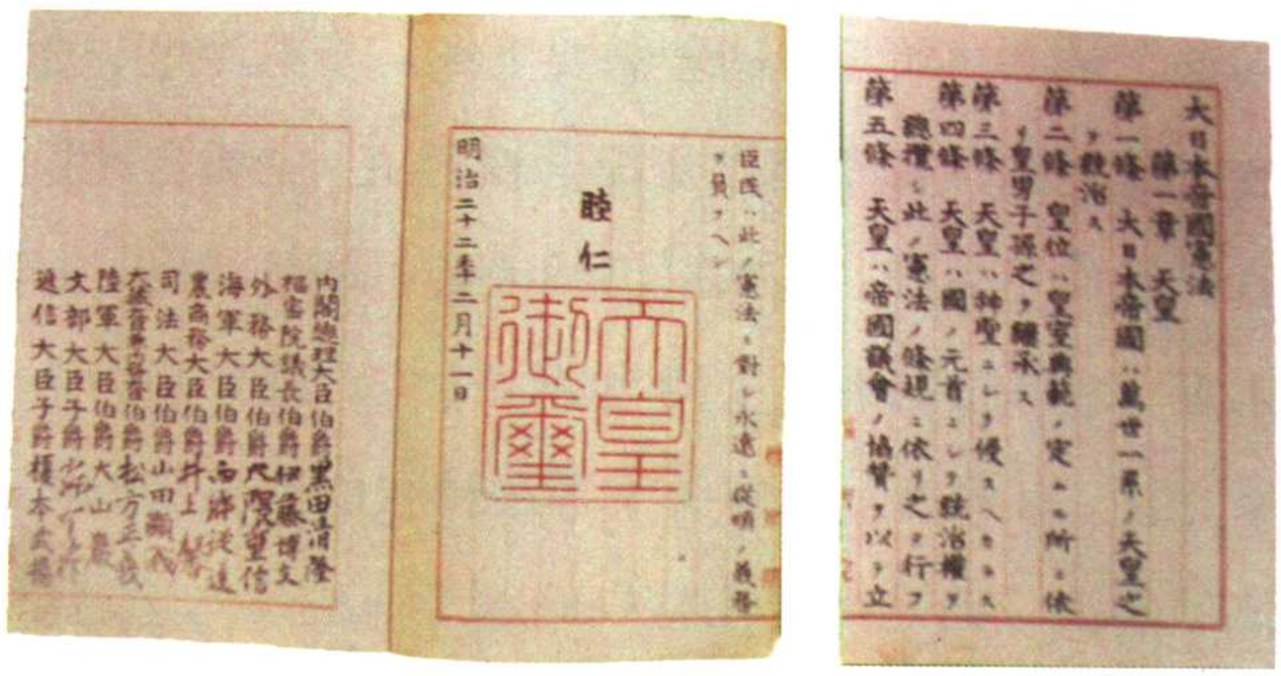
除极少数专门献身宗教的人外，日本决不会觉得宗教严峻。日本人还喜欢远途朝山拜庙，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愉快的休假。

综上所述，明治的政治家们谨慎地划定着国家在政治中的职权范围以及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他们把其他一些领域都交给人民。凡是与国家有关的事

青山练兵场　梅堂小国政

明治维新的变革瓦解了日本封建时代幕府、地方大名及武士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随即近代式的国家军队就组建起来。但敌人的尊崇地位在近代军队也依然有所体现。青山练兵场于明治19年设立，第二年明治天皇即亲自前往阅兵。





日本帝国宪法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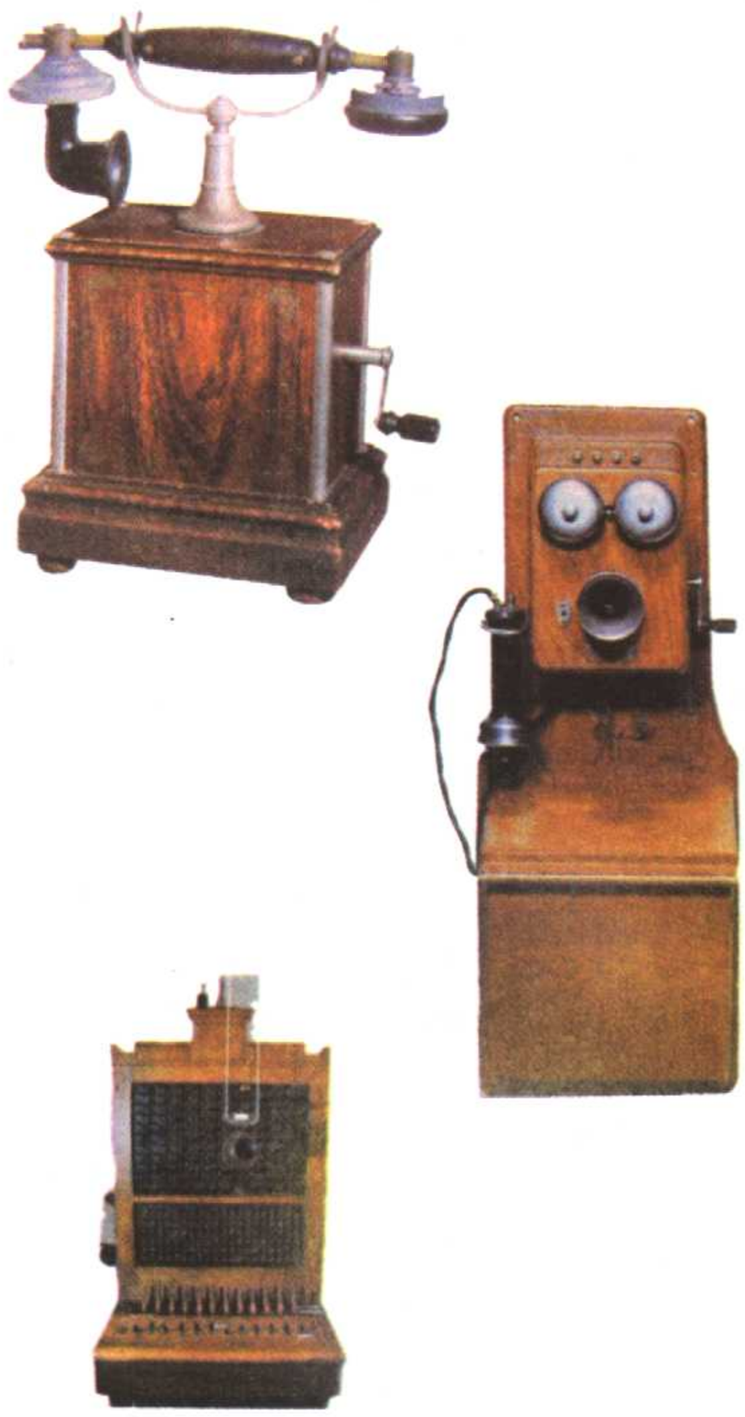
1889年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原文，天皇睦仁与各部大臣在文末均写下了亲笔的签名。

务，他们作为新等级制度的最高官员是一定会加以控制的。陆海军创建时，他们废除了军队中的旧式等级制，甚至比在老百姓中废除得更彻底。他们虽然在军队中保留了某些旧习俗，但却废除了日本的敬语。一个人能够实现军队职阶的晋升取决于个人能力而不是看家庭出身，这在其他领域是很难见到的彻底的改革。只有这样，军队在日本人心中才享有当之无愧的至高荣誉。这些确实是新军队获得民众支持的最好办法。而且，排、连单位大多由同一地区的乡邻编成，和平时期服兵役的地方大都离家很近，这不仅意味着士兵与地方保持着联系，而且每个人服役的两年期间，武士与农民、财主与穷人的关系被军官和士兵、老兵和新兵的关系所取代。在很多方面，军队起到促进民主的作用，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样的军队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大多数国家中，军队都是赖以维持现状的巨大力量。但在日本则有所不同，军队对小农阶级非常同情，这曾经屡次促使大金融资本家和企业家对军队进行抗议。

日本的政治家们并不为建立一支这样的人民军队而自豪。他们并不认为以这样的阶次来确保军队在等级制中的最高地位是恰当的。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最高层采取了一定措施。但由于这些措施没有写进宪法，军部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的公认惯例就被保留了下来。例如，与外务省和内政各省大臣不同，陆海军大臣有权直接谒见天皇，他们无须向文官内阁成员通报或协商就能够以天皇的名义强制推行其措施。政治家们只要拒绝陆海军将领入阁就可以阻止自己不信任的内阁成立。因为文官或退役军官是不能担任陆海军大臣的，只要他们不派高级现役军官担任此职，任何内阁就都无法组成。同样，如果军部对内阁的任何行动不满，只需召回其在内阁的代表就可以致使内阁解体。军部首脑绝不容许任何人干

涉这个最高决策层。倘若需要更深一步的保证，那么宪法中就有一条规定：如果政府所提的预算草案被帝国会议否决，就要自动执行前一年度的预算。尽管外务省已经作了保证，关东军仍然武装占领了满洲，起因就是内阁意见不一致。决策未定，军部首脑乘机支持当地司令官，这只是一个小案例。在军部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日本人对所有关于等级特权的后果都倾向于接受，并不是因为他们赞同该项政策，而是由于在特权问题上他们反对逾越界限。

日本所走的工业发展道路是任何西方国家都不可比拟的。这条道路也是由“阁下”们安排步骤并制定规则而实现的。他们不单单制定计划，而且他们认为是需要的企业，他们会让政府创办并为其提供财政补助。他们让政府官员来组织和管理这些企业，聘请外国技术专家，并选派人员出国学习。当这些企业如他们形容的那样“已组织完备，业务发达”时，就转卖给私人企业。他们以超低的价格将这些官办企业卖给那些几经挑选的金融巨头，即以三井和三菱两家为核心的著名财阀集团。在日本政治家眼中，工业发展是关乎日本民族存亡的大事，不能信任供求法则和自由企业理论。然而，这一政策绝对不是来自社会主义的教条，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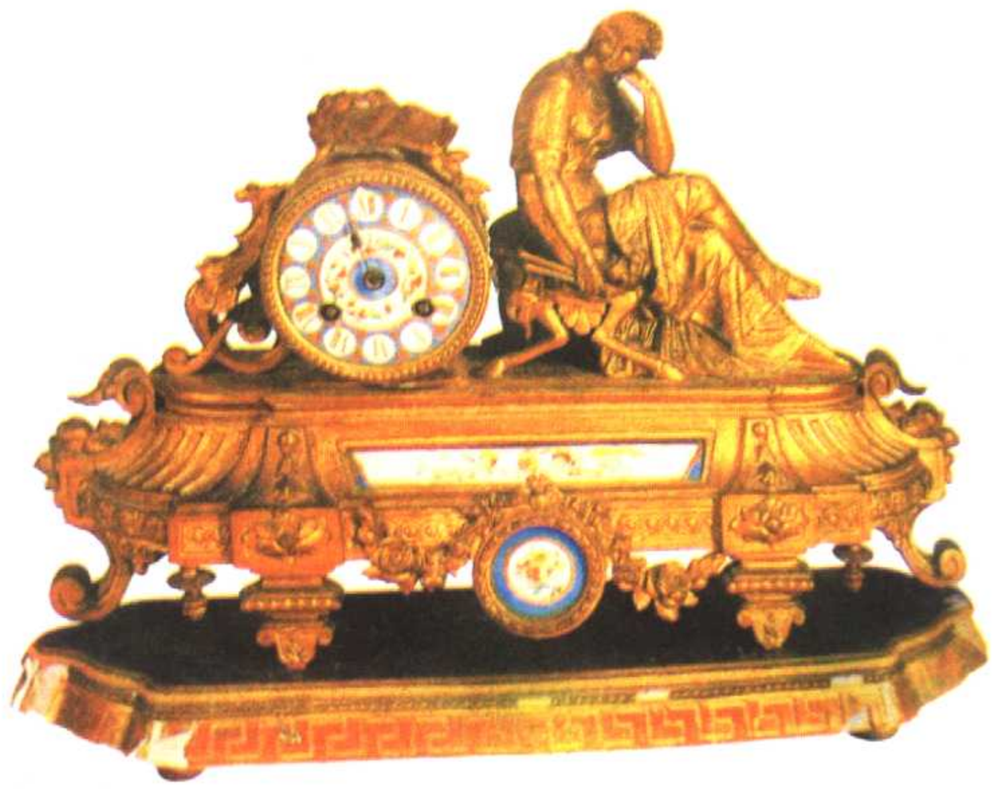


先进技术的利用

具有汲取异国文化经验的日本，深知如何驾驭外国精英和技术来为本国服务。19世纪80年代，札木晃电话局已经引入全套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话交换设备。

西式钟表

岩仓使团考察西方结束后，为天皇带回一些西式钟表，从而也将更精确的历法——太阳历介绍给日本民众。



是因为那些财团获得了厚利。日本政府也因此得到了以最小的失败和浪费建立起了其最迫切需要的企业。

通过这些措施，日本对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出发点和正常顺序作了修改。它的工业道路不是从消费品和轻工业起步，而是一开始就兴办关键性的重工业。他们优先建设兵工厂、造船厂、炼钢厂和修筑铁路等等。这些产业迅速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高的生产效率。当然，他们也并没有把这些企业全部都转让给民间财阀，政府仍然掌握着庞大的军事企业并给予其特殊的财政补贴。

在获得政府优先权的产业领域内，是没有小工商业者和非官僚经营者的一席之地的，只有某些享有特权的大财阀才能在此领域活动。这些财阀得到了国家的信任和支持，因而在政治上有一定特权。然而，如同日本的其他领域一样，产业界也存在自由领域。即那些剩余产业中，用最少的资本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廉价劳动力来经营的各种产业。今天有一些轻工业仍然存在，他们没有现代技术也能生存下来。这类产业在美国被人称为家庭血汗工厂。小本制造商买进原料，贷给家庭工厂即只拥有四五个员工的小工厂加工，回收产品后再贷出，然后再回收，如此反复，最后将产品卖给一般商人或出口商。20世纪30年代，约有53%以上的日本工业雇佣工人是在这种职工不超过5名的小工厂或家庭工厂里工作的，他们中绝大部分工人都受到古老学徒制中家长式的庇护。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大城市的许多家庭中有不少背着婴儿的母亲还在干计件零活。

如同政治宗教领域的双重性一样，工业的双重性在日本生活方式中也具有重大意义。这就如同，当日本政治家觉得需要一个与其他领域中的等级制相匹配的财界贵族制时，他就会创办一批战略性企业，然后挑选一批有政治特权的商人家族，使之与他们建立联系，以获得适当地位。日本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有计划要削弱政府与某些财界寡头之间的联系。这些财界寡头在政府的保护政策下获利，不

但得到利润，而且获得了很好的地位。按照日本人对金钱和利润的传统观点，民众难免会攻击财界贵族。但政府则尽量努力按照公认的等级制观念来扶植他们。然而，由于财阀接连受到来自所谓少壮派军官团体和农村方面的攻击，政府的这种努力并未完全成功。不过，真正的事实却是，财阀并不是日本舆论攻击的矛头所向，众矢之的是“成金”（成金：日本将棋中，步卒进入对方阵地就翻个身，成为“金将”，称做“成金”。如同中国象棋的“过河卒子强当车”。用来比喻暴发致富。——译者注）大户。所谓“成金”，一般译成“暴发户”（nouveau riche），但这个词并不能准确地表达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国，“nouveau riche”的含义是“新来者”（newcomers）。因为他们不善交际，没有修养，所以常被人耻笑。但是，这些缺点却被他们感动人心的致富抵消了。这些人从破木屋中白手起家，由骡前马后变为身怀巨资的油田巨子。在日本，“成金”一词来源于将棋，说的是一个步卒忽然摇身一变为女王。它可以横冲直撞，神气十足，像名士一样，但在等级制上，它却根本就没有名士的权利。在人们眼中，“成金”是靠诈骗和剥削致富的，遭人指责，这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者”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日本给巨富授予等级制度中的应有地位，并建立和他们的联盟。不过，倘若这种财富不是在这一领域中获得的，他们就会遭到日本公共舆论的猛烈攻击。

总之，在构建世界秩序时，日本人常常考虑到等级制度。在家庭和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和阶级决定了其适当的行为。划分得非常周到的等级存在于政治、宗教、军队以及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一旦逾越其职责范围，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都将被惩罚。只要能够维持“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局面，日本人就会没有怨言地生活下去。他们就觉得是安全的。当然，在保护最高幸福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时常感觉到不安全。他们因为把等级制度看做是合法的才感到安全。正如信赖平等与自由企业是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特征一样，这些也是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特征。

然而，当日本人要向外输出这种安全的公式时，却受到了惩罚。因为正是等级制孕育了日本国内老百姓的思想。在一个世界里，人们的野心只能是那种世界塑造出来的。但是，等级制绝不是可以输出的东西。在别的国家看来，那些大言不惭的主张实在是极其狂妄，甚至是恶劣，或者万分愤慨的。当日本人到了各占领国，当地居民们根本不欢迎他们，日本的官兵对此觉得十分惊讶。日本不是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吗？尽管很低，但也是属于整个等级制啊；即使对低层的人来说，等级制也是很理想的啊。日本军部接连拍摄了好几部战争影片，都是描写中国对日本的热爱的。痛苦绝望、沉沦落寞的中国姑娘，由于爱上了日本士兵或工程师而找到了幸福。这些都和纳粹的征服论存在很大差别。但是日本人的等级观应用到占领国，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日本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其他国家。他们的错误是认为自己可以如此，别人也应该一样。他们没有向导，其他国家的人们并不能接受日本人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道德现。这种道德观在其他国家不存在。这是原汁原味的日本产品。在日本作家们看来，这种伦理体系是理所当然的，是没有必要进行论述的。我们要了解日本人，就必须先着手对这种伦理体系进行论述。



令人惊悚的蘑菇云

美国在广岛、长崎丢下了两颗原子弹，在瞬间夺去了成千上万条生命。当日本人在输出“安全公式”的时候，他们一定没有料到会遭受这样的惩罚。

名所江戸百景

大伝馬三丁目

きんきん

呉服太物類

大丸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理解负恩——开启日本人内心世界的钥匙。“恩”的含义：从“obligation”（义务）、“loyalty”（忠诚）直到“kindness”（关切）、“love”（爱），都不能确切表达其原意。“恩”的用法虽多，其中有一个意思是共同的，那就是承受的负担、债务或者重负。

英文中，我们常把自己说成是“heirs of the ages”（历史的继承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人们讲这句话时的自信或多或少地减少了。这种变化并没有让我们对过去更感恩。而东方各民族的观点又恰恰相反，他们总认为自己是历史的负恩人。他们的很多行为，在一些西方人看来是在崇拜祖先，其实大部分并非如此，那不完全是崇拜祖先，而更多的是一种仪式，表示人们承认亏欠过去的一切恩情。非但如此，他们不仅欠过去的恩情，而且现在，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他们所欠的恩情也在不断增加。他们的日常思维和行为都源于这种报恩感。在西方，尽管社会给人们很好的照顾、教育以及幸福的生活，包括让他们降临在人世，但他们还是极端轻视对社会报恩。所以，在日本人眼中，我们的动机有点不纯正。和在美国不同，日本品德高尚的人绝不会说自己不亏欠任何人。对过去，他们从不轻视。在日本，所谓“义”就是明确自己在与祖先和同时代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

只谈论东西方间的这种巨大的差异是非常简单的，但要了解其在实际生活中所造成的后果就很困难了。但目前我们又必须了解这种差异在日本的状况，否则，我们不但无法理解战争中日本人那种极端自我牺牲的精神，而且也无法理解那种在我们看来毫无必要的易怒心态。负恩容易让人发怒，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它使日本人肩负起了巨大的责任。

中文和日文中都有许多词汇来表达英语中的“obligation”（义



对社会的恩　　八木良树　摄影　现代

20世纪90年代，日本沿海曾遭受重油污染，这是在日本沿海地区重油泄漏的受灾地，当地居民和志愿者深感自己对社会的责任，积极地参与清除油污的行动。

务）。这些词汇并不是同义词，因为它们表达的观念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因此其特殊含义也无法译成英文。在日文中，“恩”这个词相当于“obligation”，表示一个人所负的债务或恩情的大小，但如果将其所有含义用英文来表达，从“obligation”（义务）、“loyalty”（忠诚）直到“kindness”（关切）、“love”（爱），这些单独的词汇都不能确切地表达其原意。如果“恩”意味着“爱”或者是“义务”，那么日本人就可以说“受孩子的恩”，但这在日本是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用法的。“恩”的含义也并不就是忠诚。在日文中，有其他的词来表达忠诚，这些词绝不是“恩”的同义词。“恩”的用法有很多种，其中有一个意思是共同的，那就是承受的负担、债务或者重负。一个人接受上辈或上级的恩，如果他不是从上辈、上级或者是从同辈那里受恩的，那就有一种不快的自卑感。当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时，就相当于“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他们称这位债主、施恩者为“恩人”。

“记恩”，也可以是一种坦诚相待的真情流露。日本小学二年级教科书中，有一个叫做“不忘恩情”的小故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少年修身课教材中的一则故事：

哈齐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出生后不久，他就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那家人像疼爱小孩一样地疼爱它。因此，它那弱小的身体逐渐强壮起来。每天早晨，它总是到车站送主人上班，傍晚，又去车站迎接下班回家的主人。

不久主人过世了。但哈齐并不知道，它每天都在寻找主人。还是那个车站，每次电车到站，它就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主人。就这样，岁月流逝，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甚至10年都过去了，但人们仍然看到，已经长大并衰老的哈齐，每天去车站寻找它的主人。（寻常小学校用修身课本第2册，昭和十年12月发行。）

这个短故事里面蕴涵的道德意义就是：爱就是忠诚的代名词。人们说一个对母亲孝顺的儿子不忘母恩，其实就是说他对自己的母亲有着像哈齐对主人那种的赤诚。“恩”这个词并不仅仅是指对母亲的爱，还指他所欠母亲的一切，襁褓时期母亲对他的哺育照顾，孩提和成年后母亲为他所作的牺牲。总之，包括了母亲在世时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恩”意味着要回报所欠的恩情，从而包含了爱的意义，爱的本义还是负债。可是在我们美国人看来，爱应该是自由给予的，是不被义务约束的。

皇恩，是第一位的和最大的恩情，当“恩”用在这里时，表示是无限忠诚的意义。每个人必须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天皇的恩情。日本人觉得，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能够安居乐业，万事如意，就必须要想到天皇的恩赐。纵观日本历史，一个人生活圈子里面的最高上级就是他一生中的最大恩主。这个最大恩主随着时代而变化，以前是各地的地头（封建时代为领主管理庄园的家臣。）、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是天皇。关键的问题是，谁是最高上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忘恩情”。这种感恩习性几百年来在日本人的



爱的本义——负债　　田中诚浩　摄影　现代

“恩”这个词并不仅是对母亲的爱，还是他所欠母亲的一切，襁褓时期母亲对他的哺育照顾，孩提和成年后母亲为他所作的牺牲，包括了母亲在世时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恩”意味着要回报所欠的恩情，从而包含了爱的意义——负债。



生活中占据着最高地位。近代日本想方设法使这种感情集中在天皇一个人身上。日本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所有偏爱都使得他们对“皇恩”的感情不断增加。战争时代，以天皇名义发给前线部队的香烟，其中每一支都在强调士兵被恩赐的“皇恩”。出征前的士兵所领受的每一口酒就更加是一种“皇恩”。他们说，神风队员自杀式的攻击就是对皇恩的报答。为守卫太平洋上某些岛屿而集体玉碎，在他们看来，也是在报答皇恩的浩荡。

人们也要从身份比天皇低的人那里享受恩惠。当然，他们也接受父母的恩泽。正是这样，父母才有权支配子女，这构成了东方孝道的基础。孩子欠父母的恩情，必须努力加以偿还。所以，子女要尽最大努力服从父母，但却不是像德国那样（在德国，父母对子女也拥有一定权力），家长必须尽力迫使子女服从。日本人关于孝



最大的恩情

准备赶赴战场效忠天皇的楠木正成在战前仍不忘训导儿子要为天皇付出自己的所有，父母的恩情、天皇的庇护最终让楠木正成的儿子在十二年后，在战场上义无返顾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所有的恩情中，对天皇的欠负是最大的，因为每个有幸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承蒙天皇的赐予才安居乐业，万事称心的，所以他们要听从天皇的召唤，为自己所欠的恩情奉献一切。

道的解释是非常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对于父母的恩情，他们有这么一句谚语，译出来大意是：养儿方知父母恩。也就是说，双亲之恩就是实实在在的，父母每天都要照顾儿女，为他们操心。日本人崇拜的祖先只限于父辈及他们还记得的祖辈。这就更使日本人重视那些曾在幼年时实际照料过自己的人。当然，无论在哪种文化中，人都有幼年时期，都离不开双亲的照料，父母供给我们衣、食、住，我们才能长大成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日本人深感美国人轻视了这一点。就像有位作者所说：“在美国，牢记父母之恩就是要对父母好，仅此而已。”不会有人让孩子背上“恩”。不过，悉心照料自己的孩子也是对自己孩提时代所受父母之恩的一种回报方式。人们照顾自己的孩子就如同父母当年照料自己一样，甚至比那照顾得还要好。这样就部分地回报了父母对我们的恩惠，对孩子的义务仅是从属于父母之恩。

对老师和主人，日本人也怀有特殊之恩。他们都是帮助自己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对自己有恩，将来在他们有困难时，要答应他们的请求，或者要特别照顾他们身后的亲属。人们必须尽全力来履行这种义务。并且时间不会把这种恩情冲淡，它甚至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重，像是一种利息。接受一个人的恩惠是一件大事，如同日本人常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恩情是一个重负，在人们通常看来，恩情的力量往往要超越受恩者个人的意愿。

要使上述报恩的伦理原则顺利得以运用，需要的提前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巨大的负恩者，能够毫无怨言地自觉履行义务。之前，我们已经了解到，日本是怎么样建立起彻底的等级制的。等级制及日本人认真遵守的一些习惯使他们非

常重视道德上的报恩，其重视程度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他们很容易就把上级看成是善人。日语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它证明人们确实认为上级是爱其下属的。“爱”在日语中，相当于英文中的“love”。上个世纪，传教士在翻译基督教中的“love”时，认为在日语中只有“爱”这个词是唯一可以表达此意的。翻译圣经时，他们用这个词来表达上帝对人类的爱以及人类对上帝的爱。然而，日文中，“爱”这个词是特指上级对下级的“爱”。在西方人看来，也许这种爱实际上是庇护（Paternalism）的意思，不过它在日语中的意思就不只是庇护了，而是代表了一种亲爱之情。在现代日本，从严格意义上讲，“爱”这个词仍然用于上级对下级，但现在这个词也用于同辈之间了，一方面或许是基督教用语的影响，更重要的可能是官方努力打破等级界限的结果。



日本人是乐于接受别人的“恩”的，尽管文化的特殊性使他们很容易接受报恩思想。可是他们却不喜欢随随便便受人恩惠，从而欠上人情。他们常常提到让人受恩而领情，在英文与此意义最相近的词句是“imposing upon another”。但是，在美国，“imposing”一词含有强求别人的意思。日本人所谓的“让人受恩”则表示给别人某些东西或帮助别人。对日本人来说，他们讨厌的莫过于突然受到不熟悉的人的“恩”。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受恩在与近邻和旧等级关系打交道中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如果对方不是熟人或是接近自己的同辈，他们会感到很不高兴。如果可以选择，他们宁可不被卷入“恩”所带来的麻烦中。日本人一般是不理睬大街上发生的事故。之所以这样，并不只是由于他们缺乏主动性，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除非官方警察，其他任何人随便干预都会让对方负恩。明治维

球场的国旗　　森田孝昌 摄影 现代

日本球员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为祖国的荣誉流血流汗；场内的日本观众挂起国旗，在为球员们呐喊助威。他们格外注重国家的荣誉，认为自己要尽力回报国家的恩情。


LOPE
3
OMURA
5
7
7

新前，有条著名的法令是这样的：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人没有明确的职责却出面帮助，那么会被怀疑是想从中获得点什么利益。大家都明白帮助会让别人感恩领情，因此对这种帮助要谨慎，从不积极乘机干涉。日本人十分谨慎被卷入恩情。如果双方之间没有交情，哪怕是递上一支烟，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表达谢意的最礼貌的说法是：真过意不去（日语是“気の毒”，原意是为难的感情、难受之情）。有一个日本人对我解释说：在某种情形下，直截了当地表示为难，你还会感觉好受一些。由于想不到可以为对方做点什么，所以感觉受恩很羞耻。所以“真过意不去”（気の毒）有时被译作“Thank you”（谢谢。谢谢您的烟）有时又被译作“I am sorry”（很遗憾，很抱歉），或者是译作“I feel like a heel”（蒙您如此看得起，实在不好意思）。“真过意不去”可以翻译成很多的意思，但又都不那么贴切。

日语中，对受恩时的不安心情的表达有许多类似“Thank you”的表达方式。其中现代都市大百货公司普遍采用含义最清晰的词是“谢谢”（ありがとう），其本意是“这实在太难得了”（Oh，this difficult thing）。这是日本人常说的一句话，用在这里的含义是，顾客上门购物，使商店获得了巨大恩惠。这是一种恭维之辞。在接受别人礼物和许多其他场合中也都可以使用。另外，还有几种表示一般程度的感谢的词句，诸如“気の毒”（真过意不去），就是用来表示受恩惠时的为难心情。小店主经常挂在嘴边的词的是“すみません”。其（すみません）本意是：“这怎么可以呢？”意思就是：我受了您的恩情。但以目前的经济条件，我永远无法偿还，对此我感到十分遗憾。英语中这个词被译作“Thank you”（谢谢）、“I'm grateful”（非常感激）或者是“I'm sorry”（对不起）、“I apologize”（很遗憾）。比如，在大街上，别人给你捡回来了被风吹走的帽子，这时就可以用这句话了，这是最合适的。当那人把帽子递还给你时，作为礼节，你应当表达自己心中的不安：现在这个陌生人施恩



让人受恩

日本人所谓的“让人受恩”表示给别人某些东西或帮助别人。对日本人来说，他们讨厌的莫过于突然受到不熟悉的人的“恩”。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受恩在与近邻和旧等级关系打交道中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如果对方不是熟人或是接近自己的同辈，他们会感到很不高兴。

于我，我却无以报答，为此我深感内疚。只有道歉，我才能稍微感到好受一点。也许“すみません”（这可怎么了得）是日本道谢语中最普通的一句。说这句话时，就是在承认：我接受了他的恩情，这恩情并不随着接过帽子而结束，但由于是萍水相逢，我却没有办法偿还了。

在日本人眼中，还有一个词，可以更强烈地表示负恩时的心情，这就是“たじけない”（诚惶诚恐）。这个词的汉字写法是“辱ない”“忝ない”，有“受辱”与“感激”两方面的意思。日文辞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你接受了特别的恩惠，因而感到羞愧和耻辱。由于你不配接受这样的恩情，所以使用这个词来明确表示你受恩时的羞愧感。如同我们下一章要讲的，日本人对“羞耻”是极为敏感的。日本的老派店员在向顾客道谢时，仍然用“かたじけない”（诚惶诚恐）这个词。顾客买货要赊账时也说“かたじけない”。这个词频繁出现在明治以前的小说中。

身份低的小姑娘被选为妃时，也要向领主说“かたじけない”（诚惶诚恐），即我配不上受此恩宠，对此十分羞愧，我对您给予的仁慈感到受宠若惊。同样的道理，当武士发生决斗而被当局赦免无罪时，也要说“かたじけない”，表示我蒙受了如此大恩，简直没脸见人。我不应该这样作践自己，对此我感到十分悔恨，并向您表示深切的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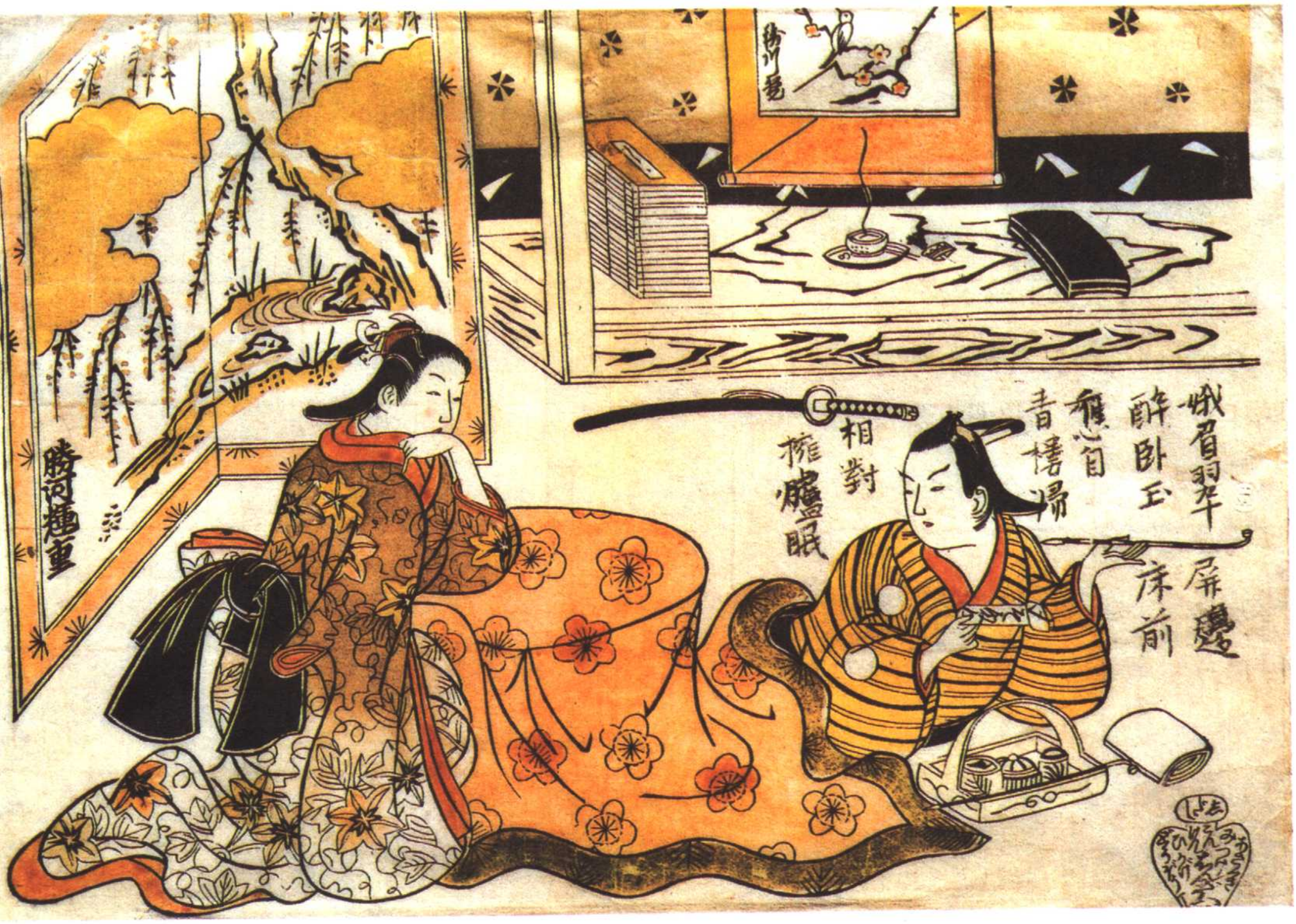
上述各种说法比任何其他概括或者总结都更雄辩地说明了“恩”的力量的强大。欠恩感推动人们竭尽全力来报恩。日本人有时很难接受欠恩，并且非常容易对此产生反感。日本最著名的作家夏目漱石在名著《哥儿》中生动地描述了人们的这种反感。小说的主人公，从小生活在东京，刚开始在一个小镇上做教员，很快就觉得自己的同事大多是平庸之辈，实在相处不来，但他和其中的一位年轻教师交情还不错。有一天，两个人在一起，那位被他戏称为“豪猪”的新朋友请他喝了一杯冰水，花了一钱五厘，大约相当于0.2美分。

此后不久，一位教师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哥儿面前说豪猪在背后讲他坏话。哥儿相信了这些搬弄是非的话，立刻就想到豪猪给的那杯冰水之恩。

虽然仅是一杯冰水，但对于这种表里不一的人，接受他的恩情实在有损面子。虽然只是花了朋友一钱五厘，即使一钱或者五厘，接受这种骗子的恩情，都是死也于心不安的。……默默地接受别人的恩惠表示尊重对方，对对方的人品满意。自己本来可以付那杯冰水的钱，但他却非要抢着付钱，这让哥儿感到负疚。这可是金钱买不来的。自己虽然无权无势，但却有独立人格。要低头接受别人恩情，简直就是100万的回敬。

豪猪为我破费了一钱五厘，而在我看来，对他的回敬却值100万元。

第二天，哥儿在豪猪的桌子上丢了一钱五厘。因为，如果不算清这一杯冰水的“恩”情，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即豪猪偷偷讲他坏话



一生的回报　胜河辉重　约1720年

在古时的日本，对恩情的回报较之现代更是沉重而且复杂得多，所以当一位武士决定娶一位身份低微的姑娘时，这位姑娘就会身负两种不同的心情——配不上恩宠的羞愧和对仁慈的受宠若惊，背负这两种心情的妇女将会在以后的日子竭尽全力地做到贤妻良母，甚至会用自己的一生来忠于她的丈夫。

的问题就无法处理了。他们或许会扭打起来，但必须要先了结那个恩情，因为那早已不是朋友间的恩情了。

在美国，只有在沾染了流氓习气的青少年的犯罪记录或精神病患者的病历中才能发现这种对琐碎的小事过分的敏感的行为。人竟能如此容易受到刺伤。然而，在日本，这却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或许日本人认为日本人中没有那么多像哥儿那样的极端的举动，那只是大多数日本人马虎大意罢了。日本评论家评价“哥儿”是一个生性率直，像水晶一样透彻，不惜为正义战斗到底的人。事实上，作者曾说，“哥儿”的原型是他自己。评论家们也公认这一点。这本小说塑造了一个具有崇高的美德的受人之恩者，描述了这种人应该将自己的感谢看做是具有百万元的

价值，只有拥有这样的想法和行动，他才可以摆脱负债者的处境。他只接受瞧得起的人的恩情。“哥儿”在愤怒中，比较了豪猪的恩情和多年来受到的老奶妈的恩情。这位老奶妈十分溺爱他，总觉得他家里没人看重他，经常私下送他些糖果、彩色铅笔等小礼物。有一次还一下子给了他3块钱。“她对我始终如此关怀，这让我感到十分内疚。”当老奶妈给他那3块钱时，他虽然感觉到耻辱，但却收了下来，当做是借款，然而却几年都没有归还。为什么没还呢？关于受到“豪猪”恩惠的感受，他自我反思道：“那是因为我将她视为是自己的一部分了。”这一独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人对恩情的反应。换句话说，无论是包含了多么错综复杂的感情，恩人实际上可以是自己，即使在“我的”等级组织中占有一定地位，对于像帮人捡起被风刮落帽子之类的自己也能做到的事，或者是崇敬自己的人，那么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倘若不符合这些条件，恩情会变成难堪的痛苦。无论是多么轻微，都应该感到难过，这才是对待这种恩情债的正确态度。

每个日本人都知道，过重的恩情无论在何时都会导致麻烦。最近一本杂志的“答询专栏”上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东京精神分析杂志》的专栏类似像美国杂志上的失恋者信箱，在它的下面有一则纯粹日本式的答询，丝毫没有弗洛伊德的色彩。有位年事已高的男性在信中征求意见道：

我是一位父亲，有3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老伴16年前就去世了，为了儿女，我没有再结婚。我的这一行为被儿女们视为一种美德。如今他们都各自成家了。8年前儿子结婚时，我搬到离家两三条街远的一幢房子里住。说来有点难以启齿，3年前，我同一个夜度娘（即被卖到酒吧里的妓女）发生了关系，我对她的身世十分同情，就花了一小笔钱为她赎了身，然后把她带回家，教授她一些礼节，让她给我做了佣人。那姑娘的责任感很强，而且非常节俭。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我的儿子、媳妇和女儿、女婿都看不起我，将



对长辈的恩情

日本的孩子从小受到要孝顺长辈的教育，如这位为长辈斟茶的小女孩，她年纪虽小，就已经在学习如何回报别人的“恩”了。

我看做是外人。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过错，所以并不能怪他们。

那姑娘的父母似乎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写信给我，说她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让我把女儿交还给他们。我见了她的父母，当面把情况说清楚了。她的父母虽然很穷，但却不贪图钱财，他们答应她女儿留下来，就当她已经死了。姑娘自己也愿意守在我身边，伺候我直到我过世。不过，我俩年龄差距太大，她都可以当我女儿了，所以，我也曾经想过要送她回家。我的儿女们认为她是看中了我的财产。

我终年生病，恐怕最多也就是可以再活一两年的时间了。我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呢？非常期望可以得到您的指教。最后我要说明一点，那姑娘虽然以前曾几度沦落风尘，但全是为生活所迫。她的品质是纯洁的，父母也不是唯利是图的人。

负责解答这一问题的医生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位老人太过于看重对子女的恩情了。他说：

你说的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

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先说一下，从信中可以看到，你好像期望我可以给你希望得到的答案，这让我感到有点不快。当然，我深深地同情您长期的独身生活。但是，我不认为你可以利用这一点让你的儿女们对你感恩戴德，也无法同意通过这

一点就可以让自己当前的行为正当化。我并不是说你是个狡猾的人，我觉得你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如果你离不开女人，必须要和女人一起生活，你最好清楚地告诉你的儿女这一点，而不应该利用你长期的独身生活而让孩子们感到欠你的恩情。你过分强调对他们的恩，他们当然会反感你。归根到底，人的情欲是不会消失的，你也是这样的。不过，情欲是应该被战胜的。你的孩子们希望你克服情欲，是因为他们希望你像他们头脑中的理想父亲那样生活。但是，他们却失望了，虽然他们有点自私，但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结了婚，满足了自己的性欲，却不理解父亲的这种需求。当然，你是这样想的，而你的儿女们持的却是另外一种想法（如同我之前所说的那样）。你们的想法是两种不同的想法。

你只是一厢情愿的认为那姑娘和姑娘的父母是很善良的人。大街上的人都知道，环境和条件决定了人的善恶。不能因为他们目前尚且没有获取利益，就断定他们是善良的。身为父母。却让女儿嫁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做小老婆，这实在是太愚昧了。倘若他们计划嫁女为安，一定是想得到某些好处，你不这样认为，只不过是你自己的幻想罢了。

你的儿女担心那姑娘的父母是在算计你的财产，我丝毫不觉得奇怪。我也认为事实就是这样的。姑娘还年轻，也许她自己没有这样的念头，然而她的父母是一定有这样的想法的。

现在有两条路可供你选择：（1） 做一个“完人”（因丝毫没有欲望而无所不能），同那姑娘做个彻底的了断。或许你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你的感情不允许。(2) 重新做一个凡人（屏弃一切虚伪造作），粉碎儿女们心中你的理想形象。关于财产问题，你应该尽快确立遗嘱，决定那姑娘和自己儿女的应得份额。最后，不要忘记你自己已是髦童之人，从你的笔迹中我可以看出，你已经变得孩子气了。与其说你的想法是理性的，还不如说你是感情用事。你所谓的救姑娘出深渊，实际是想让她代替母亲的角色。没有母亲，婴儿就

无法生存，因此，我劝你选择第二条道路。

这封信讲了很多关于恩的道理。一旦一个人采取了让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承受重恩的行动，那他要想改变这种做法的话，就必须牺牲自己。他必须清楚这一点。而且，无论他为儿女作多大牺牲，他以后也都不应该为此居功，通过恩情而使自己当前的行为正当化。如果真的那样想，那他就错了。孩子们是很自然的对此感到不满。由于他们的父亲不能始终如一地贯彻自己当初的行为，他们被出卖了。在孩子需要照顾时，父亲为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他们现在长大成人了，如果父亲需要的话，就应该特别照顾父亲，这样想就太荒谬了。孩子们非但不会这样想，反而只会意识到所亏欠的恩情，从而自然地反对你。

美国人对类似的事情就不会这样来判断。在我们看来，儿女失去了母亲，父亲为他们牺牲了自己，在晚年就理应得到孩子们的感激，而不会认为孩子们会很自然的反对他。为了能像以日本人的视角看待这件事，我们不妨将其看做钱财上的往来，因为我们美国人在这方面也有类似态度可比。倘若父亲正式借钱给孩子，并要他们到时偿本还息，那么我们完全有可能对那位父亲说：孩子们会很自然地反对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日本人在接受了别人的烟卷后，为什么不直接说声谢谢，而是说惭愧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讨厌彼此之间的施恩了。至少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哥儿”会把一杯冰水的恩情看得如此重大了。然而，我们美国人是不会用金钱来衡量这些事情的，像偶然请一次冷饮，父亲对早年丧母的儿女的长期自我牺牲以及义犬“哈齐”的忠诚等此类事情。但日本却是这样做的。我们对爱、关怀以及慷慨仁慈的价值非常重视，越是无条件越是觉得可贵。但在日本这一定是附带条件的。接受了这类行为就欠下了别人的恩情。正如日本谚语所说：“天赋（非凡）慷慨，始敢受人之恩。”（此谚语很难复原为日文，也许是指“情けは人の爲ならず”之类）

通俗水滸傳豪傑百八人之一個

小李廣花榮

青州清風塞の武知塞の職る子
能弓射る者也
百發百中の妙手なると
深山泊まそ飛
鴈を射落し
神箭射將軍と
美稱せり

一勇斎國芳画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恩”是永久长存的债务，“报恩”则是紧如张弦的偿还。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却是善行。本章中的“日本人的义务及相应义务一览表”将对“义务”作出详细的解释。

恩是必须偿还的债务。然而，“报恩”在日本看来与“恩”是完全不同的范畴。这两个范畴在我们的伦理学中常常是混在一起的，它们是中性词汇，诸如obligation（义务、恩义）与duty（义务、任务）等。对此，日本人觉得奇怪，不可理解，正如对一些部落在跟金钱相关的交往语言中不区别“借方”与“贷方”会感到奇怪一样。在日本人看来，一旦接受所谓的“恩”，就是永久的债务了。“报恩”是积极的，像拉开的箭，应该刻不容缓地偿还，是用另一系列概念来表达的。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却是善行。积极献身于报恩就是开始具有美德了。

美国人理解日本人的这种行为的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经常将金钱交易和这种报恩行为作比较，并且还要看到对不偿还的行为的幕后制裁。就像财务交往中我们都要履行合同一样，我们决不会宽容巧取豪夺的人。你必须偿还欠银行的债务，并不是还不还随你便。债务人不仅要偿还本金，还必须支付利息。虽然这些明显不同于我们对国家和家庭的爱的行为。对我们而言，爱是一种不需要任何约束而自由给予的感情，因为这样才是最高尚的。爱国心意味着我们把国家的利益置于其他一切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讲，除非遭到敌国的武装侵略，爱国心与幻想或凡人皆有缺点的人性是水火不容的。日本人那种从来到这个世界起就自然地背上巨大的债务的基本观念，我们美国人是没有的。在我们看来，一个人应该同情和帮助贫困的父母，不能殴打妻子，也必须抚养儿女。然而，这些既不能像



餐前感恩　　摄影 20世纪40年代

1944年夏天，美军夺取了马里亚纳群岛，因此城市中25万孩子被用船运送到附近的12个县。尽管农村相对安全，但生活却十分艰苦，孩子们要在放学后去山上挖野菜或者种植蔬菜来补充他们缺乏的食品。尽管生活如此艰苦，但孩子们却怀着感恩心来接受这一切。这是孩子们餐前的感恩，虽然这顿饭只有稀汤、大米和豆子。

金钱债务关系那样斤斤计较，也不能像做生意那样追求回报。但在日本，就像美国人眼中的那种金钱债务一样，这些背后有着强大的约束力，如同美国人的应付账单或抵押贷款利息、纽约的农民时刻担心抵押和华尔街的资本家卖空脱手后行情上涨一样。这些观念是时刻笼罩在心头的阴影，而不是只需战争、父母病危等紧要关头才必须注意的。

义务的某些细节可能被人一生中的偶然事件所改变，但义务本身却是自动加诸所有人身上的，它要超越一切的偶然情况。

日本人的恩和相应义务一览：

一、恩，即被动产生的义务。

一个人“受恩”或者“接受恩惠”都是处于被动立场而发生的义务。

皇恩 —— 受于天皇的恩情。

亲恩 —— 受于父母的恩情。

主恩 —— 受于主人的恩情。

师恩 —— 受于师长的恩情。

一个人一生中与各种人接触时所接受的“恩”。

注：所有给予过自己恩情的人都是自己的“恩人”.

二、“恩”的相应义务：

一个人必须要“偿还”这些债务，要“回报这些义务”给恩人。换句话说，义务发生于从主动偿还的立场。

A 义务，无论如何偿还，义务都是无法全部还清的，而且它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

忠 —— 对天皇、法律和国家的义务。

孝 —— 对父母以及祖先的义务。

任务 —— 对自己的工作的义务。

B 情义 是应如数偿还的恩情债，它在时间上是有限的。

（一）对社会的信义

对主君的义务

对近亲的义务

对他人的义务

他人的义务是指从某人那里得到的“恩”，诸如接受金钱、好意以及获得工作上的帮助等等。对伯父、伯母以及表兄妹和堂兄妹等非近亲的义务，是因为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而不是由于从这些人身上接受了所谓的“恩”。

（二）对自己的名声的情面，近似于德语中的“名誉”（die Ehre）。

1．当一个人受到侮辱或遭遇失败时，他就有了洗刷污名的义务，也就是报复或复仇的义务。（注：这种反击和报复不被视为侵犯）

2．不承认自己失败和无知的义务。遵守本国人礼节的义务，也就是遵循一切礼节、严守自己的身份、在境况不好的时候克制感情等等。

上述两种“义务”都是无条件的。就是这样，日本人把这些道德变成了绝对性的东西，不同于中国对国家的义务和孝道概念。自从7世纪以来，日本曾多次引进中国的伦理体系，“忠”和“孝”原来也都是汉文。然而，在中国人看来，这些道德并不是无条件的。忠孝在中国是有条件的，甚至还有更高的道德，即“仁”，通常被翻译为“benevolence”（慈善和博爱），它几乎包罗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要有“仁”。人民可以起义反抗不“仁”的统治者。忠义的实施有先决条件，那就是“仁”。天子实施仁政才可以享有帝位。对文武百官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的伦理学将“仁”看做是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



美德之始　　摄影 摄影 现代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有恩于晋文公的介子推隐居于绵山，不愿接受晋文公的报恩，最后抱住一棵大树上被烧死。晋文公很悲痛，用那棵树的木料制成一双木屐，每天穿着并不时叹曰：“悲夫，足下。”以此表示对介子推恩情的怀念。后来，穿木屐的习俗流传到日本，日本人穿木屐虽然与报恩无直接联系，但报恩的美德却如木屐一般，与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日本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国伦理学的这一前提。在论及中世纪两国的这种差异时，伟大的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写到：“这些观点显然与日本的天皇制不相符合，因此，即使是作为学术理论，日本人对此也没有全盘接受过。”实际上，日本是把“仁”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从而使其丧失了在中国伦理体系中占有的崇高地位。日本人把“仁”读成“jin”（仍采用中文），即使是身居高位也不必具备“行仁”或“行仁义”这样的道德。由于被彻底排斥在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仁”就具有了法律范围以外的事的含义。诸如提倡捐款慈善事业、赦免犯人等这些行“仁义”之事。“仁”变成了分外的事，而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行仁”是分外之事

摄影　日本　现代

四位僧人在为受灾者募捐，然而却无人伸出援助之手。因为“仁”被排除在日本人伦理体系之外，因此义捐也成了人们分外的事。

此外，“行仁义”还有一种法律范围之外的含义，那就是用在地痞流氓之间的道德标准。德川时代，恶棍们（佩带双刀的武士十分威武，而无赖只佩单刀）以杀人越货为生，他们之间是“行仁义”的。如果一个恶棍请求另一个不属于自己同伙的恶棍窝藏自己，为避免寻衅报复，后者便会把前者窝藏起来，这就是行仁义。“行仁义”在现代经常用于应被惩罚的不良行为，地位极为低下。日本报界写道：“下等劳工至今还在行什么仁义。我们必须严加惩处这种行为。警察应该禁止和取缔那些至今仍盛行于日本各个角落里的仁义。”毋庸置疑，这里的“行仁义”指的就是那种流氓和黑帮社会中盛行的强盗的荣誉。特别是现代日本的那些小规模的工头，像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国码头上的那些意大利籍工头padrone一样，他们与一些不熟练的工人订立非法契约，承包工程并从中揩油。在日本，这些也

被称为“行仁义”。他们已经把中国“仁”的概念贬得一无是处了。（日本人在使用“知仁”一词时，和中国的用法有些相似。佛教劝导大家要“知仁”，也就是要慈悲。但是，正如日本辞典中所说：“知仁，与其说是指行为，不如说是指理想中的人。”）就是这样，中国体系中最重要的德目被日本人全部篡改了，并被贬低到极点，并且也没有其他的德目可以代替“仁”来制约某些义务。所以，在日本，孝道就变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甚至连父母的恶行和无德也要宽容。孝道只有在与对天皇的义务发生冲突时才可以废除，而且，孝道是必须奉行的，不论父母是否值得尊敬，也不论这是否会破坏自己的幸福。

日本现代电影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位母亲，她经营着一家餐馆，还颇具规模，手头也很宽裕。她有个做乡村教师的儿子，已经成家立业了。一年，农村发生大灾，一对农民父母，为了挽救全家人的性命，要将正在上学的女儿卖到妓院去。这位教师向全村人募款要救自己的学生，想替她赎身。但是，他的母亲从身

全家合照　　摄影　日本

在全家合照中，位置的安排表现了家庭成员各自的地位。坐在最中间是婆婆，她抱着宠爱的孙女，儿子和儿媳分别坐在她的两侧。由此可以看出，长辈在家庭中地位非常高，无论他们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坏自己的幸福，儿女都必须奉行孝道。尤其家中的长子，必须继承家业，并报答长辈的养育之恩。



为教师的儿子那里偷走了这笔钱。儿子虽然知道是母亲偷走了钱，却不得不自己接受处罚。他的妻子发现了真相，立下遗书说丢钱的责任全部在自己，然后就抱着孩子投河自尽了。事件宣扬出去以后，没有人谈论母亲在这一悲剧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尽了孝道之后，儿子也孤身前往北海道去磨炼自己的人格，希望以后可以坚强地承受住这样的考验。故事里的儿子是位拥有卓绝品德的英雄。我从美国人的视角看，很明显是那个偷钱的母亲造成了整个悲剧。不过，我这种美国式的判断却遭到了那位日本朋友的强烈反对。他说，孝道常常和其他道德发生冲突，电影中的主人公如果稍微聪明一点，也许能找到一个可调和的方法，可以不伤害自尊心。然而，如果他为此而谴责母亲，即使只是在心里谴责，他的自尊心也是绝对要被损害的。

在小说和现实生活中都可以看到，年轻人伴随着婚姻就有了沉重的孝道义务。除少数摩登人物外。一般良家子弟都是由父母通过媒人来挑选婚姻的对象，家庭对一个好媳妇的关注程度要超过儿子本人。这不仅仅是因为金钱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因为家谱中会对那媳妇有所记录，如果生出男孩就可以传宗接代。一般的惯例是这样的，年轻的男女由各自父母陪同在媒人看似偶然的安排下见面，双方并不着急交谈。有时候，父母会给子女安排一桩有利益的婚姻，女方父母可以得到钱财或男方与名门望族联姻。有的男方父母比较看重姑娘的人品，善良的儿子是不能违抗父母的意志的，因为他必须报答父母的恩情，就是结婚以后，也要继续自己的报恩义务。倘若是长子，他还要继承家业，并且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婆婆总是不喜欢儿媳妇，总要挑她的毛病，即使儿子和媳妇关系很好，非常愿意和媳妇一起生活，媳妇也可能被婆婆赶回家，婚姻关系也可能触礁。在日本，有很多小说和自传写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不仅记述了妻子的苦难，也强调了丈夫的痛苦。丈夫当然是要遵守孝道，他要顺从父母的决定，同意解除婚约。



订婚前的偶遇　　鸟居清长　浮世绘　18世纪80年代中期

为了让两个谈婚论嫁的青年男女不失面子，两个家庭可谓煞费苦心，尽管当事人都心知肚明，却仍然要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模样。未来的新娘（左四）在一位年长妇女、两名女侍及一名男仆的陪伴下来到约定地点，脸上带着羞怯的神情，年长的妇女正在她耳边不住叮咛着什么；而另一侧的准新郎也由家人陪同，与一位老者坐在长椅上，他与他身后的两名妇女似乎都被那女孩的美丽端庄所吸引，毫不掩饰地向她投以注视。

有位摩登的日本妇女，现在居住在美国。她在东京时，曾经收留一个被婆婆赶出家门的年轻孕妇。这个儿媳被迫告别了年轻的丈夫。当时这个儿媳身患重病，遭到这样的打击，她异常难过，却没有因此而责怪丈夫，她逐渐把心倾注在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哪里知道，孩子刚呱呱坠地，婆婆就带着言听计从的儿子来抢了。孩子当然是属于婆家的，被婆婆带走后，被送进了孤儿院。

孝道包含了上述的种种行为，这些都是子女从父母那里接受的债务，是必须

要偿还的。在美国，大家会认为这些是个人的正当幸福遭到了外来的干涉。日本人认为“恩”是第一前提，所以他们不会将此视为是外来的干涉，就好像美国故事中塑造的那些诚实的人一样，不论他们经受怎样难以置信的苦难，也都要还清所欠的债务。一些小说中歌颂品德高洁的日本人，描述他们如何获得自尊，并证明他们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可以忍受特殊的磨难。但是，无论这种磨难多么崇高，也依然会留下憎恶和愤慨。亚洲地区关于最可恨的东西的谚语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在缅甸这些谚语是：火灾、洪水、盗贼、知事（官吏）和坏人；在日本却变成：地震、打雷以及老头（即家长、父亲）。

与中国的孝道不同，日本的孝道并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也不包括由此衍生的庞大宗族体系。日本人只是对近祖进行崇拜。他们每年都要翻新祖坟墓碑上的文字。如果祖先已经被现存的后代记不清楚了，那么就没有人过问他的墓碑了，

可恨的家长　　川边恭吉　19世纪60年代中期

画师抓住惊人的瞬间——丈夫的脚踹向了前妻的胸口，无视旁人的阻拦。在日本，家长总是与“可恨”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浓重的孝道观念下，家族成员必须遵从家长，否则会像家中的女子遭到丈夫抛弃。



他的灵位也不会摆放在家里佛龛上。日本只把可以记得住的祖先作为孝道的对象，他们重视的是现在。许多专著都谈到过，日本人缺乏进行抽象思辨和设想非现实形象的兴趣。与中国相比，日本人的孝道观刚好印证了这一论点。只是对现存者才有孝道的义务，这是他们这种观点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在。

孝道是对父母和祖先的尊敬与服从，不论在日本和中国，都是这样认为的。在西方人看来，照顾子女是源于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而在东方人看来，却是源于对祖先的孝道。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明确的，好好照顾儿女，把自己曾经受到的照顾转移给他们，就是回报祖先的最好方法了。日语中没有专门的词汇来特指父亲对子女的义务，所有这类义务都包括在了对父母和祖父母的孝道范围内。孝道要求家长履行以下所有义务：养育子女；让儿子或弟弟接受教育；对财产进行管理；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亲戚以及履行其他无数类似的日常义务。日本家庭制度中严格限定了享受这种义务的人数。按照孝道规定的义务，父母要抚养死去儿子的遗孀和儿女。同样的道理，如果是女儿去世了，他们也要收养其子女。不过，义务中并不要求一定要收养丧偶的外甥女和侄女，倘若收养，也完全是在履行另外一种义务。抚养和教育自己的子女是义务的范畴，但如果抚养和教育侄甥辈，习惯是将他们合法地过继成自己的养子。如果仍然保持他们原来的身份，那么叔伯辈就没有让他们接受教育的义务了。

孝道并不要求必须怀着敬意和慈爱去援助贫穷的直系家属。被某一家庭收养



恩情的转移

在日本，孝道的含义是：抚养子女，让儿子或弟弟接受教育，管理财产，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亲戚及其他类似的日常义务。他们这么做的出发点不同于西方人所说的本能或责任感，而是出于对祖先的孝道，是把对祖先的恩情转移给儿女或弟妹。

的年轻寡妇，由于吃的都是冷饭剩菜而被称为“冷饭亲属”。家庭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指使她，并且她只能全部服从跟她自己相关的一切决定。她们是穷亲属，其子女也是一样。比较特殊的时候，她们也会受到较好的待遇，但善待他们并不是那家的家长的义务。兄弟之间也不是非要互相友爱地履行义务。只要做哥哥的履行了对弟弟的义务，就会被赞扬，哪怕兄弟之间双方水火不相容。

婆媳间的冲突是最激烈的。媳妇是以外人的身份来到这个家庭的。她必须要熟悉婆婆的喜好，并适应顺从婆婆的脾气。在很多情况下，婆婆会毫不留情地说这个媳妇根本就配不上自己的儿子。而且，我们也可以推测婆婆是非常妒忌媳妇的。如同日本的谚语中所说：可恨的媳妇照样能生出可爱的孙子。所以婆媳之间也存在孝道，表面上看，媳妇总是异常温顺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温柔可爱的媳妇都会变成苛刻、唠叨和吹毛求疵的婆婆的。跟自己以前的婆婆一样，年轻做媳妇时，她们无法任性，但并没有因此就真的变成温顺的人了。到了晚年，她们将积压多年的怨气发泄到了媳妇头上。现在，日本的姑娘们就公开谈论：最好是找一个不继承家业的丈夫，这样就可以不必和霸道的婆婆生活在一起了。

尽孝并不意味着一定可以从家庭中得到慈爱。有些文化把这种慈爱作为大家庭中道德的基石，但日本并不是这样。就像一位日本作家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日本非常重视家庭，所以，他们并不那么重视家庭中的每位成员以及成员之间的相互纽带关系。实际情况当然也是大致如此，但有时也并不一定完全是这样。问题的关键是要担负和偿还相应的义务，在这方面年长者有更大的责任，其一就是对年轻人的监督，要求他们必要时作出牺牲。年轻者必须服从长辈的决定，即使自己不愿意，也要履行自己的义务。

日本的孝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家族成员间能看到明显的怨恨。效忠于天皇是与孝道同等的义务，但这类义务中绝对不存在怨

传统的婚礼

传统的日本婚礼是在寺庙里举行，在举行婚礼时，神职人员引领着新郎、新娘以及双方亲属祈求神灵保佑新婚夫妻。年轻的媳妇在嫁到婆家后，尤其是有着显赫家世的婆家，将面临着和婆婆之间的艰难相处，她要忍受专制的婆婆，毫无怨言地尽孝。



斟酒

司仪为新郎斟酒，穿白色丝绸和服的新娘静静地站着。白色既是新生活的开始的象征，也意味着原有生活的结束，因为婚礼结束时，新娘就不再是父亲的女儿，而是丈夫家的一名成员了，将和丈夫一同报答长辈的恩情，这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举杯宣誓

仪式的最后一项是“共饮青酒”，即参加婚礼的人共同分享盛在三只扁平杯子中的米酒。这三个杯子从下往上依次摞放，新郎拿起第一个杯子，啜三口酒，然后传给新娘，新娘也连续啜饮三口酒，再将酒杯依次传给其他亲友，然后开始喝第二杯和第三杯酒。

恨的现象。天皇被日本的政治家奉为神圣，是与人间喧嚣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了的，这实在是很巧妙的安排。只有这样，天皇才能发挥一统全民一致为国效力的作用。把天皇比作国民之父是不够的，因为在家庭中，父亲虽然可以要求子女尽一切义务，却可能是个不值得尊重的人。天皇却是远离一切世俗杂念的圣父。效忠于天皇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天皇是一个经人们幻想出来的、不染尘埃的至善之父，对他的忠诚必须是一种虔诚的仰慕。明治初期，政治家们考察西方各国后写道：这些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人民间冲突的历史，不符合日本的精神。他们回国后在宪法中写道，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需要对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负责任。天皇不是起实际作用的国家元首，而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天皇在大约700年间从未发挥过实际统治者的作用，所以，让其继续扮演后台主角并不是困难的事情。让所有日本人在思想上绝对效忠于天皇，并确立这种最高的道德，是明治政治家唯一要做的工作。封建时代，日本人对世俗首领即将军的义务被称为“忠”。这一漫长的历史也警示明治政治家：他们必须有所行动才能在新体制下实现日本精神的统一。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下属也效忠于兼任大元帅和最高执政的将军，但屡次发生阴谋暴动甚至杀死将军的事件。对将军的忠诚往往与对封建主君的忠诚产生冲突，而且对主君通常更有强制性。由于是建立在直接的主从关系上，相比对将军的忠诚，对主君的忠诚就更加强烈。动乱年代，侍从武士为了拥立自己的封建领主而逼迫将军退位，他们不惜为此而战，并高呼着效忠天皇的口号。明治维新的先驱及其领导者跟德川幕府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斗争，天皇却幽居深宫，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其形象。明治维新的胜利就是这种尊王派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把人们对将军的“忠”转变为对象征性的天皇的“忠”，所以才有1868年的“王政复古”，天皇继续位居幕后，不亲掌政务或管理军队，也不亲自决策，只是赋予阁下们权利，由一些精挑细选的顾问来执掌政务。



幼年的裕仁天皇　　摄影　1904 年

这是三岁的裕仁，那时他离开父母，单独住在日本皇室那个拥有超过3000名仆役的庞大宫殿中的一个小房子里。他从小就受到他的首席监护人西园寺公亲王的教导：为了日本的福祉，裕仁必须保持像神一样的庄严，高高在上，决不能把自己卷入俗世的事务中去。

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动是在精神领域。“忠”已经变成了一种报恩，是每个日本人对其神圣首领即最高主祭和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的天皇的报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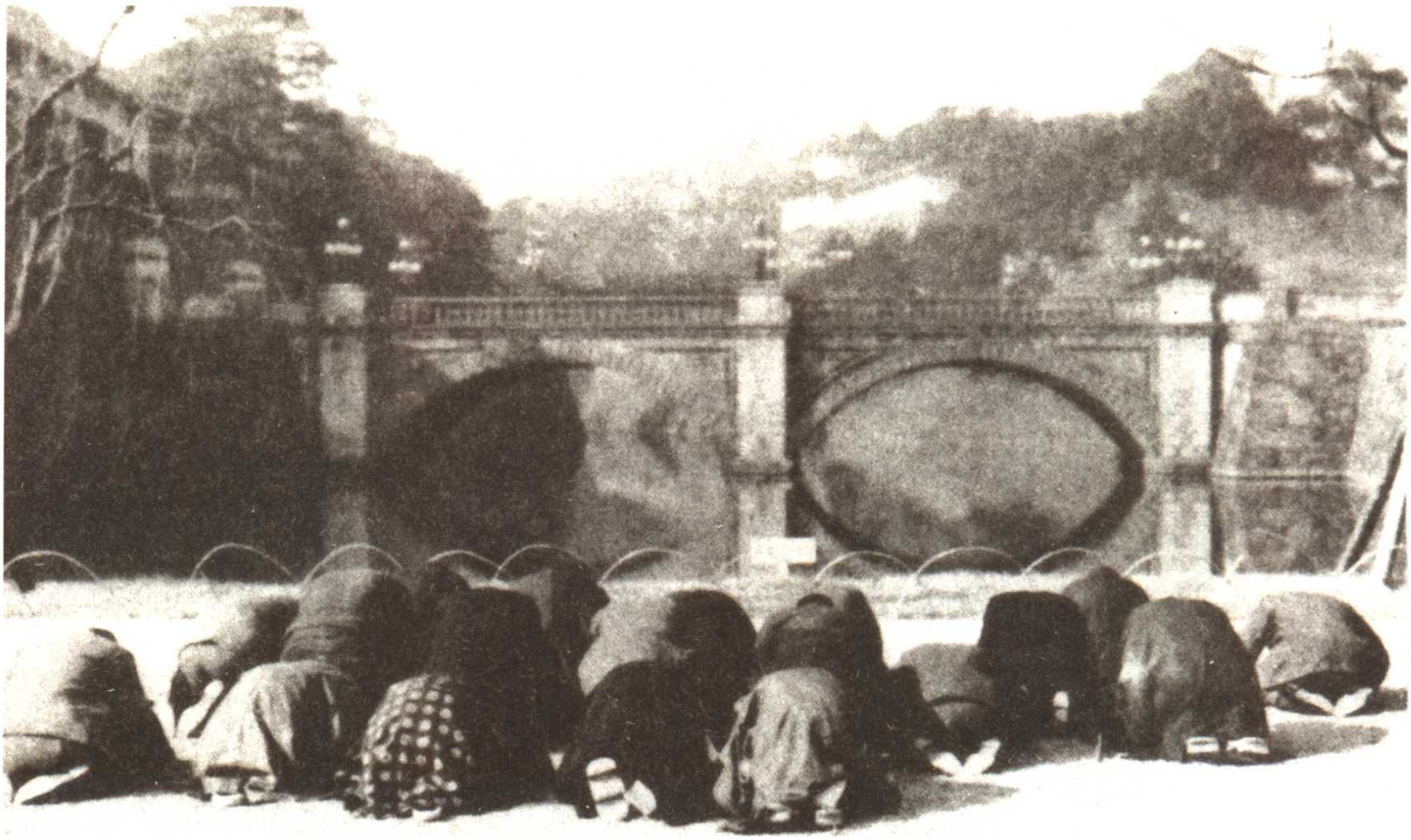
不可否认，古老的民间传说在把“忠”能够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天皇身上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传说中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然而，这一传说中的神学观点并不像西方人想象中那么重要。事实上，有些日本知识分子是完全否定这种神学观点的，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对天皇的效忠。就是相信天皇神裔论的一般群众，也不像西方人设想的那样来理解。在英文中“神”（力ミ）被译成“god”，其词义是“至上”，即等级金字塔的顶峰。与西方人不同，日本人在人与神之间不存在那样巨大的鸿沟。他们认为每个日本人死后都会变成神。封建时期，“忠”的对象是毫无神格的等级制首领，这个对象在被转移到天皇身上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整个日本历史中，只存在一个皇室来继承皇位。由于皇位的继承规则与英德有所不同，所以西方人可能会说这种万世一系的说法不过是欺人之谈。尽管如此，这种指责也是无效的。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按照这一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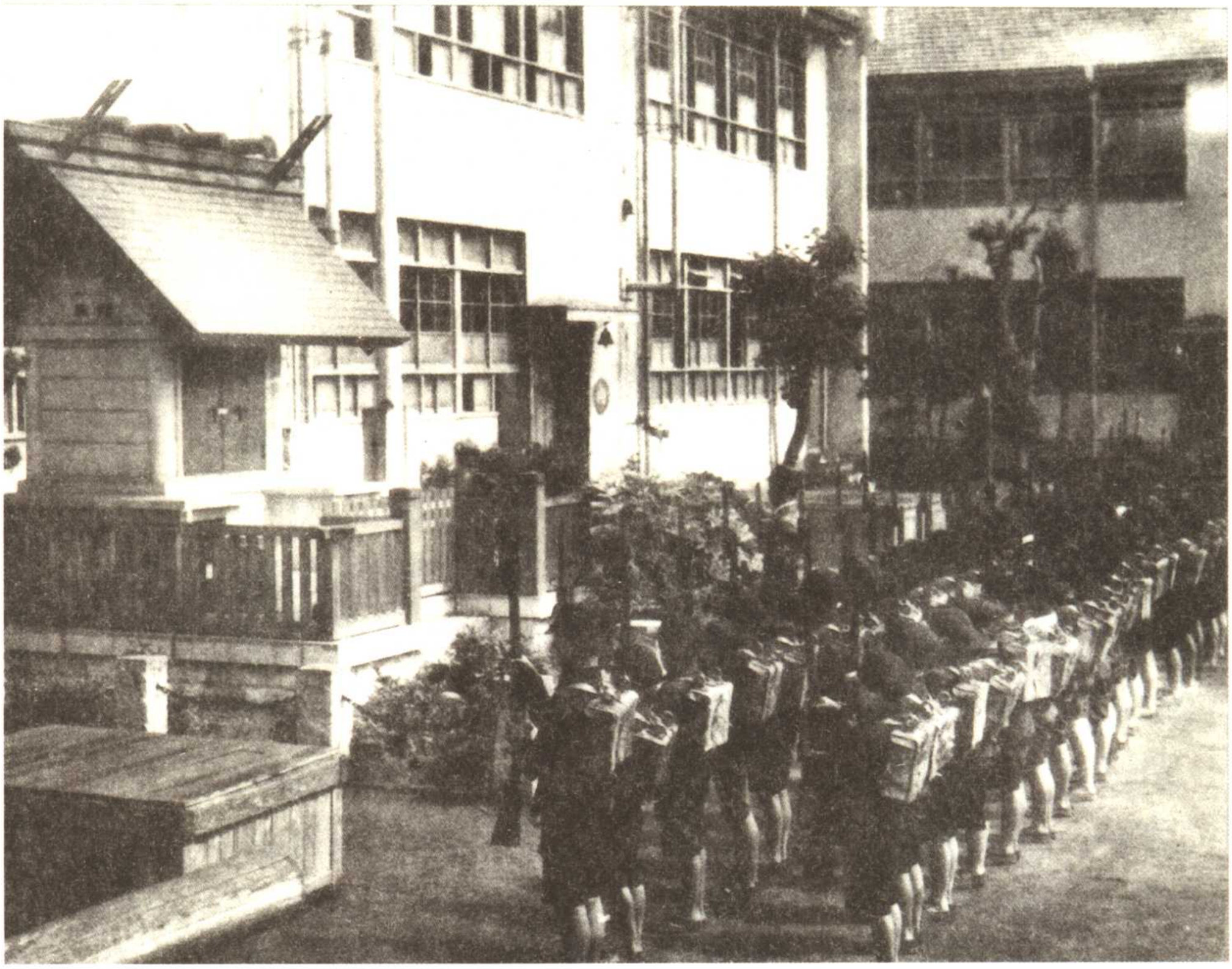
皇统就是万世不坠的。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经历过36个朝代的更替。虽然它也经历过各种变迁，但社会组织尚未瓦解，模式也一直没有改变。明治维新前100年间，德川势力的反对者们利用的不是天皇神裔理论，而是这个万世一系的论据。他们说，既然等级制的最高者才应该享受“忠”，那么就只有天皇了。他们把天皇置于国民最高主祭者的地位，这种角色和神性并不必然发生联系，但和神裔说相比，这更加重要。

为了让“忠”的对象转向具体的人，并且特指天皇本人，近代日本付出了种种努力。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代天皇，杰出而威严。他在位时间很长，自然地成为受臣民瞻仰的国体象征。他极少在民众面前露面，仅有的几次露面，都会布置隆重的仪式，极尽崇敬之能事。民众要匍匐在他身前，丝毫没有声响，没有一个人敢抬头正视他。为了避免任何人从高处俯窥天皇，要把二楼以上的窗户全部严密遮蔽。同样，他和高级顾问的接触也是等级制的。在日本，天皇不会召见执政官

皇宫前的朝拜　摄影　约1920—1930年

天皇在国民心中享有最高主祭者的地位，这是臣民们匍匐在东京的皇宫前朝拜，自1936年以后，警察对任何胆敢看天皇一眼的人都予以逮捕。





向“御影真”鞠躬　摄影　约20世纪初期　

东京的小学生们挎着玩具步枪向学校的“御影真”鞠躬。“御影真”就是专门用来放置天皇和皇后画像以及《教育敕语》的物资。这一仪式的目的是灌输对天皇的服从，老师每天都要问男生：“你们最大的抱负是什么？”孩子们就会用稚气的嗓音回答：“为天皇而死！”

员，可以受赐拜谒天皇的只有少数有特权的“阁下”们。他从不发布诏书讨论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只有在与道德、节俭相关的问题上，或者是在解决某项问题后，天皇才会发布诏书来安抚民心。在他即将驾崩时，整个日本几乎就变成了一座大寺院，全体百姓都会虔诚地为他祈祷。

就是这样，天皇变成一个超越国内一切政治纷争的象征。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要超越一切政党的政治一样。我们为国旗安排了某种仪式，并且认为这种仪式对人是完全不适用的。但日本人却充分利用天皇这个最高象征的人的价值。人民可以崇敬天皇，天皇也可作出回应。天皇说关心国民，老百姓听到就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使陛下放心。

日本文化是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这种文化中，作为忠诚的象征，天皇的意义是远远超过国旗的。如果教师在受训时说爱国是人的最高义务，那么他就会遭到谴责，他应该说的是：人的最高义务是报恩于天皇。

在臣民与天皇之间，“忠”构成了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向上直接对着天皇，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使陛下安心，其间没有中介；另一方面，天皇的敕令要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又要经过天皇与大臣之间的各种中介者之手层层传达。天皇御旨一句话就可以唤起“忠”，而且它的强制力要超过任何现代国家的号召。罗里(H. Lory)曾叙述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日常军事演习中，带队出发时，军官下令不经许可谁也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军队的训练，通常是在十分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有时要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那天的演习中，20多个士兵由于口渴和疲劳而倒了下去，其中有5人已经死亡。打开死亡士兵的水壶一看，里面的水一滴也没有动过。那位军官下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

在民政管理中，从丧葬到纳税，“忠”也在此领域发挥着强制作用。税吏、警察以及地方征兵官员都是臣民尽忠的中介。在日本人看来，遵守法律就是在回报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这一点与美国的风俗习惯形成强烈的对比。按照美国人的观点，从有关停车的尾灯标志到所得税，任何新法律都是在干涉个人事务中的个人自由，都会激起全国的愤慨。由于干预各州的立法权，联邦法律更是遭到了双重置疑，被认为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给国民的。在很多国民看来，无论如何反对那些法律，也满足不了国民的自尊心。所以，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无法无天。我们却说他们是驯民，缺乏民主观念。两国国民由于风俗习惯的差异造成了他们对同一事件具有不同的态度。在美国，自尊心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而在日本，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这两种习俗各自有自己的理解：我们的解释是，即使某些法

规对全国有利，也很难为民众接受。而他们的解释是，人的一生都笼罩在负恩重压的阴影中。也许，每个日本人都能在某些场合找到可以在法律和回避苛求之间调和的方法。对于某种暴力、直接行动和私人报复这些美国人不赞成的东西，他们甚至会赞赏。但是，尽管存在这些以及其他可列举的种种条件，“忠”对日本人的支配力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投降时，“忠”在全世界显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威力。很多了解或体验过日本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是不可能投降的。他们宣称，这是很天真的想法，如果我们幻想那些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和平地放下武器，日军的很多部队就不会确信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战争了。他们没遭受过地区性的失败，在本土各岛，誓死顽抗者比比皆是。占领军的先头部队只能是小部队，如果他们前进到舰炮的射程以外，就有危险被残杀。日本是个好战的民族，他们在战争中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这类美国分析家没有考虑到“忠”的作用。天皇一说话，战争就会

参战的僧侣　　摄影 20 世纪 30 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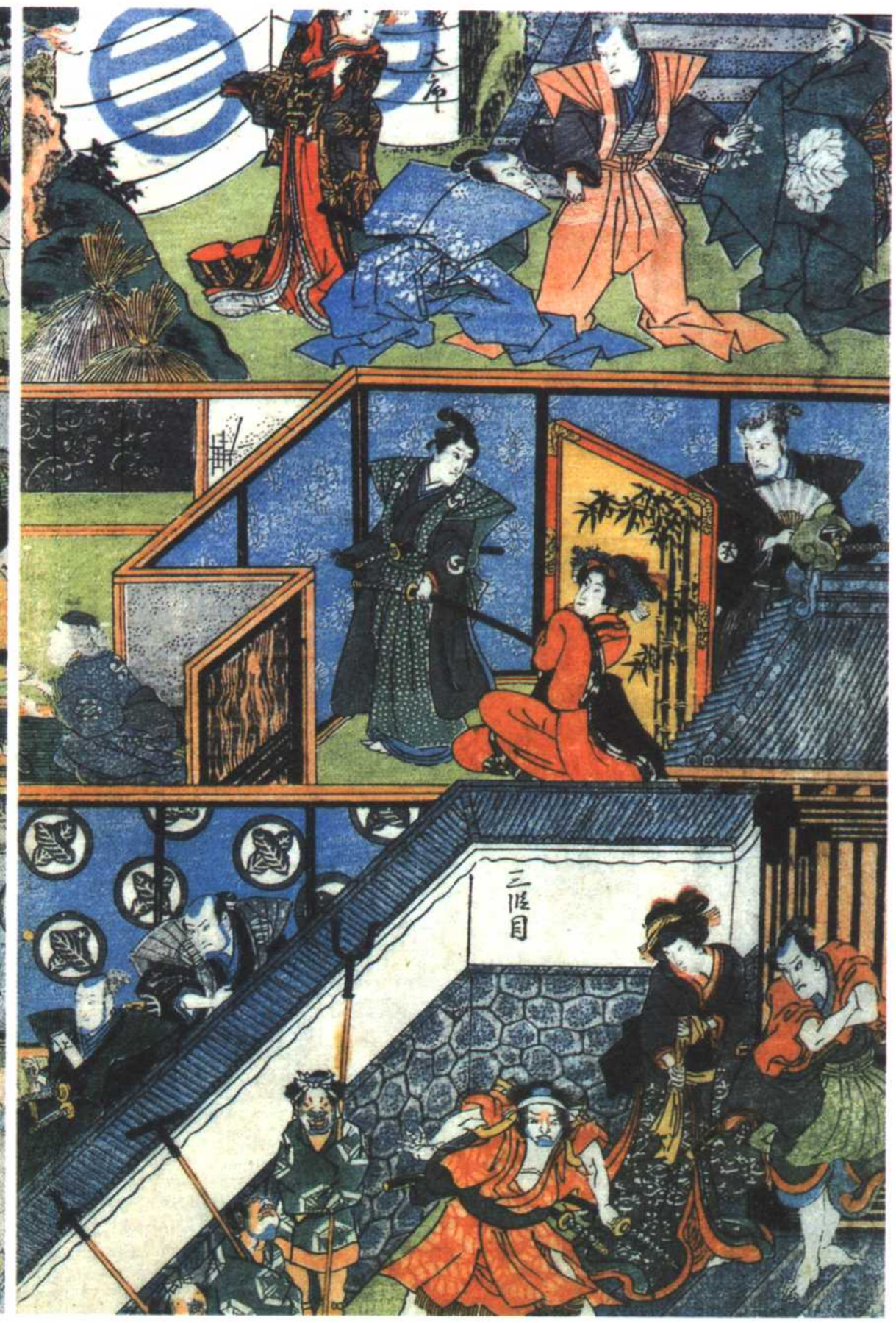
二战初期，日本军队速度惊人的胜利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军国主义狂潮，为了给狂潮推波助澜，日本政府不断地号召日本人民要发扬古代武士的英勇精神，要投身战争，效忠天皇。在这样的氛围中，连信奉非暴力、讲和平的僧侣们也响应了征兵的号召，积极地在军官的指挥下，腰别刺刀、肩扛步枪，在寺院中操练。





结束。天皇尚未广播之前，顽强的反对者们把皇宫围住，妄图阻止天皇宣布停战诏书。然而，诏书一旦宣布，他们就全部服从了。没有一个人反对，不论是在满洲、爪哇等地的前线司令官，还是本土的东条们。我们的军队在机场一着陆，就受到了礼貌的欢迎。有一个外国记者这样写道，日军在我们的军队早晨着陆时，手还不离枪，中午就都把枪收了起来，傍晚他们却又悠闲地上街采购日用品了。现在，日本人是在用维护和平的方法让陛下安心。但在一周前，他们还发誓要竭尽全力用竹枪击退敌人来使陛下安心呢！

除了那些不承认支配人类行为的情绪是会变化的西方人外，没有人认为日本人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宣称，日本民族除了灭绝已别无其他出路了；另一些人则主张，日本要获得解放，必须由自由主义者推翻现在的政府，掌握政权。如果我们的对象是一个得到全民支持全力以赴而进行总体战争的西方国家，



歌舞伎《四十七士物语》的著名场次

歌川丰国（疑为）19世纪初期

民族叙事诗《四十七士》是表现日本注重情义和忠臣的文学作品，这四十七位勇士为了给主人复仇，不惜抛妻，弃子，弑父，与此同时，他们由于违反了国法，唯有选择死才能做到忠诚和情义的两全。在日本的小学课本中这样写道："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坚定，应为永世垂范……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切腹，真是两全之策。"

那么这两种分析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错误是把日本的行动方针等同于西方国家了。有些西方人甚至在平安无事地占领日本几个月之后还认为，日本并没有发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说日本人不明白他们已经被打败了，所以他们预言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切机会。这种分析是建立在西方真理标准上的社会哲学。事实是，日本并不是西方国家，革命是西方各国的最后的力量，它并没有采用。它也没有采用消极破坏等办法来对抗占领军。他们使用了自己所固有的力量，即完全被消灭战斗力之前，他们就要求自己把无条件投降这一巨大代价作为"忠"了。以他们的视角来看，他们获得了最珍贵的东西，因而代价虽然巨大但仍然是有价值的，他们有权力说：即使是投降的命令，也是天皇的命令。换句话说，就是在投降问题上，"忠"也仍然是最高法律。


彫銀

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

“情义”分为两类：一类为对社会的情义，即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为对名誉的情义，即维护名誉使其不受玷污的责任。前者类似契约性的关系，后者则是履行与生俱来的亲属责任。

日本人经常说，“情义最难接受”。如同一个人必须要报恩一样，“情义”也是必须要报答的。不过，两者所对应所要求的义务分属于不同的系列。英语中根本就没有与“情义”相当的词。“情义”是人类学家在世界文化中所发现的所有奇特道德义务中最奇特的一个。它是日本所特有的一个概念范畴。“忠”与“孝”是日本和中国所共有的道德规范，虽然日本略微改变了这两个概念，但与其他东方各国所熟悉的道德观要求仍存在某种渊源类似点。“情义”则既不来自中国的儒教，也不是来自东方的佛教，它是日本所独有的。如果我们不了解“情义”的含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情义”二字在日本是经常被谈论到的，在他们谈及行为的动机、名誉以及在本国遭遇的各种麻烦时，都经常会用到这个词。

从西方人的视角看来，“情义”包含从报恩到复仇的一系列复杂的义务（参照第158页表格）。就连日本的辞典也很难为这个词下准确的定义，这也就是他们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含义的原因了。有一本日语辞典是这样解释的：“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非议而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可是，这些并不能使西方人理解其要领，不过“不愿意”一词却一语道破了“情义”与“义务”的明显差别。所谓“义务”，是不论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也必须要尽的一系列责任，这些责任最起码是对其儿女等亲人或者是对象征国家、生活方式以及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的。由于这种牢固的



情义最难接受

这是标准的接受礼品的礼仪：左边年轻的女子身体抬起离开坐垫，双手接过盘子。盘中的礼品要放置整齐，正面朝上，上部朝向收礼者，下部朝向赠礼者。日本的收礼者总会表现出一种难于接受的态度，因为礼品也包含着“情义”，而他们是不愿欠情的。

联系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他们理应履行。尽管人们也会对“义务”中的某些特定行为感到“不愿意”，但“义务”的定义中绝不会包含“不愿意”做的意思。报答“情义”的时候，内心则充满了不快。涉及“情义”时，欠情者总有无法形容的难处。

“情义”分为明显不同的两类。我把其中的一类称为对社会的情义，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报答情义，也就是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称为对名誉的情义，基本上类似于德国人的名誉，即要维护名誉使其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我们可以把对社会的情义大致描述为履行契约性的关系，它与“义务”存在一定差别，后者是履行与生俱来的亲属责任。所以，“情义”包括对姻亲家属所应承担的一切义务，而“义务”则只包括对直接家属负担的义务。称岳父、公公为父亲，岳母、婆婆为母亲以及姻兄弟、姻姐妹为兄弟姐妹，这些都是“情义”上的事情。这一系列称谓既可以用于配偶的亲属，也可以用于亲属的配偶。在日本，婚姻当然是家庭间的一种契约关系。对配偶的家庭履行终身的契约性义务，就是在履行情义了，这其中最沉重的要数对安排此项契约的父母的情义。尤其是年轻的媳妇对婆婆的情义更为沉重。正如日本人所说，儿



沉重的情义

面对严厉的婆婆，年轻的媳妇露出温柔驯服的笑容。在日本，女子嫁入婆家后就需要履行侍奉公婆的义务，无论是否出于内心，媳妇都必须听从长辈的意见。

媳居住的家庭并不是生她的家庭。丈夫对岳父的义务要有所不同，不过也很可怕。因为如果岳父有困难，女婿必须借钱给他，而且还有其他契约性的义务要履行。就像一位日本人所说：儿子成人后侍奉自己亲生母亲，这是出于爱母之情，并不是情义。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属于“情义”的范畴。不论履行对姻亲的义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能犹豫，而是必须履行的，否则会被世人谴责为不懂情义。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谴责。

入赘养子的问题可以最清楚地体现日本人对姻亲家属义务的态度。一个男人像女人结婚那样入赘到妻家。如果一个家庭只有女儿没有儿子，那么为了延续“家名”就要为一个女儿择婿入赘。养子要取消在原户籍中的名字，改姓岳父的姓氏。他进入妻子的家庭后，在信义上就从属于岳父母了，死后也要葬入岳父家的墓地。这些同一般妇女结婚完全一样。有时候为女儿择婿入赘并不仅是因为自家没有男孩，往往是出于双方利益的需要，即所谓的“政治联姻”。有时女方虽然贫穷，但

门第却很高贵，男方带着钱入赘女方家为的是换取在等级制上较高的地位。有时女方家比较富裕，有能力供男方读书，男方一旦接受这一恩惠，就要离开自己的家庭搬到妻子家去。有时候，是女方的父亲为了得到一个公司未来的合营者。无论是哪种情况，入赘养子所承受的“情义”都是尤其沉重的。这是因为，在日本，将自己的名字列入别人家的户籍是件严重的事。这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就意味着，如果发生战争，他必须为养父而战，即使是让他们杀掉亲生父母也在所不辞，以

日本的家族观念　　《仪式》　电影剧照　日本　1971 年

日本人是以家族为体系而团结在一起的，他们重视血缘的传递，为了让一个家族扩大，他们通常采用联姻，或赐给家臣自己的姓使其成为自己的同门等种种手段，让家族得以扩大。有时，为了让别的没有后代的友好家族得到延续，他们甚至将自己的孩子送给友好家族作为养子。同时，家族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效忠这个集体，要为家族的情义奉献自己。《仪式》讲述了一个日本的大家族在二战后 25 年的故事，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种婚礼、葬礼等仪式中度过的。这是其中的一幕，家族成员正汇集一堂，听从地位最高的长者的安排。日本独特的家族体系，不仅在武家幕府时代，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很有影响力。



此来证明自己是新家族中的一员。近代日本，入赘养子这样的“政治联姻”带来了信义上强大的约束力，把青年以最沉重的方式束缚在岳父的事业或养父家的命运上。特别是明治时代，有时候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但社会一般还是会厌恶入赘养子。在日本，有句谚语是这样：有米三合，决不入赘。日本人说，他们这种嫌恶感也是出自“情义”。倘若在美国也有这种风俗，美国人嫌恶的时候就会说：男子汉大丈夫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日本人却不会这么说。总而言之，履行“情义”是一件让大家为难的事，是人们所“不愿意”做的。所以，对日本人来说，“为了情义”是最能表达那种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的一句话了。

不仅是对姻亲的义务，甚至对伯父母和甥侄的义务也同属于“情义”的范畴。日本与中国在家族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日本不把对这类比较近亲的义务列入孝行的范畴。而在中国，很多这类亲属，甚至是比这还远的亲属都共享同一资源。不过，这类亲戚在日本却是契约上的“情义”关系。日本人说，对这类亲属的帮助不是因为对他们曾有过恩情，而是出自报答他们共同祖先的恩情。抚养自己的孩子虽然也出自同样的动机，但却是一种当然的义务；而帮助远亲，虽也出自报答共同的祖先，却被列入“情义”范畴。当人们必须要帮助这类亲戚时，他们就会像援助姻亲一样说：我被“情义”所牵连着。

大多数日本人对传统的武士对主君以及同伴的“情义”的重视要胜过对姻亲“情义”的重视。这种关系体现了重视名誉的人对其上级及同辈的忠诚。有许多传统文化作品颂扬这种“情义”性的高尚，将其视为武士的德行。德川氏统一全国以前，在日本，这种德

义理即责任

弓箭手凝视着海的尽头，眼神坚毅而无畏。对于武士而言，情义即责任，是为了效忠主君不惜牺牲一切的品质，甚至在“孝”和“忠”的取舍上，也当认为国家优先于个人，个人生于国家，是国家的一部分，个人必须为了国家或合法政权而生存或死亡。


鎮西八郎源為朝
遠江守
宣光画

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如此重大以至于超过当时的“忠”，当时即是对将军的义务。12世纪，一名武士被源氏将军要求引渡，其所庇护的敌对领主，那位大名写的回信保存至今。他极其愤慨，因为自己的“情义”受到了非难，他甚至拒绝以忠的名义背叛情义。他写道：“对于公务，个人无能为力，但武士重名誉，相互之间的情义乃永恒的真理”，这超越了将军的权力。他拒绝尊重背信弃义者。日本历史故事中流传着很多这种超越一切的武士德行，至今经过润色改编，已成为能乐、歌舞伎和神乐舞蹈了。

在12世纪，有位叫做豪杰弁庆的人，是个力大无敌的浪人（没有主君，靠自己谋生的武士。——译者注），他的故事最为著名。除了一身神奇的力气外，他一无所有。他曾寄身僧院而使僧侣惊恐。他为了筹措封建武士需要的行装，曾经斩杀过往武士收集刀剑。最后，当他向一位貌似武艺平常的年轻领主挑战时，却遇到了劲敌，他发现这位青年竟是源氏后裔，正图谋恢复其家族的将军地位。这位年轻人就是为日本人极端崇拜的英雄源义经。弁庆对义经表示热诚的“情义”，为他立下无数战马功勋。然而，最后在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中，他们被迫率家臣逃跑。他们化装成去寺庙化缘的僧侣，走遍全国。为避人耳目，弁庆装扮成领队，义经身着同样服装混迹在人群中。沿途每次遇到敌方布置的缉捕，弁庆便拿出编造的一卷寺院募捐簿来念诵，以此蒙混过关。但是在最后时刻，尽管义经衣着卑微，但其高贵的贵族气质却无法掩饰，终于引起了敌方怀疑，他们叫回了这群人。弁庆立即想方设法消除了敌方对义经的怀疑。他借口一点小事就打了义经一耳光。敌方却信以为真，打消了疑团。这是因为，如果这位和尚真的是义经，家臣是绝对不敢动手打他的。这样违背“情义”的事情是出乎人们想象之外的。弁庆的不敬行为挽救了这一群人的性命。到达安全地带后，弁庆立即跪在义经面前，请求赐死，义经仁慈地赦免了他。

在这些古老故事发生的年代，“情义”是发自内心的，完全未



报答情义　　绘画 日本

报答情义是将生命献给受其深恩的主君，是发自内心的念头，是在枪林弹雨中不会闪躲，是在危急时刻不逃脱，誓死为主君而战的意志。

受嫌恶之念的玷污，这为近代日本建构了一个黄金时代的梦想。他们通过这些故事了解到，“情义”在那个时代丝毫没有“不愿意”做的因素的。倘若“情义”和“忠”发生冲突，人们就可以直接坚持“情义”了。那个时候，“情义”是一种为人们珍视的并带有封建色彩的直接人际关系。懂情义就意味着要终身对主君效忠，而且主君也要以诚报答。报答情义就是将生命献给受其深恩的主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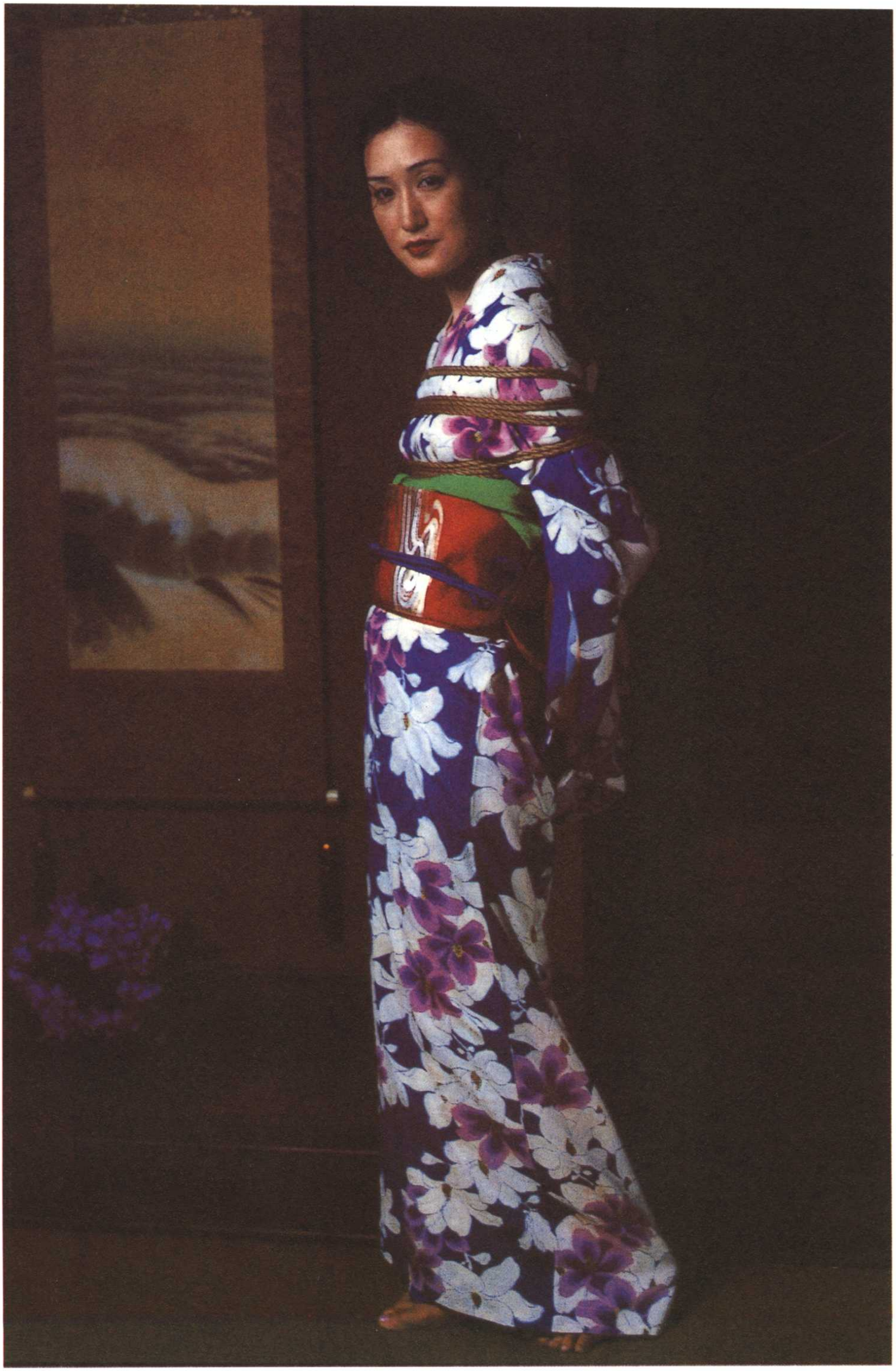
当然，这是一种幻想。日本封建时代的历史表明，有很多武士的忠诚是被敌方大名收买的。并且，更重要的是，像下一章所描述的那样，家臣如果遭到主君的侮辱，按照惯例当然可以弃职离去，甚至可以勾结敌人。对复仇和捐躯尽忠的颂扬，日本人是同样地津津乐道。他们把两者都作为“情义”。尽忠是指对主君的“情义”，对侮辱复仇则是指对自身名分的“情义”。在日本，这是一块盾牌的两方面。

但是，古代那些描述忠诚的故事，在今天的日本人看来，已经只是令人兴奋的梦想了。这是因为，现在所谓的报答情义，已经不是效忠于自己合法的主君，而是对各类人履行种种义务。现在，大家在谈论情义的时候都充满了嫌恶之情，往往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必须履行情义。他们说：这宗亲事完全是出自情义，我完全是出自情义才录用那个人的，我会见他完全是出于情义。诸如此类。他们还通常会说被情义所纠缠。在辞典中，这句话翻译为“I am obliged to it”（我被迫这样做）。当他们说“他用情义强迫我”，或“他用情义逼我”等这一类以及其他类似惯用语的时候，也就是在说，他们被某些以往施与他们恩情的人强迫做自己

情义的束缚

荒木经惟　摄影　现代

情义使日本人不得不接受种种束缚。日本摄影大师荒木经惟的作品中，一位被捆缚的女子倚柱而立，露出忧伤而无奈的神情，不禁让人联想到日本人在“情义的束缚”下，那种受到强迫却无可奈何的情结。



不愿意或不想做的事情。在农村的小商店的交易中、上层财阀社会里以及日本内阁中，人们都会被情义强迫。一个求婚者可以凭借两家交情或者交易深来迫使某人做自己的岳父。用同样的手段，有的人还可以取得农民的土地。被“情义”所迫的人也认为自己不能不答应。他说：如果我不帮助恩人，就会被人说成是不懂情义。这些说法都包含了“不愿意”、“仅仅是为了情面”等意思，正如辞典中解释的：“for ‘mere decency's sake’。”

按照严格的规定，“情义”的准则是必须报答，这跟摩西十诫的道德准则有所区别。迫于“情义”，一个人有时候居然不得不无视正义。他们常常说：为了情义，我不能坚持正义。并且“情义”的准则与所谓爱邻如己也丝毫没有任何干系。它不要求一个人真心主动地宽容别人。他们说，人必须履行“情义”的原因是如果不那么做，就会被世人斥责为不懂情义，就会蒙羞受辱。总而言之，是因为担心世人的舆论，而不得不履行“情义”的。事实上，英语往往把对社会的情义翻译为“conformity to public opinion”（服从舆论）。辞典中还把因为是对社会的情义，只好如此。这句话译为“People will not accept any other course or action”（世人不承认其他的办法）。

比较情义领域中的规矩和美国人关于偿还借款的规矩，是最能帮助我们理解日本人的态度的。美国人并不把收到别人的信件、接受礼物以及获得适时的劝告等情分看做是像偿还银行借款或付清利息那样必须严格偿还的情分。在金钱交易中，美国人惩罚不能偿付者的办法就是宣布其破产，这是非常严峻的。日本人却视不能报答情义的人为人格破产。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接触都会涉及某种“情义”。这就意味着，一些细小言行在美国人看来毫不介意也根本想不到会涉及义务，而日本人则都要一一慎重加以对待，也就是说他们终年要在复杂环境中谨小慎微，唯恐有失。

日本人对社会的情义的观念与美国人借债还账的道理还有一点



人格的破产　　上田尚纪　摄影　现代

这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战后面临的最大一起证券交易所倒闭事件。这些是聚集在交易所外的员工和客户，他们神情紧张，惴惴不安。虽然破产事件对日本人影响甚大，但对他们而言，最大的破产应该是“人格”的破产。在生活中，日本人必须谨言慎行，如果他们在人情的领域中欠下了恩情，却无法偿还，那么将背负沉重的惩罚。

相似，那就是，在思想上对“情义”的报答也是毫厘不差，等量齐观的。关于这一点，“情义”完全不同于“义务”。“义务”是无止境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报答完。“情义”则不是这样的。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对旧恩的态度几乎说的上是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而日本人却不那样认为。我们非常诧异于日本人的馈赠习惯，比如说，每年有两次，每个家庭都要包装礼品作为6个月前馈赠的答礼。女佣人家里每年都要寄东西来感谢对自己家人的雇用。然而，对比所受馈赠更重的回礼即所谓的“赚礼”，日本人是很忌讳的，他们认为这是不名誉的事。送礼者被说成是“以小虾钓大鱼”，这是很不好听的说法。对“情义”的报答也是这样。



情义的回报　　摄影　现代

热心的读者们化装成漫画中的人物，来参加作者的见面会，而漫画家为他的读者们送上有亲笔签名的海报作为答谢。在日本，人们对受到恩情事无巨细，都牢记于心，在回报上毫厘不差。

只要可能，无论是劳务往来还是馈赠礼品，人们都会记录彼此之间的来往。在农村，这类记录有些是由村长保管，有些是由同业内的一个人保管，有些则由家庭或个人保管。送葬时按照习惯要带“奠仪”。此外，亲戚也要送各种颜色的布以供制作送葬的幅。近邻们都来帮忙，女的下厨，男的制棺和挖墓穴。在须惠村，村长有一本账簿专门记录这些事情。这对死者家庭来说，也是一份珍贵的记录，因为它记录了邻居们送的礼和帮的忙，在别人家有人去世时，这一家可以根据名册中的单子来还礼。这些是彼此间的长期礼尚往来。除此之外，还有村中葬礼中短期的礼尚往来，比如说一些庆宴。丧主要用饭来款待帮忙制作棺材的人，而帮

忙者也要送丧主一些大米以作膳食之资。村长也会将这些大米记录在册。举行庆祝宴会时，客人们也大都会送一些米酒作为宴会的饮料。无论是出生、死亡，还是插秧、盖房、联欢会，人们都会仔细地记录“情义”的交换，以备日后回报时用。

日本人的“信义”还有一点是与西方的借债还账相似的。这就是，如果逾期未报，“信义”就会像利息那样增长。埃克斯坦(Eckstein)博士曾叙述过他与一位日本制造商的交涉经历。这位商人曾为埃克斯坦博士提供了去日本的旅费，让博士去收集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回到美国后，埃克斯坦博士撰写传记，并在定稿后寄到了日本，但他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来信。很自然地，博士担心是不是书中的某些地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寄了好几封信，却仍然没有收到回信。几年后，博士接到这位制造商的电话说他正在美国。很快，他带着几十棵日本樱花树来拜访埃克斯坦博士。这实在是一份贵重的礼品。就是因为回报延误得太久了，所以他必须送这么厚重的礼物。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士说：“大概您当时不是要我立刻回报吧！”人们迫于情义常常会因时间的拖长而加重偿付。譬如，一位商人幼年老师的侄子向他求助。这位商人在年轻时是无法报答老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情义上的负债也逐渐增加。所以，这位商人为了偿还对老师的恩情，就不得不答应帮忙，以免被世人非议。


将門
芳年画

第八章

洗刷污名

报复与自杀，以及这两个极端方式中的很多方式，都是日本人维护荣誉所采取的手段。日本人就是这样想的：一个正派的人会同时感受到恩情和侮辱，并对两者都要认真回报。只要一个人遵守“情义”、洗刷污名，就决不能说他犯有侵犯之罪，他只不过是算清旧账罢了。

所谓对名分的“情义”，也就是使名声不被玷污的义务。一系列德行构成了这一“情义”。这些德行在西欧人看来，有的是互相矛盾的；但对日本人来说它们却是完全统一的。因为这类义务不属于恩的范围，不需报恩，也不涉及以前受恩于人的问题，这只是保持自身名誉的行为。所以其内容包括：遵守“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各种繁琐的礼仪规则、能够忍受苦痛维护自己在专业和技能上需要维护的名声。对名分之“情义”，需要他们消除毁谤或侮辱，毁谤、侮辱会玷污名誉，必须加以消除；必要时还要报复毁谤者，甚至自杀。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方法，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淡然置之。

日本人并没有给“对名分的情义”单独起其他的名字，只是将它描述为报恩范围之外的情义。这只是分类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的情义”就是对善意关切的回报，而“对名分的情义”就突出地包含了报复。西方语言中，上述两者是被区分为感激和报复两个对立的范畴的，但日本人对此则没有严格的区分。一种德行为什么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行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者轻蔑的反应呢？

日本人就是这样想的。一个正派的人会同时感受到恩情和侮辱，并对两者都要认真回报。我们则会把两者区分开来，把一种称为侵犯，另一种称为非侵犯，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对他们来说，只有超出了“情义范围”的行为才被称之为侵犯。只要一个人遵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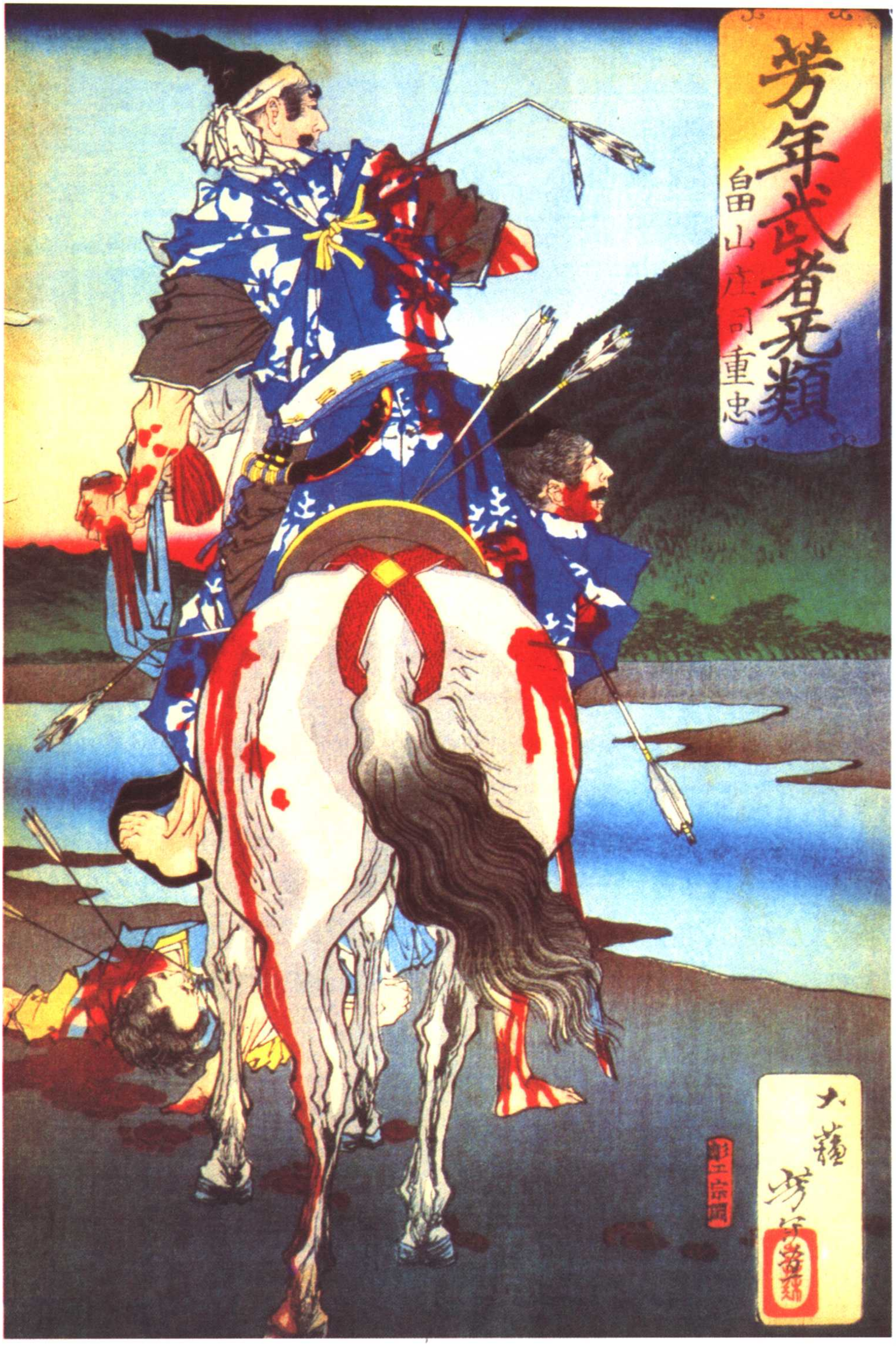


保持名声不受玷污　　摄影　现代

在日本人眼里，名声犹如雪一般不可被玷污，如果被玷污了，宁愿如雪一般消融，也不愿背负着耻辱苟活。这就是对名分的“情义”，要保持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做到克己复礼。

“情义”、洗刷污名，就决不能说他犯有侵犯之罪，他只不过是算清旧账罢了。在他们看来，如果受到侮辱、毁谤或失败而没有报复，没有消除这些侮辱、诽谤和失败，那么世界就不会太平。一个正派的人必须尽力恢复世界的平衡。这是做人的美德，而绝对不是人性中的罪恶。欧洲历史上的某些时代，对名分的“情义”，也包括像日本人那样把感激和忠诚结合在一起的表达方式，那也曾经是一种西方的道德。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在意大利，曾经极为盛行。这种道德与古典时期西班牙的 el valor Español（西班牙的勇敢）和德意志的 die Ehre（名誉）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和 100 多年前欧洲盛行的决斗中的潜意识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西欧各国，只要是在这种重视消除名誉污点的道德观占优势的地方，道德的核心总是超越一切物质意义上的利益。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而牺牲其财产、家庭和个人的性命，人们就越认为他是道德高尚的人。这成了道德本身的一部分，是这些国家常常提倡的精神价值基础。它虽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但这些确是很难用利害得失来衡量的。基于这一点，这种名誉观与充斥于美国生活中的激烈竞争和公开对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美国某些政治或经济交往中，也许并不限制保守，然而要获得或保有某种物质利益则一定要进行一场战争。至于肯塔基山中居民之间的械斗，那只是个例外，盛行于那里的为名誉习俗而战，就属于“对名分的情义”的范畴。

任何文化中“对名分的情义”都使人们之间产生了敌意和伺机报复，这绝不仅是亚洲大陆道德的特点。它并不是独有的东方气质。中国人、暹罗人、印度人


芳年武者无类
畠山庄司重忠
大蘇芳年
第五席調

为名誉牺牲

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武士和他的战马伤痕累累，但战争的胜利让他们得以荣归。为了“名誉”，他们当不惜牺牲其财产、家庭及自己的生命，这才是高尚的道德。

都没有这种气质。中国人认为，如果听到侮辱和诽谤就过于神经质，那么这样的人是“小人”，也就是说这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的特征。而不像日本那样，把对名誉的敏感归于是理想高尚的特征。中国的伦理观中，一个人忽然用不正当的暴力来肆意报复自己遭受的侮辱是错误的。他们觉得如此神经过敏是可笑的。他们也不会下决心用所有善良和伟大的行动来证明诽谤是没有根据的。在暹罗人身上也压根看不到对侮辱如此敏感的行动。和中国人一样，他们宁愿让诽谤者处于尴尬境地，也不会设想自己的名誉会受到伤害。他们说：容忍退让是使对方暴露卑鄙的最好方式。

我们要准确地理解“对名分的情义”的全部意义，就必须对日本各种非侵犯性的道德进行通盘考虑。复仇只是特定场合要求的德行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稳定的、克制的行为。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韧和自我克制，这是他“对名分的情义”的一部分。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喊大叫，男人对痛苦和危险必须泰然处之。当洪水冲到日本的村庄时，每个自重的日本人都带好必需品去寻找高地，而不是张皇失措地乱喊乱跑。秋分前后遇到台风暴雨袭击时，也能发现同样的一些自我克制的场面。这些行为是每个日本人所特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们不能完全做到。在他们看来，美国人的自尊心不要求自我克制。日本人的这种自我克制中还包含了一种位高责任重的意义。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要高于对庶民的要求，虽然对平民要求的不那么严格，但这也是一切阶级的生活准则。如果说，要求武士能忍耐极端的肉体痛苦，那么就要要求庶民极端地顺从和忍受持刀武士的侵犯。

有很多著名的故事讲的都是武士的坚韧。武士必须忍耐饥饿，


題百撰相
大將

雪除耻辱

经过一番苦战，武士终于砍下仇人的头颅，用仇人的鲜血洗清了耻辱。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受到的侮辱、毁谤应当进行报复，这是正义的，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

这是无须说明的小事，但如果他们奉命忍受饥饿，那么即使是饿死，也必须佯装是刚吃完饭的样子，而且还要用牙签剔牙。俗话说“雏禽求食而鸣，武士口含牙签”。这句话是这次战争中士兵们的格言。他们不能屈服于痛苦。日本人的态度就像是当年少年兵回答拿破仑问题的故事：“受伤了？不，报告陛下，我是被打死了！”武士临死前不能显露出一丝痛苦，更不能有丝毫的畏缩。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指胜海舟，1823—1899，幕末及明治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历任幕府陆军总裁、明治政府外务大丞、兵部大丞、海军卿等。——译者注）曾说过，他虽然出身于武士家庭，但当时家境已是一贫如洗，小时候辜丸被狗咬伤，当医生为他做手术时，父亲用刀戳着他的鼻梁说：一声都不许哭出来。要是哭，我就会让你死，要不愧为一个武士。

“对名分的情义”，还要求其生活要与身份相符。如果一个人缺乏这种“情义”，他的自尊便丧失了。德川时代取缔的奢侈令中几乎详细地规定了各类人的衣着、财产以及用品。按照身份而生活，就意味着要接受这种规定，并且将其视为是自尊的一部分。美国人会对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而作出规定的法律感到异常诧异。在美国，自尊与提高自己的地位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到一起。一成不变的奢侈令是对我们这个社会基础的一种否定。德川时代规定，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孩子买某种布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买其他样子的。对这一类的法律，我们会感到不寒而栗。在美国，我们有其他的规定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我们心安理得地承认着这样的事实：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只要有一个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满足了。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并将其视

为合理。努力获得较高的薪水成为我们自尊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获得不同的布娃娃要根据收入的高低，这与我们的道德观念并不相违背，有钱的人就可以给孩子买高级的布娃娃。然而，在日本，有钱会使人产生疑惑，守本分才会让人放心。即使是在现在，日本的穷人和富人也都是一样的，都通过遵守等级制的习惯来保持他们的自尊。美国人是无法理解这些的。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尔（Tocqueville）就在前引著作中说明了这一点。托克维尔尔生于18世纪的法国，尽管他很赞赏平等制的美国，但对于贵族生活他也了解颇多，并十分钟情于此。他认为美国虽然有其美德，却缺乏真正的尊严。他说：真正的尊严在于各安其分，不卑不亢。自王子至农夫，皆可以自许。托克维尔尔一定可以理解日本人

各安其分的社会成员

武士曾是封建幕府统治的主要支柱，幕府也赋予他们最高等级的社会地位，位列士（武士，左上）、农（左下）、工（右上）、商（右下）4个社会等级之首。武士享有特权，不事生产就可坐享俸禄，如果威严受到侵犯，甚至能自行处死其他阶层的庶民。这样就符合“对名分的情义”的要求，使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与身份相适应。









的态度，即不认为阶级差别是不体面的。

今天，我们对各民族的文化都有了客观的研究。在人们看来，不同民族可以给真正的尊严下不同的定义，就像他们对屈辱的解释各自不同一样。一些美国人叫嚣，只有用我们推行的平等原则，日本人才能最终获得自尊。其实，他们这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这些美国人如果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确实希望有一个自尊的日本，他们就必须搞清楚日本人自尊的基础。正如托克维尔尔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贵族制度的真正尊严正从近代世界中消逝，我们相信另一种更加优异的尊严正在取而代之。毫无疑问，日本也将如此。直至现在，日本的自尊只能是建立在它自身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在我们的自尊基础上重建。并且它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纯化自身。



以自杀“洗刷污名”

在古老日本，武士受到这样的要求：任务完成得很好，他们不会受到嘉奖，因为那是他们本分；但若是他犯了过错，那么他的一生都将背负着耻辱。这是一位自杀的武士，他把刀插进了自己的腹部，鲜血迸出；未能完成使命的武士总是以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挽回失去的名誉。

除了守本分之外，“对名分的情义”还要求履行其他多种义务。借款者在借钱时要把“对名分的情义”抵押给债主。直至二三十年前，一般借款者都要对向债主表示：如果还不了债，我愿意在大庭广众前被耻笑。事实上，即使还不了债，

他也不会真的公开被侮辱。这是因为日本没有当众揭丑这种惩罚。不过，新年来临之际，是债务必须偿还的时候，借款者如果无力还债，就会用自杀来洗刷污名。直到今天，除夕之夜还会发生一些为了挽回名誉而自杀的事情。

“对自身名分的情义”也与各种职业责任密切相关。特殊情况下，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并备受责难时，日本人往往会有很奇怪的要求。譬如，很多校长会因为学校遭遇火灾而引咎自杀。他们对火灾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只是因为挂在学校中的天皇御像因为火灾而受到了惊吓。也有些教师冲进大火，抢救天皇御像而被烧死。他们的死，证明对“名分的情义”的高度重视。相对天皇的“忠”，至今仍然有流传说，在庄严捧读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时，有些人会偶尔读错，然后他们竟然会用自杀来洗刷污名。在当今天皇的统治下，也有人曾不小心，误给其孩子起名为“裕仁”（当今天皇的御名，这在日本必须要避讳，绝不能说的），因而自杀并且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在日本，一个专业工作者对其专业上“名分的情义”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并一定要靠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高度专业水平来维持。教师说：教师对名分的情义，不允许我说不知道。也就是说，他即使不知道青蛙的种属，也必须佯装知道。他即使教授英文凭借的只是在学校学了几年的基础，也不能容忍别人指出他自己的错误。“教师名分的情义”所特指的就是这种自我防御。实业家也是如此。“实业家名分的情义”要求他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资产已枯竭，或者他制定的公司计划已失败。出于“情义”，外交家也不能承认自己的外交方针失败。关于“情义”的上述定义都是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密切地联系起来，批评一个人工作中的行为或能力，就自然地是指在批评这个人本身。

在美国也会出现类似日本人这种对失败和无能等没有名誉行为的反应。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一听到诽谤就暴跳如雷。不过，像日本人那样高度戒备状态的自我防御，在美国人身上是很少见的。如



个人与工作的等同　　摄影　现代

一位厨师正在麻利地做寿司，据说一个合格的刺身师傅要接受近十年的训练。作为专业的工作者，他需要在任何情形下，都表现出擅长和在行的样子。因为他的专业反映的不仅是他的能力，还代表他本人。这就是对专业的“名分的情义”——把个人与他的工作高度等同。

果一位教师不知道青蛙的属类，即使他可能掩饰了自己的无知，但他也会觉得，如实地承认自己无知要比佯装知道要好一点。如果实业家不满于自己的创业方针，他会觉得自己可以再宣布另外一种新的方针。他不会认为，要保持自尊就必须坚持自己的错误。他也不会认为，一旦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就必须引咎辞职或退休。在日本，这种自我防御有着十分牢固的基础。所以我们不能当面过多地谈论别人专业上的失误，这不仅是一种一般性的礼节，还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一个人在竞争中失败时，这种敏感显得尤为显著。譬如，找工作时录用了别人或者自己在竞争考试中落选这类情况。失败者会因为失败而蒙羞。有时候，这种羞耻感会成为发奋图强的强烈动力，但更多的情况下会变成危险的沮丧。或者他会丧失自信心，一蹶不振，或者他会怒发冲冠，又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于是，他遭



自信的微笑　　摄影　现代

由于对失败极度敏感，竞争曾经使日本人极为恐慌。而现代的日本已经步入多元化时代，这是青春靓丽的促销小姐，她们一字排开，露出自信的微笑。自信的背后却是激烈的竞争，销售额的竞争，客户资源的竞争，服务质量的竞争……与往昔不同了，以这几位敬业的促销员为例，日本人已经不再惧怕竞争了。

受了挫折。对美国人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竞争在国内生活中发挥的那种有益的效果在日本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将竞争看做是好事并高度依赖它。心理测验表明，我们会受到竞争的刺激而作出最杰出的努力。工作效率也会在竞争的刺激下提高。而当我们单独一个人工作时，通常达不到有竞争者时的效果。但是，在日本，测验的结果恰恰相反。在青少年期结束后，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因为日本的儿童们大都视竞争为游戏，并不那么看重。青年人和成年人中一旦有竞争，工作效率就随之降低。当人们单独工作时，进步得比较快，错误也会减少，速度也相应提高，一旦有了竞争对手，错误就会增加，速度也迅速下降。当拿自己的成绩来衡量自己的进步时，他们会做得最好，如果和别人对照测试，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针

对竞争状态下成绩不佳的原因，几位日本实验者作出了正确的分析。他们说，如果在一个项目中采取竞争的做法，被测试者的思想就会集中在对失败的担心上，因而会使工作受到干扰。他们对竞争对手非常敏感，仿佛是给自己构成了一种侵犯，因而把注意力从专心工作上转移到了与侵犯者的关系上。

测试表明，被测的学生，一想到可能因失败而蒙羞，心理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就像教师和实业家要各自维护其在专业上对“名分的情义”一样，他们也十分看重学生“名分的情义”。学生在竞赛中失败，会因这种耻辱而采取极端行动。赛艇运动员会手握船桨趴在船上而号啕大哭、垒球队员失败后会抱成一团而失声痛哭。在美国，我们会说这些人太小气了。我们的礼节是，失败的人应该承认对方是因为优秀而获胜的。失败者应该向胜利者伸手致意。无论我们如何讨厌在比赛中失败，因失败而情绪冲动的人会受到鄙视。

日本人常常想方设法避免直接竞争。美国人无法想象日本小学中竞争机会是多么少。日本教师的职责是教育每一个儿童，使其提高成绩，而不是给学生们提供彼此之间竞争的机会。日本小学里没有留级重读的规定，同时入学的儿童要一起学习全部课程，然后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不记录学业成绩，而是记载着

快乐的小学生

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小学生正挥手告别，在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纯真和快乐。日本的小学生比其他国家的都要幸福，他们的成绩单上不是分数，而是操行品质，因此他们的小学生活是轻松和快乐的。



操行品质。如果无法避免竞争，譬如小学升中学的考试，那么他们的紧张程度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每一位老师都知道有很多学生因为没考好而企图自杀的事情。

这种尽量避免直接竞争的做法，贯穿于日本人的全部生活中。美国人的最高要求是在同龄人的竞争中取得优异成绩，而以“恩”为基础的伦理则极少地容许竞争的存在。他们的等级制体系中定有繁琐的规定，把直接竞争减少到最低程度。家族制度也对竞争加以限制，因为从制度上讲，日本与美国不同，父亲和儿子之间没有竞争关系，他们可能会排斥对方，但那不是竞争。当日本人看到美国家庭中儿子与父亲在使用汽车以及照顾母亲或妻子等方面相互竞争时，他们总是用惊诧的语气来评论。

中介人在日本到处都是，通过中介是日本人避免让两个竞争者直接对峙的一种办法。当失败让一个人感到羞耻时，这时就需要一个中间人。所以，中介人在提亲、找工作、退职和其他无数日常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事者双方通过中介人来传达对方的意见，或者在重要交往中，比如说结婚，双方都会请中介人。他们先细致地进行交涉，然后分别汇报给各方。采用这种方式进行间接交往，当事者就不会听到在直接谈判中会招致憎恶或伤及名分“情义”的要求与责难了。由于中介发挥了这种重要作用，中介人获得众望，以其成功的手段获得了社会的尊敬。中介人会因谈判顺利而脸上增光，从而增加顺利签订协议的机会。以同样的方式，中介人还可以帮助求职者打探雇主的意图，或转告雇主雇员的辞职意图。

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从事园艺的原始民族在遭到侮辱后一定会愤怒，这会变成部族和个人行动的主要推动力。他们在举行部族宴会时，一个村的人议论另一个村子的人，说他们非常吝啬，穷到请不起10个客人的地步；他们把芋头和椰子都藏起来，他们的首领们是批连宴会都组织不了的蠢材等等。然后，被挑战的村子便炫耀他们的奢华和大方，以使得来客感到惊异，以此来洗刷自己的污



敏感的民族

日本人十分敏感，尤其对于侮辱，必然会愤怒地去复仇以洗刷污名。他们把侮辱作为一种动力和鞭策，怀着复仇的心态去获取成就。

名。他们也是这样作提亲及在经济上交易的。双方交战时也是如此，在搭弓射箭之前，交战双方必须互相谩骂。哪怕是非常琐细的事情，他们也得把它当做非得一拼死战不可的大事。对采取行动而言，这是一大动力，这些部族通常具有很大的活力。但没有人认为这些部族是崇尚礼节的。

与此相反，日本人却是崇尚礼节的典范，并且这种尚礼正好可以衡量他们是如何全力对那些必须洗刷污名的事端进行限制的。虽然侮辱引起的愤怒被他们视为获取成就的最佳鞭策力，但他们却限制引起侮辱的事端。尚礼这只在某些特定场合或消除侮辱的传统手段被抑制而不能发挥效用的时候才会发生。毫无疑问，日本之所以在远东取得统治地位以及最近10年间推行的对英美战争政策，都是这种鞭策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西欧人关于日本人对侮辱敏感及热衷复仇的诸多议论，更适合用在新几内亚那些喜欢利用侮辱的部族身上，而不是用在日本人身上。西方人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对名分的“情义”所加的种种特殊限制，所

以他们关于日本在战败后行动的诸多预测都是与实际不相符的。

美国人不应该因为日本人的尚礼就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程度。美国人像玩游戏一样随便地评论人。日本人则会把轻微的批评当做是大事，我们很难理解这一点。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自传，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日本人对他所讲的“嘲笑”作出的经典反应。写作这部传记时，他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成年时代，其感受的强烈程度就好像自己仍然生活在故乡——爱知县的农村。他的父亲是一位颇有地位的地主，作为小儿子，他受到了家庭的极大宠爱。母亲在他幼年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去世了，不久，父亲也破产了，家里变卖了全部家产来偿还欠款。家庭败落后，牧野身无分文，再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了。他的愿望之一就是学习英语。为了学英文，他到附近的教会学校做门房。直到18岁，除了附近几个乡镇外还没有出过远门的他，竟然要决心去美国。

我拜访了一位我自己信赖的传教士，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美国的愿望，期望他能告诉我一些有用的东西。然而令我非常失望的是，这位传教士喊道：“什么？你想去美国？”传教士的夫人也在房间里，他们一起嘲笑我，顿时，我感觉脑子里的血全都流到了脚底下。在那里默默地站了两三秒钟后，我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对自己说“全都完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要说明一下原因。我总是坚信，不诚恳是世界上最大的犯罪，而最不诚恳的举动就是嘲笑别人。

我经常原谅人们发脾气，因为有时脾气不好是出于人的本性。我也可以原谅人们的撒谎，因为人的本性是脆弱的，面对困难，人们常常不够坚强，也不敢讲真话。我还可以原谅无根据的流言飞语

杀人犯与嘲笑者

一名武士把一位男子狠狠地踩在了脚下，倒在地上的男子却没有露出畏惧的神色，因为他不愿被仇敌嘲笑。日本人认为杀人犯只是杀害人的身体，嘲笑者才是更可恶的，他们是杀害心灵的人。心灵远比肉体宝贵，而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


稻荷小僧次郎吉
豊国画

和背后议论，因为遇到别人说闲话时，人们难免会陷进去。

连杀人犯，我都可以视情况而体谅。但我无法原谅的确是嘲笑，因为只有当人们内心不诚恳时，才会嘲笑无辜者。

请允许我讲以下自己给两个词下的定义。所谓杀人犯是指杀害别人肉体的人；而嘲笑者则是杀害某人心灵的人。

和肉体比，心灵要更加宝贵。所以，嘲笑是最恶劣的行径。那对传教士夫妇实在是在伤害我的心灵，我内心受到了无比的创痛，我的心在呐喊“你为什么？！”

第二天早晨，他把所有的东西打成一个包裹，就背着走了。一个乡村少年身无分文却想去美国学画，结果遭到传教士的不信任，他感到被残害了。他的名分遭到了玷污，要去除污名，只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既然已遭到传教士的嘲笑，就只能别无选择地离开这里去证明他有到达美国的能力了。他用英文单词“insincerity”（不真诚、不诚恳）来指责传教士。我们对此感到奇怪，因为从我们的视角来看，那位美国人的惊奇是非常符合“sincere”（诚实、正直）的含义的。而牧野先生使用这个单词的时候则是按照日本人所理解的含义。日本人认为那种蔑视别人、不屑于挑起争吵的人是不诚实和不诚恳的。这类嘲笑是非常放肆的，毫无顾忌的，是对人不诚恳的证明。

“我甚至可以酌情体谅杀人犯。但却无法原谅嘲笑。”既然对嘲笑的正确态度不是原谅，那么报仇就变成唯一可行的办法了。牧野来到美国，因此洗刷了污名。复仇在遭到侮辱或失败的情况下也是一件“好事”，它在日本的传统中占据着很高的地位。日本人为西欧人写书时，常常用生动的比喻来描述日本人对待报仇的态度。新渡户稻造是位最富于博爱思想的日本人，他在1900年所著的书中写道：报仇具有某些足以满足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报仇观念就如同数学中必须使方程等式两边相等那样严密，不然，我们总感到心愿未了。在题为《日本的生活与思想》这本书中，冈仓由三郎比较了报仇心理与日本人的独特习惯后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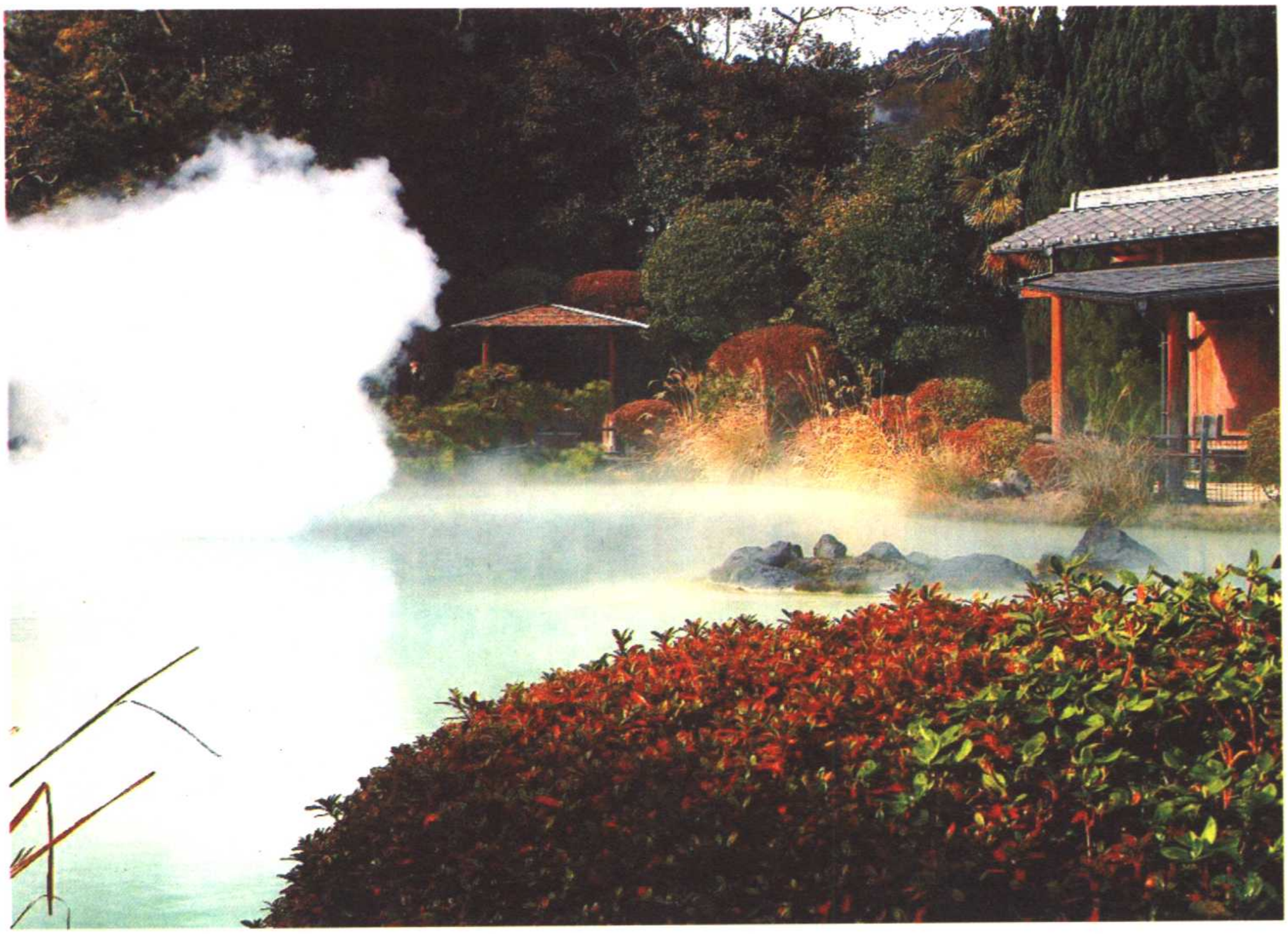
洁净无尘的生活　　摄影　现代

"日本人过着清净无尘的生活，犹如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宁静。"日本人对于"洁净"非常重视。即使是这样一条普通的街道，也洁净无尘，行人悠然地来来往往，街角的鲜花绽放出明媚的光芒。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源于对洁净的钟爱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污秽。不然很多现象就无法解释。我们接受了训练（实际情况如此），每当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遭到侮蔑的时候，就把这当做是污秽或疤疥，必须要经过申辩并洗刷干净，否则就像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我们不妨把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件看成是一个洁净成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他继续说，日本人的生活是清净无尘的，恰似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宁静。换句话说，晨浴就是把别人投给你的污泥洗净。只要身上沾染了一点，你就不再贞洁。在日本，这样的伦理教育是不存在的，只要一个人自己不觉得受辱，就不算被侮辱了。他们也不会认为：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并不是别人对他说了或做了什么。

对这种"晨浴"式的报仇心理，日本的传统经常公开提倡。有无数家喻户晓



“晨浴”式的复仇理想　　摄影　现代

水雾缭绕的温泉浴是日本人的喜好之一，它不仅能去除身体的污垢，还能净化人们的心灵。“晨浴”式的报仇理想，就是洗净别人带给你的污点，要通过报仇洗去自己的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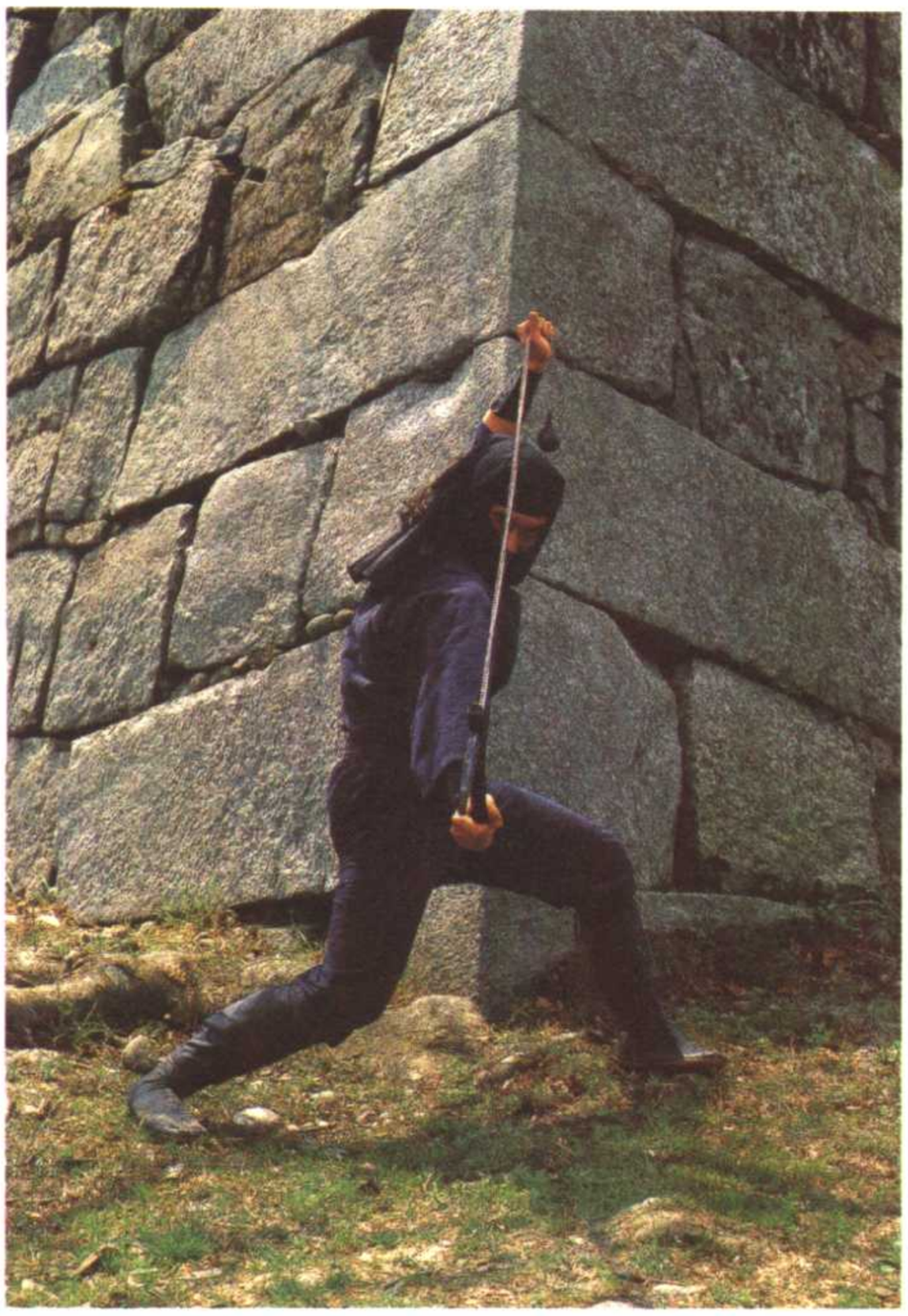
的事例和英雄故事，其中大家都熟知的就是《四十七士》的故事。人们把这些故事编入教科书，在剧场上演，将其拍成电影，或写成通俗读物。它们已成为日本现有文化的组成部分了。

其他的故事讲的是向自己的主君进行报仇。根据日本的伦理，“情义”意味着家臣必须终生效忠于主君；同时也意味着，如果家臣受辱，也会转变成为仇敌。德川幕府的第一位将军家康的故事中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一位家臣听说，德川曾背后说他是个会被鱼骨头卡死的家伙，这对珍视尊严的武士来说，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侮辱。所以，这位家臣就发誓死也不能忘记这种耻辱。那时，德川刚刚定都江户，正着手统一全国，但仍然存在反对他的强大敌对势力，大局尚不平稳。这位家臣就暗中勾结敌方诸侯，策谋做他们的内应，企图放火烧毁江户。他认为这样做是向德川复仇，可以实现“情义”。关于日本人的忠诚，西方人的很多议论

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他们不了解，“情义”不仅是一种忠诚，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也要求背叛。就像他们所说那样：挨了打会成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如此。

日本历史故事中贯穿着两个主题：一个是犯错的人报复正确的人；另一个是受辱必将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这两个主题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情节也丰富多样。然而，如果对当代日本人的身世、小说及实况进行一番考察，情况就变得很清楚了，尽管他们的古代传统十分崇尚报仇，但现实生活却和西欧是一样的，很少见复仇的行为，甚至复仇行为比西欧还要少得多。这并不意味人们对名誉观念的日趋淡薄，而是意味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逐渐由进攻性转变为自卫性的了。他们仍然十分看重耻辱，但更多地不是挑起争斗，而是自我麻痹。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击的复仇存在的可能性较大。近代以来，法律、秩序以及处理相互依存关系的条文增加，将复仇行为打入地下，或者使它针对自己的胸膛。人们玩弄计谋报复人却让对方没有丝毫的察觉，这在某些程度上有点像古代的故事，主人暗中把粪便藏于珍馐，来犒劳仇敌，唯一的目的是使对方食而不察。客人竟丝毫没有觉察。现在，甚至使用这种隐秘的攻击也非常少见，常见的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自己。在这里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将其作为鞭策，激励自己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另一种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反应十分敏感，他们不是去恼恨别人，而是恼恨自己。近几十年，日本的小说不断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是怎样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中辗转不安的。这些小说中的主角厌烦了一切，他们厌烦日常生活、家庭、城市和乡村。他们并不是因为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厌倦，相比较于理想的伟大目标，现实的一切努力都渺小得可怜。这些不是源于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日本人一旦有了追求重大使命的远景目标，他们就不会有厌倦情绪，无论这个目标多么遥远，厌倦情绪也会消失得毫无踪迹。日本人所特有的厌倦，是一种敏于感伤的疾病。他们把被排斥的恐慌引入内心，不知该如何自处。日本小说中描写的厌倦心理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俄国小说。在俄国小说中，小说主人公所有苦闷的基础是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对立。乔治·桑塞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曾说过，日本人缺少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感。他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要回答日本人厌烦的根源，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的哲学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他们对待人生的普遍态



隐秘的攻击方式　　摄影 现代

日本古代故事中的复仇者，就是穿着这样的夜行服，去寻找仇家复仇的，可谓“藏粪便与珍馐”，使对方食而不察。

度。这种观念与西方的基本观念是对立的，它远远超出此处所指的特殊事例的范围了，但却和日本人动辄忧郁有着特殊的联系。日俄两个民族都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情绪，这和美国形成了明显的对照。美国小说一般不写这种题材。美国小说很少描写单纯的厌倦，而是把书中人物的不幸归因于性格缺陷或残酷社会的虐待。对一个人与环境不协调的原因的描绘，作者总是让读者从道义上谴责主人公性格的缺陷或是社会秩序中的弊端。日本也有谴责城市中可悲的经济状况、渔船上的恐怖事件的无产小说家。然而，就像一位作家说的那样，日本小说所揭示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在周围漂荡。小说的主人公或作者都认为要弄清乌云来自何处，没有必要分析周围的环境或主人公的经历。阴云来去无踪，人们都很容易感伤。古代英雄惯于攻击敌人，他们却把这种攻击转向自己。在他们眼中，忧郁好像没有明确的起因。虽然也会寻找一些事例作为原因，但这些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最多是一种象征。

现代日本人加之于自身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是自杀。依据他们的信条，采取合适的方式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获得身后好评。对自杀美国人是谴责的，认为

忧郁的气质　　荒木经惟 摄影 现代

日本女子的眼神中透出莫名的忧伤，手中紧握的剪刀隐喻着内心的攻击欲望，而脚下那个圆形的井盖似乎象征着某种不可走出的困境。荒木经惟是当今国际公认的最能表现日本气质的摄影家，其作品多与下图类似。整幅画面影射了日本民族那种莫名的忧郁气质，以及无法找出缘由的迷茫。





最高贵的死法　《忠臣藏》 戏剧 日本 18世纪

这出戏改编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判官准备用一柄以布包裹的剑切腹自杀，而这出戏就意在宣扬自杀的光荣和伟大，场面感人至深。许多日本人都把切腹自杀浪漫化，实际上这种方式极为痛苦，是用一柄短剑剖开人的腹腔。从公元12世纪开始，它就成为了武士用以洗刷自己耻辱的方式。

它只不过是对绝望的屈服而自我毁灭。日本人却尊重自杀，认为它是一种光荣而有意义的举动。在某些场合，从“对名分的情义”来讲，自杀是最体面的做法。如同没有考中的少年和避免做俘虏的士兵一样，那些年关还不了债的人、因某种不幸事故而引咎的官员、无望在一起而双双殉情的恋人、以死抗议政府迟迟不对中国发动战争的“爱国志士”等，都把最后的暴力对准了自身。有日本权威人士说，日本是新近出现这种自杀倾向的。我们很难判断这是否属实。但统计表明，近年来观察者通常都高估了自杀的频率。按照比例，上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自杀的人数要高于日本的任何一个时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日本人喜欢自杀，就像美国人极力描写犯罪一样，两者都有相同的切身之感。相比杀其他的人，日本人更津津乐道于自杀。借用培根(Bacon)的话，他们总是将自杀看成是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flagrant case)。谈论自杀能够得到其他话题所不能达到的某种满足感。

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近代日本的自杀更加自虐。历史故事中，

武士为了避免遭受不名誉的死刑，按照朝廷的命令自杀，就像西方敌方士兵宁愿被枪杀也不愿上绞刑架或落入敌人手中惨遭酷刑一样。也正如不名誉的普鲁士军官被准许秘密自杀一样，武士被恩准可以切腹自杀。当普鲁士军官犯罪后知道除了死以外再也无法挽救名誉时，他的上级就会把一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枪放在他卧室的桌子上。日本武士也是如此，如果注定要死，自杀是对死法的选择。近代的自杀都是主动选择死。人们往往不是残害别人，而是转而对自己实施暴力。封建时代，自杀宣布一个人的勇敢和果断，今天却演变为主动选择自我毁灭。最近的四五十年间，每当日本人感觉到世界混乱、方程式两边不相等或需要“晨浴”以洗净污秽时，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毁灭自己而不是伤害别人。

虽然封建时代和现代都有把自杀作为最后论据而争取获胜的。德川时代有个著名故事，讲的就是幕府有一位担任将军监护人的年高德劭的顾问，他曾在其他顾问官和将军代理人面前当众袒露腹部抽刀准备切腹。这种威胁手段发挥了作用，由他推荐的人继承了将军的职位。他并没有自杀就达到了目的。用西方话来说就是，这位监护人是在用切腹威胁反对派。今天，这种抗议性的自杀行为多半是因为所提主张未被采纳出现的，或因为反对某些已签字的协议（如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以求名垂史册的。这些场合，只有真实的自杀，才能产生舆论影响力，只摆摆架式进行威胁已经不能奏效了。

在“名分的情义”受到威胁时，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的倾向正在发展，但这并不一定就是仅指自杀这种极端手段。有时候，自我攻击还表现为沮丧、消沉以及流行于日本知识阶层中的那种典型厌倦情绪。这种情绪之所以能这个阶层广泛得以蔓延，是有其充分的社会学原因的。因为知识分子的过剩，他们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很不稳定，只有极少数人的雄心壮志可以得到满足。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他们被当局怀疑为有危险思想，这使他们更加感伤。日本知识分子常以西方化带来的混乱来解释他们的抑郁，这种说法是站不

住脚的。日本人典型的情绪摇摆，由强烈的献身精神转变为极端的厌倦情绪。这种心理毁损是日本传统观念里所固有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曾蒙受过。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采用传统方式来摆脱这种厌倦情绪的。抱着国家主义目标，他们把攻击矛头再次由自己的内心转向外界。他们从对外发动极权主义的侵略中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们摆脱了恶劣的心境，感到自己内心有一股新的强大力量。他们相信，这股强大的力量在人际关系上起不到作用，但征服一个民族却可以做到。

这个民族一点都没有变。他们以日本式的方式作出反应。他们的情绪在顽强努力和极端消沉间摇摆不定。对他们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当前，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在于维护战败后荣誉，而且他们认为这一目的是可以通过采取友好态度达到的。作为一种派生的理论，很多日本人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安全方法就是依赖美国。因此他们极易认为，与其作出努力而遭到怀疑，还不如消磨时光。所以消沉情绪就蔓延开来。

不过，日本人并不欣赏消沉。“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醒”，既是当前日本经常用于号召人们改善

脚手架上建筑工人　　摄影 广岛 1947年

1945年，美国投向日本的第一颗原子弹将广岛这座城市的3/4夷平了，然而日本人没有消沉，事隔不久，建筑工人已经开始投身于广岛的重建了。





运沙袋的孩子们

摄影 东京 1945 年

二战让日本面临着这样的困境——25% 的房屋被摧毁，因此重建房屋成为迫切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形下，孩子们也加入了重建家园的计划，这是东京河岸赴京，在士兵的带领下运送沙袋。当时，沙袋、金属丝、烧焦的木头和废弃的金属，都用于建造临时的简陋小屋。

生活的口号，也是战争期间广播中经常出现的词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跟消极作无为的斗争。1946 年春，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地说：全世界的目光正集中在我们身上，轰炸废墟的瓦砾还未清除，一些公用事业仍处于停顿状态，这对日本名誉该是多大玷污。他们谴责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说他们意志消沉，夜宿车站，让美国人看到了可怜相。日本人对这些启发名誉心的呼吁甚能理解。他们也希望可以倾注最大努力，以便将来可以在联合国组织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都是为了名誉，但方向却完全不同了。如果将来大国之间实现了和平，日本是可以走上这条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名誉是日本人始终坚守的目标，也是获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就要根据情况而取舍了。日本人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态度，不能说这是道德问题。但我们却热衷于“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信念。我们的信念不会随着失败而改变。欧洲人战败后就到处组织地下活动。在日本除了少数极端顽固分子，日本人不需要组织抵制或在地下开展反对美国占领军的活动。在道义上，他们不觉得有必要坚持原有路线。占领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独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到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担心安全问题，并且他们还会



日本艺伎与美国客人　　摄影　日本 现代

战败的日本人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便改变了战争中的态度，他们不仅能积极地重建家园，还能与驻在日本的美国人友好的相处。在艺伎馆里，穿和服的艺伎正在教美国客人跳民间舞蹈。

受到曾经是国家官员的礼貌的款待，一次报复行为也没有发生过。当我们的吉普车通过村子时，孩子们会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见），母亲也会拉着不会招手的婴儿的小手向美国士兵挥动致意。

美国人很难相信日本人战败后这种180度的大转变是真的。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对我们而言，这甚至比俘虏营中日本俘虏的态度转变还难以理解。因为俘虏们自认他们对日本来说已经是死人了。那我们就不知道死人会做什么了。几乎对日本没有了解的西欧人预测到，战后的日本公众也会出现上述那种日本俘虏表面性格的变化。他们大都认为日本只知道胜利或失败。而且在日本人看来，失败就是侮辱，一定要用拼死的暴力来报复。另一些人则认为，日本的民族性使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媾和条款。这些日本研究者们没有搞清“情义”。在日本人众多维持名誉的各种抉择中，他们只是选出了复仇与侵犯这种传统方式。而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采取另一种方针的习惯。他们用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日本人关于侵犯的伦理。在欧洲的思维方式中，如果要战斗，任何个人或民族首先都必须确认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其力量来源是一直积蓄在胸中的憎恨和义愤。

日本人则在寻找侵略的其他根据。他们迫切要求赢得世界的尊敬。当他们看到大国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时候，就想和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和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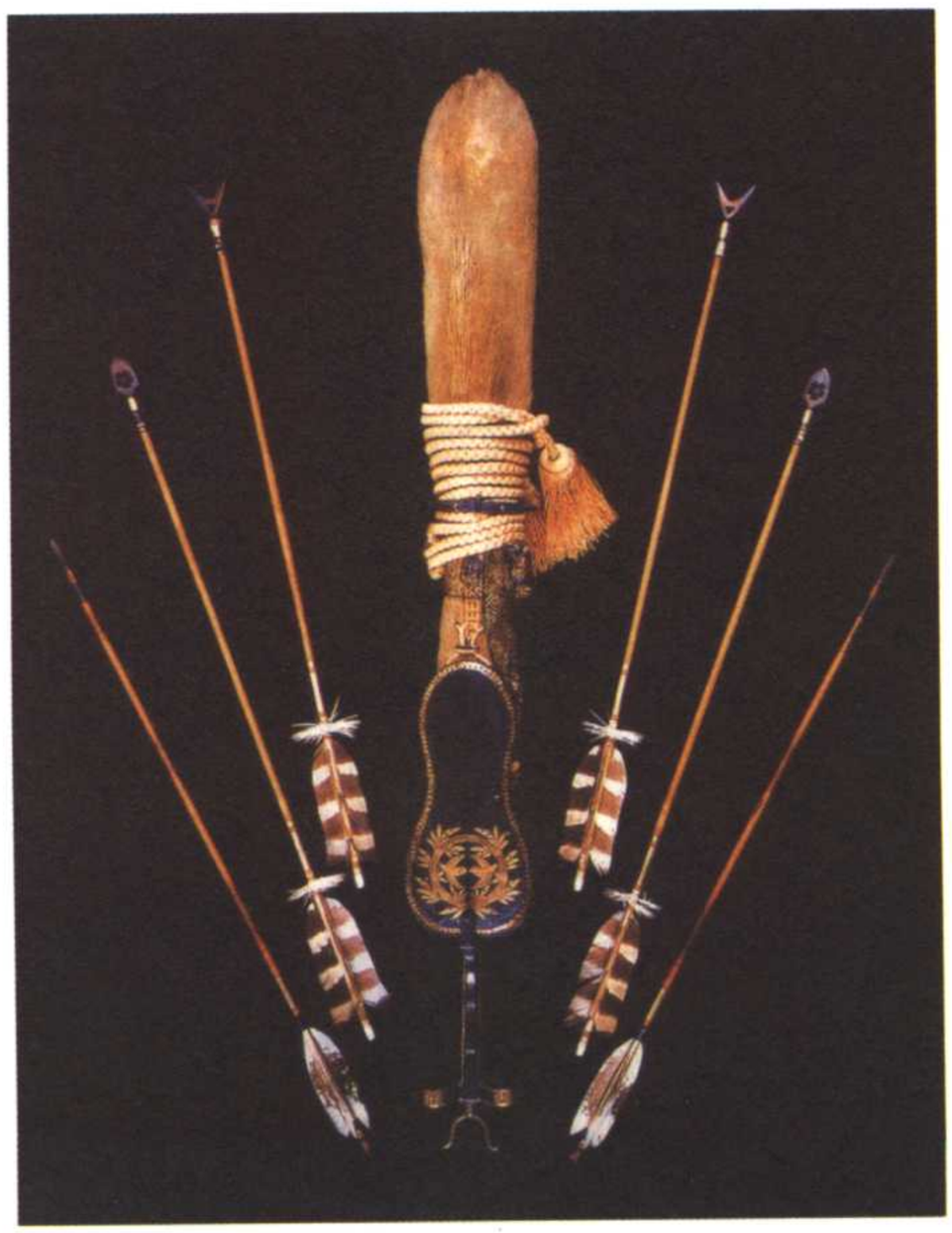
落后的制约，他们不得不采用比希律王更毒辣的手段。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们还是失败了。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侵略不是通往名誉的道路。而“情义”却往往具有双重同等的含义，一方面是采取侵略的方式，另一方面就是坚持互敬的关系。战败之际，日本人从采取侵略方式转向互敬，显然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心理上有任何压力。他们的目标仍然是为了名誉。

日本也曾在历史的其他场合有过同样的举动，西方人通常对此甚感不解。1862年，日本刚刚拉开长期锁国的帷幕，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萨摩遭到杀害，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在日本是出了名的傲慢和好战。英国派了远征军惩罚他们，他们炮轰萨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整个德川时代，日本人一直都在制造武器，但都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枪。鹿儿岛的日军当然敌不过英国的军舰。然而，这次炮击却导致了出人意料的结果，萨摩藩非但没有誓死报复，反而要跟英国建立友谊。日本人亲眼目睹了敌人的强大，并要求敌人赐教。他们和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第二年又在萨摩建立了学校（指开成所）。当时一位日本人描述说，这所学校教授的是西方的学术……因生麦事件而发生的友好关系逐渐发展起来。所谓生麦事件（此处应为“萨英战争”，不应称“生麦事件”。——译者注）就是指英国对萨摩的惩罚以及对鹿儿岛港的轰炸。

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另一个可以与萨摩藩媲美而以好战和激烈排外著称的是长州藩。这两个藩都是“王政复古”领导者的发源地。没有实权的朝廷曾发布敕令，命令将军在1863年（阴历）5月11之前把一切夷狄赶出日本国

侵略与互敬

筒中的箭有着双重含义，离弦的箭是以侵略去获得荣誉，筒中的箭是以互敬自持；情义也有着双重含义，可以使用侵略手段；变可遵守互敬关系。



土。幕府没有理会这道命令，而长州藩却理睬了。它从要塞炮轰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日本的火炮和炮药很是低劣，炮轰并没有伤害到外国的船只。西欧各国为惩罚长州藩，派来联合舰队迅速击毁其要塞，并索取了300万美元的赔款。然而这次炮击却导致了与萨摩藩同样奇妙的结果。在谈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诺曼写道：这些曾是攘夷急前锋的藩发生了转变，不管背后有多么复杂的动机，这种行动却验证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对此人们只能表示尊敬。

品川月夜行船　tsuchiya koitsu 木刻画 1935年

日本人对名分的情义就像月亮一样，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光明的一面是日本人能够以善意的态度面对失败，而黑暗的一面则是陷入失败的深深耻辱中。



这种善于适应情况变化的现实主义反映的是日本人“对名分的情义”的光明面。“情义”跟月亮一样，有光明面和黑暗面。其黑暗面就是把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看成是日本民族的奇耻大辱，并驱使日本开展了这场不幸的战争。它的光明面就是，使日本能够本着善意的态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日本仍然是一如既往，按照自己的性格来行事。

对于“情义”的各项义务，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总是选择需要的部分介绍给西方读者，称为是对“武士



情义的责任　　绘画　日本

“情义”是一切阶级共有的道德，身份高的人，“情义”的责任就越重。人们必须懂得回到情义，如同武士可以不惜用鲜血来回报情义，否则将受到藐视和厌恶。

道”或“武士之道”的崇拜。这种介绍引起了某些误解，这是有根据的。近代以来才有了武士道这个正式名称。和“迫于情义”、“完全出于情义”、“为情义而竭尽全力”等格言不一样，它没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包罗不了“情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评论家只是出于灵感而创作了它。并且，因为武士道曾是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伴随着这些领导人信誉的扫地，人们也开始怀疑武士道的概念。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以后不再懂情义。刚好相反，与任何时期相比，现在都更需要西方人来理解“情义”在日本的含义。人们产生误解的原因之一就是把武士道等同于武士阶级。“情义”是一切阶级共有的道德。正如日本其他一切义务和纪律，身份高的人，“情义”的责任就越重。但“情义”是所有阶级都要讲的。至少日本人认为“情义”对武士的要求要高于对平民的要求。在外国观察者看来，似乎是“情义”对一般百姓要求最高，因为他们得到的回报比较少。但在日本人眼中，只要得到自己那个圈子的尊敬就是获得了回报，而不懂情义者依然是遭同伴蔑视和厌恶的可怜者。


SPRING LAST C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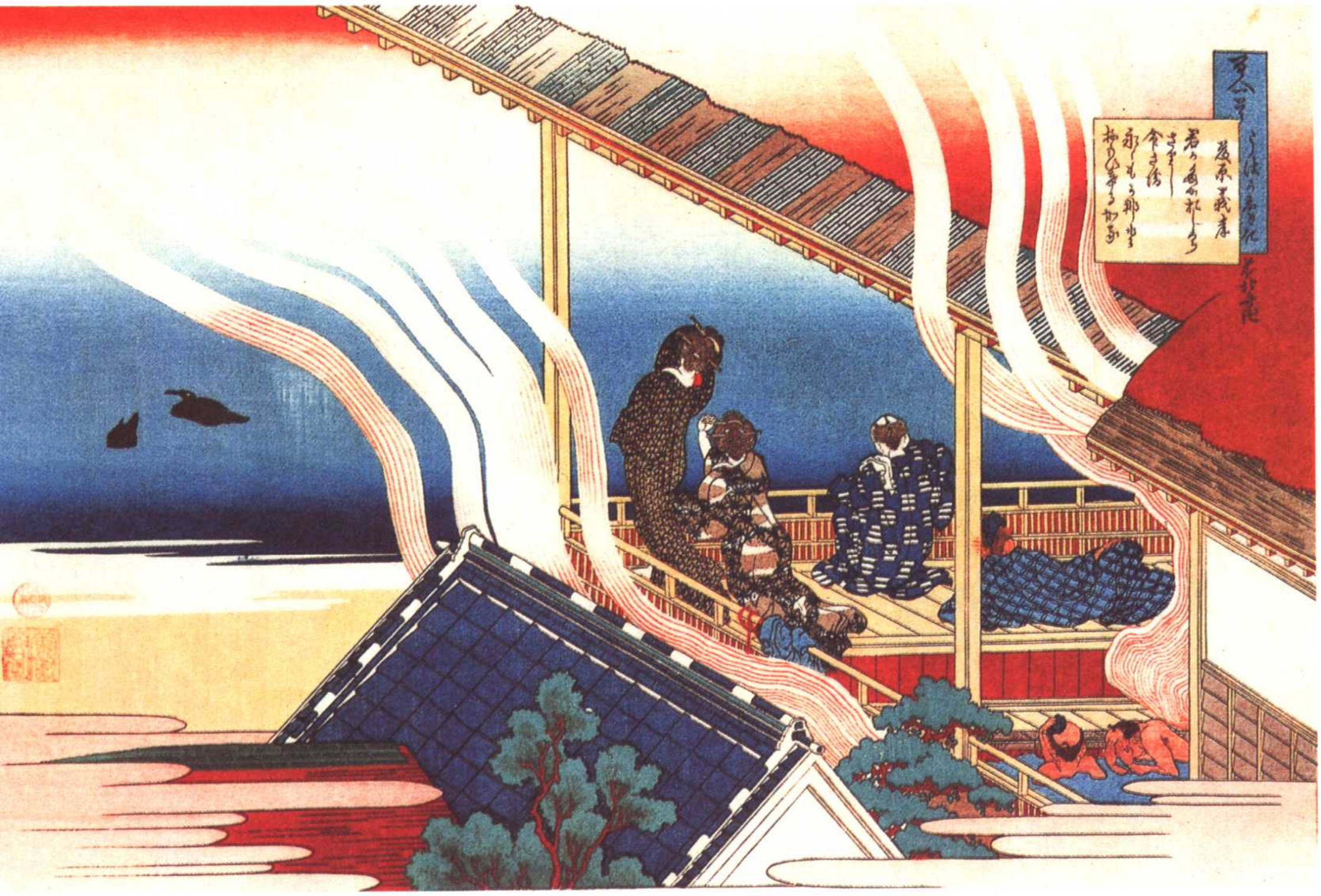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晨浴、艺伎与酒食，日本人对自我的约束虽然格外严格，但他们对感官享乐绝对宽容。只是享乐也必须有限度，不能纵情沉溺其中。于是，日本人把生活变得很难处理，他们像艺术品一样培养肉体的享乐，又牺牲享乐去献身于义务。

日本的道德准则要求回报义务和自我约束，并且坚决地把私欲谴责为罪恶，要求人们把它从内心根除掉。古典佛教的教义就是如此要求的。不过，日本的道德准则对感官享乐的宽容程度却是令人惊异的。日本是世界上闻名的佛教国家之一，但其道德伦理与释迦及佛典却是对立的。日本人满足私欲几乎不受谴责。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值得培养的好事。他们追求并尊重享乐，然而，享乐也必须有限度，不能侵犯人生的重要事情。

日本的这种道德准则经常使人们的生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印度人比美国人更能理解日本人容许感官享乐的意义。在美国人看来，享乐不是必须学习的，他们认为拒绝沉溺于感官享乐是在克制已知的诱惑。但事实上，跟义务一样，享乐也是需要学习的。在很多文化中，享乐本身并不需要经过学习，所以人们就很容易献身于牺牲自我的义务。有时极度限制男女间的肉体吸引，使家庭的圆满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威胁。在这些国家中，家庭是基于另外一些其他考虑成立的。一方面，日本人培养肉体享乐，另一方面他们又规定不能纵情沉溺其中。他们把享乐作为严肃的生活方式。这样，日本人把生活变得很难处理，他们像艺术品一样培养肉体的享乐，在品尝其中的趣味后，又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中。

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肉体享受就是洗热水澡。从贫穷的农民、卑贱的佣人到富豪贵族，他们每天傍晚都要浸泡在滚烫的热水中，这是生活常规之一。最常见的浴槽是木桶，下面烧着炭火，水温可



湖畔汤屋　　葛饰北斋　约1935年至1936年

这幅温馨宁静的画面可谓极致地体现出日本人在洗热水浴时获得的享受。氤氲的白气从汤屋（浴室）的一角袅袅升起，柔和的形态和色彩引人产生无尽的遐思。两个男子泡在浴池中，享受池水的温度，而在一旁的平台上，几个已经出浴的男女穿着随意，慵懒地或坐或卧，眺望着远处平静的湖面。

达华氏110度甚至更高。入浴前他们先把身体洗净，然后全身浸在热水中，尽情享受温暖与舒适。他们在桶中像胎儿那样抱膝而坐，让水浸至下颌。他们每天洗澡，像美国人那样重视清洁，享受这中间的艺术情趣，这是世界其他各国的洗澡习惯无法相比的。他们自己说这种情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浓郁。

城镇中，人们可以到像游泳池那样大的公共浴池中洗澡，并和澡伴说笑；农村里，妇女们轮流在庭院里烧洗澡水，供几家人轮流入浴。即使洗澡时被人看到，他们也不在乎。在上流家庭，洗澡也必须按照严格的顺序入浴。首先入浴的是客人，依次是祖父、父亲、长子，最后才是家里最下等的仆佣。出浴时全身像煮熟的虾子一样绯红。浴后，合家人聚在一起，共同享受晚餐前的轻松愉悦。



表现浴室女子的歌舞伎场景　　歌川国贞 1815 年

这是1815年在江户最大的歌舞伎剧场上演的第二场颜见世 (Kaomise)。颜见世的演出要集合剧团里的所有演员，这种排场一年中仅有一次。这次的颜见世表演的是浴室中发生的故事，演员们都穿着似露非露的服装。

与把热水澡当做人生一大享乐一样，日本人也同样重视“锻炼”，其传统包括最严厉的冷水浴。他们通常称洗冷水浴为“寒稽古”（冬炼）或“水垢离”（冷水洗身锻炼），至今这种风俗仍然十分盛行，但已经不是过去的传统形式了。过去，他们必须在黎明前出发，要坐在冰凉的山间瀑布之下。寒冬之夜，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房间里往身上泼一些冰凉的冷水，这是非同一般的苦行。帕西瓦尔·洛厄尔（Percival Lowell）对这种 19 世纪 90 年代盛行的习惯进行了描述。如果有人希望



能够成为获得医治疾病或预言未来的特殊才能，而又不想去做僧侣或神官，那么他就应该在寝前进行“水垢离”。凌晨二点钟，众神入浴的时间，还要起床再做一次。早晨起床、中午以及日落时都要各做一次。这种黎明前的苦行在那些急于学习乐器或其他手艺用以谋生的人中特别盛行。此外，人们为了锻炼身体常把身体裸露于严寒中。据说练习写字的孩子尤其要经受这样的锻炼，哪怕把手指冻僵或长冻疮。现代日本的小学里没有取暖设施，他们说这样有利于锻炼孩子们的意志，使他们将来能够忍受人生的各种艰辛。西方人对日本孩子印象更深的则是他们经常感冒、流鼻涕，因为这种习惯只能导致如此的结果。

日本人另一种爱好是睡眠，这也是日本人最熟练的技能之一。不管用什么姿势，也不管在我们认为根本不能入睡的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能舒舒服服地睡着。很多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对此惊奇不已。美国人把失眠和精神紧张看成是等同的状态，依据我们的标准衡量，日本人的状态应该是高度紧张的，可他们却能在任何情况下毫不费力地熟睡。他们晚上很早就睡觉了。东方各国很少有早睡的习惯。日落不久，日本的村民们就都入睡了。我们把早睡当成为明天积蓄精力；而他们早睡却并不是为了这样，他们没有这种打算。一位对日本人非常了解的西方人写道：“到了日本，你必须抛弃那种认为今晚睡眠与休息是为明天准备工作的念头，你必须将睡眠与解除疲劳、休息和保养等问题区分开来。”睡眠就像一项工作提议，是自成一案，与任何所知生死之事无关。美国人认为睡眠是为了维持体力。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早上醒来的第一









舞蹈与修炼　　摄影　藤井秀树　1970年

艺伎裸露上身，长发垂地，随古老的节拍翩翩起舞。舞姿灵动而神秘，然而这样的美感却是艺伎长期修习克服重重困难的成果。身心的严酷训练铸就了日本特独具特色的舞蹈，而日本的女子却不以这样的修炼为苦，她们十分期望走入艺坛，从小学习各种技艺，以成为古老的艺术的传承者。

件事就是计算一下昨晚一共睡了几个小时。睡眠的长短会告诉我们，白天可以有多少精力和多大效率。日本人睡觉却不是为了这些。他们只是喜欢睡觉，只要没人打扰，他们就高高兴兴地入睡。

同样的，他们对牺牲睡眠时间也是毫不吝惜的。学生们准备应考时会通宵达旦地用功，根本不考虑充足的睡眠更有利于应付考试。在军事训练中，睡眠时间完全服从训练。杜德(Harald Doud)大尉曾于1934年至1935年间供职于日本陆军，他在谈及与手岛上尉的一次谈话时说，部队在演习中经常是连续三天两夜地行军，中间只有10分钟小憩和短暂间歇可以打个盹，其他时间一点都不能睡。有时候，士兵们边走边打瞌睡。有一个少尉在行军中睡着了，以至于撞到路边的木堆上，引得大家笑起来。等到回到了兵营，还是不能睡，士兵们又都被分配去站岗或巡逻。我问："为什么不让一部分人去休息呢？"上尉回答说："哦，用不着，他们都知道如何睡觉，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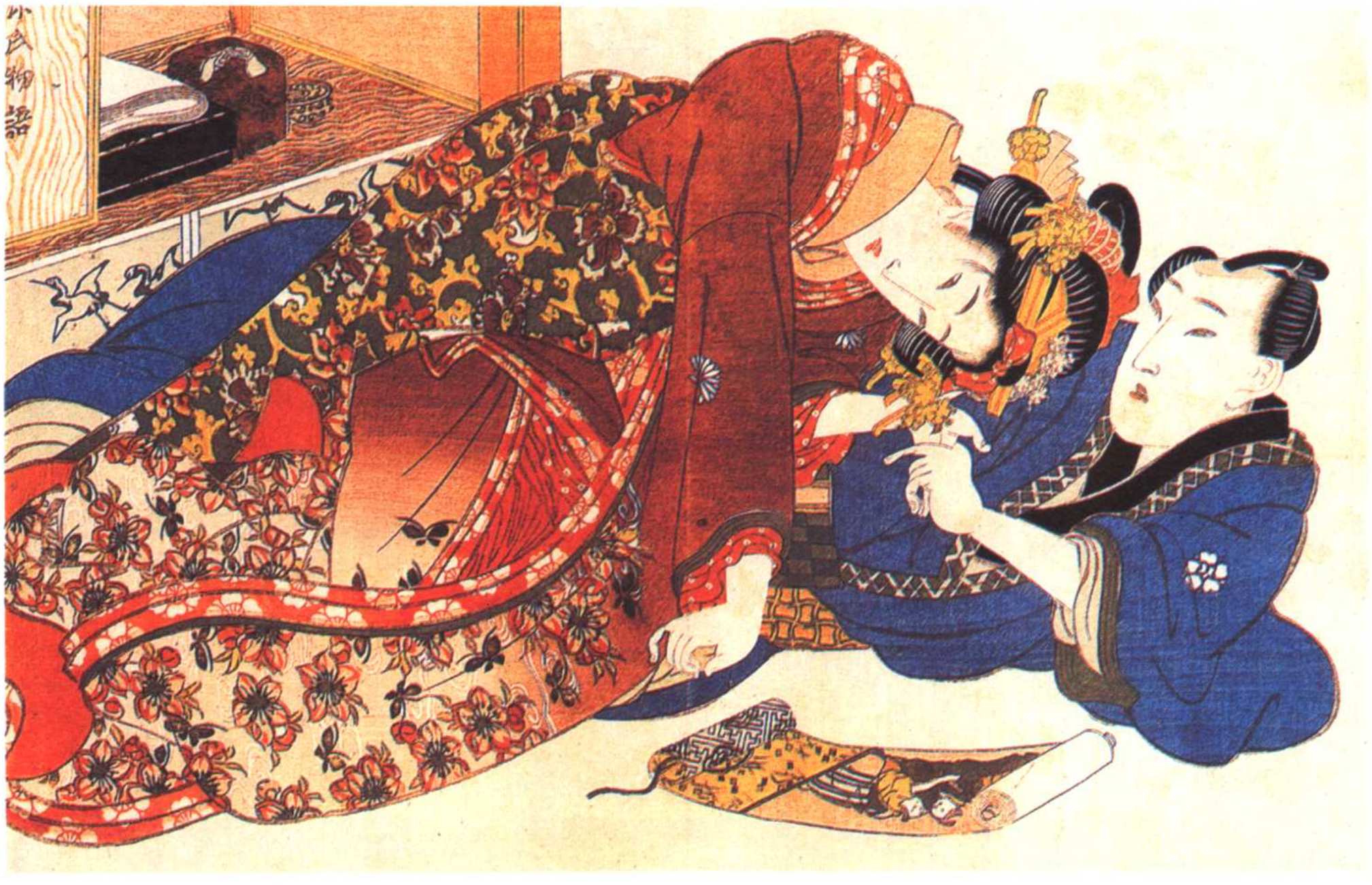
不是要训练他们睡觉。”这些话简洁生动地表达出了日本人的观点。

在日本，吃饭跟取暖、睡觉一样，既是一种享乐式的休息，同时也是一种严格的训练。闲暇时，日本人喜好做各种菜肴来品尝，一道菜只有一羹匙的量，但却非常讲究色和味。但在另外的情况下，他们又非常强调对吃饭的训练。埃克斯坦（G. Ecks – stein）曾引用日本一位农民的话说，“快吃快拉是日本人的最高德行之一”。吃饭被认为不是什么大事……吃饭只是出于维持生命的需要，所以，应当尽快吃完。对孩子们，尤其是对男孩，总是催他们尽量快吃，而不像欧洲人那样，劝孩子们慢慢地进食。训练僧侣的佛教寺院里面，饭前举行的感恩祈祷中，僧侣们必须把食品视为良药。换句话说，对于正在修行的人，吃饭不是一种享乐，而是必需的东西。

按照日本人的观点，强行绝食是测试意志是否坚强的好方法。正如却暖弃眠，绝食也表示可以忍受苦难，就像武士“口含牙签”那样。一个人能够经受住绝食的考验，体力不但不会因热量和维生素的缺乏而下降，反而会因为精神的胜利而提高。日本人并不认同美国人所承认的营养与恢复体力的对应关系。所以才有战

爱好睡眠的日本人　　溪齐英泉　约1822年至1825年

日本人有着早睡的习惯，但对他们而言，睡觉并非是为了解除疲劳、保养或休息，而是作为一种爱好。



时东京广播电台对在防空洞内避难的人们宣传体操可以让饥饿者恢复体力和元气这类事情的发生。

虽然浪漫主义的恋爱与日本的婚姻方式和家庭义务截然相反，但它也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并已成为日本的一种习惯。这类题材充斥在日本的小说中。小说中的主角都是已婚人士，和法国的文学作品一样。日本人喜欢阅读和谈论的话题是为情而死。10 世纪的《源氏物语》是一部杰出的描述爱情的小说，毫不逊色于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发表的伟大小说。该书讲述了封建时代的大名以及武士们的恋爱情感的故事，书中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在日本，爱情仍是现代小说的主要题材，这与中国文学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忌讳论及浪漫主义的爱情和性的享乐，避免造成人际间的很多纠纷，家庭生活也十分平稳和谐。

地震来临的时刻　久保敏郎 摄影 现代

这是一所小学，地震来临的时刻，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十分镇定地躲到桌子下面，没有尖叫和慌乱，一切仿佛早有准备一般地有条不紊。这和日本人从小受到磨炼意志的训练有很大关系，他们受到有素的训练，从而具备了忍受苦难的精神。





浪漫的爱情观　《雪国》电影剧照 日本

日本人的爱情观是浪漫而美好的，正如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小说反映的。这是日本著名的演技派女演员岩下志麻在《雪国》的拍摄现场。电影《雪国》改编于川端康成的同名小说，它把背景设置在远离东京的雪国及温泉旅馆。书中美不胜收的雪原、年轻貌美的艺妓、旅途中的邂逅与难以捉摸的爱情征服了无数读者。

在这方面，和中国人相比，美国人要更能理解日本人。不过，这种理解是表面的。在日本并不存在对性享乐的许多禁忌。在这个领域中，日本人并不讲究伦理道德，但我们还是要讲的。在他们看来，“性”和其他的“人情”一样，只要把它放在人生的低微位置上就可以了。“人情”是无所谓罪恶的，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对性的享受讲究伦理道德。英美人认为日本人珍藏的有些画册带有淫秽的色彩，觉得吉原（即艺伎和妓女集中地）是个悲惨的地方。日本人一直十分重视这种评论。在与西方人接触初期，他们就十分关注外国人的这种评论，并制定了相关法律，以使他们的习惯向西方标准靠拢。然而，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能被任何法律消除的。

有教养的日本人完全知道，有些事情，在他们看来并不是那么的不道德和猥亵，但是在英美人眼中却是不一样的。不过，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在我们对“性”的态度与他们那种人情不能侵入人生大事的信条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一点也正是为什么我们难以理解日本人那样对待恋爱和性享乐的态度的根源所在。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日本人分得异常清楚，并且对两个范围公开而坦率。美国生活中则不是那样的，属于妻子的范畴是可以公开于世的，而另一个范畴就只能避人耳目了。日本人对待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是属于人的主要义务的世界，后者则是属于不足挂齿的消遣世界。这种范围的划定“各得其所”，使得无论是家庭中的模范父亲还是市井中的登徒子，这两类活动都适用。



艺伎与她的旦那　　溪斋英泉 浮世绘

虽然艺伎这一行业始终强调“卖艺不卖身”的原则，但是艺伎们还是被允许与某个男子建立亲密的关系。只是艺伎必须在这个男子还愿意负担她的生活费用的同时，保持自己的“贞洁”，不得再另结新欢。

和我们美国人不同，日本人的理想并不是把恋爱和结婚看成是一件事。我们所赞赏的恋爱是建立在选择配偶的基础之上的，结婚的最好理由就是相爱。婚后，如果丈夫与其他妇女发生肉体上的关系，那就是对妻子的侮辱，因为他把原本归属于妻子的东西给了别人。日本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在选择配偶问题上听命于家长，会盲目地结婚。丈夫与妻子必须遵守清规戒律。即使在十分融洽的家庭里，孩子们也绝不会看到父母之间的性爱表现。正如某杂志中一位现代日本人所说的那样：“在我们国家里，结婚的真正目的是生儿育女和传宗接代，其他任何目的，都只能是曲解结婚的真正含义。”

然而，这绝不是说日本的男人就只是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他们一有钱就会去寻找情妇。他们和中国有很大差别，从不把自己迷恋的女人带到家里，不会让她成为家族的一员。如果这样做，两种理应分开的生活范围就混为一谈了。他的情妇或者

是精通音乐、舞蹈、按摩以及其他技艺的艺技，或者是妓女。无论是哪一种人，这个男人都要同情妇的雇主签订契约，以保证女方得到金钱报酬并防止女方被遗弃。他会为她另觅新居。只有在女的有了孩子，并且男人希望与这个孩子同自己家庭的孩子一起被抚养的时候，他才会破例地把女人接到家里来。这个女人进入男方家里后，不是妾，而只是一个佣人。孩子们把明媒正娶的夫人称为母亲，生母与孩子的关系不被承认。日本与中国那种已成为传统习惯的东方式的一夫多妻制有明显的不同。甚至是空间上，日本人对家庭义务与“人情”的处理都是泾渭分明的。

在日本，只有上流阶级才有钱包养情妇。大多数男人只是偶尔和艺伎或妓女玩乐。这种玩乐完全是公开的。妻子会为夜游的丈夫梳洗装扮；妓院可以把账单送给妻子，妻子要照单付款，看成是理所当然。可能妻子会对此感到不高兴，但

作画的艺伎　　鸟文斋荣之　约1795年

为了赢得名士贵族的青睐，艺伎必须兼备多种才艺。在京都祇园著名的艺伎之中，不乏才华横溢者。图中的艺伎正在举行一场绘画的比赛，坐在垂帘之后、穿着紫色和服的艺伎像是一名裁判，而其他的艺伎则忙着关注那位端坐在画纸之前、穿橘色和服的年轻艺伎将如何下笔。



也只能是自己烦恼。跟到妓院相比，到艺伎处玩乐花钱更多，但和艺伎玩乐一宿的费用是不包括性行为的。他所享受的乐趣就是欣赏训练有素、衣着入时、举止得体的美女的款待。如果男方想要进一步接触某一位艺伎，他就必须成为这位艺伎的保护人，签订契约约定这位艺伎是他的情妇；或者男方的魅力迷人可以打动艺伎自愿献身。当然，与艺伎共度一夜也绝不能排除色情之事，艺伎的舞蹈、风趣、歌谣以及仪态都是传统的，富有挑逗性，而且可以表现出上流阶级所不会表现的一切。这些都是人情世界中的事情，是对孝的世界的一种解脱。没有不去纵情享乐的理由，但在享乐的同时必须分清这两个领域。

妓女大都住在花街柳巷里。与艺伎玩乐后，余兴未尽的人还可以再到妓院去寻欢作乐。因为妓院所需费用低，没钱的人便满足于这种玩乐而放弃与艺伎寻欢。妓院外面都挂有妓女的照片，游客常常毫不避讳地当着众人长时间地面对照片品评挑选。妓女的身分低贱，地位不如艺伎高。她们大都是因家境贫寒而被卖到妓院的，没有像艺伎那样受过严格训练，懂得艺术。以前，在日本人还没有留意到西方人的非议，破除旧习惯之前，妓女会亲自坐在顾客面前，用毫无表情的面容面对着顾客，任其挑选肉体商品。现在则用照片取代了。

男人可以挑选一位妓女，与妓院签订合同，成为她唯一的保护人，妓女就变成了他的情妇，这种妓女受到契约的保护。对于女侍或女店员不签订契约就变成某人的情妇的，这种自愿情妇是最没有保障的。她们大都是经过恋爱才与男方结合的，被公认的义务世界排除在外。日本人在读到美国关于年轻妇女被情人抛弃，婴儿绕膝、悲伤失意的故事或诗歌时，他们会将这些私生子的母亲等同于日本的自愿情妇。

同性恋也属于传统“人情”的一部分。在旧时代的日本，同性恋是武士、僧侣等上层人公认的一种享乐。明治时期，为了赢得西方人的赞许，日本宣布很多旧习俗为非法。那时，规定同性恋也要

被惩处。然而，这种习惯至今却仍被认为是“人情之一”，不值得郑重对待，只是必须限定在一定范围里，只要不对家庭关系构成妨碍。所以，虽然有日本男人自愿做职业男妓，也不必担心会出现西方人所谓的那种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变成同性恋爱者的危险。日本人对美国存在着成年男子扮演同性恋的被动角色感到奇怪。在日本，成年男子选择的对象是少年。成年人认为扮演被动角色是件有损人格的事情。日本人有自己的界限，他们知道什么事可以做而又不伤害自尊，只不过他们的界限与我们的不同罢了。



艺伎的等级　喜多川歌 出自《北国五色墨》 约1794—1795年

吉原位于江户的北部，是有名的欢场。吉原的艺伎根据容貌、才艺以及结交客人的身份被分为五等：花魁 (Oiran)、元吉 (Geigi)、切母 (Kiri no musume)、香椎 (Kashi) 和铁炮 (Teppo)。这位铁炮嘴里正叼着一张唇红纸，一对丰满的乳房完全暴露于衣襟之外。铁炮是吉原最低等的艺伎，身份几乎完全等同于妓女，在日本俚语里又被称为“河豚”，意为“虽然有可能尝到绝品美味，但也可能因此中毒而死（指跟铁炮消磨有非常高的机率会患上性病）。

酗酒也是被许可的“人情”之一。日本人认为美国人发誓要绝对禁酒是西方的怪诞行为。对于我们地方上号召的禁酒活动，他们也同样看待。饮酒是一种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反对的乐趣，它只是一种微小消遣，所以正常的人绝不会被它所困。依据他们的观点，就像没有必要担心成年男人会变成同性恋者一样，也不必担心饮酒会变成醉鬼。在





日本，酒精中毒也确实没有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喝酒是一种愉快的消遣，所以，家庭和社会并不厌恶喝醉的人。他们不会乱来，也不会有人认为他们饮酒后会打自己的孩子。一般经常看到的是，他们纵情歌舞，挣脱一切严格的礼仪束缚，无拘无束地畅饮。在城市的酒宴上，人们则喜欢坐在别人的膝盖上饮酒。

古板的日本人对饮酒和吃饭是区别对待的。农村的宴会上，倘若一个人开始吃饭，就意味着他不会再喝酒了。他已经涉足另一个世界了，这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很清楚的。人们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有时也会在饭后喝酒，但绝不会边喝酒边吃饭，喝酒和吃饭要分先后享受。

日本人信奉的神也有如此明显的善恶两面性。最著名的神素盏呜尊是天照大神（女神）的弟弟，是位迅猛的男神。他对自己的姐姐非常粗暴，这在西方神话中可能被称为是魔鬼。天照大神怀疑素盏呜尊是怀着不良动机到自己的房间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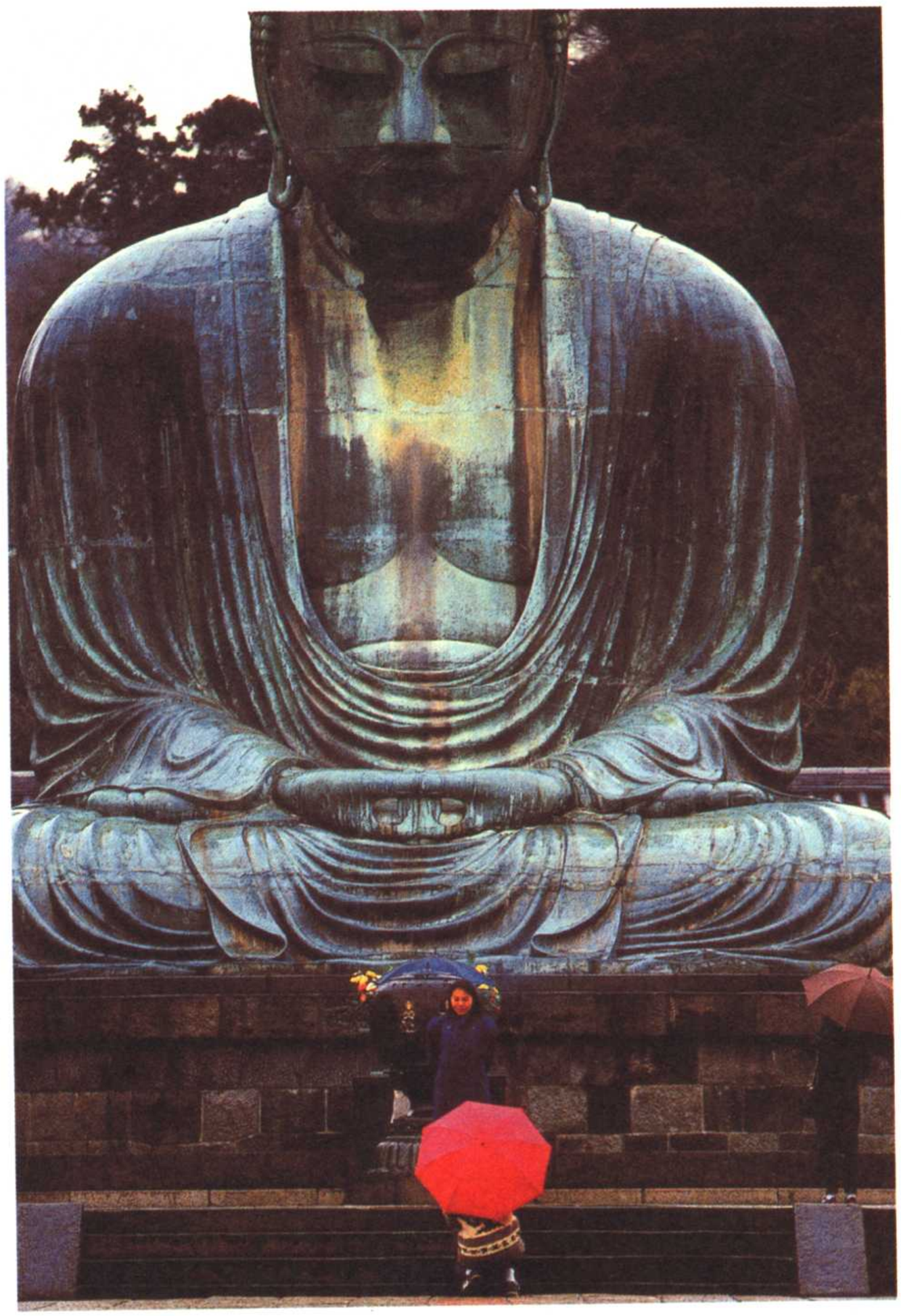
充满同性恋味道的欢宴

喜多川月 1804年 日本

在过去的日本，同性恋是武士、僧侣等上层人物所公认的一种享乐行为。只要不影响家庭关系，就不会受到太大的非议，也是日本"人情"的一部分。这是吉原三浦茶社的名妓高尾宴飨贵客的隆重场景。高尾的客人是江户城内最著名的两位歌舞伎演员——泽村源之助及岩井喜代太郎。高尾坐在泽村源之助的身后，正在施展她女性的温柔，为他轻轻地按摩肩膀，他们身后陈列着高尾收到的礼物——几床华美的被褥。岩井喜代太郎坐在一旁，专注于美食之中，其余的艺伎和侍女分别忙于演奏和服侍的工作。在日本，歌舞伎（通常是男性从事）有时在同性恋方面的名声则比他们的演技要更响一些。在图中出现的礼物——华美的被褥，充满了暧昧的情色意味。

想把他赶出去。但他放肆地胡闹，当大神与侍者正在饭厅里举行尝新仪式时，他就在天照大神的饭厅里随意大便。他毁坏稻田的田埂，犯下滔天大罪。更可恶的，也是最不被西方人理解的是，他竟然在姐姐的卧室的上端挖个窟窿，从中放入"倒剥皮"的斑驹（即男性生殖器）。因为素盏鸣尊干了这么多坏事，他被诸神审判，处以重刑，被赶出了天国，流放到黑暗之国。然而，在日本，他仍是众神中一位讨人喜爱的神，受到了人们应有的尊敬。虽然世界神话中不难发现这样的神，但他却还是被高级的伦理宗教排除在外的，因为把超自然的东西划分为善恶两个世界，分清是非曲直，会更符合善与恶的宇宙斗争哲学。

日本人始终明确地否认，德行包括与恶势力作斗争。就像几百年来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一直阐述的那样，他们觉得这种道德标准不适合日本。他们极力宣布，这正证明了日本人道德的优越性。他们说，中国人不得不建立起一种道德标准，



镰仓大佛　佛像　镰仓　1252 年

这是镰仓大佛位于东京附近的镰仓，除去底座高达11.3米。隋朝前后，佛教经过中国传到日本。在他们的佛教观念里，没有地狱、堕落的说法，只要修身养性，净化心灵，任何凡人皆可成佛。

提高“仁”即公正、慈爱的行为的地位，将其作为一种绝对标准。把“仁”作为标准，能发现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的不足。他们说由于中国人的劣根性，所以需要这种人为的手段来约束。对中国来说，这种道德标准是好的。18 世纪伟大的神道家本居宣长就是这样宣布的。近代的佛学家及国家主义指导者们也以发表论著或举行讲演的形式来谈论同样的主题。他们说，日本人性本善，值得信赖，无须和自己恶的一面作斗争，只要洁净心灵的窗口并让自己的举止适合各种场合就可以了。他们容忍自身污秽，也很容易清除这些污秽，性善的一面会再度生辉。跟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相比，日本的佛教哲学都更加坚持人人皆可成佛的主张，道德标准不在佛经中，它是打开自己悟性和清净无尘的心灵之窗。那么，为什么要自我怀疑心灵中的发现呢？恶并不是人天生具备的。基督教圣经的《诗篇》中说：“我是从罪孽中出生的，还在母亲胚胎中的时候就有罪了。”在日本，没有此类神学，他们不会对人的堕落进行说教。“人情”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幸福，不应被谴责。不论是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该谴责。







日本动漫中的民族精神

一度非常热门的日本动漫作品，如《福音战士》、《幽灵公主》、《灌篮高手》等等，都在孜孜不倦地叙述这样一种日本精神：主人公遭遇自己的对手，屡次失败，但最后通过互相激励配合，发挥团队精神和巨大潜能，最终打败了那些盖世对手。

日本人的最高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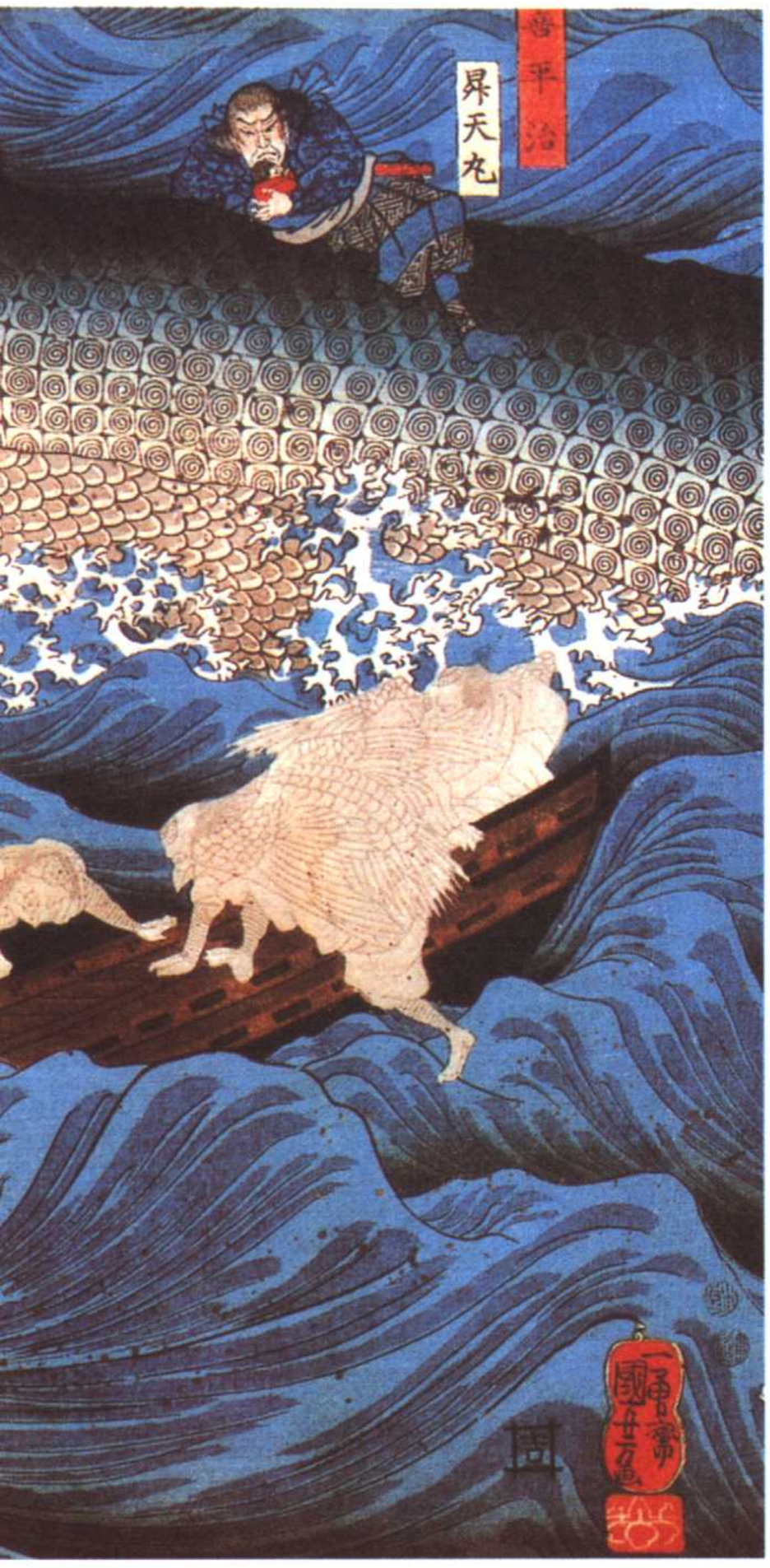
绘画 日本 185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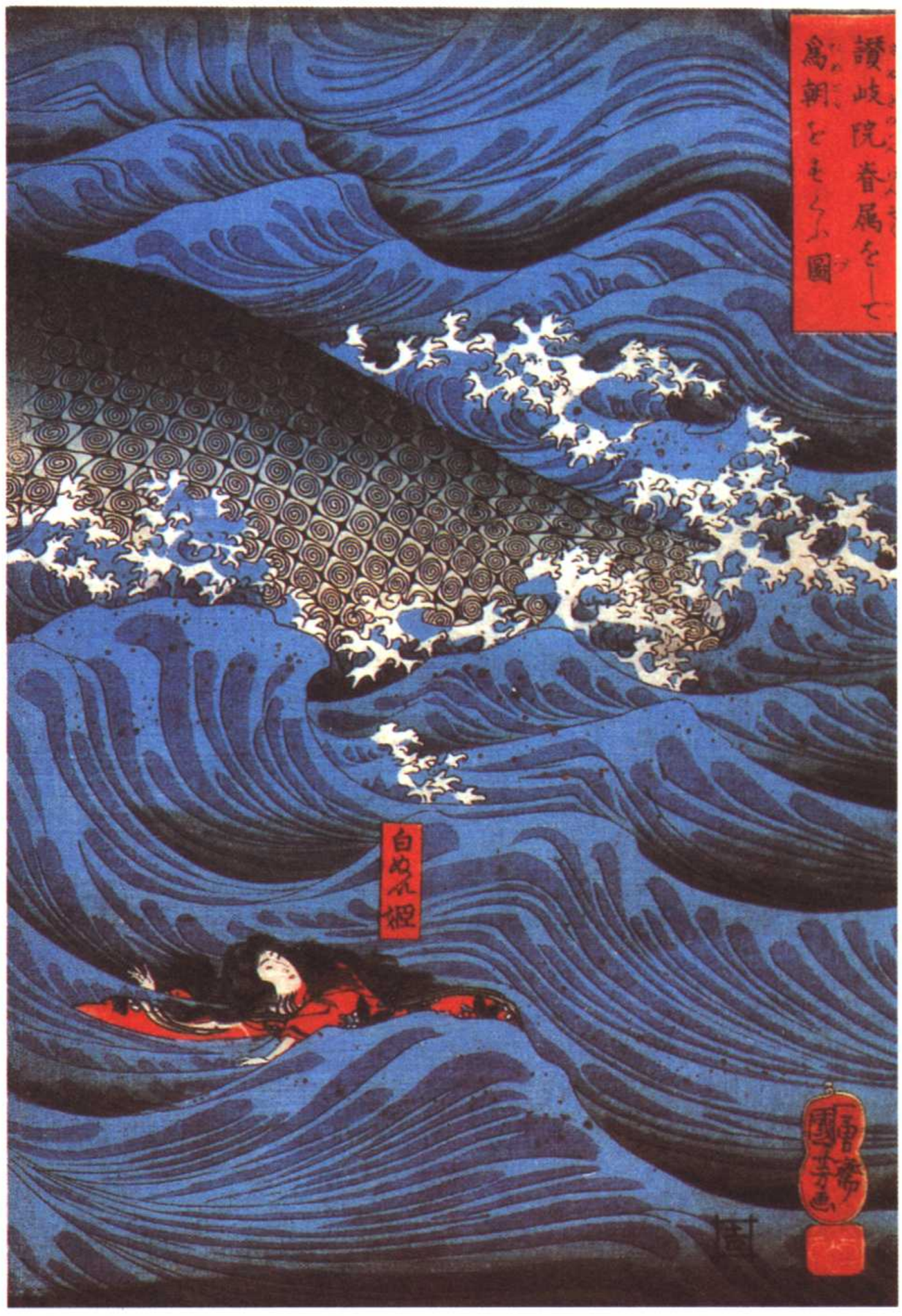
日本人把履行义务看做是人生的最高任务，要履行“忠”、“孝”及“情义”的义务就要经常忍受苦难。他们的人生犹如迎浪行船，险阻与困难已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幸福不是他们追求的最终目的，历练和展现一种坚强的意志才是他们人生的目标。



听到这些，美国人会认为这种论点必将导致另一种自我放纵的纵欲哲学。但是，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日本人把履行义务看做是人生的最高任务。他们承认，报恩就意味着要牺牲个人的欲望和享乐。在他们看来，将追求幸福看成是人生重大目标的想法是令人吃惊的，是没有道德的。幸福仅仅是一种消遣，倘若郑重对待，把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那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早就预想到，要履行“忠”、“孝”及“情义”的义务就要经常忍受苦难。虽然这会让人生充满艰辛，但对此他们作了充分的准备。一些享乐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是坏事，但他们却要经常放弃，这是要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做得的。在所有美德中最为他们颂扬的正是这种坚强的意志。

日本人的这种传统也表现在描写现代日本战争的电影中。美国人在看过这些电影后会说，这是他们所看到的最好的反战宣传片。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因为自始至终这些电影讲的都是牺牲与苦难，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以及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在电影中是不会出现的。不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中国事变的





影片，都是一副格调：行进在泥泞中的军队，凄惨的苦战和胜负未决的煎熬等等。在银幕上，你不会看到胜利的镜头，甚至连士兵们高喊“万岁”的冲锋也找不到；看到的是深陷泥泞的场景，是夜宿中国小镇的场面，是描写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而幸存者的代表，他们已经变成残废、瘸子或是盲人。再看到的是士兵死后，家人聚集在一起悲悼丈夫或父亲的场面，他们失去了维持生计的人，却仍然要鼓起勇气活下去。我们在日本电影中看不到英美骑兵动人的场景，也很少能看到描述伤残军人恢复健康的事例，电影中甚至连战争的目的都不会涉及。对日本观众而言，只要银幕上的角色无时无刻不在尽全力报恩，就已经足够了。因此，这些电影其实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工具。制作电影的人知道，这些电影不会激起日本观众的和平反战情绪。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共同构成了日本人的人生。每个世界独特而复杂的规则构筑了他们的道德困境。

日本人的人生观体现在他们对于忠、孝、情义、仁、人情等德行的规定中。他们认为这些德行如同地图上划分的势力范围，义务的整体也分成若干领域。用他们的话讲，“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共同构成了人生。各个世界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而详细的规则。一个人不可能把他归于一个完整的人格，只能说他“不懂孝”或“不懂情义”等。他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笼统地评价一个人，他们仅能明确指出某人在某个领域中的不当行为。他们不使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你违反了哪个特定领域的规则。一个得到赞许的行动总是和其所表现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一个人“为了孝”而行动时是一种方式，而“为了情义”或者“在仁的世界”行动时，就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了。各个世界的准则也会随着内在情况的变化而可能采取很不相同的行动。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之前，对主君的“情义”要求家臣尽最大的忠诚；但当家臣遭到主君侮辱后，家臣就可以背叛主君 。1945年8月之前，“忠”要求日本国民和敌人顽抗作战到底，直至剩下最后的一兵一卒。当天皇广播宣布投降时，对“忠”的要求就改变了，日本人一下子就对外来者表现出了合作的态度。

西方人很难理解这一点。按照他们的经验，人是按照其本性采取行动的。他们根据老实或不老实，合作或固执的标准来区分绵羊与山羊。他们对人进行分类后，就期望其能够始终如一地行动。他



“忠”的含义　歌川广重 出自《江户名胜百景》1856—1858年

一飞冲天的焰火在萎谢凋落之时，闪化成熠熠生辉的繁星，照亮了整个江面，如同日本人赋予“忠”的含义：与敌人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让人生如焰火，宁要短暂的绚烂，不要暗淡的平凡。

们认为人应该不是慷慨，就是吝啬；不是主动合作，就是疑虑重重；不是保守主义者就是自由主义者，两者必有其一。他们期望每个人既然信仰一种特定的政治思想，就应该反对与其相反的思想意识。按照我们在欧洲战场上的经验，那里有合作派和抵抗派，但我们并不相信合作派在胜利后会改变立场。而且，这是一种正确的估计。在美国国内战争中，我们也承认，有新政派与反新政派。而且我们推断，这两派在出现了新局势时也仍然会按其本性采取行动。如果某一个人改变了立场，诸如非教徒转变为天主教徒，激进派成为保守主义者等等，这种转变更确切地说应该更名为“转向”，并应建立起与之适应的新人格。

西方人这种对于行为完整性的信念未必都可以得到证实，这绝对不是幻觉。



江户的歌舞伎剧场　歌川丰岛　18世纪70年代初期

这张浮世绘再现了在江户歌舞伎极盛期剧场宏大华丽的规模。男扮女装的主角正从花道上缓缓走过。除了花道，在观众坐席之间，还有几条被架高的窄小过道，侍者走在上面为观众端茶倒水，提供所需。人生在日本人的眼中就是这样一台戏，在这场戏中，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种行动方针，相互之间要求彼此酌量均衡，每个世界和行动方针本身都是善的。这不是善恶斗争的舞台，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遵循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向善。

不论是原始的文化，还是开放的文化，大多数文化中，人们都把自己描绘成为某一特定种类的人。如果追逐权力，他们就会把别人对他意志的服从程度作为衡量成败的尺度。如果他想得到爱戴，他就应该和人接触，否则就会遭受挫折。他们把自己想象为严肃正直的人，或者是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或者是优秀的家庭成员等。他们自己的性格一般都带有某种风格(Gestalt)，能为人类的生存带来秩序。

日本人在从一种行为向另一种行为转变时，他们不会有心理上的苦痛。西方人是难以相信这种能力的。我们从未体验过如此地走极端。但是，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在我们看来的矛盾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中，好比在我们的人生观中

扎根一样。在西方人看来，恶的世界是不包括在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中的。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不承认坏行为的存在，而是他们并不认为人生是善与恶争斗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成是一台戏，在这场戏中，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种行动方针，相互之间要求彼此酌量均衡，每个世界和行动方针本身都是善的。倘若每个人都可以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就都是善良的。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道德格言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验证的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说，那种包罗一切的伦理戒律是日本人所完全不需要的。借用前面已引用的桑塞姆爵士的话讲，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根据他们的看法，不从宇宙的高度，也可以恰当地说明坏行为。每个人的心灵原本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像一把新刀，如果不经常磨练，刀就会生锈。但这是种自身的锈，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刀上的锈不是什么好东西，人必须像磨刀那样关注对本性的磨砺。即使是生了锈，心灵仍会在锈的下边发光，只要略加研磨，就可以脱锈生辉。

因为日本人的这种人生观，西方人就很难读懂日本的民间神话、小说和戏剧，除非我们为了符合我们对性格一贯及善恶相斗的要求，对它们进行改写。日本人对民间神话、小说和戏剧的评论围绕的总是主人公陷入“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主人公的失败源于溺于人情而忽视了“情义”的义务，或者是忠孝不能两全。他迫于“情义”而不能履行正义，迫于情义而被迫牺牲家庭等。这些都是具有约束力的两种义务之间的矛盾。两种义务双方都是“善”的，主人公对两者的选择就像债务者该还债时面对着多如牛毛的债务，他必须在先偿还哪些债务而暂时不还哪些债务之间作出选择，虽然他还清一笔债务，并不能免除另一种债务。

日本人对故事主人公的这种看法和西方人是完全对立的。在我们看来，故事中的主人公之所以是好人，是因为他选择了善的方面，并且与恶的一方展开了斗争，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有德者胜。



菊与刀

歌舞伎演员尾上松助

歌川丰国　约1799年

"恶"不会存在于日本人的世界里，他们把人生当做一场戏，每个进入戏中的人，都是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尽责。只要他遵循本能，那么一切皆善。可是，不管如何的斟酌，在人情的面前，他们还是不免陷入各种情义的困境中，所以那种被西方人称的"矛盾"才会如此的错综复杂。日本的戏剧再现了他们戏一样的人生，表演时灵动的神态，抉择时痛苦的表情，把日本人复杂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故事必须有个圆满的结局，善者要得到善报。日本人却喜欢这样的主角：他既不能拖欠社会的恩情，又不能有悖于名分，因为两者无法调和而只能一死了之。在很多其他的文化中，这类故事让人们屈服残酷的命运，但在日本这类故事却成为启迪主动精神和坚忍意志的题材。主人公在尽力完成其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视其他的义务，最终他又和所忽视的世界完成了清算。

《四十七士物语》是日本真正的民族叙事诗。虽然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并不高，但却异常强烈地扣动了日本人的心弦。每个日本儿童对这个故事都熟悉，不仅了解梗概，而且对细节也很熟悉。人们将它不断传播、翻印并拍成电影使之广泛流传。长期以来，四十七士的墓地是著名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致祭，留下的名片把墓地周围变成一片白色的海洋。

《四十七士》是以对主君的"情义"为核心主题的叙事诗。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描述了"情义"与"忠"、"情义"与"正义"的矛盾（在这类冲突中，当然是"信义"占胜）以及"单纯情义"与无限"情义"间的冲突。故事发生在封建制度鼎盛时期的1703年，根据近代日本人的想象，当时的男儿都是大丈夫，对"情义"绝不含糊，四十七位勇士为"情义"而牺牲包括名声、父亲、妻子、妹妹和正义（"義"）的一切，他们最终以自杀来殉"忠"。

当时，各地大名要定期拜见幕府将军。幕府任命两位大名主持仪式，浅野侯是其中的一位。这两位司仪官都是地方的大名，由于对仪式不熟悉，不得不请教在幕府中枢任职的身份很高的大名吉良侯。大石是浅野侯家最有才智的家臣，如果他在主君身边，是会协助主君进行周密安排的，但当时他刚巧返回故乡，而浅野又不谙世故，没有给那位在幕府中枢任职的大名赠送厚礼。另一位大名的家臣很通晓人情世故，在向吉良请教时以重金作为赠礼。于是，吉良侯就不屑于指教浅野，故意让他在举行仪式时穿完全违反仪式的服装。仪式举行时，浅野侯完全按照吉良指示穿戴服装，当他发现自己受到侮辱后，就拔出刀，砍伤了吉良的前额，后来众人把他拉开。从“对名分的情义”来说，浅野侯因受辱而报复吉良，

拜访幕府将军的路上

歌川广重　出自《木曾海道六十九次》　约1834－1842年

在幕府统治时期，各地大名都要遵守对幕府的情义，每隔一定时间拜访幕府将军，表现对幕府的效忠。傍晚时分，大名仍和他的仆人匆匆地赶路，为了缓解一下疲劳，主人向路过的人借火吸烟，仆人也在路边的火堆上点燃自己的烟，休息完后，又是匆忙地赶路。





这是一种德行；不过，在将军殿上拔刀动武就属于不“忠”了。浅野侯正当地履行了“对名分的情义”，但按照规定又必须切腹自杀，否则就是不“忠”。回到宅邸后，他换上衣服，作好了切腹准备，就等那最有才智和最忠诚的家臣大石的归来。见面后，两人久久地定睛凝视告别，浅野侯早摆好姿势端坐着，之后就拿起刀刺腹了，他亲手了结了自己的性命。他死后，由于他对幕府的不忠而受到众人的谴责，所以没有一位亲属愿意继承这位已故主君的家业。幕府没收了浅野的封地，家臣也变成了无主的浪人。

浪人

日本浪人亦称大陆浪人、国士、大男人、义盗、任侠、“英雄”，是近代日本特有的历史现象，是日本近现代社会中十分复杂又具有一定势力的社会阶层，他们是因战乱而离开主君（大名），失去户籍的武士。

浅野家的家臣出于“情义”的义务本应跟随其主君一起切腹自杀。主君切腹是为了“名分的情义”。如果他们也从对主君的“情义”的义务出发而切腹，那当然是在抗议吉良所受到的侮辱。然而，大石却在心中暗想，切腹不足以表示他们的情义，应该在完成主君未完的事业之后再去自杀。由于被其他家臣拉开，主君没有能够复仇，他们应该杀死吉良而替主君复仇。不过，这样做定会造成对幕府的不忠。幕府绝不可能批准浪人向吉良复仇。照一般的惯例，策划报仇的人要事先呈报计划，规定行动的日期，若在期限以前不能完成报仇计划，就不得不放弃计划了。这项制度曾使若干人幸运地调和了“忠”与“情义”的矛盾。大石明白，对他和他的同伙来说，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所以，他召集那些曾是浅野家臣的浪人，只字不提杀害吉良的计划。这些浪人超过了300人，按照1940年日本学校的课本说，他们都同意切腹自杀。然而大石明白，这些人并不都是有无限的“情义”

的即日语中所谓“讲情义及真诚”的人，不是都能信赖而且可以托付对吉良实施报复这种危险大事的人。为了区别只讲“单纯情义”和兼有“信义和真诚”的人，大石问大家，主君的财产应当如何分配。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一种测验，如果他们的家属有利益可以获得，那么这些人就不会不同意自杀。对主君财产的分配在浪人中掀起了激烈的争议。家老是家臣中俸禄最高的，以他为首的一派主张按俸禄高低来分配财产。大石一派则主张进行平均分配。这就很快弄清楚了哪些浪人只有“单纯情义”，大石立即赞成了家老的分配方案，并同意那些获胜的家臣可以离开同伙。家老于是就离开了，他因此获得“武士中的败类”、“不懂情义的人”、无赖等种种恶名。这时，大石看清了，只有四十七个人的情义是坚定，这已经足以共谋复仇的计划了。大石和这四十七个人订立了盟约，保证无论信义、爱情、或义务，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们履行誓言。“情义”必须是他们的最高准则。于

没落的武士

幕府时期，领主们争权夺利，有些领主就在斗争中逐渐没落，依附他的武士们也没有了依靠，不再处于社会的最高阶层，而沦为无主的浪人。



是，四十七士歃血为盟。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麻痹吉良，让他失去警惕。他们各自散开，装作失去追求名誉之心。大石经常流连于低级妓院，打架争吵，根本不顾及体面，并假借这种放荡生活和妻子离婚，为了确保妻儿不会受最后行动的牵连。大石的妻子哭哭啼啼地和他离婚了，他的儿子也成了浪人。

东京（在当时称为“江户”）城里的人都猜测他们是要复仇。尊敬浪人的人都深信他们一定会策谋杀死吉良。但是，四十七士却矢口否认有任何类似的企图。他们佯装成“不懂情义”的人。对他们的可耻行径，他们的岳父们都感到十分愤慨，取消了和他们的婚约后把他们赶出家门。他们受到朋友的讽刺。有一天，大石喝得酩酊大醉，正和女人胡闹时，被一位亲密的朋友撞见了。大石对这位亲密朋友也否认自己对主君的“情义”。他说：“什么？报仇？真是愚蠢之至。人生应该纵情享乐，还有比饮酒取乐更好的事吗？”他的朋友不相信大石会变成这样，就把大石的刀从刀鞘中抽出来看，本以为刀刃一定会闪闪发亮，这就足可以证明大石讲的并不是实话。但是，刀已经生锈了。于是朋友相信大石说的话是真的了，他便在大街上公开踢了大石，并向醉醺醺的大石吐了唾沫。

为了筹集参加复仇的资金，一位浪人竟把自己的妻子卖到妓院做妓女。这位妻子的兄长也是浪人中的一员，得知妹妹知道了复仇的秘密后，竟然想用刀杀死妹妹以表示自己的忠诚，从而让大石批准自己也参加复仇的行动。还有一位浪人杀死了岳父。另一位浪人送自己的妹妹到吉良侯家去当女仆兼侍妾，以便从内部通报消息，确定动手的时间。她在复仇任务完成之后必须自杀，因为，虽然是假装侍候吉良，她也必须用死来洗刷这一污点。

12月24日雪夜，吉良大摆宴席，警卫的武士喝得酩酊大醉。浪人们借机袭击了防守坚固的吉良府，杀死了警卫，他们直接冲进吉良侯的卧室。但没有发现吉良，卧室中被褥还有余温。浪人们知道



雪夜

雪夜，浪人们悄悄地乘船来到仇敌的府邸，他们已准备好攀屋用的长梯和行刺用的利剑，决定在这个夜晚为主君复仇。

他还藏在府内。终于，他们发现有一个人蜷缩在堆放木炭的小屋里。一个浪人隔着小屋的墙壁把长矛刺进去，拔出来时矛尖上竟然没有血。长矛确实刺中了吉良，但在拔出时，吉良竟然用衣袖拭去了血迹。他这种小动作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浪士们把他拽出来。他说自己只是家老，不是吉良。此时，四十七士中的一个人想起吉良曾在殿堂上被砍伤，所以肯定会有伤疤留下。根据伤疤，浪人们断定他就是吉良，他们要求他当场切腹。他拒绝了，这证明了他是一个怕死鬼。于是，浪人们用自己

主君浅野侯切腹时所用的刀，砍下了吉良的头，终于实现了夙愿。浪人们带着两度染血的刀和割下的首级，列队向浅野的墓地走去。

整个东京城被浪人们的行动震撼了。曾经怀疑过浪人们的家属及岳父们争先恐后地前来拥抱他们，向他们表示自己的敬意。他们沿途受到了大藩诸侯们的热情款待。来到墓前，他们不仅供奉了首级和刀，还读了奉告亡君的祷文。祷文至今仍被保存着，大意是这样的：

四十七士谨拜于主君灵前（中略）。主君复仇事业未完之前，实无颜面为主君扫墓。心神焦躁，一日如三秋……今供上吉良首级。此短刀乃主君去岁时所珍用，嘱吾等保管。愿主君执此刀再击怨敌首级，永雪遗恨。谨祷。

他们报答了“情义”，但他们还要尽“忠”，唯有一死才能两全。他们违犯了未预先呈报复仇计划的国法，但是他们并没有背叛“忠”。他们必须执行所有以“忠”的名义的要求。幕府命令他们切腹。小学五年级的日语读本是这样描述的：

他们意志坚定地为主君报了仇，应该为永世垂范……于是，经过再三斟酌，幕府命令他们切腹，此乃一举两全之策。

也就是说，浪人们亲手了结了自己的生命，从而对“情义”和“义务”都作出了最高回报。

这首国民叙事诗因版本的不同，文字和情节略有差异。现代电影中，把故事开始时的贿赂情节改成了色情。吉良追逐浅野的妻子，因为对浅野妻子心怀不轨，才故意使浅野犯下错误而受到侮辱。而且，现代电影把关于“情义”的一切义务描绘得更加深刻：浪人们为了情义抛妻弃子弑父。

“义务”和“情义”产生冲突的题材也是其他很多故事和电影

矛盾的武士

按照"信义"，武士不能违抗主君的命令。"忠"的原则又不允许他刺杀将军。武士陷入了"情义"与"忠"的矛盾里。

競勢酔虎傳

午之助

道路よ天草洋の詩吟じ・酒店よ
天下の形勢を談ト・匹夫よ勇を
憑く報國有志と誇る浮浪士・都下ふ横行せ
折ふし不斗出會議論の
後ずるゞき刃の稲妻よ
二名の悪徒疵切害せし・
其番名を聞えし
松田の樓上ふ
高く聞えし

轉々堂主人
筆記

乱法ノ狼人ニ
終ニ個井ノ巡猟
ニ斃ル

土橋政田屋板
彫工留吉

大蘇芳

的主题。其中最优秀的一部历史电影就取材于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这位将军继位时，由于年纪尚轻，没有什么经验。那时，幕臣们把将军的继位人选分为两派，一派自然要被挫败。幕臣们想拥立与其年纪相仿的近亲。对立派中的一位大名，一直对失败之辱念念不忘，虽然第三代将军长成后颇有政治才干。这位大名一直伺机谋杀将军。一天，将军及其亲信通知大名，将军要准备巡视几个藩国。这位大名要接待将军一行人马。大名企图借这个机会雪除宿怨，实现“对名分的情义”。他设法将自己的宅邸变成堡垒，堵塞所有出口，层层封锁；策划制造墙倒屋塌的场面，想要压死将军和他的随从。他的阴谋在冠冕堂皇的伪装下进行着，他用丰盛的宴席来接待将军。为了给将军助兴，他还叫一位家臣舞剑，命令他在高潮时刺杀将军。按照“信义”，这位武士不能违抗主君的命令。“忠”的原则又不允许他刺杀将军。屏幕上，武士的舞剑姿势充分展示了他内心的矛盾：他必须下手，又不能下手；他即将行刺，但又不能行刺。他尽管有“情义”，但“忠”的威力也在发挥作用。慢慢地，他的舞姿凌乱了，这让将军一群人产生了疑虑，他们突然离开了坐席。这时，铤而走险的大名下令毁坏房屋，刚刚躲过舞者的剑的将军此时却又要面临墙倒屋塌的危险。千钧一发之际，舞剑者上前带领将军一伙人通过地道安全地脱离了危险。“忠”最终战胜了“情义”。将军的代理人向舞剑者致谢，再三劝他到东京（江户）去接受荣誉。那位武士回头看着即将倒塌的房屋说：“不可以，我要留在这儿。这是我的义务和信义。”他离开将军等人，纵身跳到废墟中死去。他通过死兼顾了忠和情义，达到了两者的统一。

古代故事没有把“义务”与“人情”的冲突作为中心内容，但在近代却变成了一个主要题材。近代小说中描写的多是主人公为了“义务”和“情义”而不得不抛弃爱情和人情，这类题材被大肆渲染，如同日本的战争影片很容易让西方人把它看做是绝妙的反战宣传一样。小说试图让我们认为，日本人追求的是一种按照自己意志



强者定义　　摄影　日本　20世纪中期

日本人认为，所谓的强者，恰恰是为了履行义务而抛弃个人幸福的人，如同这些离开前线奔赴战场的士兵们。他们刚刚入伍，在老兵的护送下，正穿过欢呼的人群走向秩父这座山中小镇的火车站。

生活的自由。这些小说似乎在证明，上述冲动确实存在。但当日本人对小说或电影的情节展开议论时，他们的看法通常和我们不同。我们是因为主人公有爱情或者抱有某种个人理想而同情他，但日本人却因此而批评主人公是弱者，他们觉得他太重感情而没能履行“义务”或“情义”。西方人大都认为，强者就是要反对陈规旧习并克服一切障碍去追求幸福。而日本人却认为，所谓的强者，恰恰是为了履行义务而抛弃个人幸福的人。在他们看来，性格的坚强表现的不是反抗，是和谐。所以，西方人在看了日本小说或电影后，所肯定的意义是与日本人所肯定的意义不相同的。

在对自己或周围熟人的生活进行评论时，日本人也采用了同样的标准。在他们看来，个人欲望与义务准则发生冲突时，如果迷恋前者，就是弱者。他们是用这样的标准来评判一切事情的。其中，最与西方伦理相悖的莫过于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妻子在“孝的世界”中只处于边缘地位，父母才是世界的中心。一个道德

品质优秀的人必须遵从“孝”道，如果母亲让他与妻子离婚，他只能同意。即使他爱自己的妻子或两人已经生了孩子，他也不得不离婚，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人更坚强。日本人有句话说：“孝道有时要求把妻子视为路人。”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对待妻子的义务只不过是属于“仁的世界”。最糟糕的则是妻子没有提任何要求的权利。在日本，即使婚姻生活很美满，在义务的世界中，妻子也不能处于中心地位。所以，一个人不能把他和妻子的关系提高到同双亲及祖国的感情的高度。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曾在公众面前说，他回到日本后感到非常高兴，理由之一就是与妻子重逢了，为此他受到了世人的批评。人们认为，他看到了父母和富士山，以及能为日本的国家使命献身，这些才应该是他高兴的。与妻子相逢不应该属于这个层次。



近代以来，舆论界总在强调道德准则的不同层次与不同范围的区别，对此，日本表示不满。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日本的教育致力于把“忠”变成最高道德准则。正如日本政治家把天皇置于顶点，排除将军及封建诸侯，以此来简化等级制一样。在道德领域，他们努力把较低层次的德行全部归于“忠”的范畴下，来



道德的“拱心石”　　摄影　日本　现代

一座拱桥的最核心部分是它的拱心石，它是主要力量支柱。而在日本复杂的道德体系中，“忠”是道德拱桥上的拱心石，人们实现了“忠”就完成了其他所有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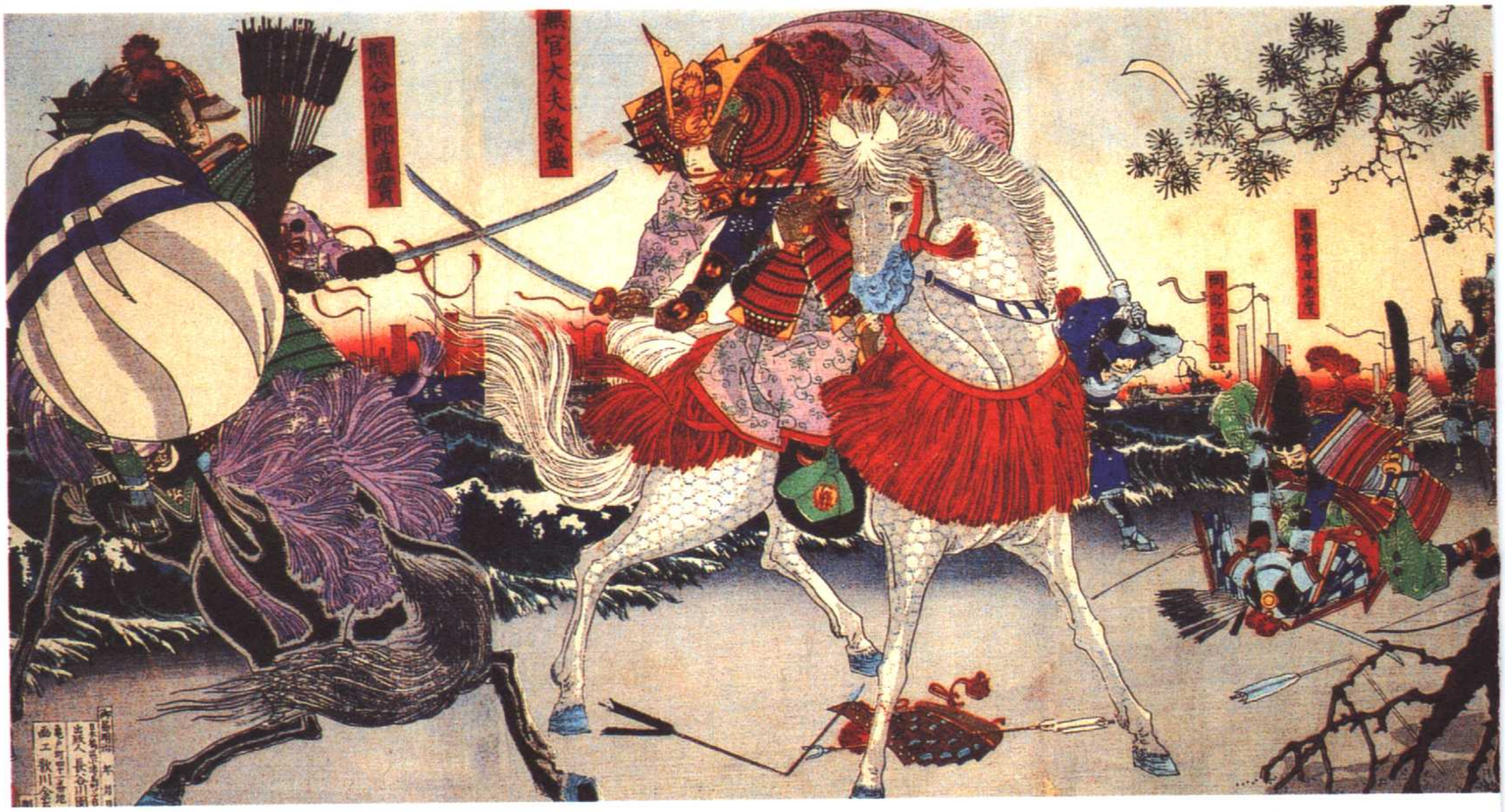


真正的大勇

锋利的箭如暴雨般细密，而作战的战士却丝毫不畏惧，心中默想着要为天皇尽忠，举起武器向敌人冲去。

对义务体系进行简化。通过这种途径，他们希望把全国统一在崇拜的天皇之下，减少日本道德体系多层次的分散状态。他们试图教导人们，实现了“忠”也就完成了其他的所有义务。他们想把“忠”变成道德拱桥上的拱心石。

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是这种设想最好的宣言。这份敕谕连同《教育敕语》是日本真正的圣典。在日本，任何宗教都不拥有圣典，神道也如此。日本的佛教各派从不把文字表达的东西视为教义，常常用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妙法莲华经”之类来代替经典。而明治天皇的敦谕和敕语却是真正的圣典，要神圣而庄严地宣读它，听众要毕恭毕敬的，现场要鸦雀无声的，犹如对待摩西十诫和旧约五书那样来表达对它的尊敬。每当人们捧读时，要恭恭敬



忠与情义

整个敕谕表明，官方在尽力抬高“忠”而贬低“情义”。它强调存在“大节”、“小节”之分。所谓“大节”，就是“忠”；而“小节”，就是徒守私情之义。敕谕在尽力论证，“大节”是一切道德的准绳。而在这样的教导下，日本往往会陷入“忠”与“情义”的斗争中。

敬地从安放处取出，待听众散去后再恭恭敬敬将它送入原处。如果负责捧读的人念错了一句，他就要因此自杀。军人敕谕主要是颁赐给服役军人的。军人要逐字背诵，并且每天早晨要默想十分钟。遇到重要的祭祀日，新兵入伍之时，以及期满复员和其他类似的场合，都要在军人面前隆重地宣读。《军人敕谕》也是中学和青年学校的学生们学习的材料。

《军人敕谕》是一份长达数页、纲目分明、用词谨严的文件。但西方人读起来却十分费解，似乎其含义彼此矛盾。它将善与德标榜为真正的目标，这一点西方人可以理解。敕谕告诫听众，不要重蹈古代那些死得并不光彩的英雄们的覆辙，这是因为他们“罔知公道之理，徒守私情之义”。（Losing sight of the true path of public duty，They kept faith in private relations）这是日本官方的正式译文，虽然不是逐字翻译的，但却忠诚地表达了原意。《敕谕》继续提到：“此类事例，汝等宜深戒之。”

如果不了解日本人的各种义务有各自不同的范围，也就不会知道这里所说

的："戒之"的含义了。整个敕谕表明，官方在尽力抬高"忠"而贬低"情义"。日本人通常意义上的"情义"这个词在敕谕的全文中一次也未提到。它绝口不提"情义"，却强调存在"大节"、"小节"之分。所谓"大节"，就是"忠"；而"小节"，就是徒守私情之义。敕谕在尽力论证，"大节"是一切道德的准绳。而所谓"义"，就是对"义务"的履行。尽"忠"的军人必然有真正的大勇。这里所谓的"真正的大勇"就是指日常待人必以温和为先，旨在得人敬爱。敕谕暗示着，只要遵守这些教导，人们就不必求助于"情义"了。"小节"是"义务"以外的诺言，必须经过谨慎的考虑才可以承担。敕谕说道：

"如欲守诺言（在私人关系上）而（又）欲尽义务（此段译文是本尼迪克特引自敕瑜的官方英译本。英文是'If you wish to keep your word and to fufill your gimn'。——译者注）……则自始即应该重考虑能否可行。如以己身束缚于不智之义务，则将使自身处于进退维谷。如确信不能既守诺言又坚持义（敕谕把'义'规定为'履行义务'），则应该立即放弃（私人的）诺言。古来之英雄豪杰，惨遭不幸，或竟身死名裂，而遗羞于后世，其例益不鲜矣，皆因唯知信守小节而不辨大义，或因阁知公道之理而徒守私情之义也。"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段谆谆教导"忠"比"情义"地位更高的文字中，对"情义"一词只字未提。不过，日本人都知道这样的说法，即为了情义，我不能行义。在敕谕中，却把它改为这样了："如确信不能既遵守诺言，而又坚持义……"敕谕以天皇的权威说：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抛弃"情义"了。要牢记：情义只是小节，只要我们按照敕论的教导，抛弃"情义"而维护"大节"，仍然是一个有德之人。

这份颂扬"忠"的圣典是日本的基本文件之一，但这还很难说"情义"的深刻影响是否因敕谕的委婉贬抑而遭到削弱。在解释、辩护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时，日本人常常引用敕谕的段落文字。如"义者，履行义务之谓也"，"心诚则万事皆成"等等。尽管对这些的引

用每每都很恰当，但关于反对信守私人诺言的告诫却很少被引用。至今，在日本人的道德观中，“情义”仍是一种颇有权威性的道德。在日本，“此人不懂情义”仍然是最严厉的批评。

不是引进一个“大节”的概念就可以轻易简化日本的伦理体系的。就像他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对日本人来说，没有一种现成的、普遍适用的道德来作为善行的试金石。大多数文化中，一个人的道德水准是以善良、节俭以及事业上的成就等标准来衡量的。人们总要把某些人生目标作为追求的对象，如幸福、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自由、社会活动能力等。在日本却有着更为特殊的准则，无论是封建时代还是《军人敕谕》中谈及“大节”，都只意味着对等级制上层者的义务要压倒对下层者的义务。这依旧是特殊主义。西方人一般认为“大节”，不是对某一特定个人和目标的忠诚，而是对忠诚的忠诚，日本人则不是如此。

“诚”是近代日本人试图建立某种统治一切领域的道德标准。正如大隈伯爵在论及日本的伦理时所说，“诚（まこと）”是日本各种箴言中最重要的箴言，它包含着一切道德教训的基础。在我国古代语汇中，只有“诚”是表达伦理概念的词汇。在本世纪初，讴歌西方个人主义新思潮时，日本的近代小说家也开始不满西方信条，努力赞美诚（诚心）是唯一真正的“主义”。

《军人敕谕》支持在道德方面强调“诚”。敕谕中有一段历史性前言，相当于美国文件中以华盛顿、杰斐逊等建国之父所作宣言的序。在日本，阐述“恩”和“忠”成为这段话的主旨。“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领。朕能否保护国家以报上天之恩，报祖宗之恩，端赖汝等克尽其职。”

接着敕谕又阐述了五条训诫。（一）最高德是履行“忠”的义务。不论一个军人多么有才能，如果不“忠”，他也只是傀儡。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不“忠”的军队就是乌合之众。“故不可惑于横议，不可干预政治，务求保持忠节，牢记义重于山，死轻于鸿毛”。（二）遵守

礼仪要按军阶。“下级应视上级军官之命令如朕意，上级军官对下级也需善待。”（三）真正的武勇与血气方刚相反，应该是不侮小敌，不惧强敌。“故尚武之人，与人交往应以温和为先，以资受人敬爱”。（四）人们应“勿守私情信义”。（五）人们应该节俭。“大凡不以质朴为旨者，必流于文弱，趋于轻薄，崇尚骄奢，终致卑鄙自私，堕落之极。虽有节操、武勇，亦难免为世人唾弃……朕心忧此恶习，故谆谆诫之。”

敕谕的最后一段提到：“天地之公道，人伦之纲常”，乃“我军人之精神”。上述五条训诫的核心精神就是“诚”。“心不诚则嘉言善行徒为文饰，丝毫无效用；万事唯有心诚可成”。五条训诫就是这样易守易行。敕谕列举了一切德行和义务，将这些都归为“诚”，这正是典型的日本特色。中国人认为道德都是出自仁爱之心。日本人却并非如此，他们先确立义务的准则，然后再要求人们为履行义务而倾注全部心思和精力。

“诚”在佛教主要教派的禅宗教义中也具有同等的意义。铃木大拙论禅的专著中有一段禅宗师徒的问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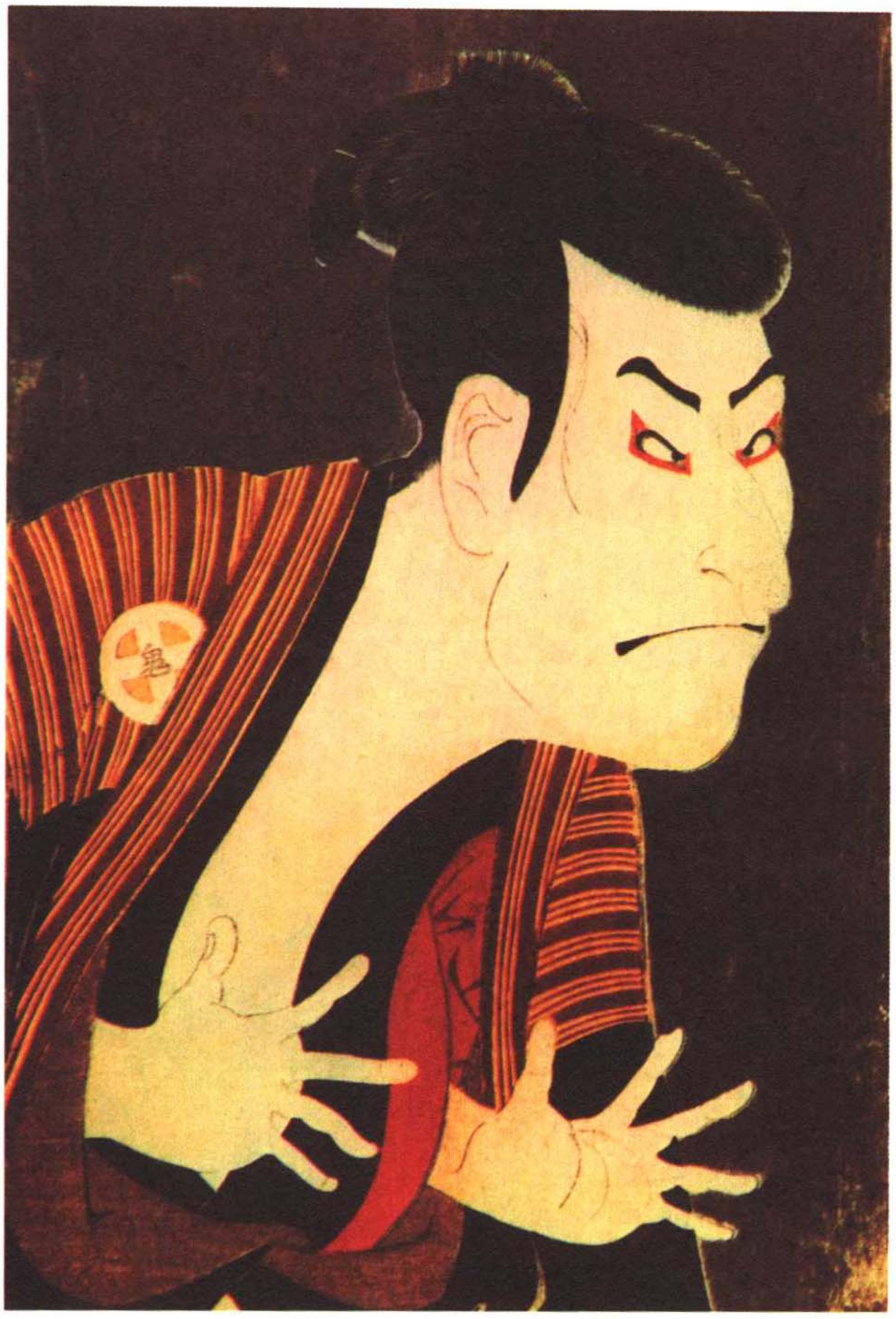
僧问：“吾视猛狮袭敌，不问其为兔为象，皆全力以赴，请问此力何物？”

师答：“‘至诚之力是也’（字面意义就是‘不欺之力’）。至诚即不欺，亦即‘献出一切’。禅语谓之‘全体作用’，即不留一物，毫无矫饰，绝不虚费。如此生活者可谓金毛狮，乃刚勇、至诚、至纯之象征，神之入也。”



敕喻的五条训诫

这是军人必须恪守的五条训诫：（一）最高德是履行“忠”的义务。（二）遵守礼仪要按军阶。（三）真正的武勇与血气方刚相反，应该是不侮小敌，不惧强敌。（四）人们应“勿守私情信义”。（五）人们应该节俭。



第二代大谷鬼次之奴·江户兵卫　　东洲斋写乐 1794 年

画中这位演员名叫第二代大谷鬼次之奴，江户兵卫则是角色的名字。在剧中，他是一个假扮好人，借机行窃的恶棍，写乐表现的正是江户兵卫面对被窃者向其拔剑自卫时的惊愕神情，然而这种惊愕却是由嘴角的紧闭和张开的两手表现出来的，可以看出日本人不喜欢直接表露情感的习惯。

前面我已经提及到“诚”的特殊含义了。比较日文“まこと”（诚）与英语“sincerity”的“诚”，前者内涵既广泛又狭窄。起先，西方人会觉得它的内涵较西方语言中的用法少，不像日本人经常挂在嘴边上说某人没有诚意，这仅是指与那个人的意见不一致。当日本人评论一个人“诚实”的时候，并不一定是指他采取行动的时候会真诚地从本人的爱憎、决断或怀疑出发。在表示赞许时，美国人常说“He was sincerely glad to see me”（他见到我心里真高兴）或“He was sincerely pleased”（他衷心满意），日本人却没有这种说法，他们用各种习惯性的语言来表示不赞成这种坦诚（sincerity）。他们如此嘲笑地说：“看那只青蛙，口一张开就亮出肚子里的黛色”，“这就好比是石榴，口一张开就知道它心里有什么”。暴露感情是一种羞耻，因为这样会暴露自己。美国人非常重视与“sincerity”一词有关的一系列词的含义，而日本人则不同。前文中提到，一位日本少年批评美国传教士

insincerity时，他绝对没有想到那位美国人会对他这样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孩子要到美国去的计划感到吃惊，怀疑其真实性。近10年来，日本政治家经常批评美英两国没有诚意，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西方各国是否真的是按自己真实的感受采取行动的。他们并不指责美英两国说他们是伪善者，因为，伪善只是轻微的责难。同样的道理，《军人敕谕》说："诚乃诸项训诫之精神"，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是说，"至德"对于一切其他德行的实践都是出自真心实意的，都是言行一致并发自内心的。的确，它并没有教导人们必须要真实，无论自己的信念与别人的是多么地不同。

"诚"在日本有其自身的积极含义，并且，由于日本人非常重视这个词的伦理作用，因此，西方人必须把握住日本人使用这个词时的含义。"诚"的基本含义在《四十七士物语》中有充分的例示。在这个故事中，"诚"是被附加于"情义"之上的。"真诚的情义"与"单纯的情义"有所区别，前者是指足资永恒垂范的情义。日本人至今仍说："是诚使它保持下去"。因此，根据文意来看，这句话中的"它"是指日本道德中的任何戒律或日本精神所要求的任何态度。

战争期间，日本人隔离收容所时对这个词的用法与《四十七士物语》的用法完全相同。它清楚地表明，"诚"的逻辑可以延伸到何种程度，其含义又是怎样地与美国的含义相反。亲日的"一世"（即在日本出生却移居到美国的人）对亲美的"二世"（指生在美国的第二代日本移民）的一般批评是说"二世"缺乏"诚"。"一世"说这话是指"二世"缺乏那种保持日本精神的心理素质。"一世"的这种指责不是说他们孩子的亲美态度是伪善的。与此相反，当"二世"志愿加入美国军队并且发自内心热诚地支持其第二个祖国时，"一世"却更加理直气壮地指责"二世"不真诚。

日本人所使用的"诚"这个词，其基本含义是忠心地遵循日本道德戒律和日本精神所指示的人生道路。不管在何种特定词句中"诚"这个词有多少特殊含义，一般均可理解为是对公认的日本精

神中的某个侧面或者是对日本道德戒律所指示的标的的颂扬。只要我们承认“诚”这个词不具有美国人所指示的那种含义，那么，它在所有日本文献中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并且非常有用的词。因为它基本上准确无误地与日本人实际强调的各种正面道德相一致。首先，“诚”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赞扬不追逐私利的人。这反映了日本人对恶谋私利的伦理非常厌恶。利润如果不是被断定等级制的自然结果就被断定为剥削的结果。从中渔利的中介人会成为遭人嫌恶的高利贷者。这些人常被指责为不诚实的人。其次，“诚”也经常用来颂扬那些从不感情用事的人。这反映了日本人的自我修养观。如果一个日本人还称得上是诚实，他就绝不会冒险去伤害一个无意寻衅滋事的人。这又反映了日本人的信条，即：不仅要对行为本身而且还要为行为的后果负责。最后，人们只接受诚实的人的领导，只有诚实的人才能有效地运用各种手段，而不会被心理冲突纠缠。这三点以及其他更多的含义都简明地反映了日本人伦理的同质性。同时，这些含义也反映出，只有实践规定的准则才能在日本收到实效，并不致陷入冲突中去。

既然日本人的“诚”具有那么多含义，而且受到了敕谕及大隈伯爵的如此推崇，但“诚”并没有简化日本人的道德体系。它既不是构成日本伦理的基础，又没有被赋予精神。它好像是加在任何数字上的指数，能够扩大该数字的倍数。比如A的二次方（A^2）可以是9的二次方，也可以是159或者b或者x的二次方。“诚”也是如此，它可以提高日本道德戒律中的任何一条。它并不是独立的道德，而是信徒对其教义的狂热。

无论日本人如何努力改进其道德体系，它仍处在多层次的分散状态。道德的原则维持了这个步骤与那个步骤相互之间的平衡，虽然各种行动本身都是善的。他们建立起来的伦理体系就像桥牌一样。优秀的选手是遵守规则并能在规则规定的范围内取胜的。和低劣选手的区别，在于对推理的训练，能够根据竞赛规程并利用足够



日本街头的男孩　　摄影　日本　现代

这是日本街头的男孩们，他们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他们把头发染成别的颜色，故意衣衫不整，表现出颓废、轻佻的样子。这些孩子不再崇尚日本的传统文化，不再以自重、尚礼自持，甚至以现在的造型为美。

的知识来判断其他选手的出牌意味着什么，由此来打出自己的牌。按照我们的话讲，就是根据霍伊尔规则来比赛。竞赛中要考虑到无数细枝末节后，再发出自己的每一张牌。一切可能出现的偶然性都被比赛规则规定了，他们预先确定了记分的方法。这反而和美国人说的内心善意没有关系了。

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那些被用来表达丧失或者获得自尊的词句，对了解人们的人生观都有帮助。在日本，说尊重自己通常是指他本人是一个审慎的选手；在英国则不然，它是指诚意地遵循为人处世的准则，不会谄媚别人，也不撒谎，不作伪证等等。当日本人说自重的时候就是在说自我慎重，其含意是事态中的一切因素都应该仔细考虑，决不可引来别人的讥笑，或者减少成功的机会。尊重自己的含义所指的行为通常与美国相反。当被雇佣者说我必须自重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说坚持自己的权利，也绝不是指要对雇主讲不恰当的话，来避免让自己难堪。自重作为政治术语的时候也一样，“你应该自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身负重任的

人”须要谨慎，不能轻率地大谈危险思想，那样就不自重了。在美国，“自重”是指即使思想很危险，也依然要从自己的观点和良心出发来进行思考。

父母经常挂在嘴上用来训诫青年子女的话是“你应该自重”，即要懂礼貌，不能辜负别人的希望。譬如，女孩子坐着的时候要摆正双腿位置，不能乱动。男孩子要锻炼身体，学着察言观色。现在的举止行为是决定未来的关键。父亲对孩子说：“你的行动不像一个自重的人。”这是在责备孩子行为的不庄重，而不是责备他缺乏勇气或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当农民还不起债时，就对债主说：“我应该自重。”这话并不是责备自己懒怠，也不是要对债权人卑躬屈膝，而是说他本应该对应急之需考虑周全。有社会地位的人说：“我的自尊心要求我这样做。”这并不是说他做事必须坚持正直、廉洁等原则，而是说在处理事情时他必须充分考虑到门第的地位，要掂量一下自己身份的重量。

在谈到自己公司时，实业家说：“我们必须自重。”这就是在说做事必须要一再地慎重。当复仇的人说“自重地复仇”时，意思并不是把炭火堆在敌人的头上；也不是要坚持什么道德准则，而是说必须要计划周密，把一切因素考虑在内，即一定要完全彻底地复仇。日语中，“自重再自重”，是最强烈的语气，意思就是要万分地小心，无限地谨慎，绝不能轻易地下结论。它还意味着，必须对各种方式和手段加以权衡，用力要适度，要刚好达到目的。

上面所讲的所有“自重”的含义都与日本人的人生观相吻合，即认为人生应当是小心谨慎地根据“霍伊尔”规则行动的世界。因为他们为自重做了上面那样的定义，所以不允许拿用心良苦的理由来为失败辩解。一举手、一投足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人们不能不考虑这些后果而采取行动。施加恩惠给人是件好事，但必须估量到接受的人是否会因此感到背上了恩情债，因此也必须要谨慎。可以批评别人，但必须做好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怨恨的准备。尽管传教士是善意的，但那



耻感文化　　吉冈毅　摄影　现代

这是日本在经济衰退时，受到冲击的日立公司的管理者致歉的情景。公司效益下降可以说完全是由整个金融环境造成的，并不是管理者的失职造成，但耻感文化的影响让他们面对巨大的经济损失时，深感到耻辱。

位年轻画家还是指责了传教士对他的嘲笑。传教士没有意识到他在棋盘上走这一步棋的后果是，日本人觉得他的嘲笑是修养不够的表现。

在谨慎和自重之间划等号，这就意味着要仔细观察别人行动中的一切暗示，并强烈地感到别人在对自己发表评论。日本人说：因为社会的存在，所以一个人要自重。如果社会不存在了，也就无须自重了，诸如此类。这些极端的看法说明，自重是源自外部的强制，一点都没有考虑正确行为的内省要求。恰似很多国家的俗话说的那样，这些说法未免有些夸张，因为，日本人像清教徒一样对自己深重的罪孽反应强烈。尽管这样，上述极端的说法仍然表明了日本人重视什么。与其说他们重视的是罪，不如说他们更重视耻。

人类学家在对各种文化进行研究时，把以耻为基调的文化和以罪为基调的文化加以区分是他们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他们把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以此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定义为“罪感文化”。生活在这种社会的人，比如在美国，在做了并非构成犯罪的不要之事后，也会因内疚而产生羞耻感。举例来说，我们有时会因衣着不得体或言辞失误而感到懊恼。在把耻作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人会因为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犯罪的行为而感到懊恼。这种懊恼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不能像罪感那样可以通过忏悔和赎罪而解脱。犯罪的人通过坦白罪行而使内心重负减轻，在世俗的心理疗法中，坦白这种手段已经得到应用，许多宗教团体也都使用，尽管在其他方面这两者很少有共同之处。我们知道，坦白是可以解脱罪行的。可是，在把耻作为主要强制力的社会，即使人们当众认错了，甚至是向神父忏悔了，有些错误也是得不到解脱的。人们反而会感到，只要社会没有发现自己的不良行为，他就不必为此懊恼，坦白忏悔也只能是自寻烦恼。所以，耻感文化中并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连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不存在。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赎罪的仪式。

真正的耻感文化中做善行依靠的是外部的强制力。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是靠在内心反映的罪恶感来做善行的。一个人感到羞耻，是由于他被公开批评、讥笑、排斥。羞耻感是一股强而有效的力量。不过，在有外人在场或者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的时候，羞耻感才会发挥作用。罪恶感并非如此。有的民族对名誉的定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来生活，在那里，即使无人知晓自己的恶行，自己也有罪恶感，并且随着坦白和忏悔，这种罪恶感会得到彻底地解脱。

早年移居美国的清教徒们曾试图将一切道德都置于罪恶感的基础上。所有精神病学者都知道，良心是怎样折磨现代美国人的。可是，现在的美国，羞耻感的分量正在逐渐增加，而罪恶感却不像以前那么敏锐了。这种现象被解释为是道德的松弛。虽然这种解释包藏了许多真理，但我们还是对羞耻感对道德承担的重任不抱有任何期望。伴随

耻辱而出现的强烈的个人恼恨并没有被纳入到我们道德的基本体系中。

日本人却把羞耻感纳入了自己的道德体系。各种善行标志的违背，各种义务的失衡或者偶然性的失误未知，都被划入耻辱之列。他们说，知耻是德行的根本。对耻辱感到敏感就会遵守善行的一切准则。他们有时将“知耻之人”这句话翻译成“有德之人”(Virtuous man)，有时候又翻译为“重名誉的人”(Man of honor)。耻感在日本伦理中的地位相当于“纯洁良心”，“笃信上帝”以及“回避罪恶”在西方伦理中的地位。他们信奉，人一旦死了，就不会遭受惩罚了。除了度过印度经典的僧侣外，日本人对那种今世受到前世功德的轮回报应的观念相当陌生。除了少数信仰基督教的人外，他们并不承认死后报应和天堂地狱的说法。



骑自行车的日本女孩　清木久雄 摄影 现代

这辆自行车十分特别，它的重要部件是由纸折叠而成。骑车的日本女孩穿着毛衣和短裙，露出温文尔雅的笑容。

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如同一切看重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它的意义在于，任何人都非常重视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人们推测别人会作出怎样的判断，并针对这些判断来调整自己的行动。当每一个人按照相同的规则游戏并彼此支援时，日本人会愉快而轻松地加入进来；如果他们觉得这是在履行日本的使命，他们就疯狂地参加。当他们妄图将自己的道德输送到那些不通行日本的善行标志的其他国家时，他们就极易受到攻击。他们“善良”的大东亚使命宣告失败了。中国人和菲律宾人的态度让很多日本人感到愤慨。

一些出于求学或经商的目的来到美国的日本人，他们不再受国家主义的感情驱使，因为美国的道德规律也没有日本那么严格。当他们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时，常常会感到自己过去所接受的那种细致而周到的教育是个失败。他们觉得日本的

道德不可能成功输出，对任何人来说改变文化都是非常困难的。这种看法不是他们想表达的全部，他们想说的远非如此，还有很多很多。相比于他们熟悉的中国人和暹罗人，日本人要适应美国式生活会更困难。在他们眼中，日本人的特殊性在于，他们依靠一个安全感长大。只要一切都按规矩行事，就可以得到被别人承认的微妙意义。当他们看到外国人一点都不在乎这类礼节的时候，就茫然不知所措了。他们设法寻找西方人生活中类似日本人的细微礼节，但是却找不到，有人对此十分愤慨，有人却感到奇怪。

三岛女士的自传《我的狭岛祖国》，成功地描述了她在道德规则不很严格的文化中所得到的体验。她非常希望去美国留学，并说服了其保守家庭，排除不愿受恩的观念接受了美国的奖学金，她顺利地进入卫斯理学院。她说，老师和学生都对她十分亲近，这使她非常不安。她在书中说："日本人的特点是以毫无缺陷的操行而自傲，但我这种自傲却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我以往接受的训练遭到了周围的嘲笑，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该怎样行动。为此我很恼恨。我的心中除了这种模糊而深刻的恼恨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感情了。"她觉得自己似乎是一个来自其他行星的生物，在这个世界上，她原先的感觉和情绪都丧失了功效。日本式的教养，要求我的举止要文静，每一句言辞都要符合礼貌的规则，这使我对当前的环境十分敏感和警觉，甚至在社交中变得茫然不知所措。这种紧张的状态耗费了她两三年的时间才得以解除，之后，她开始接受别人的好意。她认定，美国人是在一种她感到的优美的亲密感中生活，而"我在3岁的时候就把亲密感当做不礼貌的东西给扼杀了"。

三岛女士比较了她



蒙娜丽莎的日式微笑

这是日本文化节用植物拼成的蒙娜丽莎，她神秘的微笑曾让所有人着迷，而此时，她仿佛受到了日本文化的熏陶，微笑是优雅而拘谨的。



现代艺伎

现在的日本已经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他们已经在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有了交流和融洽，如同现代的艺伎，她们已经走出了艺馆，也开始接触最新的时尚文化和高新科技，融入了现代文化。

在美国结识的日本女孩和中国女孩。她评论道，两国姑娘受美国生活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姑娘具有一种沉着风度和社交能力，这是大多数日本姑娘所不具备的。这些中国姑娘出身上流，各个都有近乎皇家的仪表，似乎她们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她们让我觉得她们是世界上最文雅的人。她们即使处在高度机械与高度的文明中也不为所动，其安详和沉着与日本姑娘的怯懦、拘谨形成了强烈的比照，这些揭示了社会背景的根本差异。

如同许多其他日本人一样，三岛女士感到，她来到美国生活就像网球名将参加槌球游戏，其出色技艺派不上用场。她觉得过去所学的东西带不到新环境里来。她以前接受的训练失去了作用。美国人用不着那些。

日本人如果接受了美国那种不繁琐的行为规则，即使是接受得不深，他们也不可能再去过日本那种规矩而苛杂的生活了。有时候，这些人会把过去的生活说成是失去的乐园，有时候又说成是“桎梏”，或者说成是“牢笼”，还有时候会说成是盆栽的小树，这棵植根于花盆的小树是一件艺术品，它能给精致的庭园增添不少雅趣，但一旦把它移植到地上，它就不可能再变成盆栽了。这些人觉得他们再不会成为日本庭园的点缀了，也不会适应以前的要求了。他们最尖锐地指出了日本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日本人把自我修养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一类为“圆熟”。“圆熟”的境界远高于培养能力，目的在于消灭自我监视的“羞耻感”。

在外国观察者眼中，一种文化的自我修养没有任何意义。人们很难理解修身养性的方法。人们为什么要麻烦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吊在钩子上、或者全神贯注于丹田？为什么这样自苦而不花一分钱？为什么只集中训练一项苦行、毫不克制在局外人看来不是很重要而且不必加以训练的某些冲动？尤其是那些在本国从来没有研究过修养的观察家，他们来到这个对修养方法高度重视的国家，非常容易产生误解。

美国的自我修养的方法和传统不是很发达。在美国人看来，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生活中发现了可能达到的目标，就会训练自己以达到实现所选择的目标。他的理想、良心或维伯伦所谓的“职业本能”（an instinct of workmanship）决定了他是否要进行锻炼。他可以为了成为足球运动员而接受严格的纪律；他也可以为了做一名音乐家或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而放弃一切娱乐活动。他的良心让他断绝邪恶和轻率。

在美国，大家是把自我修养作为一项技术来学习和训练的，它不是算术，可以一点都不考虑其在特定事例中的应用。如果说在美国也有人教授这种修行，那一定是欧洲的某些教派领袖或传授印度修炼方法的印度牧师（swamis）。在美国，连基督教的圣特丽萨（Saint Theresa）或圣胡安（Saint John）所传授和实践的默想和祈祷式的宗教修行都几乎绝迹了。

然而，日本人却认为，不管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还是剑术

比赛的参与者，或仅仅是一个贵族，他们除了学习和应付考试等所必需的活动之外，还都要进行自我修养。无论取得多么好的考试成绩，剑术有多高超，也无论如何周到有礼貌，他们都必须放下书籍、竹刀，停止社交活动，来进行特殊的修炼。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接受这种修行的。自我修养的术语和在实践生活中享有的地位，即使是不修行的人也会承认的。有一套相当流行的修行是讲如何进行自我克制，各阶级的日本人在判断自己和他人时经常运用这一修行。


トム・クルーズ

剑道——身心俱修　　《最后的武士》　电影剧照

剑道是从武士的重要武艺剑术中派生而出的日本击剑运动。比赛者按照严格的规则，身着专用防护具，用一把竹刀互刺对方的头、躯体以及手指尖。欣赏和观看剑道可从外在的技术和内在的心理两方面来看。技术方面，动作要求利落姿势优美，气势及精神饱满，要显现得强而有活力；就心理方面而言，其临场情绪是冷静而不是浮躁，交战中能有敏锐正确的判断力。如何采取妥适的应对是习剑者的智慧与修炼的重要体现。.

日本人对于自我修养的概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一类比培养能力要求更高，我们称其为“圆熟”。在日本，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两者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具有不同的根据，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外部标志来加以识别。前者，即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在本书中已经叙述过不少事例了。比如那位陆军军官在谈及他的士兵平日演习长达60小时、中间却只休息十分钟的事说：“他们已经知道怎么睡觉了，睡觉不是需要锻炼的活动。”对我们来说，他们对士兵的要求太极端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培养一种行为能力。这被公认为精神驾驭术，即把那些忍受一切的肉体训练认为能被意志所驾驭，他们完全不理会那些忽视健康使肉体经受损害的客观规律。日本人所有“人情”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即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无论人们的健康是否允许，肉体本身是否容许以及他们是否被训练过。总而言之，一个人应该不惜任何代价



柔道——护身之术

柔道，顾名思义，就是“温柔的方式”。柔道是日本武术的一种，它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性很强的竞技运动。它强调选手对技巧掌握的娴熟程度，而非力量的对比。柔道比赛要求选手对对手的四肢、脖子做出“锁臂”、“扼颈”等动作，将对手扔倒或压制在地，直到对手认输，或清楚地将对手扔倒在地，方可取得胜利。柔道在全世界有广泛声誉，它的基本原理不是攻击，而是一种利用对方的力量的护身之术。



合气道——精神锻炼

合气道，是一种以柔术、剑道、枪术等武道为基础发展而成的以合气为核心原理的武道。其创始人是日本的植芝盛平。他提出了“气”和“合气”的概念。“合气”就是处处符合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合气武道之技术就像大树的叶子一样，在气流的作用之下，产生出无穷无尽的不断变化的技术。它原来只是一种用于练习“形式”的运动，基本理念是对于力量不采用力量进行对抗。与柔道和空手道等运动相比，是没有粗野感的一种精神锻炼和健身运动。

发扬日本精神。

或许这样表述日本人的观点有点太武断了。在美国的日常用语中，“不惜任何自我修养的代价”（at the price of whatever self-discipline）往往是指“不惜任何自我牺牲”（at the price of whatever self-sacrifice），而且有“不惜任何自我克制”的意思。对于训练，美国人的理论是，无论男女从小都要经过训练而实现社会化，不管这种训练是外部强加的，还是内部意识形成的，训练是一种压抑，被训练者不满于对其愿望的限制，他必须有所牺牲，而且有时会产生反抗情绪。这不仅是许多美国心理专家的观点，也是家庭中父母抚育每一代人的哲学。就因为这样，心理学家似乎分析了不少真理。孩子们到时间必须睡觉，双亲

的态度使他感到睡觉是一种自我压抑。很多家庭中，孩子们每晚都要因此吵闹一番，以示自己的不满。他已经是一个被训练过的美国孩子了，他知道人必须要睡觉，但他却仍要反抗。他的母亲要他吃东西，包括燕麦粥、菠菜、面包、桔子汁等，可是，对这些必须要吃的食物，一些美国的孩子却学会了反对，他们认为，大凡对身体好的东西都不好吃。日本没有美国这种惯例，某些欧洲国家如希腊，也没有。在美国，孩子长大了就意味着摆脱了在饮食上所受的压抑。原因是大人可不必讲究对身体是否有益而吃好吃的东西。

然而，与西方人对自我牺牲的整个概念相比，这些对于睡眠和饮食的要求，都是微不足道的琐碎小事。父母要为孩子作出很大的牺牲，妻子也要为丈夫牺牲自己的事业，丈夫则要为一家人的生计牺牲自己的自由，这些都是西方人的标准

相扑——英雄的荣誉

在人们心目中，能上场的相扑手是颇具荣誉的，是英雄。参赛前，运动员梳好发髻（3段以下的运动员不结发髻），系好腰带和兜裆（运动员裸身，只系宽大的腰带和兜裆），在台子东西两侧专门放置的水桶内取“力水”——能增加能量的水，漱口，润喉，再用“力纸”擦拭身上的污秽，象征着清净心灵上的污点。比赛场上会撒些盐，以保持场地清洁，防止皮肤擦伤受到感染，并祭祀天地，祈求安全。在裁判员鼓打香尺，号召相扑力士出场比赛后，双方便上台，走到中央相距60厘米处，相对站立，各自做抬腿踏脚、搓手拍掌等准备活动。再两手接触地面，调节呼吸，准备进入比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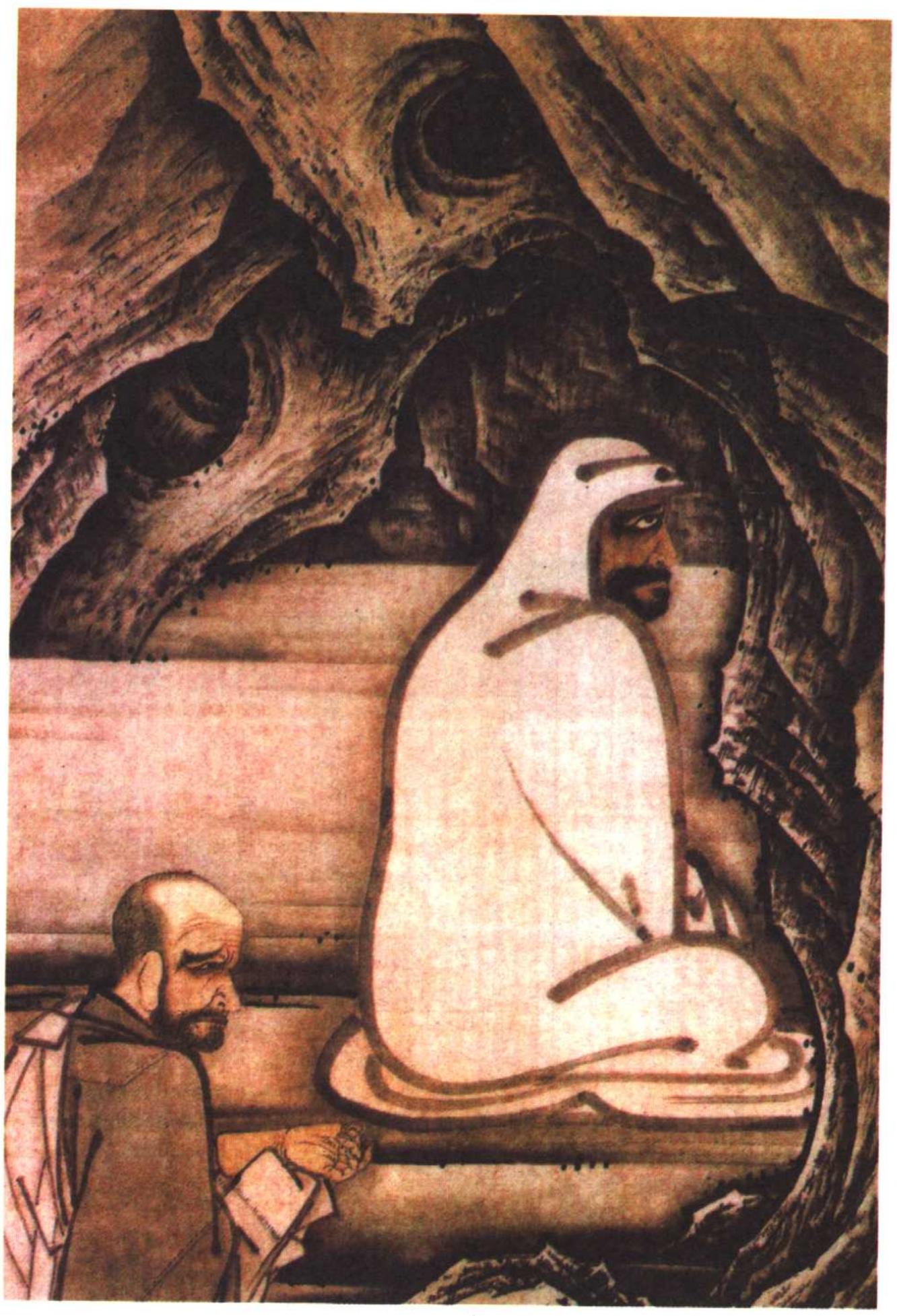


信条。对美国人来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自我牺牲是不可思议的。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会说父母亲疼爱孩子是出于天性。与其他社会生活相比，妇女们更喜欢婚姻生活。肩负一家生计的人从事他喜爱的工作，如猎手或花匠等，人们怎么能说这些是自我牺牲呢？社会强调要这样来解释标准信条，人们也赞成按这种解释生活，几乎没有人承认自我牺牲的概念。

在美国只要是为别人的事作出牺牲，这种牺牲就可以相互交换，这一点与其他文化的认同是一样的。人们把它看做是投资，期待以后得到回报；或者这本身就是对以前受之于人的等值报偿。在具有这样观念的国家，就连父子之间也是如此。儿子幼年的时候得到父亲的照顾，理应在父亲的晚年或身后回报给他。任何一件事务上的关系都是一种民间契约，它通常都要求保证对等，一方承担庇护的义务，另一方则承担服务的义务。只要双方都获利，谁也不会觉得自己所承担的义务是一种牺牲。

精神的修养　　资料　日本

13、14世纪前后，禅宗佛教在日本武士中变得非常流行。图中一位学生以断臂的行为向达摩祖师表示自己的赤诚。虽然禅宗是反对屠杀的佛教的一个流派，但许多禅宗僧侣后来成为众多武士的导师。只不过这些禅宗僧侣不训练剑法，而是教授如何在交战中排除一切杂念。





刀柄护手

这是刀柄护手的正面图，蟹形图样别致精美，刀身巧妙地从图样中心穿过。



自我修养　　文物　日本　14世纪

这把日本刀有着真漆装饰的刀柄和鱼皮与真丝的包裹，发出耀眼的光芒。日本人常常以刀为喻，把人比作刀，把自我修养比作“去锈”，因此人们要积极改善人驾驭生活的能力，把思想中“自我牺牲”和“压抑”的概念去除，磨掉身上的“锈”，让自己的精神发亮发光。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是相互的，不仅要求等量，还要求在等级关系上要相互承担相辅相成的责任。这种自我牺牲的道德与美国完全相反。日本人特别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极力主张，有道德的人不应把别人的服务看成是对自己的压抑。有位日本人曾跟我说：“那些你们称为自我牺牲的事情，我们做的时候，往往是自己愿意做的，或者认为就应该那样做。我们绝不会感到遗憾。无论我们为别人作出了多少牺牲，我们也不会认为，那样做的目的是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也不认为应该以此得到回报。”日本人是以紧密细致的相互义务为核心来组织社会生活的，他们不在乎所谓的自我牺牲。他们要求自己履行义务，但传统的关于相互义务的强制力却阻碍了他们持有的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这种感情很容易出现在个人主义竞争的国家中。

所以，要想理解日本的自我修养习惯，美国人就必须对他们的自我训练（Self-discipline）进行一系列外科手术，割除美国文化概念周围缠绕的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和压抑（frustration）等赘生物。在日本，要想成为出色的运动员就要进行自我修养，像打桥牌一样，绝不会把这种活动看成牺牲。虽然训练是严格的，但这也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刚出生的婴儿虽然非常幸福，却没有体验人生的能力。人只有经过精神训练（或称“自我修养”）才能生活得充实，才能获得体验人生的能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享受人生乐趣（only so he can enjoy life）。修养可以锻炼丹田（自制力之所在），从而使得人生更加开阔。

日本人培养“能力”是因为他们要改善本人对生活的驾驭能力。他们说，人



演习茶道

茶道是艺伎必备的素养，此时艺伎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学习茶道。从唐代开始，中国的饮茶习俗就传入日本；到了宋代，日本开始种植茶树，制造茶叶；直到明代，才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其中集大成者是千利休（1522—1592），他明确提出“和、敬、清、寂” —— 茶道四规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要求人们通过茶室中的饮茶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彼此思想沟通，于清寂之中去掉自己内心的尘垢和彼此的芥蒂，以达到和敬的目的。和、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过饮茶做到和睦相处；清、寂是指环境气氛要以清雅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日本茶道的宗教（特别是禅宗）色彩很浓，有着非常严格、复杂甚至到了繁琐程度的表演程式，而缺少一种宽松、自由的氛围。

们也许会在修养初期感到难以忍受，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的，因为他一定可以享受中间的乐趣，否则他就会抛弃修养。徒弟要在商业上卓越地发挥作用，少年要学习柔道，媳妇要学习并适应婆婆的要求。训练的最初阶段，人们对新要求会有些不习惯，会想逃避这种修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此时，他们的父亲就会教训他们说：“你希望得到什么？想要体验人生，就必须接受一些训练；如果你放弃修养，也许会觉得愉快。但如果你陷入这种处境而受到社会的议论，我绝不会袒护你。”按照他们的说法，修养就是要去除身上的锈。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

刀。这是他们所希望的。

日本人如此强调自我修养对自己的好处，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道德戒律中要求的那些极端行为不是严重的压抑，也不意味着这种压抑不导致攻击性的冲动。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美国人是可以理解这种区别的。为了打好牌，桥牌选手绝不会抱怨必须作的自我牺牲，也绝不会把为成为专家而花费的时间看做压抑。尽管这样，医生们说，在下大注赌钱或争夺冠军赛时，精力的高度集中与胃溃疡和身体过度紧张之间是有关系的。这种事情在日本人身上发生过。但是，由于相互义务观念的强制力以及人们对自我修养有利自身的坚定信心，使得那些被美国人看做是难以忍受的行为，日本人却可以接受。他们要比美国人有更大的胜任行为，不会给自己寻找借口，也不像我们那样经常认为是别人导致了我们对生活的不满。他们也不会因为没有获得美国人所谓的平均幸福(average happiness)而经常沉湎于自怜。他们经过训练，变得比美国人更加关注自己身上的锈。

比培养“能力”更高的自我修养境界是“圆熟”。西方人只靠阅读日本人所写的有关著作是不大容易理解这类修养的技巧的，它往往不被西方学者所重视。它有时被称为“怪癖”。一位法国学者在著作中认为这完全是无视常识，他说最讲究修养的教派——禅宗是集严肃的荒谬之大成。但是，我们却可以理解日本人试图通过这种技巧所要达到的目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日本人的精神驾驭术。

日语中有一系列的词汇来表达自我修养达到圆熟者的精神境界。词汇中有些用于演员、宗教信徒以及剑术家，还有些用于演说家、画家和茶道宗师。通常，它们的含义是相同的。我仅列举其中的一个词：“无我”。这是上流社会很流行的禅宗用语。它所表达的圆熟境界是指在意志与行动之间毫无障碍，纤发悉除的体验。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它都像电流那样从阳极放出直接流到阴极。



与自然对话

“花道”是适当截取树木花草的枝、叶、花朵，将其艺术地插入花瓶等容器中的方法和技术。“花道”和茶道同样是日本独特的传统艺术之一，它是日本人民与大自然的对话，是他们的人生观的反映。花道的由来可以从观赏及宗教两方面看。据文献记载，平安时代就有室内摆设樱花习俗，到了14世纪室町时代的前期，已有举行花会的记载。随着佛教的传入，开始盛行“供花”的习惯，后来在佛前的花瓶中插三枝花代表佛、法、僧的“三尊式”又逐渐脱离宗教，成了室内的摆设。

没有达到圆熟境界的人，仿佛有一块绝缘板位于意志与行动之间。日本人称这个障碍为“观我”、“妨我”。这种障碍经过特别训练消除之后，圆熟者就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了，好像电流在电路中自由流动而没有任何障碍。这种境界就是“一点”（One-pointed），行为者的行为与内心所描写的一模一样。

在日本，普通的人也要努力达到这种“圆熟”境界。英国研究佛教的权威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在谈到一位女学生时说：

她来到东京某著名传教士的住处，要求做基督教徒。传教士问她原因，她回答说，因为自己想乘飞机。传教士让她说说飞机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她回答说，她听说坐飞机需要一颗非常镇静而遇事不乱的心，而只有经过宗教训练才能获得这种心理。她觉得，基督教是宗

教中最好的了，所以，她才前来求教。

日本人不仅把基督教和飞机联系在一起，他们还把镇静、遇事沉着与应付考试、讲演、政治生涯等都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对“一点”即集中和专注的培养对从事任何事业都有毋庸置疑的益处。

很多文明都发展这种训练技巧，但日本人训练的技巧具有独特的特点。由于日本的修养术很多且都源于印度的瑜伽派，这就饶有兴味了。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日本的自我催眠、全神贯注以及驾驭五官的技巧与印度修行方法的亲缘关系。对“虚灵”（心中不想）、“体静”（身体不动），以及千万遍地反复诵念同一句话和全神贯注于某一选定的目标，日本人也同样重视。日本也使用印度的术语。不过，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共同点外，日本版的修养术与印度的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印度的瑜伽是一个极端崇拜禁欲苦行的教派，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从轮回求得解脱的方法。人除了这种解脱即“涅槃”外，再无解救之道。障碍是人的一种欲望。人只有通过饥饿、受辱和自苦才能消除欲望。人通过这些手段可以超凡圣人获得灵性，可以达到神人合一的境界。瑜伽修行即是一种鄙弃肉欲世界、逃脱人间无边苦海的方式，还是一种掌握灵性能力的方法。苦行越是极端，就越能更快地实现目标。

日本是看布道这种哲学的。尽管是一个佛教大国，但在日本，轮回和涅槃的思想始终都没有成为人民对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然有少数僧侣接受这种教义，

顿悟即涅槃

轮回和涅槃的思想从未成为日本人民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轮回不是日本的思想模式，涅槃的思想也不是。高僧的断言是：顿“悟”之人即已达到涅槃，即在此时此地，松树和野鸟中都能见“涅槃”。





死者皆佛

日本人把供在佛坛上的家属灵位都称做"佛"。他们认为，不管什么人，甚至身分最低贱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既然一个人怎么都能成佛，就无须终生使肉体受苦而努力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了，因此这样的民族当然不会追求涅槃之类的艰难目标。

但这从来没有影响民间的思想和习俗。在日本，人们不会把鸟、兽、虫、鱼看做是人的转世而禁止杀生，轮回思想也没有影响到葬仪及庆祝诞生仪式。轮回和涅槃的思想都不是日本人的思想模式，不仅一般民众没有这种思想，僧侣们也把这种思想加工改制过了，因而这种思想也就消失了。有学问的僧侣们断言，顿悟的人已经达到涅槃了，也就是说此时此地，松树和野鸟也都能见涅槃。关于对死后世界的空想从来都没有激起日本人的兴趣。他们的神话讲的都是关于神的故事，而不是已经过世的人。对佛教有关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他们拒绝接受。在他们看来，不管是谁，就连身分最低贱的农民，去世后都能成佛。日本人把供在佛坛上的家属灵位都称为佛。没有第二个佛教国家会这样看待佛了。理解一个对一般死者用如此大胆的尊称的民族当然不会追求涅槃之类的艰难目标。既然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可以成佛，终生使肉体受苦或试图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的努力就没有必要了。

同样道理，在日本，也没有肉体与精神不相容的教义。瑜伽修行是一种消除欲望的方法，欲望是寄生在肉体之中的。日本人没有这种教义，他们不认为“人情”（烦恼）是恶魔，他们认为感官享受是生活智慧的组成部分，唯一条件就是感官享受必须为人生重大的义务作出牺牲。在日本人对待瑜伽修行方法方面，这一信条从逻辑上扩展到极端：不仅一切自虐性苦行被排除了，就连这个教派也不是禁欲主义的了。他们的悟者过的是隐遁生活，虽然被称为隐士，但通常还是能和妻子一起在风景秀丽的地方过着安逸的生活。娶妻育子与超凡圣人没有一点矛盾。

在佛教的通俗教派中，僧侣是完全可以娶妻生子的。灵肉不相容的说教从不会轻易被日本人接受。由于自我修行和生活质朴才成为顿悟者，而不是因为破衣敝服、弃绝声色之娱而成为顿悟者。日本的圣者整日吟诗、品茶、观花赏月。现在的禅宗指示其信徒要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

神秘主义的修行是瑜伽哲学的最终信条，它认为可以把修行者带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日本没有这种信条。不管是原始民族、伊斯兰教阿訇，还是印度瑜伽修行者或中世纪基督教徒，尽管他们有各自不同的信仰，但推行神秘主义的修行法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到了人世所无的喜悦。这种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日本也有，但却没有神秘的色彩。这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入定，他们也可以入定。不过，这种境界在他们看来是“一点”，而不是超凡入神。其他国家的神秘主义者说，五官会在入定时停止活动。禅宗的信徒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入定会让六官达到异常敏锐的状态。第六官位居心中，训练能

圣者的感官享受 金阁寺 建筑 始建于1220年

金阁寺是京都最负盛名的庙宇之一，它有着金碧辉煌的庙宇，典雅传统的庭园，涓涓盈流的池水。每当阳光普照，金阁寺会闪闪发亮，与水中的倒影相映成趣。它的庭园有许多造景，分别是：陆舟之松、银河泉、严下水、龙门之淹、登龙门、鲤鱼石、安民尺、白蛇之冢。还有一个木造的亭子，叫做夕佳亭。这里就是圣者喝茶赏景吟诗悟道之处。



使它支配其他的五官。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和听觉在入定时都要接受特殊的训练。禅宗修行者的一项练习是要听到无声的足音，并可以准确地跟踪足迹；或者在三昧境界中仍然可以辨别诱人的美味。嗅、视、听、触、尝都是辅助第六官，在这种境界中，人要学会使诸官皆敏。

在任何重视超感觉经验的宗教中，这都是例外的现象。修禅者即使在入定状态也不想脱于自身之外而像尼采描述的古代希腊人那样，要保留自己的原样，保持自己市民的名义。在日本佛教法师的言论中，有很多生动的阐述，其中高僧道元讲得最精彩。他在13世纪开创的曹洞宗至今仍然是禅宗中最大、最有势力的教派。在谈到自己顿悟的时候，他说："我只知道眼睛横在鼻子之上……在禅的体验中并没有神秘。好比时间自然流逝，太阳从东方升起，而月亮从西方落下。"禅学著作也不承认除了培养自我修养能力以外，"入定"还能传授些别的什么能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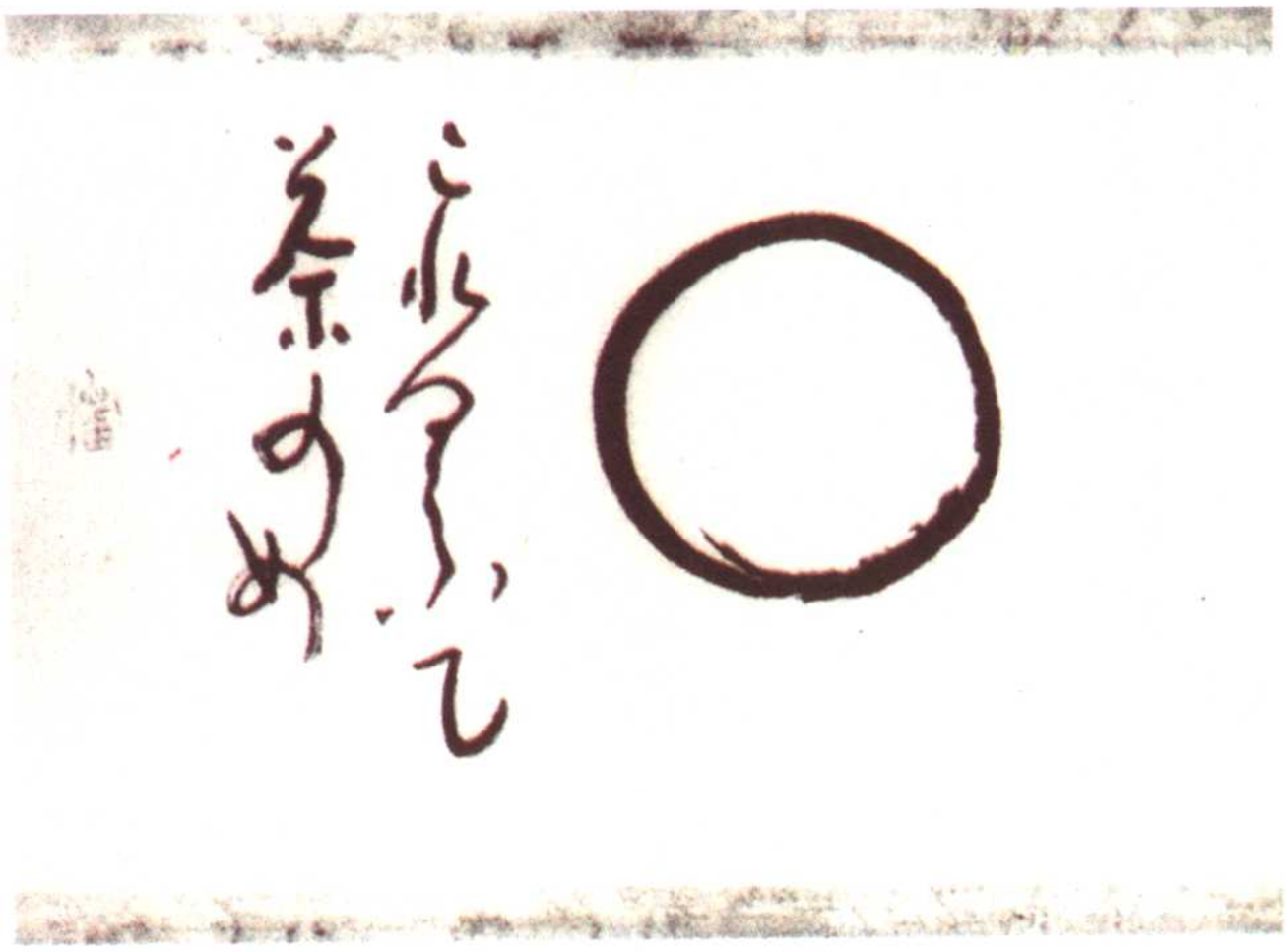
默照禅

道元谈到自己顿悟时说："我只知道眼睛横在鼻子之上……（在禅的体验中）并无神秘。犹如时间自然流逝，日出于东，月沉于西。"道元是日本佛教曹洞宗创始人，俗姓源，号希玄，京都人。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他的会禅要诀是"只管打坐"，后人称其禅风为"默照禅"。



位日本佛教徒写道:“禅宗并不赞同那种瑜伽派认同的冥想可以获得超自然能力的荒谬说法”。

就是这样，印度瑜伽派的各种基本观点被日本人完全抹杀了。日本人的限定，让人联想到古希腊人。瑜伽派的修行方法被他们理解为自我修养以求完善自身的一种方法；是一种为达到“圆熟”境界，使人和自身行为毫无间隔的方法。这是一种自力更生的训练。它的回报就在现时现地，人们可以不用多少力就能恰如其分而又有效地应付任何局面；它能把人的恣意妄为控制得不躁不乱，不管是遇到外来的人身危险或内心的激动，人们都不会失去镇定。



圆通空悟

“以此为食，并饮一杯茶”意为：深思冥想是给精神自我提供营养，由此可以掌握存在的真谛。简单的圆则带着禅宗圆通空悟的境界。

这种训练不仅对僧侣而且对武士也有益处。实际上，正是武士把禅宗作为自己的信仰。像日本这样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单骑作战，这在任何地方都很难发现了。从禅宗开始发生影响之时起，日本就一直如此。12 世纪，日本禅宗开山鼻祖荣西的巨著就取名《兴禅护国论》，而且为了达到目标，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好比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所说的那样，中国的禅宗史上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有朝一日，传到日本的禅宗竟然会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和茶道、能乐一样，禅宗完全成了日本式文化。人们可以设想，在十二三世纪的动乱年代，这种主张是内心直接的体验而不是从经典中寻求真理的冥思，神秘的教义流行于逃避尘世灾难的僧院中，人们却不会想到武士阶级会把它作为喜爱的生活准则。

包括佛教和道教在内的日本许多教派都对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的修行方法

作了特别的强调。这种训练的成果被其中有些教派看成是上帝的恩宠。其哲学基础建立在“他力”之上，即要靠仁慈上帝的帮助。以禅宗为主的有些教派则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要自己帮自己。他们常教导人们说，潜力存在于自己内部，唯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潜力。日本的武士们发现这种教义很符合他们的性格。无论是作为一个僧侣，还是政治家、教育家，他们所从事的这类工作都用禅宗修行法来加强一种朴素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非常明确：“禅所求者，唯在己身可发现光明，不允许有任何阻碍。除去途中一切孽障……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剿圣。唯此一途，可以得救。”

探索真理的人不能接受任何间接的东西。无论是佛陀教导、祖宗经典、还是神学。三乘十二因缘教都是一堆废纸。虽然不能说研究它一点用也没有，却无法自心灵光一闪，只有灵光一闪才能让人顿悟。有一本禅语对答的书中说到弟子求禅僧讲《法华经》。禅僧讲得很好，弟子对此却失望地说：“怎么这样，我还以为禅僧蔑视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呢！”禅僧回答道：“禅并不是一无所知，只是相信真知存在于一切经典文献之外罢了。你不是来求知的，只不过是问经的罢了。”

禅师们传授的传统训练的目的是教弟子如何求得“真知”从而顿悟。训练不仅有肉体的，还有精神的。无论是哪一种，最终都必须在内心收到效果。剑术家的修禅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例子。他必须经常练习基本击刺，但这只是“能力”的范畴，他还必须学会“无我”。刚开始，他首先被命令站到地板上，把精神都集中在脚下那块支持身体的几英寸的地板上。这块室内窄小地板

大德寺枯山水　　建筑　日本京都

日本禅宗的象征：由无数的小石头堆砌成山丘与水波的样子，是有与无、色与空的幻觉，表示一切现象都是从心中产生的，是假象。





锻炼意识的自我

《蒲原》 歌川广重 出自《东海道五十三次》 约1831年至1834年

在幽暗的山谷中，风雪交加，身披斗篷、头戴笠帽的人正在费力地向山上走去。这样艰难的苦行对日本人而言却是一项修炼，他们的目的在于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等到修炼者意识不到寒冷时，就到达了“圆熟”的境界。

逐渐上升。之后，剑术家要学习像站在院子里那4英尺高的柱子上那般。当他可以坦然地立在那根柱上时，他就获得真知而顿悟了。他的心已经顺从己意，不会再有眩晕感或摔跌的顾虑了。

日本的这种立柱术改造了人们所熟悉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派的立柱苦行术，把它从一种苦行变成一种有目的的自我训练。各种肉体训练都必须经过这种改造，无论是修禅还是农村中的诸多习惯。潜入冰水或站在瀑布下之类的苦行修炼存在于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有的是为了锻炼肉体，有的则为了祈求上帝的怜悯，还有的是为了进入恍惚状态。在天亮之前站在或坐在冰凉刺骨的瀑布之下，或者冬夜用冷水洗澡三次，这些都是日本人喜好的耐寒苦行，目的是锻炼自我。求道者的目的是把自己训练成能够不受任何干扰而继续冥想的境界。当他已感觉不到水的

冰冷，身体能够在寒夜凌晨也不颤抖的时候，他也就“圆熟”了。除此之外，他不讲求任何裨益。

同样的道理，精神训练也要适合个人。你可以向老师请教，但老师却不会像西方意义上那样教导你。弟子不可能从自身以外学到任何有意义的知识。老师与徒弟讨论，但不会温和地对弟子加以引导，使他达到新的智慧境界。老师越粗暴，人们就越认为他有帮助。倘若师父猛地打掉弟子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将弟子摔倒在地，或者拿铜如意敲打弟子的指关节，弟子就会像通上电流一样顿悟。这是因为，这样打掉了他的自我满足感。这类故事曾多次出现在僧侣的言行录中。



一种经常使用的使弟子拼命努力而开悟的办法是“公案”，按照字面的理解就是“问题”，传说有1700个“公案”。“禅僧逸话”中说，有不少人花费7年时间来研究解决一件公案。求得合理的答案并非公案的目的。譬如“设想孤掌独鸣”，或“缅思未生儿时母”；以及“背负尸体而行者谁？”“朝我而来者何人？”“万法（万物）归一，一又何归？”等。十二三世纪以前，这些禅问曾在中国使用过。日本在引进禅宗的同时也引进了这种方法。在中国，公案已宣告绝迹，而在日本，它却成了达到“圆熟”的最重要的训练手段。禅的入门书尤其重视公案。“人生的困境隐藏在公案中”。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就如同被赶入绝境的老鼠，或是想吞热铁球的人，想叮铁块的蚊子，他进行忘我的努力，最终，除去了横在自己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屏障，就像一股闪电，心与公案合二为一，他就顿“悟”了。

读了这些使人极度紧张的精神材料，如果你想要从中寻找他们

二难推理　《犹豫之相》 月岗芳年 出自《风俗三十二相》

新年临近，茶社老板娘手托两盆注有“大黄金”名字的花草，正在为难选哪盆好。日本人在接受精神训练的时候，也往往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而他们在获取真理时，往往不是寻经据典，也不是借助外力，而是反求诸己来去除“观我”的屏障。


風俗三十二相
かほさう
嘉永年間
おこのみきんの
風俗
明治廿年　月　日印刷
同　年　月　日出版
印刷兼發行者
日本橋区馬喰町三丁目壹番
鯉島亀吉
和田彫勇



无我　《武士与蟒蛇》 一勇斋国芳 约1845年

这位与巨蟒搏斗的武士毫无畏惧之色，这是他通过严格的训练消除了易受刺伤的自我，不再是自身行为的观察者，从而不再意识到自己在行动，也就感觉不到压力，从而没有了恐惧。

全力以赴的努力所得到的伟大真理，那么你一定会觉得失望。南侯用了8年时间来思考“朝我而来者何人？”最终，他想明白了。他得到这样的结论：“说此地有一物，旋即失之矣。”然而，禅语的启示也有一般定式，以下几句问答中，我们可以窥知一二：

僧问：“如何才能逃避生死轮回？”

师答：“是谁束缚了你？（就是是谁把你绑在轮回上的？）”

他们说，中国有一句有名的俗语，就是“骑牛找牛”。他们要学的不是织网，而是如何使用那些捕捉鱼兽的工具。用西方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他们学的是二难推理，两个都与主题没有关系。目的在于让人顿悟：只要打开心胸，现存手段就可以实现目标。一切皆有可能，无需借助外力，只需反求诸己。

公案的意义对于日本人来说，不在于这些真理的探索者如何找到真理（与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是相同的），而在于他们探索真理的方式。

人们把公案称为“敲门砖”。“门”就装在蒙昧的人性周围的墙壁。这种人性对现存手段是否够用存在担心，总是存在幻觉，认为许多人正关注着自己，并准

备发表着褒贬评论。这堵墙即日本人感之颇切的“耻感”。一旦把门用砖砸开，人就到达了自由天地，砖则因此失去了用途，公案也无须解答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随之得以成功解脱。他们拼命钻牛角尖，为了修行成为“咬铁牛的蚊子”，最终，恍然大悟。“义务”与“情义”之间没有墙，“情义”与“人情”没有墙，“正义”与“情义”之间也没有墙。他们找到一条出路，从而得到了自由，从此就能充分地体验生命了。他们到达了“无我”的境界。他们的修养成功地实现“圆熟”的目标。

研究禅宗的泰斗铃木（大拙）解释“无我”为“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不着力、无用心”，“观我”消失了，人失去自身，也就是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按照铃木的观点，意识一觉醒就一分为二：行为者和旁观者，两者势必发生冲突。因为，行为者的我要求摆脱旁观者的我给予的约束。一旦“悟”了，弟子就发现，既没有“观我者”，也没有作为无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除了目标本身和实现目标的行动外，一切都不存在。如果人类行为研究者改变一下表述方式，他们就能更具体地道出日本文化的特性。就如一个孩子，被严格地训练来观察自己的行为，关注别人的评论并据此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观我者，他很容易受伤，一旦升华而到了灵魂的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这个容易受刺伤的自我，不再意识到“他在有为”了。此时，他就觉得成功地修养了自己的心性，就像舞剑术的人站在4英尺高的柱子上都可以毫无畏惧一样。

画家、诗人、演说家和武士都采用这种训练方法来达到“无我”的境界。他们所学到的并不是无限，而是关于有限的、清晰的、不被干扰的感受；换句话说，就是学会对手段与目标进行调整，用不多不少的恰当努力，恰如其分地实现目标。

就是连一点都没有被训练过的人也有一种“无我”的体验。当欣赏能乐和歌舞伎的人完全忘我地陶醉在剧情中时，也可以说这个时候他失去了“观我”。他手掌是汗，觉得这是“无我的汗”。在接



近目标将要投下炸弹之前的时候，轰炸机的飞行员也渗出“无我之汗”。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他的意识中并没有作为旁观者的自我。当高射炮手全神贯注地侦察敌机时，他周围的世界就全都消失了，也同样会出“无我之汗”并失去“观我”。当人们身处这些场合，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他们都进入了最高境界。这些就是日本人的观点。

上述论述雄辩地证明，日本人把自我监视和监督看做是多么重大的压力。他们说，这种牵制一旦消失，就会感到自由而有效率。美国人把所谓“观我”等同于内心的理性原则。所以他们以临危不惧、保持机智而自豪。对日本人来说，要让灵魂升华到三昧境界，忘掉自我监视的束缚，才能感觉到颈上的石枷解脱了。由此，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在心灵深处一再地灌输谨小慎微的原则；而对此，日本人却极力辩解并宣称：三昧境界使心理重荷消失，人的意识达到更加有效的境界。

对这种信条的最极端的方式（至少西方人听来如此），是日本人对“就视死为活着”的人表现出了高度的赞赏。如果把“就视死为活着”按字面意思翻译成西方语言，也许就是“行尸走肉”吧。可是，这句话在任何西方语言中都是很讨厌的。这是说一个人已经死了，在人世只留下一具躯壳，再也没有了活力。日本人

“无我”的体验

无论是舞台上的演员，还是台下的观众，都可以达到“无我”的境界。台上的演员通过表演训练，可以自如地展现剧情，不受任何干扰；台下的观众虽然没有受到训练，但是在陶醉于剧情的时候，可以忘记身处的现实，也可以达到“无我”的境界。

讲“就视死为活着”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已到达了“圆熟”的达观境界。在日常的劝勉和鼓励中，这句话被经常使用。人们鼓励苦恼于中学毕业考试的少年时，会说：就当你自己已经死了，这样就容易通过了。鼓励从事商业交易的人时，也是这样，朋友会说：就当已经死了而干下去。当一个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苦恼而看不到一线希望时，也经常怀着就当死了的决心生活。日本战败后，被选为贵族院议员的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在自传小说中说道：“就像是被魔鬼缠身了一样，他每天都躲在自己房间哭泣。那爆发性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的程度。一个半月中，苦痛一直在持续，但是，生命终于获胜了……他要自己带着死的力量而活下去……他就当自己已经死了那样投入到战斗中去……他决心要做一名基督徒。”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喜欢说：“我决心就当自己已经死了，来报答天皇的恩泽。”这句话的后面还包括了一系列行动，比如出征前要为自己举行葬礼；发誓要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硫黄岛上的一抔土；决心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落；诸如此类。

“就当已死去而活着”的态度隐蔽地包含了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在这种状态中，人会消除一切自我监视，一切的恐惧和戒心也没有了。他已经死去了，也就是说不必再考虑行为是否恰当了。当死者不必报“恩”的时候，他们就自由了。所以，“我要当自己已死了那样活着”，这句话意味着要完全摆脱一切矛盾和冲突，也意味着：任何事情都不能束缚我的活动力和注意力了，我可以无所畏惧地去实现目标。我和我的奋斗目标之间已经不再有观我和一切恐惧的重荷了。以前，我奋力追求的时候，一直烦扰我的紧张感和消沉倾向也都消失了。现在的我可以为所欲为了。

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排除了在“无我”及“就当已死”的习惯中的意识。他们所谓的“观我”、“妨我”才是对一个人行为进行判断的监督者。这明显地表明了东西方人心理的差异。当我们说一个美国人没有良心的时候，是说他在干坏事时已经不再有罪恶

感了。而在日本使用同类词语时，指的却是这个人不再感觉紧张，不再受到妨碍了。同一个词，在美国形容的是坏人；在日本形容的却是好人，有修养的、能最大限度发挥能力的人，以及可以完成最困难工作、献身于无私行为的人。是罪恶感在驱使美国人行善，一个人若良心已经麻痹，就不会再有罪恶感，就会成为反社会的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日本人并非如此。根据他们的哲学，善存在于人内心深处，如果内心冲动可以直观地表现为行动，很自然地，他就会实践德行。于是，他想努力修行，为了“圆熟”，以求消灭自我监视的“羞耻感”。只有达到

“就当已死”的决心　　摄影　1943 年 10 月

这是1943年10月在东京明治体育场举行的新兵送行会，身着制服的中学生正观看着这些新入伍的大学生奔赴战场。这些敢死员怀着“就当已死”的决心，勇敢地投入战斗以报答皇恩。最终，他们中的650人作为“神风”敢死队的敢死员死去。





平静的神风飞行员　　摄影 194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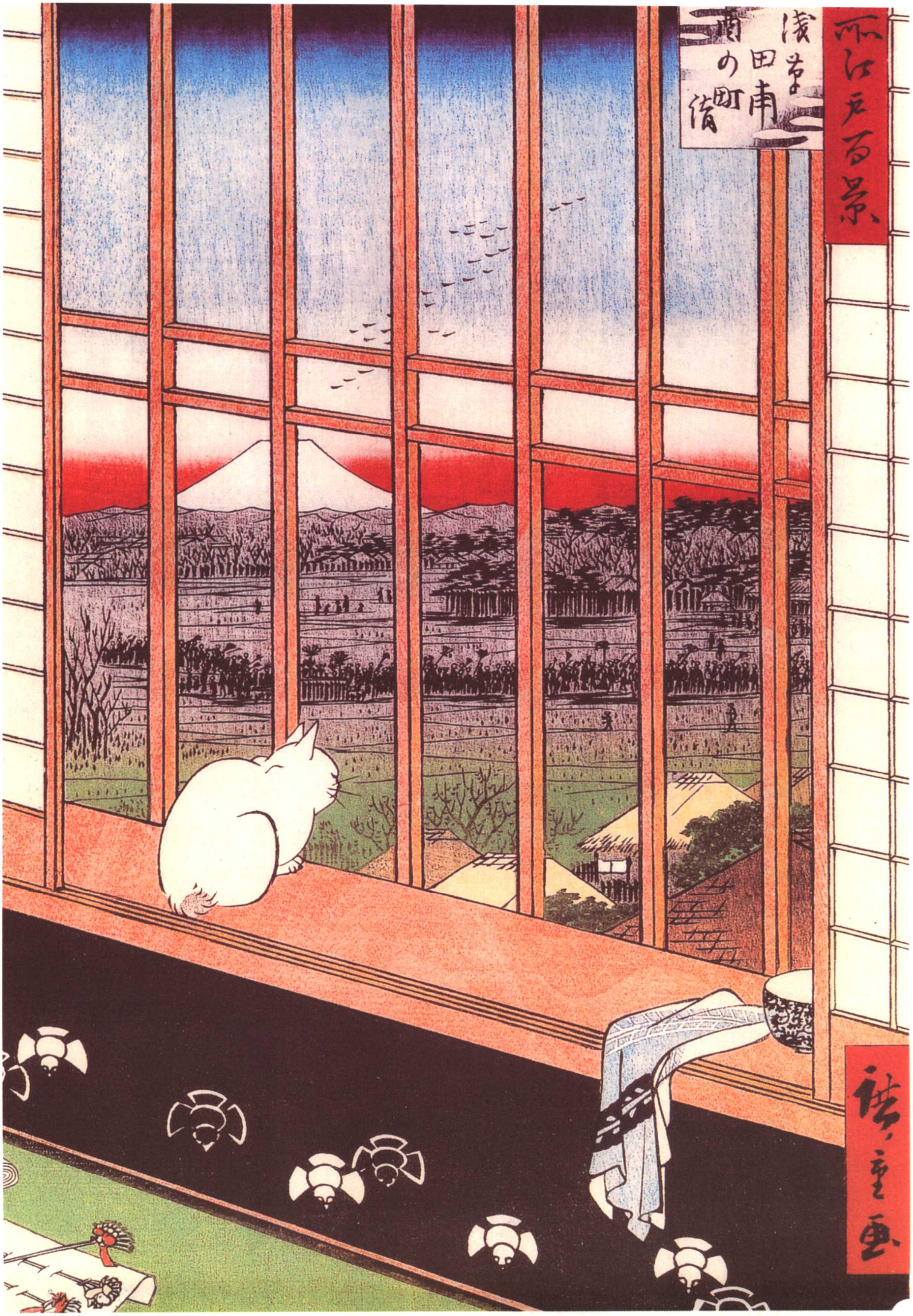
1945 年的一天，神风飞行员正在等待自杀性任务的到来，而他们有的在下棋，有的在奏乐，有的在看书，十分平静，丝毫没有死亡临近带来的恐惧和不安。

这种境界，才能消除第六官的障碍，这才算是对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的彻底扬弃。

如果脱离日本人在文化中的个人生活经验来考察他们的这种自我训练的哲学，那么你很有可能面临一个不解之谜。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那种被他们称为“观我”的羞耻感给日本人身上增添了异常沉重的压力。如果不考虑日本人教育孩子的方式，就不能弄清楚他们的精神驾驭术的真正哲学含义。任何文化的道德规范总是要通过语言以及长者对后代的态度来一代代传承下来，使其流传。如果不对一个国家的育儿方式进行研究，局外人就很难理解该国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直到本章结束，我们叙述日本民族对人生的观点时都只是从成人的角度出发的。日本人培育后代的方式将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些观点。

江戸百景

浅草田甫酉の町詣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本尼迪克特找到了日本人双重性格形成的关键原因：幼年和老年是自由的领地，婚姻却是戴上“枷锁”的开始。

喜欢思索的西方人也想象过日本人教育儿童的方式。在训练孩子对生活的适应能力方面，美国人很少像日本人那样要求的如此谨慎和自制，并且从开始父母就教育儿童，他们的小小愿望并不是这个世界最高的指令。我们对授乳时间和睡眠时间做了一定的规定。如果时间没到，孩子无论如何哭闹也要等待下去。当婴儿吮吸手指或触摸身体的某些部位时，母亲就会敲他的手指来禁止他这样做。母亲经常不在孩子身边。当母亲出门时，孩子必须留在家里。当婴儿喜欢母乳胜过其他食物时，也要让他断奶。如果之前是用奶瓶喂他，现在就不给他奶瓶了。孩子必须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如果不按规定做，孩子就会被惩罚。美国人曾设想，日本人对待儿童的训练一定更加严格，因为他们成年后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要十分谨慎地严守各种道德准则。

然而，日本人却不是这样做的。他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人恰恰相反，是一条浅底U字形曲线，婴儿和老人可以自由和任性。伴随着幼儿期的结束，对一个人的约束日渐增加，个人自由在结婚前后降到了最低线。这条最低线贯穿于整个壮年时期，并一直持续几十年，之后再次逐渐上升。六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像儿童时期那样不用烦恼羞耻和名誉了。在美国，人生曲线的形状正好相反，人在幼儿时期接受到非常严格的教养训练，这种训练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而放松，等到有了足以自立的工作、组织自己家庭的时候，就可以不被任何人牵制了。对我们来说，壮年时期是自由和主动性达到鼎

盛的时期，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日渐衰退，最终成为他人的负担，这时又要接受别人的约束了。美国人想象不到按照日本人的模式来安排人生会是怎么样，那与现实是多么的背道而驰了。

不管是美国的人生曲线还是日本的人生曲线，都保证了一个人在壮年时期要尽力参与该国的文化。在美国，我们给一个壮年期的人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来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在日本，则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个人约束的时期，尽管人在这个时期体力最强、谋生能力达到最高峰，但却不能自己主宰生活。日本人坚信，约束是精神训练（修养）的最好方式，可以发挥自由所达不到的效果。虽然在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壮年时期受到了最大的约束，但这种束缚不是终生的，日本人的幼年和老年则是自由的领地。



自由的童年

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克己”精神无处不在，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日本的孩子可以享受一个十分自由的童年。这三个孩子生活在日本最北面的岛，他们身后的富士山巍然屹立，山下的野花开得正盛，这是他们童年的自由天地。

娇纵孩子的国民都非常希望有孩子。日本人恰好如此。正如美国父母，喜欢孩子，让孩子快乐是他们要孩子的首要因素。不过，日本人要孩子却不仅是因为想获得感情上的满足，还因为，如果家族血统断绝了，他们就会变成人生的失败者。美国不太重视这方面的因素。日本男人都一定要有儿子，为的是有人在自己



携子采鲍鱼的母亲　　春梅齐北英 浮世绘　约1800年

日本素有采鲍鱼的传统，这位年轻的母亲正带着自己的孩子采鲍鱼，画面透出温馨、祥和的气氛。在日本的传统观念中，只有当了母亲的女子才有地位，才能享受这样携子出行的快乐。

死后跪在佛坛灵前祭拜以及绵延家系，传宗接代和保持家族的荣誉和财产。出于这种传统的社会思想，父亲对儿子的需要，就跟幼儿对父亲的需要一样。将来儿子总是要取代父亲的，这并不是说要撇下父亲，而是为了让父亲可以安心。在很多年内，由父亲来管理家务，之后儿子接班。如果父亲不能把家务转交给儿子，他就失去了做父亲的意义。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使日本成年男子对父亲的依靠不像西方民族那样感到耻辱和不体面，而且在日本这种状况延续的时间要比美国长很多。

妇女需要儿子不仅是为了满足感情上的需要，还是因为只有做了母亲的妇女才有地位。没有孩子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最不稳定，即使不离婚，也不能指望有一天能做婆婆，不能行使对儿子婚姻的主宰和对儿媳调教的权利，此时，丈夫出于延续家系的需要可能要收养孩子。依照日本人的观念，不能生孩子的妻子是个失败者。日本的妇女总是希望多生几个孩子。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平均出生率达到31.7‰，高于东欧多子女的任何国家。美国在1940年的出生率仅仅是17.6‰。日本母亲的产龄较早，大都在19岁就生小孩了。

在日本，分娩和性交一样是隐秘的事情。产妇阵痛时不能大声呻吟以免让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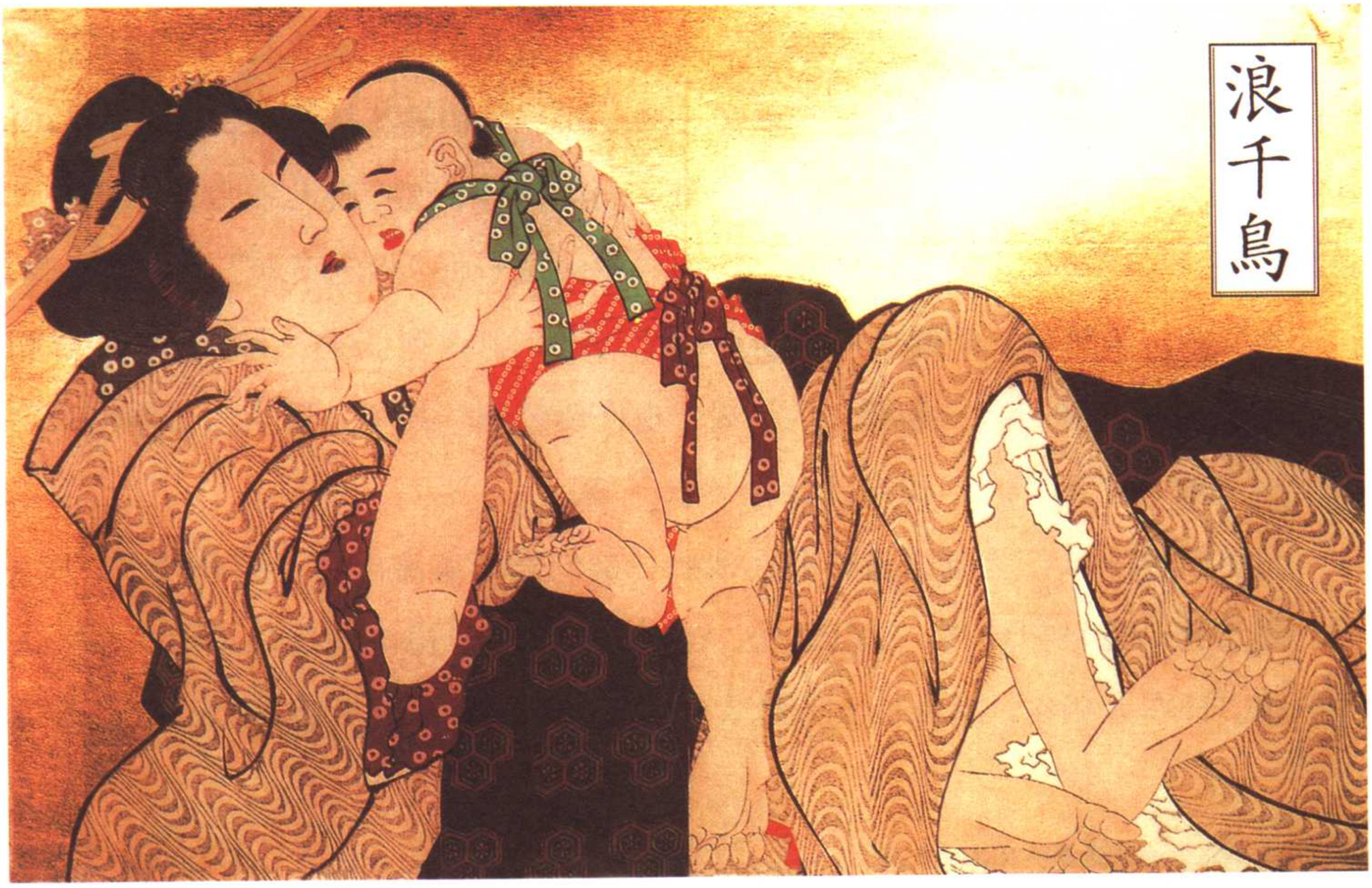
人知道。母亲要提前准备婴儿的新被褥和小床，这是因为，新生婴儿不睡新床是很不吉利的。家境贫困的人买不起新床，也要把被料和棉花洗干净，以作为“新”的被褥。小被褥不像大人的被褥那么僵硬，而是很轻，这样婴儿在自己的床上可以睡得更香。日本人让婴儿分床睡觉的深层原因是一种“感应巫术”，即新人必须睡“新”床。虽然婴儿的睡床和母亲的睡床靠近，但直到孩子长大，知道要求和母亲同睡时才能和母亲一起睡。他们说，也许要等到一周岁，婴儿才会伸出双手提出这种要求。到那时，母亲才会搂着孩子睡。

日本母亲不给出生前3天的婴儿喂奶，她们要等着流出真正的乳汁。3天过后，婴儿可以随时叼奶头，可以吃奶，也可以叼着玩。母亲把给孩子喂奶作为一件乐事。日本人相信，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婴儿也最容易感受到母

扒背的技巧　　摄影　日本　现代

日本沿海的渔民们沿袭着古老的背孩子的方式，这位正在晾晒乌贼的妈妈就让孩子自由地扒在自己的背上。这种方式能让孩子更早地接近人群，让孩子通过自己眼睛观察世界，模仿他人；同时，扒背的技巧就是生存的技巧——不要成为别人的包袱，而要利用仅有的生存条件，把潜能发挥到最大，去找自己最合意的生活方式。





妻子的双重角色　　《浪千岛》 葛饰北斋

日本传统文化中很崇尚母性，妻子在丈夫面前必须担任两重角色，一重角色是妻子，满足丈夫的情欲，为他生儿育女；另一重是母亲的角色，像关爱照顾孩子一样地关爱和照顾丈夫。所以有些有了两个孩子的女子会对人说她有三个孩子，这“第三个孩子”就是她的丈夫。在日本文化中，妻子对丈夫、女人对男人必须全身心地奉献，为对方作出一切牺牲，这种观念比中国古代的“妻为夫纲”还要强烈得多。

亲的这种快乐。乳房不仅供给婴儿营养，而且也提供给他喜悦和快乐。出生后的第一个月，母亲不是把孩子放在小床上让他睡觉，就是自己抱着去参拜当地神社。参拜后的婴儿才被认为生命已经扎根体内了，才可以被自由带出。一个月后，母亲把孩子背在背上，用一根双重带子系住孩子的腋下和臀部，再挂过自己肩前，在腰前系一个结。天冷时，母亲会用外衣把孩子裹紧。家里其他年长点的孩子，不论男女，都要背孩子，甚至是玩垒球或踢石子时也背着孩子奔跑。在农村和贫困的家庭，都是由孩子来照看孩子，这样，婴儿就在人群中生活，他们玩着背着自己的大孩子正在玩的游戏，这显得很有意思。婴儿四肢伸开被绑在背上的方式，很像太平洋诸岛和其他地方流行的用披肩裹婴儿的方法。他们都把孩子看成是被动的。这样抚育长大的孩子以后可以随时随地、不拘姿势地睡觉。日本人恰恰是

这样的。不过，日本人是用带子背婴儿的，这不像用披肩或包袱裹婴儿那样培养了婴儿完全的被动性。婴儿在别人背上会像小猫一样搂着别人……绑在背上的带子是安全的，婴儿会靠自己的努力呈现最舒服的姿势。这样做不久，他们就掌握了扒在背上的技巧，他们不只是被绑在别人肩上的包袱。

当母亲工作时把孩子放在睡床上，上街时背在背上带走。母亲会跟孩子说话，哼小曲给他听，教他做各种礼貌动作。当母亲给别人还礼时，也会晃动婴儿的头和肩让他也鞠躬致意。总之，婴儿跟大人一样。每天下午，母亲都给婴儿洗澡，然后把他抱在膝上逗他玩。

三四个月大的婴儿要系上布质很粗厚的尿布，日本人抱怨说是尿布造成了他们的罗圈腿。三四个月过后，母亲就教他便溺：估计好时间，带婴儿到户外，用手托住他的身体，吹着单调而低音的口哨，等着孩子便溺。孩子似乎听懂这一听觉刺激的目的。跟中国婴儿一样，日本婴儿也很早就学会了便溺。当孩子尿床时，有些母亲会拧他的屁股教训一顿，并更频繁地把记性差的婴儿带到户外去教他便溺。当婴儿拉不出大便时，母亲就给他洗肠，或者服泻药。母亲们这样做为的是让婴儿更舒服。孩子学会了大小便的习惯，就可以不用那种不舒服的尿布了。日本的婴儿肯定会觉得尿布不舒服，不仅因为它布质粗厚，而且每当尿湿时，母亲也不给换尿布。婴儿还太小，不知道学会便溺与去除不舒服的尿布间的关联。他们只体会到每天必须由母亲带到户外便溺，这是不能逃避的。并且母亲让孩子便溺时会尽量让他的身体离远点，将他抱紧一点。这种强制性的训练为孩子

无情的训练

日本的孩子从婴儿期就开始接受十分严格的训练，从听懂母亲的口哨到服从繁琐的日本文化。这个小男孩年纪尚幼，就开始独自一人乘车了，然而他的脸上似乎没有害怕的神色。





整洁的日本家庭

两位日本女子正在亲热地交谈，房间收拾得十分整齐，地上铺了几张铺席。日本的房间被称做三铺席房或十二铺席房，铺席的尺寸是固定的。

长大后服从繁琐的日本文化作了准备。

日本的婴儿一般是先会讲话，然后会走路。大人们经常鼓励他们爬。按照日本的传统习惯，不能教不满周岁的孩子站立或走路。近十年来，日本政府在其发行的廉价的、普及的《母亲杂志》中宣传鼓励婴儿早学走路。母亲在婴儿腋下系根带子，或用手托住婴儿的身体教他学走路。不过，婴儿会说话还是早于会走路。当婴儿开口说话时，大人们对孩子说话作乐的话语就成为有目的的教导了。他们不是让婴儿通过偶然的模仿学说话，而是通过教单词、教语法和敬语来教他讲话，大人和孩子都喜欢这么做。

在日本的家庭中，孩子一学会走路，就开始做各种恶作剧了。他们用手指捅破窗纸，会掉进地板中间的火炉等等。大人们很担心，常常夸大危险，警告孩子们踩门槛是一种“危险”，并坚决制止他们从事危险活动。日本的房子是靠架在地面上的梁柱支撑的，没有地下室。家里人认为小孩踩门槛会让整个房屋坍塌变形。不仅如此，孩子们也不能踩、踏、坐、卧在两张榻榻米的连接处。铺席的尺寸是固定的，按照铺席的大小，房间被称做三铺席房间或十二铺席房间。孩子们经常听大人们讲这样的故事：古代的时候，坐卧在铺席连接处的人会被武士从铺底下插入的剑给刺死。那种厚厚而柔软的铺席很安全，但铺席的接缝处却是很危险的。

母亲常常用“危险”和“不行”等话语来规劝孩子。他们经常使用的第三个规劝词就是“脏”。日本家庭是出了名的整洁的，人们在儿童时期就被教育要重视整洁。

在生下另一个孩子前，母亲一般是不会给婴儿断奶的。近年来，在《母亲杂志》上，日本政府提倡在婴儿8个月的时候，给他们断奶。中等阶层的母亲常常会这样做，但大多数母亲还没有这样的习惯。哺乳非常符合日本人的感情。在他们看来，这是母亲的最大快乐。采用新习惯缩短哺乳期是母亲为孩子幸福而作出的牺牲。他们认同新规定，认为长期喂奶不利于孩子身体健康，也批评不给孩子断奶的母亲，说这是一种自我放纵，说她们没有自制力。他们说母亲没办法给孩子断奶，这是不可能的，只是她下定不了决心罢了，她这是想让孩子一直吃奶，是出于她自己快乐。因为大多数母亲不愿意断奶，也就不可能普及8个月断奶的习惯了。此外，断奶晚还有一个实际的原因即日本人不习惯给刚断奶的幼儿吃特殊的食品。断奶的孩子应该喂稀粥，但大部分孩子从吃母奶一下子过渡到吃成人普通的食品了。牛奶不包含在日本人的饮食中，而且他们也从不给孩子准备特殊的蔬菜。这种情况下，政府倡导的长时间哺乳不利于孩子身体健康的正确性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怀疑。

婴儿一般在能听懂别人说话的时候，就断奶了。断奶前，吃饭的时候，母亲抱着婴儿坐在饭桌前喂他一点食物。断奶后，他们的饭量增加。这时，有些孩子仍要吃母乳，那么喂养他们就是一个问题了。对于那些因为母亲有了下一个孩子而不得不被断奶的孩子来说，不被喂养就更容易理解了。母亲不断地给他们喂点心，让他们不要恋奶。有时候，母亲会把胡椒面涂在奶头上，然后对幼儿嘲笑说，只有小娃娃才吃奶。她们说：“看看你的表弟，他才是个大人呢？他和你年龄一样小，却不吃奶了。”“看，那个小孩还在笑话你呢。你已经做了哥哥了却还要吃奶。”有的小孩在两三岁，甚至四岁的时候，还在玩妈妈的奶头，他们一看见年纪大点的孩子走过


江戸自慢
立花羅漢
祐餓鬼

哺乳的快乐　　《五百罗汉施饿鬼》　歌川国贞　浮世绘

帐中母亲正在为孩子哺乳，露出满足、幸福的神情。日本的母亲总舍不得让孩子断奶，因为哺乳是她们非常大的快乐。同时日本的孩子从小就受到严格训练，在断奶后只能吃成人吃的普通食品，没有婴儿吃的特殊的食品，无怪母亲舍不得了。

来，就会突然松开奶头，佯装没那回事的样子。

有时讥笑的方法能敦促孩子早点长大。从孩子听懂人话开始，这些方法适用于任何场合。比如说，当男孩哭得时候，母亲就说“你又不是女孩子”，“要知道你是个男孩啊”，诸如此类。或者是“你看那个小孩，人家就不哭”。客人带小孩来串门的时候，母亲会当着孩子的面，亲客人的孩子。并说：“我就想要这个小宝宝，就喜欢要这样聪明伶俐的好孩子，你都已经长大了，还只知道淘气。”此时，孩子就会飞奔到妈妈面前，一边用拳头打母亲，一边哭着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我不喜欢这个宝宝，我听妈妈的话。”当一两岁的孩子吵闹或不听话时，母亲就会对男客人说：“请把我的孩子带走吧，我们家里已经不要他了。”客人也会扮起这种角色，并佯装把孩子带走。于是，孩子就像发疯了一样，哭喊着向母亲求救。看到嘲笑已经达到目的，母亲就会和颜悦色地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并要仍在抽泣的孩子发誓，以后不再调皮了。有时，会把这种小型滑稽剧演给五六岁的孩子看。

对孩子还有别的形式的嘲弄。母亲走到父亲的身旁，对孩子说：“我不爱你，爱你爸爸，因为你爸爸是个好人。”孩子就会非常嫉妒，要把父亲和母亲分开。母亲会说：“爸爸不像你，不会在家乱喊乱叫，也不会乱跑。”然后，孩子就顿着脚说：“你在撒谎，在骗人，我并没那样做，我是个好孩子。你不喜欢我吗？”开够了玩笑，父母就相视而笑，他们用这种办法不仅来嘲弄男孩，也同样来嘲弄女孩。

上述这些行为培养了日本成年人对嘲笑和轻蔑的明显恐惧。几岁的孩子不会懂得哪种嘲弄是拿他开玩笑的，对此我们也并不清

楚，但早晚他们会明白的。他们明白以后，这种受人嘲弄的意识和害怕失去一切安全与亲密的恐惧感紧密结合起来。等到他们长大成人受到别人嘲笑的时候，幼儿期的恐惧的阴影就会出现。

这种嘲弄可能会在二到五岁的孩子心中引起更大的恐慌，因为家庭是安全与自由的天堂。无论在肉体还是感情上，父母都有明确的分工，他们很少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在孩子面前。母亲或祖母负担家务并要教育孩子。她们都鞠躬行使礼仪来侍候并崇拜父亲。家庭等级制中的座次非常明确。孩子们也明白，年长者有特权，男人有特权，女人却没有，兄长有特权，弟弟就没有。在人生中的幼儿期间，会被家里所有人娇宠着，对男孩尤其如此。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永远扮演了一个满足他们所有愿望的角色。一个三岁男孩可以把无名怒火发泄在母亲身上。但对父亲，他有的是绝对的服从，不会有任何反抗。他可以对母亲和祖母暴跳如雷，以发泄受父母嘲弄以及要被送给别人的愤懑。不过，不是所有的男孩都会发脾气。不管在农村家庭还是在上流社会的家庭，脾气暴躁是三至六岁孩子的通病。

讥笑的教育方法

日本的母亲常常采用讥笑的教育方法，在孩子哭闹的时候用言语激起孩子的嫉妒心和好胜心，当孩子求救的时候，再对孩子施以温柔，并对孩子提出要求，以达到训练的目的。



幼儿一个劲地用拳头打母亲，又哭又闹，做各种粗暴的事，最后还弄乱母亲珍惜的发髻。母亲是个女人。而他，即使只有三岁也是个男子，他可以把粗暴发泄和无端攻击当做乐趣。

孩子对父亲只能表现出尊敬。对孩子来说，父亲代表了等级制的高层次。孩子必须学习对父亲表示出应有的尊敬。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父亲承担教育子女的任务很少。他们把教育孩子的事完全交给妇女。如果父亲对孩子有什么要求，他也只是用眼神示意或只是讲几句训诫的话。并且，由于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所以孩子们都会马上听从。父亲会利用业余时间给孩子做玩具，父亲在孩子学会走路后偶尔抱抱他，会背着孩子来回走动。当然，母亲也会这样做。对这个年龄段的幼儿来说，日本的父亲偶尔也做一些抚育的工作，而美国的父亲却大都是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全部委托给母亲。

虽然祖父母也是被尊敬的对象，但孩子们可以对他们纵情地撒娇，他们不负有教育孩子的责任。虽然也有的祖父母因不满于母亲对幼儿教育的松弛而自己来承担教养的责任，但这样做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通常，祖母都是从早到晚守在孩子旁边的。日本



男权社会

《在吉原寻欢的武士》 喜多郎胜村 18世纪80年代中期

孩子易于对母亲发火，同日本传统家庭中母亲的地位有着紧密的关系。古代的日本极大地受到中国过去男尊女卑的观念影响，社会以男性为中心，而女性应遵守“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但丈夫却有在外寻欢的特权。



间隔次序照顾方式

在日本传统家庭中，对于多子女的情况，父母会采取按间隔次序照顾的方式，让孩子们结成伙伴，老大照顾老三，老二则照顾老四，形成隔一个次序的亲密的关系。

家庭中，婆婆与媳妇争夺孩子的事经常发生。从孩子的立场看，他可能得到了双方的宠爱，但从祖母的角度看，她常常利用孙子来压制儿媳。年轻的母亲一生中最大的义务就是要讨婆婆的欢心。所以，儿媳不能对祖父母娇纵孙子提出任何异议。常有这样的情形，母亲说不能再给孩子吃糖了，但祖母又会马上给，而且还含沙射影地说："奶奶给的点心没有毒。"在很多家庭里，祖母给孩子的一些东西都是做母亲所不能给予的，和孩子的母亲相比，祖母有更多的闲暇时间陪孩子玩。

日本的家庭中，哥哥和姐姐要宠爱弟妹。在妈妈生下另一个孩子时，这个孩子会充分地感到被夺宠的危险。失宠的孩子极易联想到自己经常亲昵的母乳和母亲的床榻，但这些就要让给新生的婴儿了。母亲会在新宝宝诞生之前告诉孩子：这次，你会有一个活娃娃而不是假宝宝了。以后，你就跟着爸爸睡，而不是跟妈妈睡觉。孩子非常感兴趣地为新宝宝出生作着各种准备。他会为婴儿的出生而感到由衷的激动和喜悦，但这些很快会随着失宠而消失。不过他们对这一切早就预料到了，所以并不觉得特别难受。孩子失宠以后总想把婴儿抱到别的地方去。他会对妈妈说，"把这个宝宝送给别人吧"。于是母亲就回答："不能这样啊，这是我们家的宝宝呀！我们大家都要喜欢他啊。小宝宝也爱你，你要帮妈妈照顾他，好不好？"有时候，这种场面会持续很长时间，对此，母亲似乎并不介意。多子女的家庭会自动出现一种调节方法。孩子们会按间隔次序结成伙伴，老大来照顾老三，老二则负责照顾老四，弟妹们也是隔序亲密。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孩子七八岁

之前，这种安排都不会有什么变化，而且这种安排也不受男女差别的影响。

日本的孩子都有玩具。父母及亲友都会送布娃娃或其他的玩具给孩子们。玩具有些是自己做的，有些则是买的。穷人们几乎都是自己做，不会花钱买玩具。幼儿会拿布娃娃及其他玩具做游戏，比如摆家家、当新娘和过节日等等。游戏之前，他们会先辩论：大人是怎么做的？有时还会辩论不止，甚至就要请母亲来裁决。母亲会在孩子吵架时说“贵人要度量大”，她会劝大孩子忍让。经常使用的话就是：吃亏者占便宜，也就是说，你先把玩具让给小孩子玩，过一会儿他玩腻了，他又想玩别的了，就会把玩具还给你。三岁的孩子可以很快领悟母亲的这个意思。或者，母亲会在孩子玩主仆游戏时让大孩子充当仆人，说大家都高兴，你也会觉得快乐的。在日本人生活中，即使是成年以后，这种吃亏者占便宜的原则也得到广泛的尊重。

除了训诫和嘲弄以外，日本人教育孩子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

吃亏者占便宜　　摄影　日本　现代

参加礼仪队的成员年纪虽小，但表演起来却井然有序，变换队形时，能十分默契地配合。这与日本的孩子从小受到“吃亏者占便宜”的教导密不可分，因此他们才富有谦让、合作、团结的精神。



转移孩子的注意力，连随时给孩子吃糖果也被认为是转移注意力的一个方法。当孩子接近学龄的时候，他们就会采用各种“治疗”方法。如果孩子脾气暴躁、不听话，喜欢吵闹，很难管束，母亲就会带他们到神社或寺院去。母亲的想法是让我们求神佛为他治疗吧。多数情况下，求神佛相当于一次愉快的郊游。施行治疗的神官或僧侣会和孩子严肃地对话，询问孩子的生日和坏毛病。然后他会退至后屋祈祷，再回来宣布已经把病治好了。有时候会说，是因为孩子肚子里有虫子，孩子才会淘气的。于是，他会给孩子作祓清除虫子，然后让他回家。这种方法在短期内有效。日本人其称为“良药”。有时，他们把一种盛满干艾粉的小型圆锥形容器放在小孩的皮肤上，然后用火点燃，这种方法叫做“灸”。斑痕会一直留在孩子身上。艾灸在东亚一带是古老的流行疗法。日本也有这种传统，它被用于治疗各种疾患。艾灸除了可以治疗脾气暴躁还可以治疗固执己见。六七岁的小孩就是这样接受母亲或祖母的治疗的。对于一些难治之症，需要治疗两次。但是，很少有需要治疗三次的淘孩子。艾灸并不是一种惩罚，不是美国人说的“你这么干，我可要揍你”那种。不过，艾灸的苦痛远胜过挨打，于是，孩子们懂得，不能淘气，不然就要被惩罚。

培养孩子具有必要的身体技能，除了上述对付调皮孩子的各种方法外，还有其他的很多方法。家长们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各种动作，孩子则必须老老实实模仿。两岁前，父亲就让孩子两腿盘起来，脚背贴着地板，盘腿端坐。刚开始的时候，孩子会很容易仰面朝天。端坐的要领之一是身体要稳定，不可以乱动，不能随意改变姿势。日本人说，端坐的诀窍就是放松全身，让自己处于被动的状态。父亲要亲手按住孩子的腿来培养这种被动性。孩子要学的不仅是坐的姿势，还有睡觉的姿势。日本妇女对睡姿优美的严肃性就像美国妇女不能被人看到裸体一样。为了让外国人的认可，日本政府曾把裸浴列为陋习，此前，日本人并不认为公开的裸浴是令人害羞的，但

对妇女的睡姿却特别做以强调。男孩怎么睡都不要紧，女孩就必须要并拢双脚，然后直身而睡。这是男女有别的一个早期规则。和其他所有的规则一样，这种要求对上层阶级比对下层阶级严格。杉本夫人（悦子）谈到她的武士家庭教养时说：“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晚上总是静静地小心躺在小小的木枕上。……不论在什么场合，武士的女儿就连睡觉的时候也必须做到身心不乱。男孩可以四肢叉开睡，他们呈‘大’字形，手足也可以乱放。女孩睡觉却必须小心翼翼，要曲身庄重地呈现‘き’字形。这代表了一种自制的精神。”日本妇女告诉我，晚上睡觉时，母亲或奶妈会帮她们把手脚放规矩。



女性需要学会自制　　《辰时 · 双双就寝》

艺伎每次做发型都颇为费时，于是为了将打理好的头发多保留几天，她们所睡的枕头都是特制的，又细又长，只能给脖子提供一个支点。然而在日本，不仅艺伎需要进行这样的苦修，每个女子都需要这样，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培养自制力。

老师会手把手地教授孩子传统书法。这是为了让孩子体会感受。孩子还不会写字甚至还不认字以前，他们就要体会那种慢条斯理、有板有眼的运笔方法。近代，在大班的教学中，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经常看到这种教授方法了，不过仍然会时有所闻。在行礼、用笺、射箭以及背枕头以代替背婴儿的时候，大人们都是手



书道　　摄影　日本　现代

日本的书法称书道，最早是从中国而来，一位名叫王仁的人去往日本，带去了系统的汉字和汉文的典籍，从此日本人开始学汉文。到了推古天皇朝代，日本与隋朝建立了邦交，随着留学生和留学僧的归国而带去了中国书法。后来日本又开始崇拜王羲之，这对于日本的书法的形成起了很大影响。到后期的假名书法出现时，书道终于有了自己的特色。

把手地教孩子运指并把身体摆正。

上学之前，孩子与附近的孩子们一起自由玩乐，但上层阶级除外。在农村，不满三岁的孩子们就开始有小小的游戏集团了。在乡镇和城市里，在行人拥挤的街头，车辆出入的地方，孩子都可以自由玩乐。他们是拥有特权的人。他们可以在商店周围乱转、站在旁边听大人说话、玩踢石子和橡皮球。当他们聚集在村社玩耍嬉戏的时候，氏神会保护他们的安全。上学之前以及上学后的头两三年里，男孩会与女孩结伴一起玩。不过，一般是同性之间的孩子最亲近，尤其是同年龄的孩子最容易结成亲密的朋友。在农村，这样的同年集团可以持续一辈子，持续性要超过其他任何集团。在须惠村，上了年纪的人，随着性关系的逐渐减退，同年人集会就成了人生的真正乐趣所在。须惠村的俗话说：同年比老婆还要亲近。

学龄前的儿童集团相互之间是毫无拘束的。以西方人的视角来看，许多游戏是在毫不害臊地干一些猥亵事情。由于日本的家庭居室狭窄，大人又喜欢随便谈论，孩子们很早就有了关于性的知识。并且，当母亲逗孩子和给孩子洗澡时，也经常指戳着生殖器，特别是男孩的阴茎。只要注意场合和对象，日本人一般是不会责备孩子的性游戏的。他们也不觉得手淫是件危险的事。伙伴之间随便相互揭丑（如果是大人，这种揭丑就是侮辱了）或炫耀（如果是大人，这种自炫又会引起耻辱感）。而对于孩子，日本人却平静地笑着说道，“孩子怎么知道什么叫羞耻”，

并补充说，“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幸福”。这就是幼儿与成人之间的巨大差别。因为，如果一位成年人被说成是不知羞耻就相当于被骂是死不要脸。

处在这种年龄段的孩子们经常互相议论对方的家庭和财产，他们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父亲。比如，他们会说：“我爸爸的本事比你爸爸大”“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他们甚至为夸耀各自的父亲而动手打架。美国人则认为这类事情是不值得介意的。在日本，孩子们自己这类说法完全不同于他们耳闻的情况。大人都谦称自己的家是“敝宅”，尊称邻居的家为“府上”、“贵府”。日本人都承认，幼儿的数年间，从形成游伴到小学三年级即大约九岁左右的时候，他们是强烈主张个人本位主义的。有时候他们说“我当主君，你当家臣”，“不行，我不当家臣，我要当主君”，有时他们为了炫耀自己而贬低别人。总之，孩子可以想什么就说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知道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了，所以，他们就静静地等待，没有人问的话就不会自己说，他们再也不会炫耀了。

日本的孩子是在家庭中学到对超自然神灵的态度的。神官和僧侣并不教孩子。只有在民族节日或祟日，孩子才有组织地接触宗教，神官会像对待其他参拜者一样为他们洒祓灾水。家长会让有些孩子去参加佛教仪式，不过，这大都是在特别的祭祀日。以家庭佛坛和神龛为中心而举行的家庭祭祀是孩子们经常接受的也是最深刻的宗教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祭祀家族祖先牌位的佛坛，那里供着鲜花、香火和某种树枝。人们每天都要供奉食品。家庭中的年长者要把家里发生的一切大事都报告给祖先，他们每天都要跪拜。傍晚还要点上小小的油灯。人们经常说，他们一离开家里这一套祭告，心里就不踏实，所以不愿意在外面过夜。神龛只是一个简单的棚架，从伊势神宫取来的神符之类的东西供奉在里面，人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供品放进去。厨房里有被烟熏得发黑的灶神，窗户和墙壁上贴着很多护符。这些都是用来保证全家平安的。由于有大慈大悲的众神镇



同年之谊

日本的孩子容易在同性之间形成小团体，而且同性之间的感情非常之深，他们在一起学习、玩乐、祭祀，这样的亲密关系会一直保持到老年。

守，村里的镇守神殿同样也是安全的地方。母亲们倾向于让孩子在安全的神殿内玩耍，孩子们的经验中没有怕神的概念，他们不必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神灵的旨意。众神被人崇拜，他们又要给人间赐福。但他们并不是当权者。

男孩在入学两三年后开始了真正的训练，他们被纳入到成年人那种谨慎的生活模式中。此前，孩子要学习控制身体。如果他太淘气，就会“治疗”，大人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会受到和蔼的规劝，有时候也会被嘲笑。但他却可以恣意做一些事情，包括可以粗暴地对待母亲。这些助长了他的自我中心主义。入学最初的三年是男女同校读书。并且，男女老师都很喜爱孩子，会和孩子平等相待。但是，家庭和学校都反复叮嘱他们不要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由于年龄尚小，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大人们必须教导他们不要使自己难堪。比如，一个故事里的男孩，竟然在没有狼的情况下，瞎喊“狼来了！狼来了”以此愚弄别人。如果你们也这样做，人们就不会相信你了。像这样，就是件很难堪的事情。很多日本人说，他们做错事的时候，首先遭到的是同学的嘲笑，而不是老师或家长的责备。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个时期，家里年长者的责任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教育孩子将受人嘲笑与根据“对社会的情义”而生活结合起来。在孩子六岁左右的时候，忠义献身的故事里（即前文所述的六岁儿童读本中义犬报答主恩的那种感人故事）所提倡的义务，开始成为对他们的一系列约束。长辈会对孩子说，“这样下去，世人会耻笑你”。日本有很多规则，这些规矩因时因事而异，大多数规则和我们所说的礼节有关。这些规则都要求个人意志要服从于逐渐扩大的对邻居、家庭和国家的义务。个人必须学会自我抑制，必

须对自己所承担的“债务”有所认识，并逐渐把自己置于欠恩负债的地位，如果想还清恩情债，他就必须谨慎处世。

地位的变化以崭新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把幼儿期对孩子的嘲弄方式传导给正在成长的少年男孩心中。八九岁的时候，孩子有时就要受到家人真正的排斥和打击了。如果老师把他在学校不听话或不逊的举动告诉家长，或者报告他的操行分不及格，家人便会不理他。倘若店主人指责他做了某种淘气的事，这就意味着他侮辱了家庭名声，会遭到全家人的批评指责。我认识的两个日本人在十岁以前曾两次被父亲逐出家门，因为羞耻，不敢去投奔亲戚。他们在学校也受到了老师的处罚。两个人只能呆在外边的窝棚里，后来母亲发现了他们，经调解才让他们回家。有时候，小学的高年级孩子会被关在家里“谨慎”，就是“悔过”，他们要一心一意地写日本人十分重视的日记。总的来说，这个男孩在家人心目中是他们在社会上的代表。小孩一旦受到社会的非难，就会被全家人反对。如果违背了“对社会的情义’，他就别期望会得到

对社会的情义　　土屋功 摄影 大阪 现代

这是被重油污染的海岸，沿海的居民正在奋力清除油污。这个日本男孩年纪不大，却已经像个成年人那样开始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了。在日本，孩子的教育十分重视对社会的情义和责任的强调，如果孩子们不能遵守社会道德，回报社会情义，那么孩子本人连同他的家庭将一起受到社会的非难。





穿红色和服的女孩

在过去，日本的女孩与其他亚洲少女相比，她们拥有更多自由，可以穿鲜红的衣服，可以与男孩子在外面玩闹取乐。

家庭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同年人支持他。如果犯了错误，也会被同学疏远，他必须道歉并发誓不再犯同样错误，不然，伙伴们就不会理睬他。

就像杰佛里·格拉所说的："只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上述种种约束达到了不寻常的地步。在有大家族或其他宗派集团的社会中，当一个集团成员受到来自其他集团的非难和攻击时，该集团一般都会一起袒护。只要能够继续得到本集团的赞同，他就坚信自己在遭到袭击或有必要时，本集团会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所以他敢于和本集团以外所有的人对抗。但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那就是，只有在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后，一个人才能指望得到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部人对他不赞成或加以非难，本集团的人也会反对和惩罚他，除非他可以让其他集团撤销这一非难。因为这种机制的存在，日本人把被外部世界赞同看得非常重要，这是其他任何社会不能相比拟的。"

这段年龄之前，男孩和女孩接受的教育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略微有点差异。在家里，女孩子受到比男孩子更多的约束，虽然男孩有时候也要看护婴儿。大一点的女孩子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女孩子总是在最后接受赠礼和关怀。她们不能像男孩那样脾气暴躁。不过，和其他亚洲少女相比，她们拥有的自由是惊人的。她们可以穿颜色鲜红的衣服，可以和男孩子一起在外面玩闹取乐，而且常常一点也不认输。她们在幼儿期也"不知耻"。六岁到九岁期间，她们逐渐明白了对社会所负有的责任，其情况和体验与男孩基本相同。九岁以后，学校就让男女分班学习了，男孩们慢慢重视新建立起来的男性团结。他们开始排

斥女孩子，害怕被人看见与女孩子说话。女孩子也被母亲告诫不要与男孩交往。据说少女处于这个年龄的时候，很容易郁郁寡欢，不喜欢外出，很难教育。这被日本的妇女说成是“童欢”的终结。女孩的幼年期随着遭到男孩的排斥而宣告结束。今后的很多年里，她们的人生道路只能是自重再自重。无论是订婚的时候，还是结婚以后，她们会接连不断地受到这样的教训。

当男孩子知道了“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的时候，还不能说他已经懂得日本男人应当负担的全部义务。日本人说：“从十岁起男孩就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情义’。”这句话是指“义在憎恶受辱”。他必须学习这类规矩：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采用间接手段来洗刷污名。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要孩子学会在受到侮辱时进行反击。男

涩谷女孩

涩谷是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现在的涩谷四处游荡着很特别的“涩谷女孩”。她们追求后现代生活，着迷于电子游戏、流行偶像、日本漫画；她们对奇装异服趋之若鹜，把自己打扮成“电玩少女”，部分女孩甚至从事色情交易，为了满足购买欲和虚荣心。她们被称为“消沉的一代”，是日本社会经历的战后漫长的低迷期、转型期、调整期，造成了价值观与传统文化断裂的“新人类”。



孩子从小就已经学会对母亲粗暴，和年龄相仿的孩子们相互诽谤和抗辩，没有必要十岁以后再学习如何攻击对手。但是，“对名分的情义”的规范要求十几岁的少年也要服从相关的规定，从而将他们的攻击方式纳入到公认的模式中，并提供特定的解决方法。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日本人通常不是攻击别人，而是把攻击指向自己。儿童也不例外。

少年从六年制的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后（约占总人口的15%，男孩比例较高），立刻就卷入到激烈的中学入学考试竞争中。竞争涉及每个考生和每门科目。不久，他们马上就要承担“对名分的情义”的责任。他们对这种竞争并没有经验，这是因为小学和家庭里都很少有竞争的环境。这种突然而来的竞争异常激烈并令人担忧。他们开始竞争名次并怀疑别人的私情等。不过，在追忆往事的时候，日本人谈得最多的并不是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在中学高年级学生欺侮低年级学生的那种习惯。高年级的学生会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并想方设法欺侮他们。低年级

尚仇的心理

日本人从少年起就开始经历激烈的竞争和沉重的社会压力，面对这样的压力，他们会以暴力方式寻找发泄口。于是不能取胜的一方会受到很大的羞辱，导致他们暗自磨练，以达成报仇的心愿。



学生被迫表演各种受捉弄的角色。低年级学生都十分憎恨这种行为。因为，对于这种事情，日本的男孩子是不会用开玩笑的态度来看待的。一个男孩子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受尽屈辱，用四肢爬行，过后，他会咬牙切齿地计划报复。并且，因为他不能立即实施报复，所以就记恨在心，对此耿耿于怀。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关系到“对名分的情义”，属于道德问题。很有可能，几年后，他会利用家庭的势力撤销对方的职位，或者努力钻研剑术、柔道，毕业后在大街上当众复仇，捉弄对方。总而言之，如果此仇不能有朝一日得以雪耻，他就会觉得心事未了。这正是日本人崇尚复仇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些少年并没有升入中学，他们在军队训练中得到了同样的体验。通常，每四个青年就有一人被征去当兵。而且，相比与中学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欺负，二年兵对一年兵的侮辱更胜一筹。对此，军官毫不在意，士官也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干预。日本军规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申诉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士兵间的争执都是自行解决的。军官认为这是部队锻炼的一种方式，他们不会参与其中。二年兵一股脑地把上一年的积恨发泄到一年兵身上，千方百计地侮辱一年兵，以展示他们受锻炼的水平。据说一旦接受了军队的教育，征集兵就立刻发生了改变，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可是，并不是因为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才导致了这种变化，也不是由于他们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发生这种变化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经受了各种屈辱刺痛的体验。在日本家庭生活中，接受了日本式教养并对自尊极为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到这种环境，就非常容易变得野蛮。他们不能忍受屈辱。他们认为这种折磨是一种排斥，他们也会因此变成擅长折磨别人的人。

是日本古老的嘲笑和侮辱习俗让近代日本的中学及军队中的上述事态具有了这种性质。不过并不是中等以上的学校和军队创造了

日本人对这类习俗的反应。很容易看出，在日本，因为“对名分的情义”的传统规范的存在，这种嘲弄行为使人更难忍受。尽管到时候，被嘲弄的集团会依次虐待下一个受难集团，但这并不会让那个被侮辱的少年停止千方百计的报复，这种行为方式和日本的古老模式是一致的。在许多西方国家中，经常会看到找替罪羊来发泄积愤的民间习俗。比如，在波兰，一个新学徒或年轻的收割手遭到嘲弄后，不是向嘲弄他的人泄恨，而是发泄到下一代徒弟或收割手身上。当然，日本的少年也会采取这种方法来消除怨恨，不过，直接复仇还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必须直接报复虐待者，被虐待者才会感到痛快。

在战后重建日本的事业中，关怀日本前途的领导者们，特别关注这种战前日本成年学校和军队中侮辱和戏弄青少年的习俗。他们充分强调“爱校精神”和“老同学关系”，以此来消除大欺小、高压低的旧习。虐待新兵必须在军队中绝对禁止。虽然老兵应该严格训练新兵，就像日本的各级军官一样，在日本，严格的要求算不上是侮辱，但嘲弄和虐待就是侮辱了。在学校和军队中，只要发生上级或老兵让下级或新兵学小狗摆尾巴或者要他们学蝉鸣，或者在吃饭时间让他们“立大顶”这一类的事情，一律惩罚这些上级或老兵。如果这种变化发生，其对日本的教育作用将比否定天皇的神格以及从教科书中删除国家主义内容更加明显。

“对名分的情义”的准则不需要少女，她们不必经历男童那种在中等学校及军队训练中的体验，类似的体验也没有。和男子相比，她们过着更平稳的生活。从懂事的时候起，她们就被灌输一种教育：所有的事情都是让男孩优先，礼品关怀都没有女孩的份。有些处世的规则，她们必须遵守，她们没有公然表白和自我主张的特权。虽然这样，在婴幼儿时期，她们也享受了和男童同样的日本幼儿特权。尤其是当还是幼女的时候，她们被允许穿鲜红的衣服。长大后，她们就不能穿那种颜色的衣物了，等到第二个特权时期，即到了六十

岁后，她们才可以再穿。她们在家里也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可以受到彼此并不和睦的母亲和祖母的双重宠爱。此外，弟弟或妹妹总是要姐姐和家里的其他人和他们关系最亲密。孩子们为了表示关系最亲密，也要求和她一起睡。并且她经常把祖母给予她的恩惠分给两岁的孩子。日本人不喜欢一个人睡。晚上，幼儿可以紧挨着自己喜欢的年长者睡。两个人的睡床紧挨在一起就可以证明“你对我是最亲的人”。九岁十岁后，男孩在玩游戏的时候就把女孩排除在外了，但女孩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她们可以彼此炫耀新发型。在日本最讲究的就是十四岁到十八岁姑娘的发型。在此之前只能穿棉布的衣服，现在她们可以穿丝绸做的衣服了。此时，家里人会设法把她们打扮得更加漂亮。女孩子这样也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



日本的女孩节

每年的3月3日是日本的女孩节（雏祭り／ひなまつり），这一天，女孩会有特别的权利。这天，凡是有女孩子的家庭都会在客厅里设置一个阶梯状的偶人架（雏坛／ひなだん），在上面摆放各种穿着日本和服的小偶人（玩具娃娃）和橘花或樱花的盆景，以庆祝女孩健康成长。这些小偶人，有自己制作的，也有买的，一般以姥姥家的人送来的居多。日本人家只要有女孩降生，父母、祖父母或者亲戚朋友就都会送她一套精致漂亮的小偶人。在女孩节这天，她们却都会穿起漂亮的和服，邀来自己最亲密的伙伴，大家围坐在偶人架前，尽情地吃、喝、说笑、玩耍，愉快地欢度节日。

各种各样的约束也是女孩子必须遵守的，她们无需被父母强制，要自己直接承担这些义务。父母亲不是通过体罚来行使对女孩的家长权，他们通过平静而坚定的心态来期待女儿按照要求生活。下面就是这种教养方法的一个例子，很值得引用，它说明了女孩子所受的那种不很严厉的教养方式的特点。从六岁开始，由一位博学的儒者来稻垣钺子传授汉文经典：

授课期间的两小时里，老师除了双手和嘴唇活动外，几乎纹丝不动。在面前的榻榻米上，我也同样端坐得纹丝不动。有一次，上课期间，不知什么地方不舒服，我略微挪动了一下，屈起的双膝角度稍微偏移了一下，老师脸上就立刻流露出不满的神情。他轻轻地把书合上、慢条斯理但又很严峻地说："小姐，很显然你今天的心情并不适合学习，请您回房好好思考思考吧。"我幼小的心灵羞愧得无地自容，但没有任何办法。首先，我对着孔子的像行礼，然后给老师行礼道歉，最后，我毕恭毕敬退出书房。我小心谨慎地来到父亲跟前，和平常上完课那样跟父亲报告。因为下课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看到我很诧异。他似乎是无意地说："你的功课学得真快啊？"这句话听起来简直就像丧钟一样。至今，每当我想起这件事，仍然能感到内心深处在隐隐作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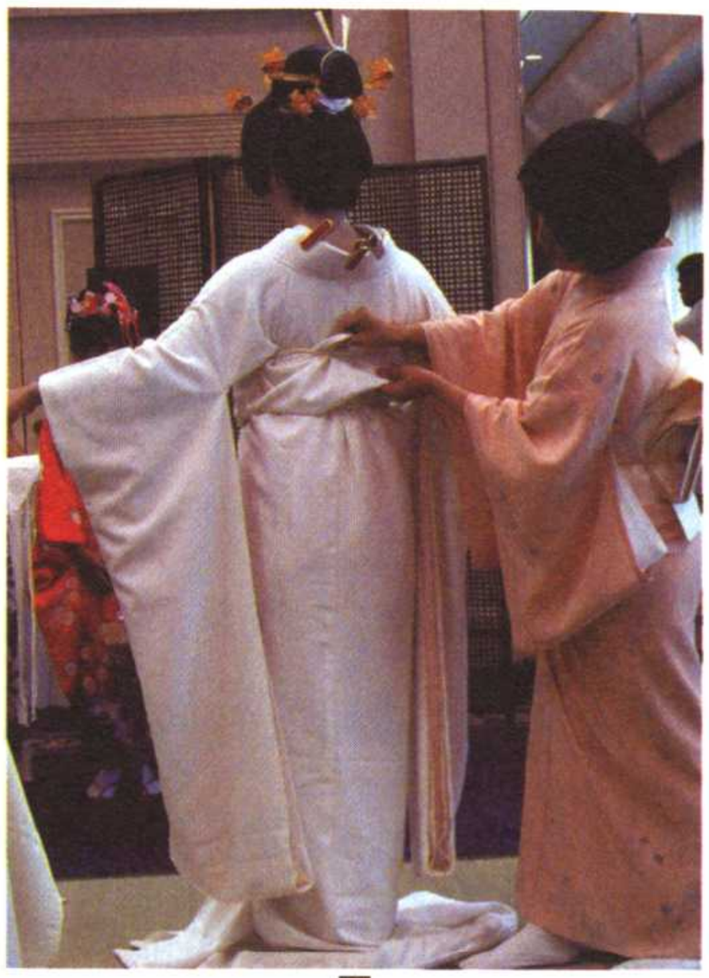
杉本夫人在一处描写她的祖母时，简洁明了地揭示了日本父母教育子女的态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祖母态度安详，她希望每个人做事的时候都按照她的想法去做。祖母既不会叱责我们，也不会争辩什么，但她的希望像真丝一般柔软而又坚韧，这让我们小家族沿着她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种"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又坚韧"的希望，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么好的效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每一种工艺和技术的训练都十分明确。女孩子学到的不仅仅是规则，而是习惯。幼儿时期正确用箸的手势，进入房间时的姿态，以及成年后对茶道和按摩的学习，没有一样不是经过长辈手把手教自己又反复不断地练习直至娴熟而



1



2



3



4



5



6



7



8

穿和服的步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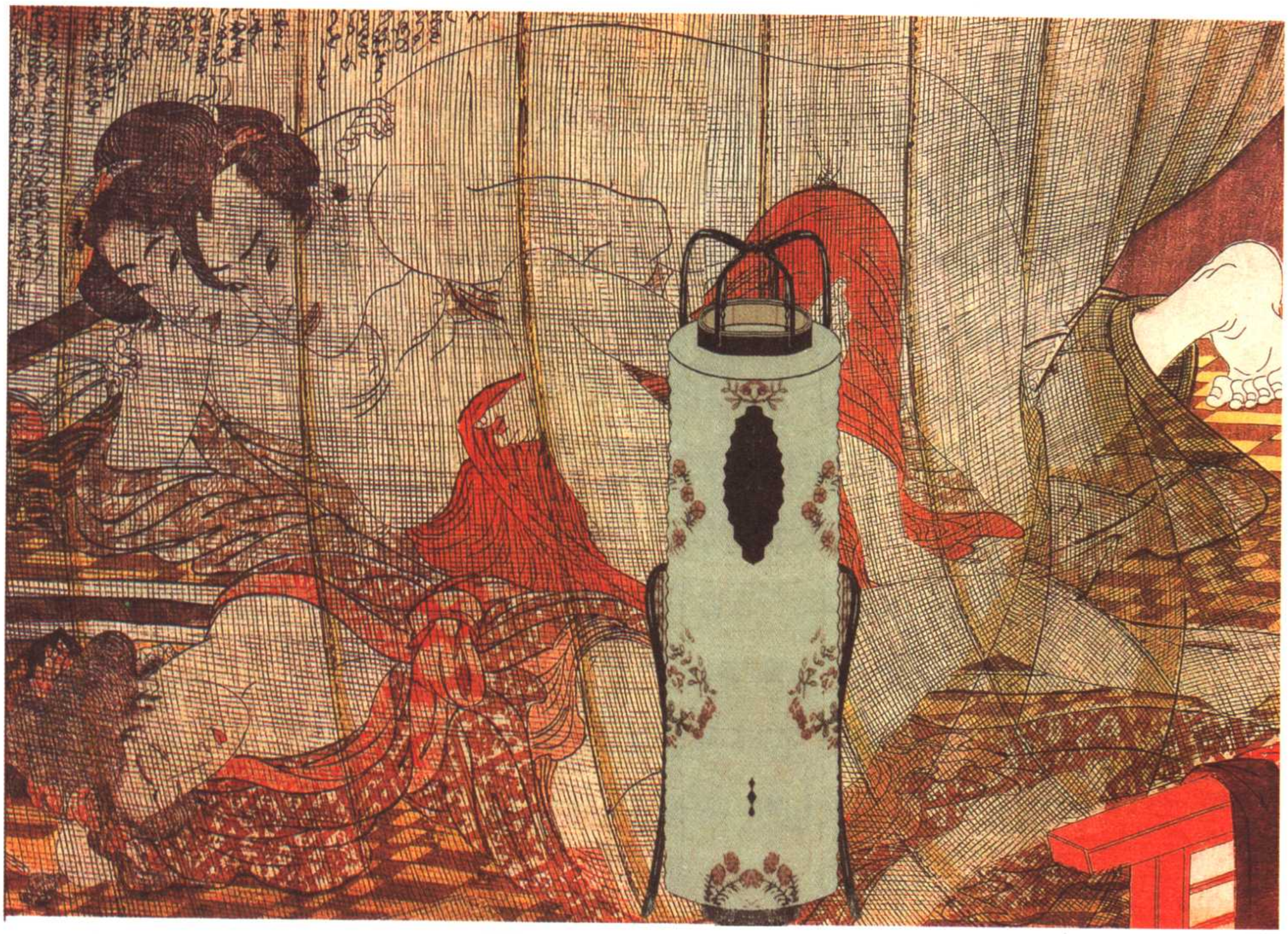
1. 用带子束好和服内衬。
2. 将衣领拉至合适高度，用夹子夹好，并将腰带的内衬系在带子上。
3. 将腰带一圈圈缠在腰上。
4. 将腰带在背后打结，只有老练的熟手才能将腰带打得漂亮。
5. 取下别在衣领上的夹子，在腰带上再系上一条装饰的绳，这是近来才开始流行的做法。
6. 在胸前别上漂亮的花饰。
7. 披上华丽而厚重的和服外袍。
8. 一切就绪，拿上一把折扇就可以与发出邀请的男客出游了。

形成习惯的。长辈们从不认为孩子们到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学到这些正确习惯。杉本夫人对她十四岁订婚后如何学习伺候未来的丈夫用餐作了描绘。此前，她从未见过未来的丈夫。丈夫在美国，她在国内的越后。在母亲和祖母的亲自监厨下，她反复地下厨做几样据哥哥说是松雄（即未来丈夫）特别喜欢吃的食物：我设想他就坐在我身旁，我要为他夹菜，并劝他开始吃。就是这样，我学习如何关心未来的丈夫，如何让他感到愉悦。祖母和母亲也总是装作松雄站在我们眼前那样问这问那的。我也像是丈夫真的就在房间里那样注意自己的服饰和动作。就是这样，我学会了如何尊重丈夫，以及尊重我作为他妻子的身份。

虽然不像女孩那么严格，男孩也要通过实例和模仿接受细致的习惯训练。学了习惯之后就不能再违反任何习惯了。青年期以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依靠自己的主动性。长辈从不会把求爱的习惯教给他。一切公开表现性爱的行动都被家庭禁止了。并且，从九岁十岁起，如果男孩和女孩之间没有亲属关系，那他们就不能同席了。日本人的理想是双亲要在男孩确定对性感兴趣以前就为他订下婚约。所以，男孩接触女孩的最好态度就是害羞。这个话题常被农村人用来取笑男孩子，使他们总是害羞。不过，男孩子仍然会设法学习。以前，甚至最近，偏僻农村的许多姑娘就充斥这种玩笑。婚前的性经验并不属于人生大事的自由领域。议婚时，父母也不在乎这些事。到了今天，就像须惠村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博士所讲的那样，女佣人也受到了教育，她们知道要保持自己的贞洁。男孩子进入中学后被严禁与异性有任何交往。两性在婚前的亲密交往受到日本教育和舆论的竭力禁止。那些对年轻妇女随便就表示亲密的青年被日本的电影描述成“坏”青年，而所谓“好”青年是指那些对可爱的少女采取在美国人看来是冷酷甚至粗野态度的青年。如果一位青年对女人表示亲昵，这就意味着他是放荡、追逐艺伎、娼妇和咖啡女郎的人。学习色情艳事的最好方法是到艺伎馆去，因为艺伎

会教你，作为男人只需悠然旁观就可以了。他不必顾虑自己的笨手笨脚，也不期望和艺伎发生性关系，然而，能到艺伎馆去的日本青年并不很多。多数还是到咖啡馆去看男人是如何亲昵女人的。不过，这种观察与他们在其他领域的训练不是同一类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男童都会担心自己的笨拙。性行为是他们生活中无需由值得信任的年长者亲自指导而只能自学的极少数领域之一。有地位的家庭，会在年轻夫妇结婚时，把《枕草子》和绘有各种姿态的画卷交给他们。犹如一位日本人所说："看书就能学会。这就像是布置庭园，父亲并不教儿子怎样布置日本式庭园，但上了年纪，儿子自然就会学会这种嗜好。"性行为和园艺都被他们看做是到时候看书就会的东西，这很有意思。虽然日本的大多数青年是通其他的方法来学习性行为的。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靠成年人的教导学会的。这种训练上的差异使青年深信，性是属于与人生大事无关的另一领域，从而不必经过长辈的亲自指教和严格训练来培养这种习惯。这是一个可以完全由自己掌握来获得满足的领域，尽管他常常对此惴惴不安，甚至感到迷惑。结婚后，男子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面享受性的快乐，这样做丝毫都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更不会威胁到家庭的关系。

妻子就没有同样的特权了。她的义务就是对丈夫保持忠贞。即使被勾引，也只能偷偷进行，日本妇女很少有可以隐秘私恋而不被发现的。如果有的妇女神经过敏或心绪不宁，她们就会被说成患有歇斯底里。"妇女最常遇到的困难不在于社会生活中，而在于性生活上。很多精神不正常的妇女以及大多数的神经过敏患者，发病的原因多半是由于缺乏性协调。妇女的性欲只能靠丈夫的随意来满足。"须惠村的农民们说，大多数妇女的病始于子宫，然后往头部蔓延。如果丈夫只对其他女人迷恋，妻子就会求助于手淫。从农村到高贵的家庭，妇女都私下藏有手淫的传统器具。在农村，如果妇女已经生了孩子，她就可以随便地谈论性了。做母亲以前，她绝不



欢场的游戏　　柳川重信 浮世绘

这幅浮世绘的描绘，就是日本男子游乐于艺伎馆的场景。日本的男人可以随意地与艺伎游乐，美酒佳肴、笙歌曼舞可以让他们忘记生活中的种种纷扰。

会讲一句关于性的玩笑，当了母亲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男女混杂宴会中充斥着这种玩笑时。她们还会伴着猥亵小曲的节拍而扭腰摆臀，她们会毫无顾忌地跳色情舞蹈来娱乐宾客。这种娱兴一定引起哄堂大笑。在须惠村，村里的人会到村外迎接服役期满回乡的士兵。每当这时，妇女们就会女扮男装，互相开下流玩笑，还佯装要强奸年轻的姑娘。

就是这样，在有关性的问题上，日本妇女也有自由。她们越是出身低微，拥有的自由空间就越大。一生的大部分期间，她们遵从诸多禁忌，但男女间事不必忌讳。她们在满足男人的性欲时是淫荡的；同样的道理，在满足男人性要求的同时，她们会克制自己的性欲。到了成熟年龄后，女人就开始抛开禁忌，倘若出身比较低微，那么她的淫荡不会比男人差。日本人在不同的年龄和场合下对妇女的行为有不同的要求，和西方国家不同，不要求她们有完全不变的性格，也不会简

单地把她们分成贞女和淫妇。

男人们也是这样，有时候恣情放纵，有时候节制谨慎，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现。对男人来说，最大乐趣就是和男友一起去喝酒，如果有艺伎在一旁陪座，那就更惬意了。日本人很喜欢醉酒，没有规定要节制饮酒的习惯。两三杯酒下肚后，他们就会去掉平常严肃拘谨的姿态，相互之间倚躺着，表现得无比亲密。除极少数难以相处的人会吵闹外，一般喝醉的人是很少有粗暴行为或彼此打架的。除喝酒这种自由领域外，日本人认为，男人绝不能干别人讨厌的事情。一个人如果在生活的重要方面被人指责为讨厌，这就仅次于日本人常用的骂人话“马鹿”（即浑蛋）。

过去所有有关西方人与日本人矛盾性格的描述，都可以在日本人对儿童的教养中得到理解。正是因为这样的育儿方式，日本人的人生观中具有了两面性，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面。儿童时期，他们过的是有特权的娇纵生活，以后，在接受各种训练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保持着对那种“不知耻”年代的欢乐生活的记忆。他们不必描绘未来的天堂，这是因为，过去他们曾经拥有过天堂。他们用自己的术语描绘的童年时代的生活是：人是性本善的，众神是慈悲的以及作为一个日本人是无比光荣的。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种极端的观念上，即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佛种”（成佛的可能性），死后都能成为神。这种观念使他们变得固执而又相当自信，这是他们不管自己的能力差距多远都愿意做任何工作的思想基础，也是使他们敢于坚持己见，甚至是以死力谏反对政府来证明自己正确的思想基础。有时候，这种自信会让他们陷入集体性的狂妄自大中。

六七岁以后，他们身上逐渐增加了“谨言慎行”、“知耻”，这一类的责任，而且开始背负强大的压力；如果他有过错，就会遭到家庭的反对。这种压力虽然不像普鲁士的纪律一样，但却也无法逃避。在拥有特权的幼儿时代，有两件事情为这种必须履行义务打下了基础：一是父母会坚决地训练孩子便溺习惯并纠正各种姿式；一

是父母经常嘲弄孩子，吓唬他说把他遗弃。这些幼年时代的经验让孩子们早就准备好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遭到“世人”的耻笑和遗弃。幼儿时期那种无拘无束、公开表达的冲动也被抑制。并不是这些冲动不好，而只是因为已经不合时宜了。他现在正步入严肃的生活。伴随着对童年特权的逐渐否定，他被允许享受成人的更大乐趣，而幼年时代的那些经验也绝不会真正磨灭。童年的经验会随时为其人生哲学供给经验。他对“人情”的承认，也是对幼时的经验的回复。整个成年期间，在他生活的“自由领域”内，他又开始重新体验童年时代。

日本儿童生活的前期和后期被一个显著的连续性联结起来，那就是获得伙伴的承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深扎根于儿童心中的是这一点，而不是绝对的道德准则。儿童时代前期，当他长到可以对母亲撒娇时，母亲就让他睡在自己的床上，他就会比较母亲给自己与兄弟姐妹们点心的多少，以此来判断母亲对他的重视程度。遭到冷淡的时候，他可以敏感地察觉到，他甚至会问姐姐：“你最疼爱的是不是我？”到了童年的后期，他更加要放弃个人的满足，得到的补偿是“世人”的赞许和接受，受到的惩罚则是被“世人”的嘲笑。这当然是大多数文化施加给教育儿童的压力。然而，在日本，这种压力尤其沉重。在孩子的心目中，被“世人”抛弃就是被母亲嘲弄威胁要遗弃他。所以，整个一生中，遭到伙伴的排斥是比挨打还要可怕的事情。他非常敏感于嘲笑和排斥的威胁，即使仅仅是浮现在脑海中的念头也会感到可怕。事实上，由于在日本很少有秘密可能保持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几乎事无巨细地为“世人”知晓，如果对此不同意，就可能排斥掉他，这绝不是主观猜测。况且考虑到日本的房屋结构，板壁很薄，既不隔音，白天也敞开着。所以，那些不能修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他们的私生活就完全暴露在外面了。

日本人使用的某些象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因儿童教养的不连



世人的关注　　中村宗则住宅　京都　19世纪

这是典型的日式房间布置——薄薄的壁板往往不隔音；地板上铺着榻榻米草席，草席有着标准尺寸，因此房间的大小即由草席数决定；门、窗可以左右滑动，就是现在常见的滑动式拉门、拉窗。这种房屋结构是开放式的，通常是敞开，屋内的一切都易于被外界洞察。

续性而造成的两面性格。幼年期造成的一面是“不知耻的自我”。这使他们成年后不免经常对镜自照，以查看自己还剩下多少儿时的天真。他们说，镜子“反映的是永恒纯洁”，既不培养虚荣心，也不反映“妨我”，反映的是灵魂深处。人会从镜子里看到“不知耻的自我”。在镜子里，他将自己的眼睛看成是灵魂的“窗子”，这有助于使他作为一个“不知耻的自我”而存在。他从镜子中看到理想的父母形象。相传有不少人因此随身带着镜子。甚至会有人在佛坛上放一面特殊的镜子，以静观其身，反省灵魂。他“自己祭自己”，“自己拜自己”。虽然这并不寻常，但也花不了什么工夫。因为所有人家的神龛上都放着镜子以作为神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电台曾经特意播放过一首歌，赞扬的是几位女学生自己花钱买了一面镜子放在教室里；这绝不会被人认为是虚荣心的表现。大家只会说这是她们灵魂


六玉川屑雀墨
喜多川歌麿筆

对镜自照　　《化妆》二代歌麿 浮世绘

镜子是日本女子梳妆的必备之物，然而镜子还有自省的功用，可以以静观身，一日三省，回归善良，消除“观我”。

深处重新焕发了为献身于坚毅的目标的精神。揽镜自照是一种测试精神高尚与否的外观活动。

在培育孩子心目中的“观我”观念之前，日本人就早已对镜子产生了感情。当他们照镜时，看不到“观我”，但镜中所反映的自我就像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一样，当然是善良的，无需用“耻”来开导自己。他们赋予镜子的这种象征性打下了自我修养以求“圆熟”的基础。通过这种自我修养，他们坚持不懈地消灭“观我”，以求回到儿时的天真率直。

尽管日本人受到了幼儿期的特权生活的种种影响，但他们并不认为童年后期建立在耻感道德基础之上的各种约束纯粹是对特权的剥夺。如上所述，自我牺牲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日本人却常常对这种看法发起攻击，否认所谓他们在自我牺牲上的看法。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说自己是在“自觉自愿”为“尽忠”、“尽孝”或为“情义”而死，并把这看做是在自我牺牲。他们说，像这样自愿死去正是达到其目标所需要的。否则就是“犬死”，即死得毫无价值。英语中的“dog's death”指的是穷愁潦倒而死，日本人指的不是这个意思。英文把那些不那么极端的行为称做是 self-sacrificing（自我牺牲），这在日语中则是“自重”。“自重”常常意味着克制，克制与自重具有相同价值。只有克制才能做成大事业。美国人强调，自由是达到目标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和我们具有不同的生活，他们认为仅是自由还不够。他们认为克制才更能提高自我价值，这种观念是他们道德律的主要信条之一，不然，他们要如何控制那个充满冲动的危险的自我？这些冲动是有可能冲出来扰乱正常生活的！就像一位日本人所说的那样：

经年累月，给漆坯刷的漆层越厚，做出来的漆器就越贵重。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人们在谈论俄罗斯人时会说："撇开俄罗斯人的外表，看到的是鞑靼人"；对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这样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去表面的漆层，露出来的将是海盗"。不过，请不要忘记：漆在日本是珍品，是制作工艺品的原料。而不是用来掩盖瑕疵的涂料，它不包含一丝杂质，至少和坯质一样地精美。

日本男子行为的矛盾性让西方人觉得奇怪，这是日本儿童接受了不连贯的教养而造成的。有这样一个时期深深刻在他们的脑海里，那就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他们就是神，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恣意地攻击别人，似乎可以满足一切欲望，

秋烧

日本人的品格如精美的日本的漆器，而日本的陶器——秋烧，也同样有名。日本沿海的秋市是在注入日本海的桥本川和松本川之间的三角洲上拓展的城市，在 17 世纪初期到 19 世纪的后半叶的 260 年间，作为这一地区的中心而繁荣起来。这里就是陶器"秋烧"的产地。"秋烧"的特点是使用质地较粗的黏土烧制，其风格纯朴，曾是藩主的御用窑制品，庶民与之无缘。直到20 世纪以后，"秋烧"也开始制作一般日用品走进寻常百姓家，秋市成了全国的陶瓷器爱好者的寻访之地。



虽然几经修饰，这种记忆依然刻到了意识深处。这种二元性如此根深蒂固，使得他们在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浸在罗曼蒂克式的爱情，又可以绝对地服从家庭安排好的婚姻。既能沉溺于享乐和安逸，也能不计一切地承担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往往造成他们行动的怯懦，但他们却又可以勇敢到几近鲁莽的地步。他们可以在等级制下表现地十分驯服，但却又不会那么轻易地受上级的驾驭。他们异常殷勤有礼，而又保留了傲慢不逊的风格；军队中，他们能够接受盲从的训练，而又顽固不易被驯服；他们是坚决的保守主义者，而又极易为新的方式吸引；他们曾到中国学习习俗，转而又吸取西方学说，这些都是二元性的证明。



金太郎与野兽　　葛饰北斋 浮世绘 18世纪80年代晚期

金太郎是日本民间一个悲婉爱情故事中的角色。他的母亲是天皇的侍女，与一名侍卫产生了私情，在山中生下金太郎。生长在山中的金太郎背负这种耻辱，练就了一身武艺，最终成长为源氏家族的一员猛将。

日本人性格的这种二元性给他们带来各种紧张。日本人对这些紧张的反应并不相同。他们每个人都要就同一个基本问题作出决定，那就是怎么样协调儿时那种纵情无虑、处处被宽容的经验与后来生活中那种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种种束



缚之间的关系，虽然如此，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如同道学家一样，有些人一丝不苟地约束着自己的生活，唯恐肆意的行为会与现实生活产生冲突。正是因为这种毫无顾及地纵情并不是幻想，而是确实为他们自己经历的，所以这种恐惧才会更加严重。他们的态度非常洒脱，坚决遵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定自己就是可以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的意识则更加分裂。他们害怕自己心中积聚的反抗情绪爆发，就用表面的温顺来掩饰自己。他们把思虑都放在日常琐事，以免察觉到自己的真实情感。每天他们只机械地重复那些基本上一点意义也没有的生活常规。还有些人，由于他们对儿时生活感情更深，在长大成人后面对社会的一切要求时，会有严重的焦虑情绪。他们试图对别人更依赖，但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们这样了。他们觉得任何失败都是在背叛权威，从而动不动就会陷入到紧张激动的状态，他们会对常规不能处理的意外情况感到恐慌。

陶情自然

日本人陶情于自然，除了源于秉性中的热爱，还有缓解日常生活压力的缘故。他们的罪感意识和社会约束成为了心里的沉重负担，于是他们想方设法把绿色带进生活，在庭院内外栽种植物，让回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摆脱这些压力的出口。

上面说的就是日本人在极度担心遭受排斥或非难时所面临的各种特殊危险。如果不是要承受过度的压力，在生活中，他们会表现出既享受乐趣，又保持幼年所培育的那种留意不刺伤他人的情感。这是非常大的成功。幼年时代的生活使他们充满了自信。那时罪感意识还没有给他们带来沉重的负担。他们后来所受到的各种束缚是为了可以与伙伴协调一致，义务也是相互之间的。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个人愿望会一再受到别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感情冲动仍然可被满足。日本人一向以沉浸在自然乐趣中而闻名，比如观赏樱花、赏月、赏

菊、远眺新雪，把虫笼子挂在室内以听虫鸣以及咏和歌、俳句，修饰庭院、插花、品茗等等。这些活动绝不像是烦恼重重、满怀侵略心理的民族所应有的。他们在追逐享受时也并没有就此消沉颓废。在还没有听命于那种不幸“使命”之前的幸福时代里，日本人农村闲暇生活中的活泼愉快，工作时的勤劳也绝不比现代任何民族差。

然而，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却非常多。为了避免遭到别人疏远和毁谤等这些重大威胁，他们不得不放弃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问题上他们必须抑制种种冲动。极少数违反这些规矩的人甚至面对着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的生活准绳并不是明辨“善”与“恶”，而是要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别人“失望”，要使自己的个人要求让位于群体的“期望”。只有这样，才是一个“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给自己的家庭、故乡和国家带来荣誉。由此而产生一种十分强烈的紧张感，并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日本因此也成为东方领袖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但对个人来说，这种紧张感就是沉重的负担了。人们高度紧张，深怕失败，担心别人会轻视自己付出巨大牺牲而从事的工作。这种积愤有时会爆发，表现为极端的攻击性行为。他们被刺激而发起攻击时，并不是像美国人那样是由于自己的主张或自由遭到了威胁，而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诽谤。那时，如果可能，他们那危险的自我，就会向诽谤者泄愤；如果不可能，他们就对自己发泄。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对各种最基本的自由他们都自愿放弃了。美国人把这些自由视为理所当然，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战败后的日本人正在追求民主。一旦他们可以率直而无顾虑地行动，他们将会高兴到什么程度！杉本夫人曾经严肃地描述过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英语时可以随意种花植树的喜悦心情。老师给每位女学生分配一块园圃并提供给她们所需的种子。

“这块可以随意种植的园圃赋予了我一种关于个人权利的全新

感觉。……人心中竟然能有这种幸福感，这本身就让我感到诧异。……像我这种人，违背传统、玷污家名的事情从来不会做，也从来不会惹父母、老师和邻居生气，不会损害世上的任何事物，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

其他女学生都打算种花，而她却想种马铃薯。

“谁也理解不了这种近乎荒谬的行为带给我的莽撞自由心情，自由之神正在敲打我的心扉。”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我家花园中有一块特意荒芜的土地，为的是保持天然的野趣。但又总会有人来修剪松枝，修整树篱。每天早晨，负责园艺的大爷还要清扫石阶，扫净松树下那里，然后细心洒上从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

对杉本夫人来说，这种伪装的天然野趣，象征的就是被她看成是伪装的意志自由。这种学位在日本比比皆是。日本庭园中一半埋在地下的巨石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的，他们会拿小石块来铺底。巨石的布置要与流泉、屋宇、矮丛和树木照应。菊花也是盆栽的，要准备参加各处每年都要举办的菊展。栽培者要细心地修整每一朵花瓣，并常用看不见的金属线圈维系其形状，以保持某种姿态。

杉本夫人幸运地摘掉了菊花上的细线圈，此时，她怀着欢乐而天真的激动心情是，盆栽的菊花，一直被人摆弄，一旦回归自然，她就显出满心的愉悦。不过，现在，如果在日本人中忽视他人的期望，质疑“耻”的压力，这种自由可能会使他们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遭到破坏。新的环境下，他们必须学习新的制约方式。变化是要付出代价的。新观点和新道德的建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西方人无法设想日本人会立即采用新道德，并真正将其变为他们自己的东西，但也不应认为日本始终都不能建立起一套比较自由和宽容的伦理规范。那些在美国生活的第二代日本人已经不具备日本道德的知识和实践了，他们的血液中也丝毫没有要僵守父母出身于日本习惯的那些因子。同样的道理，生活在国内的日本人，在新时代建立起



伪装的天然野趣

在这些流水过处，日本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刻意地养鱼、植草、安设石桥、点缀木雕，而最终目的却是为了符合来自外界的客观的审美标准，而不惜放弃个人的爱好。这就是伪装的意志自由的象征。

一种不要求过去那种自制义务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完全可以摘除菊花上的金属线圈，使其不被摆布而照样婀娜多姿。

在进入到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时期后，或许日本人可以借助两三种古老的传统来保持平稳。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的精神，就是他们所说的自己来擦掉“身上的锈”。这一形象的语言将身体比喻刀，就像佩刀的人有保护刀光亮的责任一样，人也要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任。对于因自己的缺点、不坚定以及无效性而产生的一切自然后果，他都必须承认并接受。跟美国相比，日本对自我负责的解释要更加严格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刀象征的不是进攻，而是象征了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形象。在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德性将向平衡轮一样发挥最有效的用。并且，日本的儿童教养和行为哲学已经让自我负责的德性渗透到内心深处，变成日本精神的组成部分。在西方意义上，现在日本人已提出了“放下刀”（即投降），但在日本意义上，他们仍将继续努力关注使心中那把易被锈蚀的刀保持光洁的方式。依据他们的道德术语，这把刀是一种即使在自由和平的世界也能保存的象征。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日本人迈出社会变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的“错误”和失败。同时，天皇的身份也由“神”转向了“人”。这是由于他们非常希望重新获得在和平国家中受尊重的席位，而这就要求一定要实现世界和平。

战胜后，美国在管理日本方面所发挥的相应的作用，对此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8月29日，美国通过电台发布了对国务院、陆军部以及海军部的联合指令，宣布了自己的政策，并由麦克阿瑟元帅成功地付诸实施。然而，引以为豪的原因却常常被美国的报刊和电台中的党派性的赞扬或批评弄得模糊不清，只有极少数充分了解日本文化的人才能确定既定政策是否恰当。

对日本占领的性质是其投降时的一个重大问题。战胜国是应该利用还是废除现存政府，尤其是天皇？每个县市的行政是否都应在美国军政府官员指挥下进行管理？在占领意大利和德国时采取的方式是在每个地区设立A.M.G.（盟军军政府）总部，将其作为战斗部队的一部分，盟军的行政官把持着地方的行政权。打败日本时，太平洋区域A.M.G.官员仍然预料这种统治体制也会在日本建立。日本人也不知道他们自己还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面的权力。波茨坦公告上只是说："必须占领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的地方，以确保吾人于兹所示之根本目标。"以及必须永久排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强权和势力"。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分别给麦克阿瑟将军发出了联合指令，对上述各节作出了重大决定，并获得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将全权由日本人负责。"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只为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的目标。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日本国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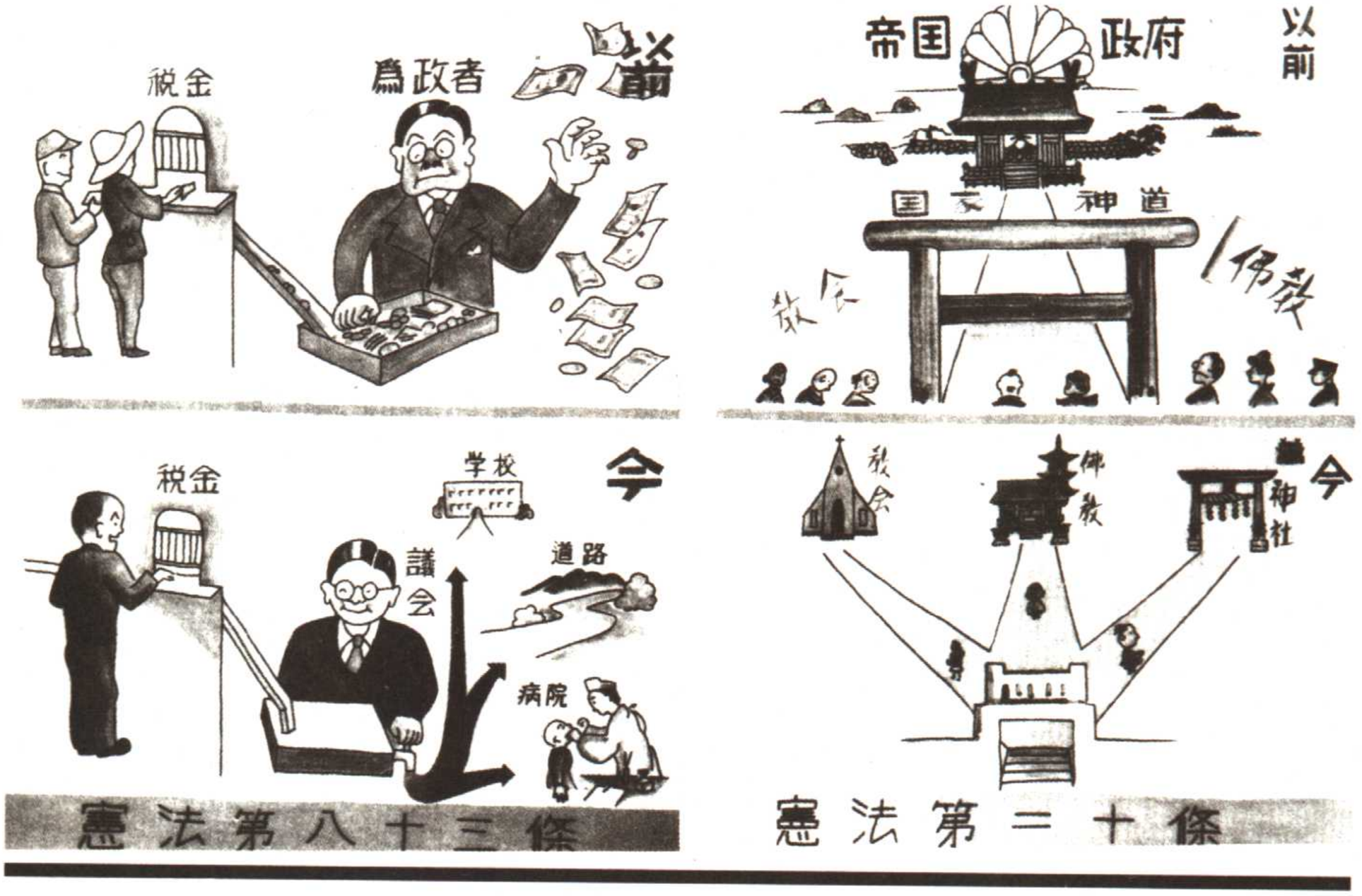


友好的征服者　　摄影 1945 年 8 月 30 日

1945 年 8 月 30 日，在下午的烈日下，一架美国运输机在日本横滨附近的厚木机场降落下来。新任命的盟国征占日本的军事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叼着他那玉米穗轴似的烟斗，踏上了他将要进行改革和重建的土地。之后，这位将军的个人风格深深吸引了日本人，这位没有武装的征服者，要求效忠和绝对服从他的方式恰恰迎合了日本人的方式，对战后的日本而言，这位果断而权威的将军带来的是希望与复兴。

府将被允许就内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因此，麦克阿瑟的对日管理区别于盟军对德或对意的管理。它是一个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级的官僚机构。最高司令部的通告不是发给日本国民，或某些县市的居民，而是发给日本帝国政府，规定日本国政府的工作目标是它的当务之急。如果某位日本内阁大臣认为不可能实施，可以提出辞职来抗议，但如果他的建议合理，则可以依照他的建议修改指令。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大胆的管理方式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正如当时希德林将军（General Hilldring）所说：“利用这种占领日本国政府的方式所取得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利用日本国政府，我们务必要有直接运转管理一个7000



新宪法的被接纳　　海报 1947 年 日本

这是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在 1947 年发布的图解海报，向日本人举例说明了他们新宪法的许多优点。最左边的海报提供了政府花费方面的改变，以前市民的税收由不负责任的官僚挥霍掉，现在税收收入通过法律来分配，用于学校、道路和公共医疗服务。右边的海报则说明了一个事实：神道教与其他宗教平等存在，没有一个能得到政府的援助。最初，日本人对这部宪法不能接受，然而通过数月媒体对宪法的评论，如一位报纸评论所说，这部宪法"在建立人民的永久性不被侵犯的基本人权方面是显著地彻底"。

万人口国家所必需的全部复杂机构。因为他们有与我们不同的语言、习惯和态度，所以通过净化并利用日本国政府，我们能节省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换句话说，我们是提供具体指导，而不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的国家。

这一指令在华盛顿制定之初，许多美国人仍然担心日本这个怒目而视、伺机报复的民族也许会采取倨傲和敌对态度来消极抵制一切和平计划，但后来证明这些担忧是多余的。其主要是因为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是有关战败民族和战败国的政治、经济等一般真理。可能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样顺利地接受这种信义的政策。在日本人看来，从严酷的战败现实中排除屈辱是这种政策的最大象征，从而促使他们自己实行新的国策，而这一切正是因为特异文化所形成的特异性格，

所以他们才能如此欣然接受。

在美国，我们曾不断争论谈和条件的宽严，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此，而是如何严如其分地摧毁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性模式，建立起新的目标。然后根据该国国民的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来选择采取何种手段。在家庭生活和市民日常生活中，普鲁士的权威主义根深蒂固，这就需要对德国制定某种谈和条件。明智的谈和条款对日本应该不同于对德国，因为他们如此不同。德国人不认为自己对社会和历史欠恩情，他们不是为了偿还无穷的债务或恩情而努力奋斗，仅仅是为了避免沦为牺牲者。在德国人的眼中，父亲如同其他占据高位的人一样，是一个权威的人，是一个“强迫别人尊敬他”的人，是一个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的人。生活中，每一代青年时期的儿子都反对权威的父亲，然而等他们长大成人后，与父母一样，最终还是屈服于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飙年代。

极端的权威主义并不是日本文化中的核心问题。所有西方的观察者几乎都认

纺织业的复兴 摄影 20世纪中期

战后的日本对于美国的援助并没有表现出拒绝和倨傲，而顺利将复兴计划执行。在美国人的计划中，为了让日本自立，最优先考虑的是恢复它生产出口商品的能力。华盛顿计划将日本的出口增长5倍，这是一个离谱的要求，但是日本人完成了它。其中几乎占到出口一半的纺织业成为第一批复兴产业。在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两位日本工作人员在美国纺织专家的指导下，认真地接受指导和学习。





爱国便当　　摄影 20世纪中期

二战伊始，日本的国内四处洋溢着爱国的热情，大多数的日本人都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诸如"奢侈是我们的大敌"，自愿节制食量。照片里的父亲和儿子正在吃"日之丸便当"，这种饭菜象征着日本国旗，就是在白米饭中放一颗红色的腌梅子。在日本孩子的心目中，父亲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父亲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和这位带领儿子吃"爱国便当"的父亲一样，众多日本的父亲就是这样以身作则，将日本精神教给了下一代。

为，日本的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钟爱在西方似乎难得一见。日本的孩子普遍认为与父亲有某种真正的亲爱是理所当然的，常常会公开夸耀自己的父亲，以至于孩子会因为父亲稍许改变的声调就会按父亲的愿望行事。但是，父亲绝不是幼儿的严师，青年时期也绝不是反抗父母权力的时期。相反，孩子进入青年时期就成为一位在世人判断面前家庭责任的驯服代表。对日本人来说，"为了学习"，"为了训练"，他们尊重父亲。换而言之，作为尊敬对象的父亲是等级制和正确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征。

儿童这种在同父亲早期的接触中学到的态度会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模式。在等级制度中，位居上层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本身并不掌握专断权力，居于首脑地位的官员也不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底层都有顾问和隐蔽势力在背后操纵。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位黑龙会式的超国粹团体领袖在与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谈话中，最准确地说明了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他说："社会（当然是指日本）是一个三角，但它已被大头针固定住一角。"换句话说，三角形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而大头针则是看不见的。三角形总是围绕着一个隐蔽的轴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用西方人的俗话说就是，凡事都要用"镜子"来反映，力求不要把专制权力露在表面，一切行动都显示对象征性地位的忠诚，尽管这个象征性地位经常不行使实权。一旦发现那被剥掉假面具的权力的泉源时，日本人就认为它就

是剥削，并且是与他们的制度不相称的，好比对高利贷者和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正是由于日本人观察他们社会的角度不同，因此，反抗剥削和不义却不会让他们成为革命者。他们并没有打算破坏他们的社会组织。只是可以在毫不批判其制度本身的情况下，像明治时代那样实现最彻底的变革。这种变革被他们称之为“复古”，即回到过去，因而他们不是革命者。西方的著述家有的寄希望日本能在意识形态方面掀起群众运动，有的夸大战争期间日本的地下势力并指望他们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领导权，还有的则预言激进政策将在战后的选举中获胜，可惜他们都严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1945 年 10 月组阁时保守派的首相币原男爵发表的下述演讲最准确地表达了日本人的想法。

“新的日本政府具有尊重全体国民意愿的民主主义形态……自古以来，天皇的

走下神坛　　摄影　20 世纪中期

在麦克阿瑟的主持下，1947 年日本推出了“和平宪法”。新宪法中规定“天皇是国家人民统一的象征”，从此裕仁天皇不再有日照大神子孙的神圣光环，而成为一个凡人，他不再以神的身份把自己的思想旨意般地传递给人们，而是作为一位温和有礼、学术精深的领导者走近民众，以更近更亲切的方式告诉人们。天皇地位的转变，对日本未来的政治有一个明显的暗示：一个君主打破先例与他的人民混合的民主的征兆。



意志被认为是国民的意志。这也就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我所谓的民主政治正是这种精神的真正体现。”在美国读者看来，对民主的如此解释简直毫无意义。但是有这种复古解说的基础，与西方意识形态相比，日本无疑更易于扩大国民的自由范围，增进国民的福利。”

当然，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在日本也将实行。但是，正如在美国那样，西方的制度并不能成为改善世界的可资信赖的工具。普选和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尽管能解决许多问题，但同时也产生许多困难。一旦这些困难持续，日本人就会修改我们所赖以实现民主的方式。那时，美国人将愤然宣称这场战争只是徒劳。即使我们相信自己的办法是最好的，但普选在日本重建和平国家的过程中至多只能占次要地位。日本自19世纪90年代试行第一次选举以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

友好的对抗　　摄影 20世纪中期

这是二战后对日作战胜利之后两个月，在东京举行的一次垒球赛，裁判发出注意信号，美国兵正准备把球投出。这样的对抗同样存在于新宪法的颁布过程，自1945年秋季开始计划，历经了不同的意见和反应，终于在1947年5月3日，天皇站在雨中向他的人民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法律，人民应当去行使他们的最高统治权。



化。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当时所记述的那些传统困难今后还会重复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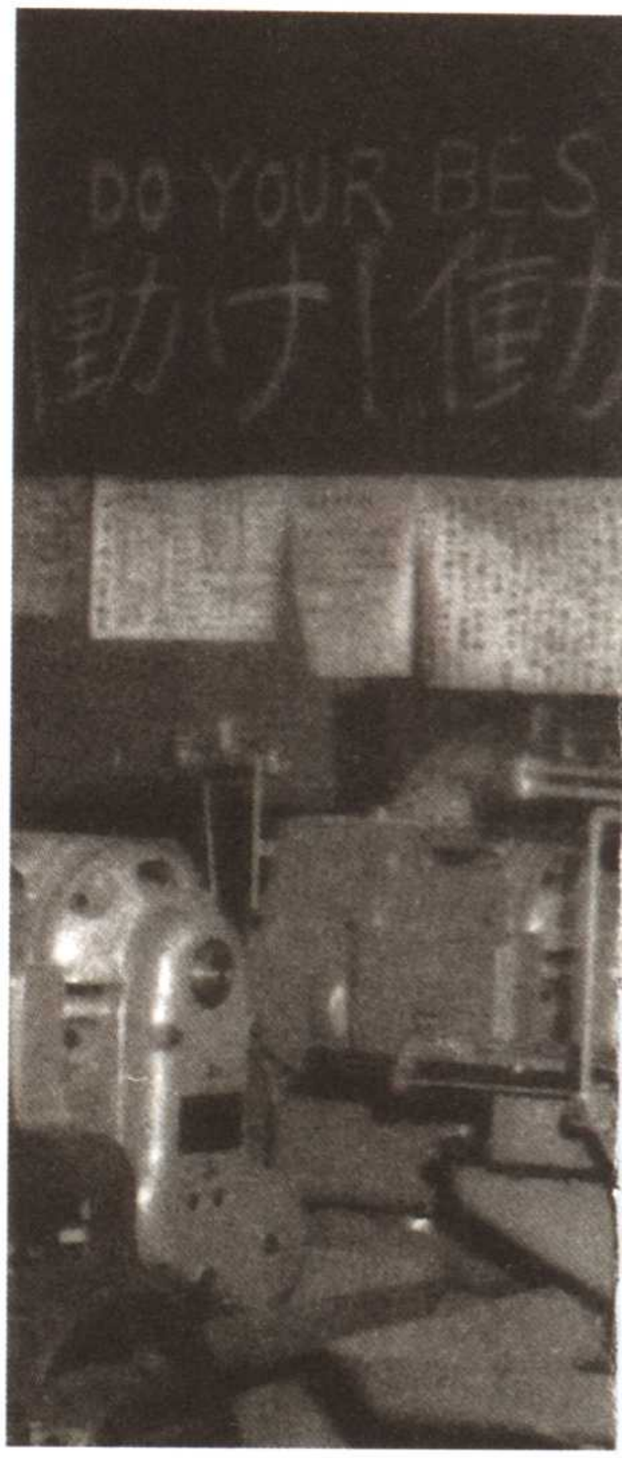
在激烈选举战中，确实丝毫不存在个人的仇恨，但却牺牲了不少生命。议会中让外人惊愕的激烈论战、暴力很少属于个人之间的对抗。政争的实质是藩阀之间、党派之间利害的斗争，而不是个人与个人的斗争。并且，每一个藩阀或党派的热诚追随者只把新的政治理解为新的战争——一种忠于领袖利益的斗争。

在较近的20世纪20年代的选举中，“洗好脑袋准备砍头”是农村人投票之前经常说的话，它把选举战比作过去有特权的武士对平民的攻击。直至今日，不论日本是否推行危险的侵略政策，日本选举所包含的意义与美国仍是截然不同。

重建一个和平国家，日本的真正力量在于他们敢于承认过去行动方针的失败，从而有精力转到另一方面。在日本，存在一种善变的伦理。曾经他们妄图通过战争赢得自己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结果却以失败告终。所以，这种方针就可以抛弃了。他们以前所受到的训练使他们可以转变方向。当一个民族怀抱更加绝对性伦理观时，他们总是相信自己在为原则而战，在向战胜者投降时，他们会说：“正义随着我们的失败而消失了。”他们的自尊心要求他们继续努力以使“正义”下次取胜。或许，他们承认自己有罪，忏悔反思。日本人并非如此。投降后的第五天，美军仍然没有登陆时，东京的一家大报《每日新闻》就开始发表相关文章就战败及其所带来的政治变化展开了论说。它说：“不过，这是有利于最终解救日本。”这篇社论强调每个人都必须牢记日本已经彻底战败了。既然企图凭借武力来建设日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那么以后就不得不走和平国家的路线了。同一周内，另一家东京大报《朝日新闻》也发表文章说，近年来，日本“过于相信军事力量”，这是日本国内外政策中的“重大失误”。文章说“以往的态度让我们几乎损失惨重却一无所获，对它我们必须予以抛弃，并应采取立足于国际协调和爱好和平的新态度”。

西方人认为这是一种原则性的转变，所以很是怀疑。然而，这却是日本人为人处世的完整的构成部分，在人际关系上是如此，在国际关系上也是如此。当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时，他们就认为是犯了“错误”。如果失败，它就会被作为失败的方针而被抛弃，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坚持失败的方针的必要。日本人经常说“噬脐莫及”，20世纪30年代，他们一致认为军国主义是争

取全世界尊敬的方式，是一种靠武力获取的崇拜。他们容忍了这一纲领所要求的所有牺牲。1945 年 8 月 14 日，天皇作为日本最神圣的发言者向国民宣布日本已经战败。他们接受了失败所意味着的一切。这意味着日本要被美军占领，于是他们就欢迎美军；这意味着皇国侵略的企图已经失败，于是他们主动考虑要制定一部排除战争的宪法。日本投降后的第十天，《读卖报知》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的社论，文章说："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失利不能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我们应该把军事失败看成一种动力。……这是因为，只有这种全民族惨遭失败的重大牺牲，才能提高日本国民自己的思想；使国民能够把眼光扩展到世界领域，客观而真实地观察事物。我们应该坦诚地分析并消除过去所有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来正视失败这一残酷的事实。不过，我们必须相信日本文化的未来。"这意味着，一种他们曾试行的行动方针失败了，现在，他们将采取另一种和平的处世手段。各家日本报纸的社论都反复强调："日本必须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日本国民的职责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获取别人的尊重。



这些报纸的社论不只是少数知识分子阶层的心声。东京街头和偏远村寨的普通民众也经历同样的大转变。美国占领军简直不能相信这么友好的国民就是曾经发誓要用竹枪顽抗到底的那些国民。美国人很排斥日本人的伦理中的很多东西，不过，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不同的伦理也包含着许多值得称赞的东西。

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在管理日本时，承认了日本人转变航程的这种能力。它并没有采用使人屈辱的手段来阻碍这一进程。倘若按照西方伦理，我们将这种手段强加给日本，或许这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依照西方的伦理信条，侮辱和刑罚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手段，它可以让做过坏事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孽。这种自我忏悔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如同前面所说的那样，对此日本人的看法并非如此。根据他们的伦理，一个人必须要为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任，错误所产生的自然后果会让他确认不能再这样做下去。这些自然后果也可能会包括总体



重建家园　摄影 20世纪中期

战前的日本曾是亚洲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在1945年，它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数月的轰炸摧毁了它的城市，也摧毁了它的制造能力。如果日本要再一次自立，那么它的工业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这是当时在本轴东部千叶市一个生产机器设备的工厂里粘贴的一个双语标语，勉励着日本工人为国家经济复兴而努力。不出所料，这句标语在很短的时间便成为了事实。

战争的失败。不过，日本人并不把这些情况视为屈辱而产生憎恶。根据日本人的观点，某人或某国侮辱他人或他国，就是采取诽谤、嘲笑、鄙视、侮蔑以及揭露其不名誉等方式。如果日本人认为自己遭到侮辱，那么复仇就变成一种道德。尽管西方的伦理非常强烈地谴责这一信条，美国的占领是否有效却取决于在这方面的自制。因为，日本人十分讨厌被嘲笑，他们认为这与投降带来解除军备、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等必然后果完全是两码事。

日本曾经打败过一个强国。在对方最终投降，并且日本认为它从来没有嘲笑过自己时，作为战胜国，日本曾谨慎地避免给失败方带来侮辱。俄军1905年在旅顺口投降时，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在日本是妇孺皆知的。在这张照片上：战胜者和

战败者的唯一区别就是军服的不同，俄军依然佩带着军刀，并没有解除武装。日本流传甚广的著名故事说，当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将军表示同意日军提出的投降条件时，一位日本大尉和翻译带着食物来到俄军司令部。那时，“除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以外，所有的军马已全被宰杀吃掉。所以，日本人带来的50只鸡和100只生鸡蛋受到了热切的欢迎”。第二天，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将军按照约定会面。“两位将军握手，斯提塞尔将军赞赏日本军队的英勇……乃木将军则称赞俄军长期的防御坚强。斯提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深表同情。……斯提塞尔将军将自己心爱的阿拉伯种白马送给了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虽然十分想得到阁下的马，但却必须首先呈给天皇陛下。他相信天皇一定会把这匹马赐给他的。他发誓，倘若如此，他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爱马那样对它倍加爱惜。”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在住宅前为斯提塞尔将军的爱马建造了一所马厩。据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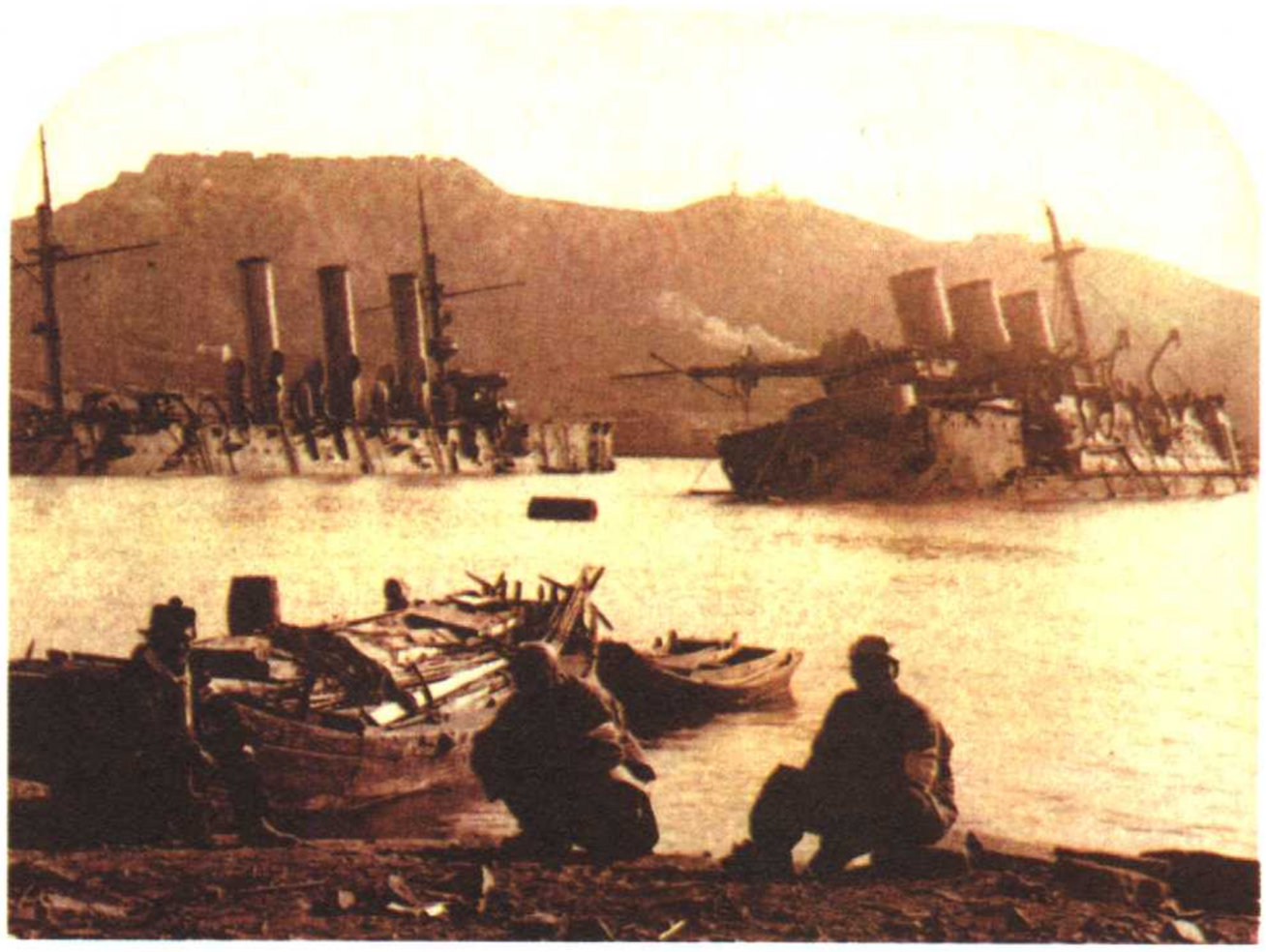
异质的伦理——忠诚　　摄影　20世纪中期

令美国人自喜的工会并未得到日本人的青睐，他们一度鼓舞日本工人组织要求高工资和给予妇女相同的薪金，但是日本的公司更倾向于为工人制定基于他的年龄和家庭规模的标准而定的津贴，这使得员工们更加忠诚地工作。对于工人而言，他们喜欢稳定的工作，认为工会没有必要去斗争。这是1949年东京最主要的报纸《朝日新闻》的办公室，编辑人员在准备版面。当时由于纸张短缺导致发行量降低，但是报社却通过三班轮换制保留了全部的2500名员工，避免了裁员。



马厩比乃木将军自己的住房还要考究，它在将军死后变成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说，从上次俄国投降后，日本人就性情大变，譬如，众所周知，他们在菲律宾进行肆意破坏表现出了残暴的一面。但是，日本是个很容易随着状况而改变道德标准的民族，对这样的民族而言，上述结论未必成立。首先，巴丹战役后，敌军并没有投降，只是局部地区投降了。到后来虽然菲律宾的日军投降后，日军仍在战斗。其次，日本人从来不认为本世纪初遭到过俄国人的侮辱。恰好相反，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认为美国的政策在“蔑视日本”，或者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根本看不起日本”。对排日的移民法、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及第二次裁军条约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就是存在这样的反应。美国在远东经济影响的扩大以及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也使得日本人作出了同样的反应。所以，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以及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显示了日本人行为中显然对立的两面性：遭受侮辱时是一面，没有受到侮辱时是另一面。



沉没的俄国军舰

日本打败俄国让世人为之一惊。这是被鱼雷击沉的俄国军舰，它凄凉地没在水中，旅顺港不久便宣告全面失守。俄国救援舰队在对马海峡再一次见识了日军的勇敢和机敏，这场惨败使俄国彻底放弃了赢取这场战争的指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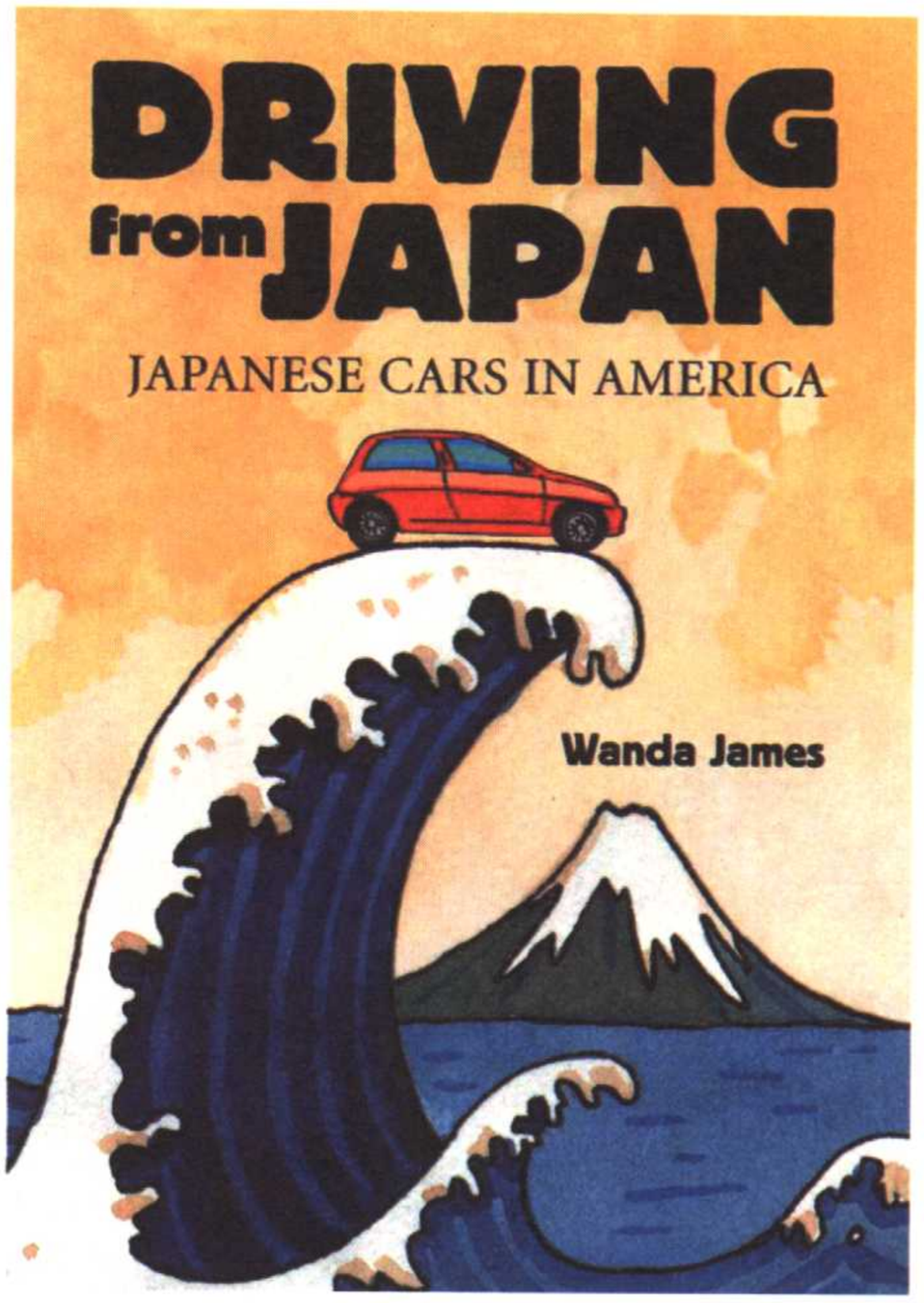
美国取得最后胜利再次改变了日本人所处的环境。恰如日本人生活中的惯例，最终的失败让他们放弃了之前采取的方针。日本人这种特有的伦理观，使他们可以自行消除污垢。美国的政策以及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日管理没有增加需要消除的新的屈辱。他们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眼中仅属于战败的“当然结果”的事情，很显然，这种做法取得了成效。

对天皇的保留意义重大。对这件事的处理非常好。是天皇先访问了麦克阿瑟


大物海上月
芳年

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先访问的天皇，这件事给日本人上了生动的一课，西方人是难以估计到其中意义的。据说，天皇曾对否认神格的建议表示异议，他说要自己抛弃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对此感到很为难。他真诚地说，日本人并未把他看成是西方意义上的神。但是，麦克阿瑟司令部劝说他，西方人关于天皇仍在坚持神格的想法将会影响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就强忍这种为难，同意发表声明否认神格。元旦，天皇发表了声明，并要求把世界各国对此事的评论全部翻译给他看。读了这些论评后，天皇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表示对此满意。外国人在此以前显然理解不了天皇居然会为发表声明而感到高兴。

美国的政策还允许日本人得到某些满足。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三部联合指令上明确写道，“对于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劳动、工业、农业等各团体，应鼓励发展并为其提供便利”。



来自日本

或许美国人类学家没有预料到，战后的日本竟会获得如此的发展，如同汽车行业的风尚会由日本引领。日本汽车公司正式独立地开发产品不过40年，至1988年，便已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2003年，日本11家汽车企业的销售额总计达到44.6万亿日元，实现主营业务利润3.25万亿日元，连续3年更新了历史最高纪录。日本人在“知耻而后勇”的精神下，在战后恶劣的环境中，竭尽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经济战场上创造了最著名的奇迹。

倨傲的民族　《大物海上月》 月岗芳年（Tsukioka Yoshitoshi）

在过去的150年间，日本经历的失落和崛起令全世界震惊。在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封闭、传统、落后；到了1905年，它击败了俄国，成为进入世界强国之列的第一个亚洲国家；二战中，日本成为唯一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满目疮痍；又过去了短短20多年，1970年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19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停滞期；2003年，日本的对外贸易猛增，经济恢复势头迅速……这就是倨傲的日本人，在历史的海洋中有波澜不惊的从容，也有凭海临风的勇敢。



拭去尘埃　　摄影 20世纪中期

战败的耻辱宛若日本人心上的厚厚尘埃，因此他们格外积极地工作，这样才能清除内心的压力，挽回民族的尊严。这位日本关山公司的工人手中是我们熟悉的"尼康"相机的元件，他正在小心地除去上面的尘埃颗粒。1952年，日本向委内瑞拉、新加坡和美国出口的相机已达7.2万台，此时，日本人心里的尘埃已经清除了，他们已经在经济的战场了赢得了胜利。

在很多产业中，日本工人组织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积极活动的农民组合也重新组织起来。许多日本人开始主动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就证明了日本在这次战争后果中有所收获。美国一位特派记者告诉我，东京一位参加罢工的人盯着美国士兵喜气洋洋地说："日本'胜利'了！是吗？"现在，日本的罢工很像战前的农民起义，当时农民请愿的原因往往是因年贡或赋役过重而影响了正常生产。按照西方标准，这不属于阶级斗争，请愿的目的并不是变革制度本身。现在，日本各地的罢工也没有降低生产。罢工者喜欢采取的方式是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以使经营者丢脸"。在三井系统一家煤矿中，"罢工"的工人将全部管理人员赶出矿井，日产量由250吨提高到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使生产得以增加，并提高了两倍的工资。

当然，无论管理政策如何怀有善意，战败国的行政总是存在困难。在日本，粮食、住宅以及国民再教育等依然是很尖锐的问题，倘若不采用日本政府的官员，问题必将同样尖锐。在战争中以及停战前期美国当局非常担忧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军队的复员，这个问题由于日本官员的保留也明显减轻，却也并不容易解决。日本人深深了解这种困难。去年秋天，日本报纸以同情的语气报道，对于那些历尽艰辛而失败的日本士兵来说，战败该是多么难接受的事情。报纸请求他们不要

因此对自己“判断”构成影响。一般来说，遣返军人表现出十分正确的“判断”，但其中一些人也因为失业和战败而参加了追求国家主义的旧式秘密结社。他们动不动就对他们现在的地位感到愤慨。他们已不再拥有往昔那种特权地位了。过去，行人在街上遇到身着白色衣服的伤残军人都要行礼。军人入伍时，村里要为他们开欢送会，退伍回来要开欢迎会，士兵要坐在首席，村民们用美酒佳肴和美女的歌舞来款待他们。现在的复员军人已经没有这样的优待了。只有家里人安置他们而已。在许多城市和村镇，他们受到冷遇。知道了这种骤然变化带给日本人多少痛苦，就不难想象，这些军人是多么喜欢和旧日同伙聚在一起，缅怀过去军人把名誉作为寄托的那个时代了。并且，可能他的战友中会有人告诉他，有些幸运的军人已经在爪哇、山西、满洲与盟军作战了。他们会说：干吗要绝望？他将再度参加战争！日本早就有了国家主义的秘密结社。这些团体志在“清除日本的污名”。那些因未了复仇宿愿而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很有可能会加入这种秘密团体。如黑龙会、玄洋社等这类团体，他们所使用的暴力在日本的道德中是“对名

战败的苦酒　　摄影　20世纪中期

曾经背负着荣誉奔赴战场的军人，此时却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一些在战争中受伤的老兵，在家乡遭受冷遇，失去了劳动能力的他们不得不在街头流浪，以乞讨为生，但日本政府对此却全然无能为力。



分的情义”，允许被使用。今后几年中，要消灭这种暴力，日本政府还必须坚持以前的长时期的努力，也就是强调“义务”，并贬抑对名分的“情义”。

所以，仅仅是号召不要“判断”错误尚且是不够的，还必须重新振兴日本经济，使当前二三十岁的人找到生存之道，能够“各得其所”。农民的状况必须得以改善。经济一不景气，日本人就会回到农村的故乡。但很多地方因为地方狭小，加之沉重的债务，就很难养活庞大的人口。必须开始发展工业。因为，在反对平分遗产问题上，有非常强烈的情绪，只有长子可以继承遗产，其他幼子只能进城寻找机会。

毫无疑问，今后日本人还有一段漫长的困难道路要走。然而，如果国家预算不拨付费用用于重整军备，他们就有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的机会。大概是珍珠港事件前十年间，军备和军队的维护花费了日本国民收入的一半。这样的国家如果

农地改革法　　摄影 1946年

1946年，在麦克阿瑟下属的严密监督下，日本国会通过了《农地改革法》，它有效地将土地转给了耕种它的人。在1945年之前，佃农收成的一半左右需交给地主，而《改革法》颁布后，地主须在接下来的三年内向政府出卖500万英亩的农用地，这些农用地再由政府以适度的价格卖给以前的佃农，付款期限长达30年。因此，超过200万的人成为了土地所有者。这是日本1946年在《改革法》颁布后进行的第一交易，一个政府官员正交给一位以前是佃农的农民一份关于他在横滨附近稻田的契约。





银座大街　　摄影　现代

任何对东京的描述都无法赶上这座城市的发展，它从来都无视地震的困扰，以极快的速度超越着自我。这是世界闻名的东京银座商业街，是著名的全球文化交流中心和贸易中心。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越在林林总总的广告牌中，感受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无论半个世纪前人类学家作出过怎样的预言，银座大街的一隅都可以说明，日本人“解放”了，无论他们对本族的文化有着怎样的崇尚和偏爱，这都不妨碍他们从无数人类的灾难和自然的灾害中走出来。

停止军备支出并逐步减轻农民的租税，是有希望建立健全经济基础的。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日本农产品的分配是耕种者得到60%，租税及佃租占剩下的40%。缅甸、暹罗也是种植水稻的国家，和日本相比，情况却大不相同，那些国家传统的分配方式是耕种者留下90%。归根结底，日本耕种者所交纳的巨额税金归用在了军费支出上。

今后十年间，欧洲或亚洲任何不搞军备扩张的国家，和搞军备的国家相比，都将具有潜在的优势，因为这类国家可以拿财富用来建设健全繁荣的经济。在美国，在推行亚洲政策及欧洲政策时我们几乎从未关注过这类情况。因为我们明白，美国不会因为国防计划的巨大经费而陷入贫困，我们没有蒙受战争的灾祸。我们也不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工业生产的过剩。大量生产和机械设备

已经非常完善，如果不从事大规模军备和奢侈品生产以及福利事业和研究设施，我们的人就面临失业的问题。盈利投资的需求也非常迫切。其他国家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即使是西欧也很不相同。尽管德国要负担巨大的战争赔偿，但因为不能重新武装军队，如果法国在今后十年左右推行扩充军备的政策，那么德国就有可能建设起法国所不能建立的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基础。日本也将利用同样的优势超过中国。中国当前的目标是实现军事化，美国也支持它的野心。如果日本的国家预算中不包括军事化的目标，在不远的将来，它就会奠定繁荣的基础，一举成为东方贸易中的主角。它的经济将在和平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它将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赢得有声誉的地位，如果美国能利用这种势力并支持这项计划，将会对日本有非常大的帮助。

美国做不到用命令的方式来创造自由民主的日本，任何其他国家也做不到。这种方法从来就没有在任何一个被统治国家成功过。任何国家都不能强迫一个具有不同习俗和观念的民族按照自己的模式生活。法律不能让日本人承认通过选举产生的人的权威，不能使他们忽视等级制中的“各得其所”。我们美国人所习惯的那种自由随意的人际交往、自我独立的强烈需要以及自由选择配偶、职业、住宅和承担各项义务的热情，法律也不能赋予日本人。然而日本人已明确认为需要转向这个方向。投降后，日本的政治家说，日本必须鼓励男女国民操纵自己的生活，尊重自己的良心。虽然他们并没有这样说，但每个日本人心里都清楚，“耻”在日本社会中的功效已经遭到了质疑，他们希望能在同胞中发展新的自由，也就是要从对“社会”谴责和追究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因为，不管是怎样的心甘情愿，日本的社会压力给个人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社会压力要求他隐藏自己的情感、摒弃个人私欲、而以家庭、团体或民族代表的身份来面对社会。日本人曾证明，他们可以忍受这种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一切自我训练。不过，负担确实过于沉重了，为了求得善遇他们必须极度压制自己。他们不敢要求过有较轻心理压力的生活，结果却被军国主义者引到了一条付出惨重代价而且漫长无际的路上。他们付出如此高昂代价后，竟然变得自以为是，并且开始鄙视那种道德观念相对宽容的民族了

日本人迈出社会变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的“错误”和失败。他们非

常希望重新获得在和平国家中受尊重的席位。这就要求一定要实现世界和平。今后的几年里，如果美俄致力于军备的扩张，准备彼此进攻，那么日本会利用自己军事知识参加到战争中去。不过，对这一点的承认并非对日本变成和平国家的内在可能性的质疑。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适时变化的，如果现实允许，日本将会在和平世界中谋求自己的地位。倘若不是这样，他们也会在武装阵营的占据一席之地。

现在，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他们还将关注，军国主义是否会在世界其他国家失败。如果在其他国家没有失败，日本会再次点燃自己的好战热情并显示其如何能为战争作出贡献。如果在其他国家也失败了，日本就会证明，它吸取了教训：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绝不是抵达荣誉的道路。



东京湾人工岛　　鹰见安浩　摄影　日本　现代

人工岛是人们在海上建造的陆地，一般采用移山填海，或把河道、港口挖出的淤泥，陆上用不着的无污染的废弃物，集中堆放到附近的海里，在海上形成一块高出水面的陆地，并用建筑材料加固四周。现在世界上经济发展越快，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建造人工岛的就越多，日本是建造人工岛最多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多年间，日本人围海造陆达200平方千米。20世纪70年代日本又将围垦的重点转移到海岸以外的人工岛。照片中是东京湾附近的海上高速公路，她伸向大海的尽头，向世界证明着日本的复兴。

巨木丛书



● 一本经典的畅销书：对战争的情绪与对日本的好奇造就的畅销书

日本，一手造就了我们记忆中最近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另一手造就了二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战争带来的负面情绪与经济奇迹引起的好奇为本书招揽了众多读者。阅读本书，读者可以在满足好奇的同时，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性格。

● 一本自省的参考书：当代读者跳出民族立场全面认识日本的参考书

跳出民族立场，客观审读书中对与日本多维度的分析，对当代读者了解日本文化，透视日本精神，解决关于日本的疑问以及对日本的未来做出预测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或细化到认识日本当今政治、经济现象，尤其总结日本工商业的成功和教训，也将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

● 一本精彩的学术书：严谨的调研与生动的案例相得益彰的学术书

全书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对日本社会风貌的生动描摹，更在于应用文化人类学技术工具进行的整理和分析。未曾亲临日本的本尼迪克特在纷繁的资料中，发掘出了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和性格特点，更不可思议的是，她对战后日本的预言得到了精确的证实。

● 一本附图的历史书：以浮世绘与现代摄影折射日本众生百态的历史书

本书附有250幅著名的浮世绘及当代摄影，包括日本著名绘画大师葛饰北斋的风景画，美女画师喜多川歌麿的艺伎图以及当代的摄影大师荒木经惟的惊世之作等，以画面的方式表现日本古往今来的众生百态，以比较的方法反映日本传统与民俗的承袭与演变。

ISBN 978-7-5442-3877-9

9 787544 238779 >

定价：58元

建议上架类别 | 社科·文化